

(第二次修订本)

虔诚与疯狂

(下册)

孙 涛 著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第七章

刘格平为自己造神。山西的武斗不断升级。兵团俨然以政府口气下达通令，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显示出这些中学生们对领袖的一片虔诚。

【1】搞政治，你一定要记住两条

兵团轰轰烈烈的各种活动连着搞了十来天，果然震撼了刘格平。参加七月会议的各路人马回到了太原，刘灏再次来找刘格平，再次提出上次提到的问题时，刘格平不敢再打官腔了。没有几天，在刘格平的亲自主持下，兵团司令刘灏被补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刘灏进了常委，红总站也要闹着再进人。刘格平只好答应给红总站再增补一些常委，此事一定，兵团就又不干了，也闹着要再增补。闹来闹去，山西革命委员会这个被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表扬了的新生红色政权，仅常委的名额就由最初的 27 人，增加到了 60 多人，而委员也越增越多，一直增加到 400 多人。直到 1970 年，谢振华取代刘格平主政山西后，在 4 月 12 日主持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才将省革委常委缩减到 34 人，委员缩减到达 235 人。

刘灏成了省革委常委后，刘格平还给了刘灏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呢？由刘格平自

已担任。排在刘灏前面的,还有两名副主任,一名是能打能冲的杨承孝,另一名是胆大多谋的郝庭云。原本是当初指挥杨承孝往前冲杀的堂堂兵团司令,这回一下子就变成排名在杨承孝后面的角色了。刘灏无奈,每逢省革委这个制止武斗办公室开会时,只要刘格平不在场,刘灏还得听杨承孝来主持训话。

刘格平如此安排自有小算盘,刘灏是袁振的人,用刘灏,自然不如用没有多少心计的杨承孝听话。安排来安排去,刘格平算是将七月会议后,受到中央封赏的山西两大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大大小小的头儿,都安排成了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红总站的领导和兵团的领导,都成了由他直接领导下的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刘格平心中,如此下来,在山西新政权中稳住三晋大地,岂不是有这两大派可靠的支持了吗?我已无法采访刘格平这位业已谢世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了,但可以肯定地说,刘格平无论有多少私心,但跟着毛主席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心,在他当时的思维中一定还是主流。而刘格平以为稳住了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干将杨承孝和兵团司令刘灏,就稳住了山西的政局,也一定是出于他的政治谋略所致。“文革”中全国各省夺权后在革命委员会的当政者,又有哪一位不是如此呢?

刘格平果然把刘灏视为亲信了。有一天晚上,刘格平突然派人来叫刘灏,说是想找刘灏谈一谈。格平同志传令召见,莫非是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消息?莫非是省里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新的动向?刘灏正在兵团司令部里,与他的助手李生全闲聊,便急匆匆拉上李生全,来到了已经挂上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原省人委大院。他俩走进刘格平的办公室,看见刘格平的脸上挂满倦容,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桔黄色的台灯反射出的光束,笼罩着这位神态显得苍老的胖老头儿。刘格平示意刘灏和李生全坐下,自个并没有起身。他开口了,对着兵团司

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他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还有刘灏带来的革命小将李生全，缓缓地开口说话了。先是天南地北地聊，聊着聊着，刘格平就换上了贴心的语气：“我今天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搞政治，一定要记住两条——这可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呐！”

刘灏和李生全洗耳恭听，同时看着大办公桌后面，三级高干那张高深莫测的脸上，正写满同样高深莫测的神情。真不知道刘格平今天突然要给他们传授的两条革命经验是什么？

“第一，别管钱。你看我，一辈子就是没有分管过财务，连工资，都是丁磊管，我懒得过问。第二，你说过的话呀，可以不承认，有些话呀，你一承认就惹下麻烦啦。”

刘灏由不得打了一个愣怔。难道这两条就是面前这位大人物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刘灏看看李生全，这位大学生也在凝神注目着刘格平。自打组建起兵团以后，刘灏身边，除了副司令宋捷，高参汤建中，还有许多如李生全这样的助手呢。可李生全似乎也听愣了。后面刘格平还说了好些闲话，刘灏是一句也没有再听进去，可这两条，他却记住了。而且在许多年后回忆起那个晚上刘格平的神态，以及说这两句话的表情时，都复述得栩栩如生。绝不是因为这两条有多么深刻，而是这两条让刘灏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不管钱，能算经验吗？说了话不认账，这也算是革命经验吗？大人物总有大人物谜一般的趣闻轶事，不管钱可以归入这一类。而说过的话可以不承认，则是刘格平这类大人物的一项政治原则。刘灏后来慢慢明白了，比如山西在夺权后搞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张日清和刘格平商量过没有？刘灏不清楚，可成立大会上，刘格平可是端坐在主席台上的呀！但到了七月会议上，当着康生的面和大伙的面，刘格平就敢说自个不知道这事情！19岁的准知识分子刘灏那时恐怕还理解不了，在中外古往今来的政治斗争中，运用过这项原则的政治家可不乏其人。关于这次刘格平

召见刘灏，李生全也曾向我回忆过。他说那次从刘格平办公室出来，就和刘灏分析议论，刘格平这位三级高干，看来是把兵团当成自家人了。

【2】《踏遍青山人未老》为刘格平造神

七月会议之后，刘格平是胜利者，而袁振不但是胜利者，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刘格平虽然胜利了，但面对山西的三大派群众组织，除了可以掌控红总站这一派外，对兵团和红联站两大组织，他却基本上驱使不动。即便有杨承孝的“武功”支持，这个杨承孝还得听一半袁振的。而随着红联站大部分组织投奔了兵团，袁振手下的造反派干将们可就越来越多了。面对这种局面的刘格平，想到了要在山西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才能立稳脚跟。他开始了一种“文治”。由他的夫人丁磊一手策划，一本书名叫做《踏遍青山人未老》，副标题叫做“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刘格平同志的迫害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小册子，便由红总站下属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突击编印出来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大搞个人迷信，刘格平分明是要学习神坛上伟大领袖的这一手了。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在特定的年代，毛泽东可以让自己变成神，但却绝不容许刘格平这一类地方诸侯也变成地方上一尊神的。

此书分8个部分：

一、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二、坐穿蒋家王朝的牢底

三、砸烂刘、邓司令部的桎梏

四、我自岿然不动

五、山西的春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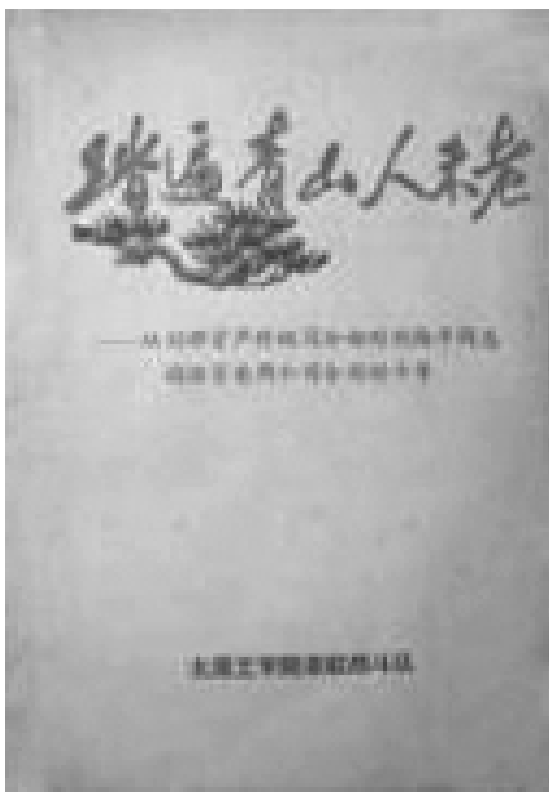
六、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七、踏遍青山人未老

八、结尾的话

在一、二部分里，主要介绍刘格平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杰出代表，是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敢把牢底坐穿的英雄。而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则是民族败类和革命的叛徒。在三、四部分里，介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黑司令部对刘格平的迫害，把他打入山西这个刘、邓黑司令部的“黑色保险箱”，只给个副省长，连个省委委员也不给等等。并点名批判了李维汉、杨静仁、汪锋、乌兰夫等走资派对刘格平的长期迫害。在五、六部分，主要歌颂刘格平在山西“文革”中向卫、王、王黑省委夺权的丰功伟绩。在七、八部分中，则把刘格平比作无比高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种当时只有林彪和江



由太工永红战斗队编著的《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书红极一时

青能受用的桂冠，戴到了刘格平的头上，多次称刘格平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将丁磊称之为“红岩上的红梅”，在描述了刘格平与61个叛徒集团做斗争，以及带领山西革命造反派向“黑省委”夺权时，这样歌颂刘格平：“如果说到刘格平同志功劳的话，确实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他对我们的伟大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射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必须重申，我们的刘格平同志不仅仅是

揭露了一个叛徒集团的问题,而是对整个世界进步人类和革命人民,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书中还把刘格平比作恩格斯,说“恩格斯创立了第二国际,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而“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格平是同‘刘邓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山西夺权胜利后,又同“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挖出了埋在核心小组里的定时炸弹。”作者还这样感叹道:“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是高深的。……我们无论如何写不出他的完美和高大来。”对刘格平的夫人丁磊,书中则肉麻地描写她是“只次于太阳亮度,银河系外还没有被更多人发现的特大明星”。在“文革”时期的新华书店里,除了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就是鲁迅的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再加上中国当时独一无二的作家浩然的那本《金光大道》,书架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别的书藉。在那时的新华书店里,绝无现在的“畅销书”一说。而这本歌颂刘格平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小册子,却以各种渠道流向全社会。它的开本是大32开,章回小说的写法,加上封面封底共52页。是一本共8万余字的记叙刘格平生平的传记作品。此书虽说文字粗劣,却可以看出极尽了作者有限的文字功力。书中对刘格平和他的夫人丁磊,颂扬和美化的句子有的连文理都不通。此书一印出,即由丁磊出面,给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们一人发了一本。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作为这本书的署名者,更是在社会上大量散发这本书。一时间,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人人争看《踏遍青山人未老》,人人争说《踏遍青山人未老》。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人员赞叹说:原来格平同志早就受到了刘、邓的迫害,要不是格平同志,那61个叛徒集团就揪不出来呀,能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的刘格平同志,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

生。反对刘格平的原红联站的人员(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变成刘灏手下的兵团战士了)却借此机会,给刘格平送了一个“刘未老”的绰号。你“刘未老”敢让人们说你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你把林副主席放在何处?把敬爱的江青同志放在何处?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你“刘未老”竟敢与林副主席和江青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你究竟想干什么?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是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呢,你“刘未老”怎么就敢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一争高下?更有一种传说,被这些刘格平的反对派们抓住了把柄,说某某地区的群众大会上,刚刚奏起“东方红”乐曲,身着绿军装的刘格平就在这乐曲声中走上了主席台,还频频向台下群众招手致意,并挥起了军帽。这“东方红”乐曲可是专供毛主席他老人家用,你刘格平是不是想取代老人家?说到底,这本当时在太原和山西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原本是要为刘格平歌功颂德,它确实让红总站的人读了为之兴奋,也让兵团和红联站的人从字里行间、书里书外,找到了刘格平的许多问题。

七月会议上,兵团和红总站一样,成了被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肯定的“革命的左派组织”。刘灏要掌握兵团的斗争“大方向”,岂能让山西的“土太阳”和北京的“红太阳”争夺光辉?刘司令下令,在兵团的报纸上开始批判《踏遍青山人未老》。红联站呢,虽然在七月会议上被定性为没有左派二字的“革命的组织”,但反对刘格平的决心未变。当初刘格平们向省委造反夺权时,支持刘格平的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大学生们,这时也改变了观点,站到了红联站一边,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刘格平。清华大学的邢晓光,在太原五一广场公开批判《踏遍青山人未老》,就是一种表态。

那是盛夏的一个下午。红联站在五一广场集会,偌大的广场,顿

时人山人海。邢晓光站在主席台上的麦克风前,手握那本《踏遍》,没有讲稿,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批判。时而将那本书举在面前,狠狠呸上几口,再继续他的演讲。

“文革”让中国的大学生们、中学生们不再研读所学的专业,而将他们推向了畸形的革命人生。仅就《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本书而言,它的创作者和批判者们,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再具体到山西大学的李大纲、方培泉与他的战友们、太原工学院的李青山、杨保明与他的战友们、山西省委党校的段立生与他的战友们、太原五中的刘灏与他的战友们、太原六中的李金渭与他的战友们、太原十中的马尚文与他的战友们、连同他们对立面中的各位学生领袖们;以及从北京来到山西,在太原一直为山西的“文革”做无私贡献的邢晓光等首都来的那些大学生们、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还是回到《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话题上来。此书究竟是谁所写,从当时的署名看,是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其队长高翔被刘格平提拔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分明与此事有关。而许多年后,当“文革”的历史已经掀过之后,恐怕没有人愿意承当此书的著作权人了。

在其后中共中央专门为山西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有一天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单独召集刘格平、袁振、张日清等核心小组的成员开会,康生指着刘格平大骂他的那本《踏遍青山人未老》。刘格平可是康生抓出61个叛徒集团的重要证人,在七月会议上,康生更是刘格平的坚决支持者。要不是《踏遍青山人未老》这本书对刘格平吹捧得过了头;要不是刘格平要和林彪、江青一样,也要给自个的头上戴上一顶“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帽子;要不是刘格平让人将他比作几乎与毛泽东一样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或者说是刘格平的下属如此而为得到了他的认可;要不是这些犯忌的内容太多太多,恨铁不成钢的康生,他能指着刘格平大骂?

【3】从北京来的红色播火者们离别太原

现在,让我们在继续讲述当年省城太原的“文革”历史时,把视角先转向从北京来的红色播火者们吧。

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后,在1966年的下半年,分别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共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接见全国赴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据官方数字,这八次大接见,先后共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300多万人。伴随着这八次接见的,则是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串连。大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坐火车不要钱,有些地方,坐长途汽车也免费了。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举凡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抽出专人,拨出专款,成立了大串连接待站,为各地来的学生们免费提供住宿和伙食。



兵团司令部工作人员与袁振(二排右八)及其夫人鲁克南(二排右九)欢送北京赴晋串连造反的学生们合影

这种由国家提供经济支持，由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们组成的大串连，除台湾省外，波及全国。其走出校门的人数有多少？未见官方数字，恐怕那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了。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创造，可谓独步古今，世上奇观。借用这种全国红卫兵和学生的大串连，领袖为他的“文革”进一步造势，靠串连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去各地播火，进而推动了各地的“文革”运动。直到1966年的12月1日，全国的铁路交通压力已不堪忍受，党中央和国务院才联合发出通知，停止乘火车、汽车、轮船免费串连。由于在外串连的大量红卫兵和学生们，依旧以步行方式周游各地，党中央又在1967年3月19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为了彻底遏制一直停不下来的学生大串连，同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第三条规定，“北京和各地接待机构，从9月28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地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各地的接待站开始统统解散，全国的红卫兵和学生的大串连才宣告结束。

关于这次大串连，官方的用语是“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学生们都是红卫兵。但历史慢慢掀过了一页又一页以后，后人已经忘却了真实的历史过程，红卫兵和当年的革命师生，渐渐被“红卫兵”一种概念取代了，须知，当时他们的革命行为和方式，是大有区别的。

参与大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朝拜红色圣地的。当时的延安、瑞金、井冈山、韶山、遵义等地，都曾有过人满为患的情况，迫使当地政府不得不贴出公告，恳请各地准备来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延迟前来。

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多自发成立一个组织，剖析一下山西大学井冈山长征队，即可窥豹。山西大学数学系63级学生石敏和



刘格平(二排右五)送北京赴晋串连造反的学生们合影

刘大寿,组织 13 名红五类出身的同学成立了井冈山长征队,石敏是队长,刘大寿是指导员。出发前,每人兑换了三个月的全国粮票,以每天 5 角钱的标准准备好了伙食费。(当时没想到好多接待站是免费吃饭的)另外必不可少的,是人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刘大寿还带了一本中国地图册。1966 年 10 月 27 日从太原出发,一路步行去朝拜红色圣地井冈山。当天到达榆次后寻宿,住在地委党校。第二天一早,听到广播里播送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的消息,当即由刘大寿起草出一份欢呼胜利,表态坚决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打倒帝、修、反的传单稿,直接去地委机关找到地委书记王绣锦,要求印制一千份传单,沿途宣传散发,王绣锦签字照办。又提出要用长途电话给《山西日报》口头传稿,王绣锦也点头照办。学生们拿上传单继续上路。10 月 29 日的《山西日报》二版头条,在《全省军民热烈欢呼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综合消息中,提到“山西大学数 63 级井冈山长征队和太原重机学院东方红长征队,当他们行进榆次、忻县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

的消息,就赶印了几千份传单沿途散发,向群众进行宣传。”

11月5日,这支长征队途经山西长子县,免费住到县政府招待所,又听到广播里播送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京第六次接见全国赴京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消息,13名大学生又群情激奋,你一言,他一语,由刘大寿执笔写成了《毛主席鼓舞我们前进》一文。文章既成,就去邮局给《山西日报》挂了长途,值班编辑正需这类稿件,遂请刘大寿一字一句慢慢念文章,由值班编辑一一记下。这个长途电话挂毕,营业员出示了24元钱的通话费。24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啊!这种革命行动还要钱?但营业员认死理,不交钱不能走人。最后了断,是由县委办公室出面,把这笔通话费记到了县委的账上。那篇文章,刊发在11月6日《山西日报》第二版的“革命小将来信”的专栏中。这13名大学生果然一路走到井冈山,虔诚之心,化为一路风尘一路歌。从刘大寿保留的串连日记中,可见到他们当年坚持读小红书,并为驻地老乡做好事的不少情景。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串连学生们,有问题会找当地党委和政府解决,但不介入当地的革命造反活动。

二:更有大量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趁大串连游山玩水,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过了一段可以免费吃喝、免费住宿的旅游生活。笔者当年正上大学,中央下文件搞运动了,不上课了,因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无缘参加红卫兵,后来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也得以有了革命学生的身份和大串连的机会。第一次走出娘子关,下江南,游杭州,去上海,确实也玩了个痛快。

三:煽风点火并参与当地运动的。许多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串连之地,融入了当地的运动,他们和当地的不同群众组织结成同盟,成了当地“文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串连的红卫兵们热衷于和当地的红卫兵们结成同盟,一道破四旧,而串连的革命师生们,却往往和当地的革命师生们一道合力,将斗争矛头指向地方的当权派,

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当时的太原,已经有了官办红卫兵组织,从北京来的一些红卫兵们,和太原的官办红卫兵们一道,大搞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前面《五中井冈山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节中所述,从北京二十六中来到太原串连的那几位北京红卫兵,就直接参与了在太原五中组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文革”活动。

当时的太原,除了红卫兵组织,一些大中学校的群众造反组织,也纷纷杀向社会,他们以省委、市委为革命目标,造反原因,是省委、市委在运动之初,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学生组织又因观点认识有分歧,分成了两大群体。一大群体以刘灏率领的五中井冈山这个组织为核心,他们的观点,认为袁振是受黑省委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省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大群体以太原工学院李青山、杨保明率领的太工红旗这个组织为核心,他们的观点,认为省委的卫、王、王是走资派,太原市委的袁振也是走资派。



山西大学数学系 63 级井冈山长征队在武汉长江边留影。后排右四是队长石敏,右二是指导员刘大寿

从北京来太原串连,并直接与当地的学生造反组织联合,参与太原“文革”运动,将造反矛头对准省委和市委走资派的北京学生们,也有不少。有代表性的是四个组织,分别是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北农机全无敌纵队、北航播火兵团、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由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朱永庚、清华大学的大学生邢晓光等大学生挑头,人数较多。在太原,他们明确地支持太工红旗和随后组建起的红联站,与红联站观点一致,认为省委的卫、王、王是走资派,太原市委的袁振也是走资派。在华北会议上省委批判袁振,不过是舍车保帅的做法。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由北农机的13名大学生组成,大队长是梁颺。他们明确地支持刘灏领导的五中井冈山和随后组建起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认为袁振是受黑省委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省委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与兵团一道,支持袁振翻案,将革命造反的矛头,对准了省委的卫、王、王。

北航播火兵团人数不详,挑头的是北航的大学生鲁凡、王世志等。面对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和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的两种不同观点,他们对太原的“文革”形势表态较晚,一直在用搞飞机设计的精准姿态,搞调查研究和观望状。最后这批大学生表态坚决支持刘灏,支持刘灏后来组建起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与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站到了同一战壕内。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李元吉、北京政法大学的李成义、张龙、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乔清维等挑头,人数较多。他们在太原的活动独立性较强,在炮打省委时,既联合刘灏领导的五中井冈山和随后组建起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也联合太工红旗和李青山、杨保明们随后组建起的红联站。

与这些北京赴晋造反的大学生们的组织相反,北京二十六中那



1966年10月山西大学化学系三年级12名同学组成红色长征队步行去延安途中

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以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从北京来太原的其他红卫兵们，全没有参与山西的1·12夺权，而上述四个从北京来太原串连、播火的大学生们的组织，则全部参与了由刘格平领导的山西1·12夺权。在夺权后的公告中，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北农机全无敌纵队、北航播火兵团、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四个组织的名字，赫然排列在参与向山西省委夺权的25家革命造反组织的名单中。在本书第五章有关山西1·12夺权的小节中，相信读者已见到了这个名单。

“文革”是党中央下发文件，由毛泽东主席领导和发动的群众运动，这些从北京来的革命学生们，心中怀着革命的理想，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精英，是那个年代备受赞扬的弄潮儿，也是那个年代践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播火者。直到1·12夺权成功后，太原市和山西省先后建立了受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支持、被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这些从北京赴晋的播火者们，才先后离开了太原，返回了首都。他们参与了山西这一时期的“文革”，事件纷

繁,具体在什么事件中,他们做了推手,已难一一考证了。需要说明的是,在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后,还有个别北京的大学生们留在太原,但他们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个人行为,从北京来到太原的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北农机全无敌纵队、北航播火兵团、晋京革命造反大军这四个由北京大学生组成的群众造反组织,实际上也就解体了。

在我收集到的老照片中,有两张留下了当年北京赴晋造反学生们的身影。一张摄于1967年9月27日,照片留有“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工作人员与袁振、鲁克南同志欢送北京赴晋战友合影留念”一行字,(孙涛注:鲁克南是袁振夫人)可见这些从北京来的播火者们,在参与太原轰轰烈烈的“文革”后,最后一批同学离开太原的日期,正是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之后。另一张是刘格平和参与1·12夺权的北京赴晋大学生们的合影,合影时间不详,但可认定是刘格平执掌了三晋大权之后。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本地起来造反的学生们,有的因官办红卫兵宣扬血统论,受到过排斥和打击,有的在运动初起时,挨过校党委和工作组的整肃,后来在成立革委会时,也会为本组织的利益争夺委员名额。如果说,这些是他们听从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时和胜利后所含的一些私人动力的话,那些从北京来到太原,并直接参与了太原“文革”的大学生们,他们参与“文革”造反的行动中,完全没有这些私心和动力,他们心中,只有当时被官方媒体灌输的防修反修理想,和为伟大领袖设定的这种理想去革命造反的精神。他们与太原革命造反的学生们一道参与“文革”,是太原十年“文革”历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全国“文革”初期的一种现象。回眸历史,当局

先鼓动学生批斗校长和老师，再支持学生走出校门，到处去革命造反，下令让他们返校后，又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期去领导学校，将校园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可谓独一无二之奇观。

【4】红总站密谋拦截袁振

跟着毛主席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心，在袁振当时的思维中一定也是主流。刘格平要搞稳定，一手成立了制止武斗办公室，而且将杨承孝和刘灏都“安排”了，在袁振看来，这分明是在拉人，而且是要把一直支持自己的两个造反派大头目拉走。于是，袁振也要贯彻党中央的七月会议精神了。如何贯彻？袁振自有高招：那就是赶紧召开全省的“工代会”和“红代会”，名为促进大联合，实为由他出面安排人。所谓“工代会”，即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所谓红代会，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大会。这种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通过大会选下的“工代会主任”杨承孝，和“红代会主任”刘灏，那可就成了正儿八经，可以号令全省工人阶级、全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官儿。这官帽是谁给他俩的？他俩能不清楚吗？能不领情吗？两个主任定了，再设立一些工代会副主任和红代会副主任，不是能更多地将一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团结到自己的麾下吗？

正好，刘格平到晋东南召集这个地区的两派领导，设法制止武斗去了。袁振就开始紧密策划，做好了抓紧同时召开这两个会议的准备。人选呢，除了“工代会主任”杨承孝，“红代会主任”刘灏，其他的副主任和常委们也都拉好了名单。这些人只要头上戴上这些官帽儿，还不清楚这些官帽儿是谁给的吗？正如太原市的革命委员会在夺权后，能以最快的速度成立起来一样，袁振是干这种事的好手。方案拿定，

立即派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向刘格平报告。刘格平倒没有啥意见,批示同意了。但刘格平的老婆丁磊不干了。丁磊一下子就看出了袁振是怕杨承孝和刘灏都跟了刘格平,这“醉翁之意”不在两会,全在巩固对杨承孝和刘灏的掌控权呀。刘格平已经表态同意由袁振来操办这两会了,现在明白了袁振另外的意图,也不好马上就自我反悔。这不怕,丁磊不是有红总站这样的大组织吗?找来红总站的领导们一商量,先用大字报揭露了袁振的阴谋再说。于是,红总站在省城刷出了一大批大标语:“袁振背着刘格平同志筹备工代会和红代会是分裂省革委的大阴谋!”这还不算,打听到袁振11月16日要去太原河西工业区筹备两会,红总站的领导们安排下属人马,拦截了驱车前往太原河西工业区的袁振。红总站的这些人马只是奉命教训一下袁振,虽然袁振没有挨一指头,但他的小轿车,却被长矛捅得爆了胎。虽说是惊无险,袁振还是吓坏了。

让刘格平的老婆这么一搅,袁振想开两会的事,也只好搁浅。

兵团闻讯,立即将此事定性为“11·16 刺杀袁振事件”,发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文革”时期早已没有了党纪国法,无论是起来造反的领导干部,还是起来造反的学生和工人,没有纪律可以约束他们。袁振被围,小轿车被捅破了轮胎,谁干的?袁振一调查,就有告密者。明白了此事是丁磊和红总站所为,袁振比在河西区被拦截时还生气。袁振气坏了,马上就有兵团的人马街上街刷出大标语,矛头直指刘格平。刘格平的问题是现成的,就拿那本《踏遍青山人未老》说事,袁振让手下的兵团战士们(有许多是原红联站的人马)开始公开批判这本书,怎么批判,都不为过。袁振和刘格平的矛盾,这个时候开始渐渐在社会上明朗化了。兵团和红联站批判《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一时间遍布省城。

1967年的下半年,面对着被刘格平控制了了的三晋大地,两个被中

央冠以“革命左派”的群众组织红总站和兵团时有摩擦，而没有被中央冠以“左派”两字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站，也并没有销声匿迹。三大组织都想主宰山西的局面，将各自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派斗渐渐演变成了武斗。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团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对的！”第二天的上海《文汇报》上，被江青肯定了的这个口号就向社会公开了。

好一个“文攻武卫”，全国所有的武斗从此都有了理论指导。

山西三大派之间的种种摩擦和活动，也在“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指引下，出现了武斗的大规模升级。

下面截取的，是那一阶段几次大规模武斗的典型片断。

【5】大型武斗剪影之一：省委党校与山西大学

1967年的省城太原，三大群众组织及其下属大大小小的组织，派斗演变成了武斗，在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在不少工厂，不同观点的组织对峙，各自构建起自己的武斗工事。其时，山西大学的教学主楼，由红总站观点的8·14一派占据，教学楼后面的图书馆大楼，则由时而红联站观点，时而兵团观点的8·8一派占据。两楼同一朝向，中间相隔着一块很大的空地。两座高等学府内的大楼，成了两派的武斗工事。两派的学生们和教师们一道，将两座楼一层的所有窗口，都用砖封死，楼门也用钢筋棍和钢板焊成工事状，只留一个小铁门供本派师生出进，真有同大楼共存亡的气魄。原本应该好好读书的大学生们，竟过起了与读书毫无关联的另类生活。

当时山西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曾担任 8·8 一派男广播员的郭介成同学,在 1967 年 6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

人类好像又回到了荒古的时代,法律制度这些民约的和法定的权威,似乎也不再起作用了;人们又得像荒古时代防御野兽一样,搬到高的地方,准备好石头木棒来保护自己。四层的图书楼变成堡垒,大家像准备打仗一样,用各种木料(木质很好的很厚的书桌桌面)在各楼道口,设起障碍,找来许多石子和石灰。重要的东西都搬到了四楼。宣传队把他们的乐器也搬上来了。一些女同学,在用红绿色的传单包石灰。……坐在四楼顶上准备被打砸抢,很有可能被好端端地揍一顿,弄不好还得被装在麻袋里,被埋起来。天知道明年的现在我在哪里?干什么?正如同去年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坐在设防的楼顶上,准备击退什么永红、四野的进攻一样。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生活。(摘自《我们文三甲——山西大学中文系 63 级甲班同学回忆录》一书)

当中央文革小组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还没有召开前,杨承孝为了报被红联站生擒活捉之仇,带领决死纵队,对红联站的核心组织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实施了又一次打击。事情的起因,源于兵团六中 32111 一派的中学生们,联络了兵团另一些下属组织,要去省委党校抓一名叫葛莱的教授。这位教授参加了党校东方红,东方红是红联站的核心组织。这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位教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阐述他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点,“文革”开始,就被学生们批判为“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唱反调。”中央党校的杨献珍教授,曾提出合二为一的哲学观点,“文革”初期就被揪出来打成了黑帮,你东方红却吸收葛莱参加你们的组织,岂不是藏污纳垢?更深层

次的原固,是兵团做了个4·14决议炮轰刘志兰,红联成了反对派,兵团要找个理由打压一下红联站。6月20日上午,这些中学生们冲进省委党校闹哄哄半天,也没有找见葛莱教授,只是和党校东方红的一些大学生们,发生了些肢体冲突。兵团无果,就去请决死纵队帮忙。时隔多年,有无此事?是谁去联系的杨承孝?已难调查清楚,但当时兵团与红总站、与决死纵队持共同观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6月20日晚上,天刚擦黑,杨承孝带着一万余名决死纵队战士和红总站的武斗队,突然奔袭省委党校。这一回,不是简单的围困了,在杨承孝指挥下,主力由党校大门涌进,其余兵力合围住党校四周,在防范党校学生翻墙逃跑的同时,这些武斗人员也翻墙而入,对省委党校作了彻底扫荡。党校东方红的学生们猝不及防,凡开始反抗者,全部遭受毒打镇压,有的教师住在校内宿舍中,也受到搜查和侵犯。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们见好东西就抢,当晚大胜而归。第二天,即6月21日,同样是天刚擦黑,红联站的另一下属组织,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造反兵团也遭到决死纵队和红总站武斗队的突然袭击,还被抓走几名学生。

攻打省委党校和山西会计学校得手后,杨承孝又对山西大学的8·8红旗战斗队一派下手了。山西大学的8·8红旗战斗队组织上投靠了兵团,观点上却替红联站呐喊,打他们,就等于既打了兵团,也教训了红联站。再者,这个组织因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向毛主席请过罪,现在翻翻他们的旧账,再收拾他们一下,岂不是出师有名、顺理成章的捎带吗?

7月19日,杨承孝的决死纵队突然围攻了山西大学。先是互相喊话,继而决死纵队用教学主楼上8·14一派的广播,与困守在图书馆楼内的8·8一派,彼此用高音大喇叭展开谩骂。同时,决死纵队的战士们,向图书馆的高楼上扔石子儿进攻。图书馆内的8·8小将们,则

向楼下的工人们抛石头和用纸包好的石灰。决战是在7月21日的上午开始的。大批的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们，挺着自制的长矛开始攻击图书馆的大楼了。从图书馆的大楼上，突然抛下来一颗颗闪光的东西，落地后随即炸开，顿时臭气熏天。正在图书馆楼下朝着窗口和大门进行攻击，欲强行攻入楼内的决死队员们，一个个吓得大喊：“8·8扔下毒气弹了，快跑，快跑！”强烈的进攻，于是暂时停歇。这是决心与图书馆大楼共存亡的8·8一派，从河西一家化工厂的同派战友那里弄来的一大批溴水。此物洒开后臭气冲天，装入瓶中，形同毒气弹，不明就里的决死纵队不敢再贸然攻楼了。

决死纵队进攻山西大学8·8一派的战斗，未果而终，在21号傍晚时撤离了山西大学。原因多多，有三条在此一录。其一，8·8一派当时派出两路说客，争取救援，以减少损失和牺牲。一路去离山西大学不远的驻军69军军部求救，一路是负责宣传的副大队长侯光天，带人到教学主楼与8·14一派的大队长朱永成面对面谈判。侯光天指出，一旦决死纵队攻入图书馆大楼，势必造成楼毁人亡的局面，希望朱永成从长远看问题，劝说他们的同盟军决死纵队撤兵。其二，山西大学8·14一派的学生中，也有不愿武斗的正义之人。当时任该派宣传部长的王作柱同学和另一位学生领导，悄悄来到决死纵队围攻8·8一派的前线指挥部，坦言攻打图书馆大楼，必然造成双方重大伤亡，等决死纵队一走，失去工人阶级支持的8·14一派师生，必然要遭到8·8一派进一步报复，力劝决死纵队前线指挥部的头领，已经对8·8一派教训了两天时间，放弃攻楼算了。其三，还有8·14一派管资料的安大钧同学，也悄悄到69军军部，说明事态严重，请部队出面让决死纵队撤兵，以免事态发展造成师生们伤亡。不同的合力起了作用，决死纵队终于歇兵，撤出了山西大学。8·14一派的王作柱、安大钧等人，事后怕被同派战友斥之为“叛徒”，在校期间对他们此次暗中

所为，一直守口如瓶。

【6】大型武斗剪影之二：平遥古城

晋中地区的平遥古城，8月7日至9日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斗，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当时被坊间称为“平遥87事件”。

平遥的两大派组织，一派是支持张日清和平遥人武部，反对刘格平和晋中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任井夫、王振国和张怀英的平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另一派是支持刘格平和任井夫、王振国和张怀英，反对张日清和平遥人武部的平遥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总司一派人多势众，人数相对较多，不少人是党团员和贫下中农。联络站一派相对人少，不少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出身有问题，还有一些骨干是在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以及“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人。

七月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在晋中要坚决支持陈永贵和任井夫、王振国和张怀英。但在晋中，两派的武斗，并不因为七月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而平息。7月20日，王振国奉刘格平之命回到晋中，传达七月会议精神。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和任、王、张的一派，组成一个会场，由王振国负责传达，他们听了传达欢心鼓舞。支持张日清和晋中人武部，反对陈永贵和任、王、张的一派，组成另一个会场，由晋中军分区的领导负责传达，他们听了传达，却不服气这种来自北京的“圣裁”。具体到平遥，总司一派和联络站一派的对峙，在七月会议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各自剑拔弩张，要以武力相拼了。

8月1日，平遥总司一派召开庆祝建军节的拥军大会，县武装部全力支持。联络站一派这一天召开学大寨会议，表态坚决支持陈永贵和地区核心小组的任、王、张。各自的大会开完，两派都上街游行。队伍相逢，各喊各的口号，互不相让，继而武斗。除了拳脚，双方都用上

了棍棒、砖瓦。一场混战，不分胜负。

8月3日，平遥城内，两派在县城南门重新开战。除棍棒、砖瓦外，还用上了钢筋棍。武斗中，总司一名队员受重伤，被抬出战场后死亡。

8月4日，平遥的两派继续发生武斗，联络站一名叫田礼的中学生被打死。联络站一派的几个据点被



陈永贵和楊成效等同志正在指揮平遙平叛戰鬥。

总司一派攻下。联络站退守在平遥一中，和与之相连的城隍庙。

8月7日，开罢七月会议的陈永贵，和张怀英等领导人来到平遥，要宣传和贯彻七月会议精神，制止武斗。老陈原本就是支持刘格平，支持当年“受黑省委迫害”的晋中地区老领导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的，七月会议上有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表态，老陈的腰杆更硬了。陈永贵一行先到了联络站驻地平遥一中，并用联络站的高音喇叭发表讲话，支持刘格平，支持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支持联络站。总司派出人马，围困住一中，要和陈永贵见面、谈判，非要向老陈陈述他们革命造反的战斗历程，好让老陈再表态。联络站一派死守一中，绝不让总司人员前进一步。两伙人于是先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继而开了枪。联络站一派为了陈永贵的安全，又掩护陈永贵一行转移到了城隍庙。总司的高音喇叭里说，联络站扣押了陈永贵，联络站的高音

1967年8月25日出版的《决死战报》刊出此新闻照片。照片原说明中的杨成效(左一)即杨承孝“文革”时的用名。中间为陈永贵

喇叭里说,总司要揪斗陈永贵。两派在高音喇叭里互骂,总司依靠人多,封锁了平遥县城,围困了城隍庙。两派武斗越演越烈,陈永贵解决不了问题,又出不了平遥县城,遂派手下人,悄悄出城,去毗邻的祁县,找69军驻在当地的的一个团部,借用部队电台,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发电报求救。称:“我在今日下午6点到平遥城,进城后十分钟内,总司开枪打伤六个革命小将,并把六道城门全部封锁,通讯联络全部中断。经了解完全是由人武部和公安局的一些人操纵的。事态正在发展,请速采取措施。”当天,在平遥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人,也将陈永贵被困平遥的消息传回山西分社,由分社将此事急报北京。

在《百战将星谢振华》(欧阳青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一书中,作者对8月8日谢振华带部队解救陈永贵一事,作了详细的描写记述: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三人,迅速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立刻把消息传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深思熟虑的周总理认为,陈永贵是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劳动模范,又是大寨的带头人,尽管他有派性,但我们还是要营救他,保护他。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立即照办。于是,他迅速命令驻祁县的319团(孙涛按:有另外资料说是4656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50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自率一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300里开外的平遥解救陈永贵。

清晨,谢振华率部赶到平遥后,立即让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带任何武器徒手与两派头头联系,力

劝双方平息事端。

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在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于是，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

谢振华便令部队迅速进城。

后来，成为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冯东书，在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描述道：“徒手连的战士站在三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城门洞里开了进去。我们同行的另一位记者范银怀也穿上军装混在解放军战士中间进了城。过了一会儿，这三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开出城来。他们仍是手摇语录，高呼口号，虽未带枪，但气势壮观。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当时，城门上还站着许多‘总司派’的人，但有周总理的指示，又有这么多解放军，他们没有动手。”

谢振华没费一枪一弹，便把处于绝望之中的陈永贵解救了出来，既让两派群众十分佩服，更使陈永贵感激万分。他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谢振华虽然对陈永贵支持一派挑动武斗的做法不赞同，但出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和对大寨人民的感情，还是真心实意解救了他。

陈永贵被69军救出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完。69军撤离平遥了，刘格平任命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杨承孝却杀向平遥了。有“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组成的最高指示，大寨党支部书记和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永贵，便是响当当的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陈永贵在平遥竟然被“扣押”，由革命的义愤而激发出革命的烈火，一下子就在省城太原燃烧起来。陈永贵去平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8日，为了支持陈永贵，声讨平遥总司的一小撮坏人，刘格平召集兵团、红总站、还有那个在七月会议上也被定为“革命左派群

众组织”的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左派领袖们,让这些七月会议上受到表扬的革命左派组织,联合起草了一个《关于平遥 8 月 7 日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内容共四条如下:

1.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最最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我们将永远和陈永贵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2.任、王、张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是长期受卫、王、王和王秀锦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击迫害的。我们坚决支持任、王、张等革命领导干部。

3.坚决支持晋中地区和平遥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切行动。我们誓与晋中地区和平遥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4.平遥总司、晋中军分区、平遥武装部一小撮走资派和总司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下,围攻陈永贵同志,多次调动民兵带枪进城镇压革命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黑司令部。必须把晋中军分区、平遥武装部一小撮坏头头彻底揭露,斗倒、斗垮、斗臭。我们热烈欢迎总司的广大受蒙蔽群众起来造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第 4 条中那句“我们热烈欢迎总司的广大受蒙蔽群众起来造反。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是刘灏执意让加上的。其不为人知的潜台词,是晋中和平遥那些总司的人马,很快就是兵团的人马了,当然要表明他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了。

原以为发个声明,报上一登就行了,刘灏没想到,省革委制止武斗办公室的两名副主任杨承孝和郝庭云,还要向刘格平请缨,要去平遥平息叛乱。他也是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看看人家刘格平,正在赞许地点头呢,刘灏不能唱反调了。会上当即决定,由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杨承孝,亲自率领他的决死纵队弟兄们,还有红总站、兵团的一些下属组织,真刀真枪地全副武装,马上从太原出发,一路南下,直扑平遥古城。自然有人打电话通知各路人马出征。

杨司令要求刘司令去陪同作战。刘灏却另有想法。在晋中,刘灏

救出的任、王、张三人，眼下成了晋中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和晋中军分区唱的是两个调门。刘灏本来想将他们纳入兵团麾下，但这三人和支持他们的一派，却跟上陈永贵，站到刘格平和省城红总站一边了。具体到平遥，联络站一下子就成了革命的左派组织。总司呢，也要戴一顶革命左派组织的帽子，正与省城的兵团司令部联系，要加入兵团呢。这种情况，兵团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焦根林，早就给刘司令汇报过，也就是说，杨承孝带着队伍此番前去讨伐的，是不支持陈永贵和任、王、张的平遥总司一派，而这一派，马上就要易帜，属于兵团的下属组织了。可偏偏省城的一些兵团组织，却在省革命委员会和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号令下，派出人马随杨司令开上了前线。这不是自家人去打自家人吗？怎么能让兵团战士的刺刀，去捅即将成为兵团战士的胸膛呢？

“备车！”刘司令当机立断，坐上吉普车“出征”了。发了疯似的一路追赶，他要把自个的队伍半路截住，决不能让兵团去自相残杀。这事儿不能公开下令，只能和武斗队的头目私下说。好不容易才截回一点人马，而绝大多数已难追回，他们早随着杨司令的大军，杀到了平遥古城的城墙之下。刘灏可不敢追到平遥去。他明白面对大寨红旗的举旗人陈永贵，绝不可持对立的态度。由他们去吧！刘灏只好悻悻然返回太原的兵团司令部。

由太原去平遥的公路上，那一天车辚辚、马萧萧，省城各路武斗战士钢枪铁矛举得高，好一派英武雄壮气势豪！平遥古城，保存着巍然城墙，俯瞰古城，形状似龟，古称龟城。龟头龟尾和四脚处共设六座城门。杨司令带领的大军，先将古城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攻城。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部主办的《决死战报》，1967年8月25日出版了第三期。三版上，曾刊出一篇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署名的长篇通讯，题为《晋中平原奏凯歌——决死纵队捍卫毛

主席革命路线威振晋中平原》。文中点明,8月8日决死纵队有五千余名战士开赴平遥。对8月9日的那场武斗,有如下报道:

9日,我纵队战士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向龟缩到县党校里的平遥总司的顽固军反逆流公社大举进攻,冲过枪林弹雨,突破层层工事,一举捣毁了这个反革命的重要巢穴,生擒一小撮幕后操纵者和制造反革命叛乱的首恶分子,缴获大量杀人凶器及反动宣传资料。

晋中作家陈瑞、温晋生在《“文革”时期发生在晋中地区的武斗事件》(载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2年月12月所编《山西纪事》(1949——1978)下册)一文中,记下了平遥武斗事件发展到8月9日的结局,摘要如下:

8月9日晨,谢振华率部陪陈永贵重返平遥,“制止武斗”,“解决两派冲突”。上午9时许,红总站的武斗队(孙涛按:即杨承孝带来的武斗大军)包围了总司的所有武斗据点,随即发起进攻。至下午两点左右,总司除部分人员突围外,其余全部当了俘虏,武斗基本平息。而武斗中的被俘者,均“押送受审”,遭到毒打。支持总司的武装部领导人被抄家,受到处理;武装部全体进学习班,另外成立825战斗队,接替武装部工作。全县对各公社总司派进行大清洗,各公社、机关、厂矿还对部分总司派人员实行开除、抄家、游斗、办学习班。总司派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与总司派相联系的平遥武装部相关领导亦被牵连在内。

那一天,平遥古城内,从太原来的各种派旗哗啦啦地迎风飘扬,

头戴柳条帽的决死纵队和红总站、兵团的其他盟军们，呐喊着冲向总司的驻地。沿途为了杀出威风，一路打砸下去扩大战果。参战的红总站战士和兵团战士，确实是充满了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们只听领导们说，平遥的总司犯下了反对刘格平同志和反对陈永贵同志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他们是为保卫陈永贵同志而战，而保卫陈永贵同志，就等于保卫毛主席，这样的战斗，岂不是伟大的战斗？古城内，有些店铺被抢；陈永贵到过的那所中学校内，教职工和学生们放在存车棚里的自行车，也被省城来的武斗人员们装上卡车，一扫而光。本该班师得胜返回太原了，可杨承孝杀得性起，想起了那回红联站将他生擒后，不但在平遥的总司驻地被囚禁过，还在太谷山西农学院红联站的下属山农火炬总部被囚禁过呢！平遥的血海深仇算是洗了，太谷的奇耻大辱岂能不雪？山西农学院火炬造反团（简称山农火炬）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那回就是这个组织的学生们出面，帮助太原红联站的小将们囚禁杨承孝的。只听杨司令铁令如山：“路过太谷，给我砸掉山农火炬！”

决死纵队在途经太谷时，曾与红联站的一些组织相遇，双方发生了冲突。在上面提到的《晋中平原奏凯歌——决死纵队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威振晋中平原》一文中，有下列记述：

8月10日，我决死纵队完成战斗任务胜利返并途中，与红联站、十三冶红总部开向平遥去的车相遇，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拦阻我方车辆，拣起张日清的语言恶毒地咒骂我决死纵队是“打砸抢的急先锋”，扬言什么要“运动后期再说”，更有甚者，乘我车队到达太谷地区休息之际，山农火炬一小撮混蛋竟偷袭、挟持、绑架我方两名队员，直到我大队开动回并时，得到当地革命群众的报告才发现此事，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

决死纵队斗志正勇，一鼓作气，8月9日黄昏，杀进位于太谷县城的山西农学院，那些工人师傅们砸锁破门，四处寻找战利品，广播器材装了一卡车，其他斩获不知多少。教学仪器被砸的支离破碎，优质良种被抛洒一地。返回太原后，杨承孝依旧威风凛凛，沿途又砸了许多红联站的下属组织。路过山西省会计学校，进去砸会校井冈山（全称为会校井冈山造反团），路过山西省冶金专科学校，进去砸冶校红旗（全称为冶校红旗战斗队），最后又冲进省委大院，再次对七一公社总部一顿打、砸、抢……

而这一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江青高喊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刘格平利用他领导下的制止武斗办公室，用他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去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就成了对“文攻武卫”的最好诠释和实践。

杨承孝绝对没有想到，他依靠武斗树起的威风，实际上正在为他日后的命赴黄泉铺着道路。毛泽东让学生们革命造反，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打倒刘少奇的大气候，可日后各地武斗成风时，北京神坛上的老人家就开始另有想法了。用军队制止武斗，那是后话。

8月10日下午，省革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六千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叛乱大会”。刘格平、袁振、谢振华等省革委和军区、驻军领导人出席了大会。陈永贵身着军装，在大会上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遂后大讲如何平息了平遥反革命叛乱的过程。会上，宣读了省革委就平遥事件的告全省人民书。

第二天，兵团、红总站和解放军驻晋部队，在太原五一广场隆重集会，15万人到会。刘格平、袁振等省革委领导人再次到会，庆祝陈永贵解决平遥问题凯旋。李顺达专程从平顺西沟赶来参加了这个大会。那天，先被平遥总司围困，后被谢振华救出平遥的陈永贵，成了平

息平遥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大英雄。

当天会后，杨承孝又率领大军再度出征，直扑太谷县，对红联站的山农火炬作第二次打击。在《晋中平原奏凯歌——决死纵队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威振晋中平原》一文中如此记载：

我决死纵队不可欺！我决死纵队不可侮！任凭你天高路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决死队员所向无敌！8月11日下午一时，在红总站及太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一声冲锋号响，仅用15分钟便突破了层层工事，战旗插上主楼峰顶。山农火炬纷纷举手，缴械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在山农体育场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除一小撮坏头头勒令他们检查交待所干的罪恶勾当之外，其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反戈一击，坚决回过头来，与我们广大战士一起参加了声讨罪魁祸首张日清、兰敏及刘、陈、刘反党集团的罪恶大会……

攻打平遥刘灏没去，而且当时还想拉回自个的队伍。但平遥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了，自然是坚决支持陈永贵。好在兵团的一些下属组织，也作为参战部队参加了攻打平遥，这功劳兵团不能不要。红总站在攻打平遥中出动的人马比兵团多得多，可在刘灏的安排下，兵团在事后刷出的大标语却比红总站多得多。陈永贵在那时是伟大领袖支持的大寨红旗的擎旗人，对陈永贵的态度，关系到对伟大领袖不忠的政治原则。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陈永贵，刘灏也认定必须支持陈永贵，在山西才能永保党中央所赐“革命的左派”本色。那些大标语在省城铺天盖地，内容很简单：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其一。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解决平遥问题。此其二。兵团战士永远和陈永贵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此其三。

这是一种政治态度。而兵团的另一种组织行为,则是在不久后,即吸收平遥总司加入了兵团。加入了兵团的平遥总司一派人马,终于也戴上了“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的红帽子。

【7】大型武斗剪影之三：太原重机厂

太原重机厂,古城太原一个大型的重工业企业。

这里的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做太重红旗,清一色产业工人,持红总站和兵团观点;他们的领导人是杨润智和查德林、张士宽等。另一派叫卫东彪,后来扩大为东风野战军。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批军人集体转业地方,这批战士来到太原重机厂,脱下绿军装,穿上了新工装,成了太原重机厂产业工人大军中的新鲜血液。“文革”开始,这批转业军人自成一派,先叫做卫东彪战斗队,持红联站观点。这批转业军人推出自个的领导人,是位在部队时就很活跃的年轻军人,名叫金泽志。两派都是产业工人,太重红旗自不必说,喻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卫东彪战斗队更具特色。卫东彪,是保卫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林彪是副统帅,为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而战,也是要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卫东彪战斗队要与太重红旗一争高下,又联合一些观点相同的小战斗队,成立了东风野战军,简称太重东野。其属下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全由这批转业军人中当年的练兵尖子组成,叫九九支队。九九八十一,暗喻为八一军旗红。七月会议后,太重红旗自恃成了“革命的左派”,想打败太重东野,但太重东野有九九支队能征善战,太重红旗和太重东野在厂内几番较量,拥有了“革命的左派”称号的太重红旗,就是打不垮曾经在军营中摸爬滚打,又脱下军装穿上工装的这个九九支队。内部解决不了问

题,就得靠社会上的支援。红总站和兵团不能坐视不管,刘格平更不能视而不见。

这一年7月26日,刘格平直接领导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办公室,要出面“制止”太原重机厂的武斗了。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承孝;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还有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一道奉命出击。杨承孝亲自带着嫡系部队决死纵队,伙同郝庭云的红总站下属部队,加上兵团司令刘灏带着的其他兵团盟军,浩浩荡荡开到了太原重机厂,在太重红旗的配合下,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盘踞的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刘司令毕竟才是个19岁的中学生,比不了杨司令骁勇善战。但他是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副主任的角色就得听主任的安排。好在此役的总指挥,刘格平委任给杨承孝,杨承孝也当仁不让,为省革命委员会和刘格平立功的事儿,岂容你刘灏指指点点?刘灏那时也顾不上指点了。他站在阵前看着遭逢大劫的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那座楼前空无一人,钢板水泥铸就的楼前工事也空无一人,刘灏不由得双腿有些打颤了。再看红总站和兵团的阵势,那些武装起来的工人们,双手都握着焊着铁矛头的钢筋棍,一旦较量起来,是要流血的呀!还有自制的土枪,要用上那号家伙,射出去的子弹岂不是会要人的性命?

杨承孝不愧为乱世英雄,他腰板直挺着,脸上没有一点儿惧色。刘灏不由得心想:他妈的,亏了刘格平安排杨承孝来指挥这次“制止武斗”,要让我来指挥,怕是还真干不了呢!什么“制止武斗”?这不就是寻个借口武斗来了吗?

杨承孝自有他“制止”武斗的办法。先是让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明白告诉太重东野九九支队: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你们只有向革命的群众组织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是念毛主席语录,无

非是要动摇对方的军心,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最后却是一句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

杨承孝指挥着一些人在高音大喇叭里又是喊又是叫,卫东彪据点里安装着的大喇叭也开始了反宣传广播,自然也是喊话,也是念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一句话,我们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全体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撼山易,撼卫东彪难!

杨承孝火了。下令停止文斗,要用武斗来解决问题了。他的嫡系决死纵队先行出击。决死纵队自组建以来,在杨司令的带领下革命造反,哪一回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听杨司令一声令下,刘灏心想:妈呀!太重东野九九支队,你们这一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眼看着,一个个挺着长矛的决死纵队队员们,喊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口号冲上去了。眼看着,他们就要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楼门围住了。再往后,眼看着,他们就会向楼内发动攻击了。突然间,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楼门洞开,同样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九九支队的队员们,也喊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口号冲出来了。这些专业的前解放军某部的战士们,他们一个个怀着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腔热血,既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后退而只能前进,因为他们知道,承认了失败,就是承认自个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了。那结果,也就是自动将自个送进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曾经在军营中炼就的忠心和赤胆,怎么能让他们承认失败,并且自动走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呢?

决死纵队的队员们喊叫着,冲了上去。他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以往的打砸抢也无须训练,因为那时的对手太容易征服了。可这一回,他们碰上的对手厉害得很。九九支队的队员们手持长矛,分两列犹如蛇行,以拼刺刀的正规格斗方式跳动着,不可阻挡地冲进了决

死纵队的腹部。只听得一声呐喊，两列蛇行的队伍蓦然分开，变化成三人一组，全是背靠背，形成了三点式的战术。他们手中的长矛频频舞动着，把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无限忠诚，化成了对刘格平与红总站及兵团的无比仇恨。这里果真就成了拼杀的战场。战场上，虚幻的理想是赞歌，也是挽歌。决死纵队顿时乱了阵脚，几条壮汉，刹那间便被九九支队战士们的长矛刺中，倒在了血泊中。面对这可怕的三点式战术，不可一世的决死纵队的队员们，一个个顿时变得无心缺胆，再不敢恋战，掉头就跑，溃不成军。决死纵队首创了自成立以来出征的第一次败绩，其他盟军一见这种阵势，再没有人敢往上冲锋了。

而夺得胜利的九九支队的战士们，则又归入一列长队，迅速退回了他们的据点——那座被工事保护着的楼房。

杨承孝和他的决死纵队不擅长搞宣传攻势，不象红联站在9·5事件后，对被打死的工人李成义和学生孟玲玲极尽宣传，又追认烈士，又谱歌传唱，使世人皆知，同时唤起了老百姓对红联站的同情。杨承孝指挥的太原重机厂一役，死的全是他手下的年轻工人。社会传说多多，一说当场毙命三五人，一说还有重伤者后来不治而亡，先后毙命六七人。行文至此，可怜这些冤魂，我真不知现在该为他们写几句什么招魂的话才好。

亲眼目睹了这生与死场面的刘灏，那一天真是胆战心惊。不等杨司令下令撤退，他就先带着自己司令部的一些亲信撤出了现场。杨承孝打了败仗，当即跑回省委大院，直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的办公室，一口东北腔中充满了愤怒，口口声声地开始控诉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刘格平不能容忍他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制止不了武斗。杨承孝的控诉显然使刘格平又气又恨。这位山西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很快就召

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制订如何讨伐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作战方案。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灏，在刘格平召开的这次会议上，目睹了刘格平调兵遣将，要彻底消灭红联站的“铁军”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决心和具体方案：由杨承孝继续组织并调遣红总站的人马，进攻太重东野九九支队，通知驻在山西的空军 025 部队和 027 部队，派出飞机和全副武装的空军人员，协同会剿。时间呢，就定在一个月之后，即 8 月 26 日。

在一个月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太重红旗就可以在太重全面掌权了，这可是刘格平决定的机密大事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这期间，刘灏的心中，总是被这件事搅得忐忑不安。他是军人的儿子，九九支队的那些人，原来可都是解放军呀！终于，他自个为自个作主，办了一件人不知鬼不晓的事情。

到了 8 月 26 日那天下午，太原重机厂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大楼前，再次大军云集。那阵势唬人得很。决死纵队依然是打头阵，其他盟军紧随其后。两所空军军事院校派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着，不时撒下一团团传单如天女散花，为刘格平这次“制止武斗”助威。刘灏这天也在现场。只听杨承孝一声令下，决死纵队开始进攻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却不见丝毫动静。决死纵队终于冲上去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依旧不见动静。决死纵队终于攻入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那栋楼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等待捷报的杨承孝，最后等到的，却是前线传来的准确消息：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早已成了一座空城！

杨承孝当即跺脚怒骂：“他妈的！是哪个王八小羔子泄露了军情？”

是谁泄露了军情？杨承孝不知道，刘格平事后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反正太重东野九九支队跑的没有一个人影儿了，太重的问题只好就此作罢。

20多年以后,当我与刘灏谈及此事时,这位昔日的兵团司令,才淡淡一笑,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别看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我在刘格平眼里还是个人物,可一到了搞起武斗来,眼看着死人、流血,我就没那个胆量了。我看到刘格平、杨承孝他们是真要动手了,就悄悄派人给九九支队通了个消息,让他们逃之夭夭啦。你们问为什么?因为九九支队都是转业军人嘛,我老子是军人,我是军人的儿子,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昔日红联站的作战部长张玉峰,向我补充了另一种情况。他说当时同情太重九九支队的,还有省军区独立师的首长。贺华胜师长就派人悄悄告诉九九支队,一走了事,方为上策。

我曾想找到昔日九九支队的领导金泽志,再了解一下太重武斗的细节,却听说这位转业军人在改革开放后,去了南方的一家企业。毕竟是在解放军大熔炉中炼出来的汉子,据说,他成了那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我找到了昔日太重红旗的一位领导查德林。他宝刀不老,创办起一家企业。他用依然浓厚的上海腔对我说:“我和老金这些年一直有联系,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呢!”

【8】大型武斗剪影之四：山西机床厂

在省城太原靠近北郊区的山西机床厂,也称247厂,解放前就是阎锡山组建起来的军火厂。经过解放后不断补充技术力量,这个厂的工人师傅们,不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军工,也有许多年轻军工。他们思想好,自然要跟着毛主席大搞文化大革命;他们技术好,自个造的大炮自个就会使用。这个厂的两派工人师傅们,于是就在双方同时高喊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开战了,彼此都用上了他们亲手造出来的大炮,向着对方的阵地,发射出了充满仇

恨的炮弹。

这个厂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派称机床挺进造反兵团，是张志安那个太原工人联合会的核心力量，另一派称机床烽火兵团，则是兵团工总司的核心力量。在烽火兵团中，还有一些年轻工人们，组织了一个烈火战斗队。刘格平在山西夺权成功了，工人联合会垮了，这个厂的挺进兵团也倒了大旗，而原先属于烽火兵团下属的那个烈火战斗队，此时却与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联合在一起，成了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盟友。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参加1·12夺权后，脱离了红联站，成了刘格平麾下红总站的核心力量，山西机床厂烈火战斗队的队长傅海鹏，自然不会再跟着烽火兵团的领导归兵团指挥了。他将烈火战斗队改名为烈火兵团，自立门户，成了与烽火兵团对立的一派。原先挺进兵团的那些工人师傅们，还背着一个保皇派的包袱，这些工人师傅们要跟上毛主席闹革命，工人联合会垮了，会长张志安被抓了，他们该怎么办呢？于是也有了观点分歧，分别参加了烈火兵团或烽火兵团。在这个兵工厂里，红总站的“烈火”和兵团的“烽火”，在厂里都有理由骂对方是保皇派，骂毕就开战，这次你将我赶出了厂区外，下一次我又将你赶出了厂区外。附近有一个粮店遭了殃，一次厂里的一派决定，武力强占了这个粮店，店内8万多斤存粮和其他副食品，全部成了这些要革命、要造反的工人师傅们的口粮。附近的居民们也遭了殃，有一次只听厂里枪炮又响起来了，五一路北街一个早餐点上吃油条的居民们急忙自行疏散，偏偏一颗流弹从天而降，一位正吃油条的老人，当下被炸成了碎块。这个厂的两派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

1968年，这个厂的红总站下属烈火派，占据了厂区，兵团下属烽火派，占据了工厂宿舍区。两家各自构筑起工事，严重对峙。省革委在这年4月20日开会，下发文件，责令烽火派在五天内拆除工事，从宿

舍区撤出。五天过去,烽火不买账。他们认为,刘格平主持的省革委,是支一派压一派。4月27日晚,红总站调动武斗大军,打着贯彻省革委决定的旗号,开始围攻占据工厂宿舍区的烽火派。好几辆土制装甲车开到了烽火派工事的对面。大批武斗人员围住了宿舍区。双方的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宿舍区家家闭门熄灯,不知这场大仗要打到何时。原本是要天亮前发起总攻的,但郝庭云突然接到密报,说69军已派出部队,要来制止武斗。于是他当即下令,全部撤兵。红总站此役,未果而终。

1968年6月21日,红总站的“烈火”武斗队,占据了市区五一路原北城区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要与前来进攻的兵团“烽火”武斗队决一雌雄。在这次武斗中,“烈火”武斗队原本计划对“烽火”武斗队来一次伏击,偏偏有解放军某部在五一路的军人俱乐部看节目,散场后乘大卡车回驻地,路过“烈火”武斗队占着的那栋楼前时,楼上的武斗队员们,竟认定这些解放军是去支持“烽火”的,仗着是刘格平麾下红总站的部队,后台硬,竟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名山西昔阳籍解放军战士,伤数名战士,制造了轰动省城的6·21打死打伤解放军事件。后文中,将要叙述到中共中央为制止山西的武斗,在1969年7月23日,发布了《七二三布告》。这个厂的武斗头目和骨干,都在这个布告发布后受到了惩处。烈火兵团的两名头头被判执行死刑。那位叫傅海鹏的年轻工人,在6月21日那天,还在北京,并未指挥更未参与这次武斗,但也被判执行了死刑。

【9】大型武斗剪影之五：晋中和晋南

晋中的总站一派,从派系上看,属于省城的红总站一派,是陈永贵和晋中党的核心小组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支持的一派,司令是

出身工人的王金海。晋中的总司,从派系上看,属于省城的红联站派,是军分区支持的一派,司令是年轻的水利干部李兆田。七月会议结束后,眼看着红联站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李兆田从北京直接回到老家河北宁晋县,想躲一阵子。晋中总站的司令王金海和他的组织,七月会议后以胜利者自居,派出武斗队,远赴河北宁晋县,将李兆田抓回晋中扣押,然后不时将其拉出去批斗。戴上了“左派”帽子的晋中总站派,开始打砸抢晋中的总司一派,许多县的人武部也遭到他们的打砸抢。当时的总司一派,处在被动局面。为了争一顶“左派”的帽子,这个组织也很快易帜,改换门庭,成了省城兵团的下属。待头上也戴上了“左派”的桂冠后,他们于十一月组织人马突袭总站派,抢回了他们的司令李兆田。两派磨擦,越演越烈。

在晋南,则是两派以临汾城为界,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割据。临汾城在反对刘格平的1·26派手中,他们有一千多条枪,还有十几挺机枪。而在基层县里,3·18派有广大地盘。临汾城是当时晋南地委和专署所在地,1·26派要保卫临汾,而3·18派则要以农村为根据地,解放临汾。

【10】大型武斗剪影之六:太原十中

太原十中。这里是红联站的一个重要据点。红联站的下属组织十中七一战斗队的领导人,是田仿余、马尚文、王忠强三名高中学生。他们带人坚守着这座十中大楼,马尚文具体负责守楼。十中大楼东面,与原省委,当时改为省革命委员会所在的大院仅一街之隔。七月会议后,红联站有别于兵团和红总站,头上没有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赐给“左派”帽子,成了刘格平打击的对象。

8月3日,红联站下属太原十五中红旗战斗队,被对立面红总站

一派赶出学校；8月30日，红联站下属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受到决死纵队围剿；原红联站核心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在9月1日被红总站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和决死纵队围攻；9月3日，山西财经学院的武斗中，红联站下属山西财经学院东方红战斗队被打败撤出学校。

在这种重大打击下，一些红联站的学生们，便来到了太原十中大楼内。当时，从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们，加上十中坚守大楼的七一小将们，共有400余人。参加了红联站的工人师傅中，也有人来到这里，发誓要与红联站的学生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架在楼顶的大喇叭，不分白天黑夜，广播着红联站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和文章。红联站也理顺了他们的观点和口号，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红联站可没有说过一句不贯彻的话。红联站的口号和宣传稿，说的是刘格平和杨承孝在七月会议后，严重违背了七月会议的精神。“文革”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混乱的岁月，各种道理都可以在毛主席的语



9·5事件后红联站在太原十中前的马路上集会。楼上大标语是“难盼李孟再次归,怒挥刀戈向刘贼”。李孟指被打死的李成义和孟玲玲,刘贼指刘格平

录和文章中找到依据,而这种依据,是不用考虑断章取义的。

十中大楼里,红联站的女播音员宣传着红联站的主张。那声音虽充满了革命义愤,却委实如百灵鸟鸣叫一般动听。她历数七月会议以后,刘格平和杨承孝的种种罪行,向省城全社会表明,只有红联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红联站要坚决贯彻七月会议精神,违背七月会议精神的是刘格平和红总站的杨承孝这伙人。十中红联站据点的高音大喇叭,从来也不点兵团的名更不点刘灏的名。红联站的小将们有他们的策略。红联站的许多下属组织投奔了兵团,骂兵团岂不伤了他们的心?此其一也。其二,他们也要讲究分化瓦解,只能将矛头对准刘格平和杨承孝,才能取得兵团的同情,日后才能说服兵团再次结盟,一道向刘格平和红总站发起进攻。

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对红联站这支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早就想翦除,现在十中大楼里的高音喇叭,天天点名骂他和杨承孝,他和杨承孝终于忍不下去了。一位是山西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一位是山西省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制止武斗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有一次在刘格平召开的会上,杨司令兼杨副主任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恶恨恨地骂道:“十中那个播音员小女×,他妈的!老子只要有个机会,非踏平这个十中不可!”

决心固守十中大楼的学生们,也做好了准备。他们先将大楼的东楼梯上,砌上了足有一米宽的工事墙,西楼梯上,焊上了一块厚钢板,留一个观察孔,还留一个铁门可供进出。武器呢?除了砖头,最厉害的就是山西大学武斗中,8·8一派使用过的那种溴水。此物来自河西化工厂的同派组织,装入瓶中,有毒气弹的效力,瓶子落地破裂后溴水洒开,臭气冲天,能让人窒息。

9月4日晚上,终于出现了导火索。那天黄昏,十中红联站据点里的七一小将们,突然发现十中大门口对面省革委大院的西门外面,停

下一辆小轿车,从车上还下来一个人,好像在观察地形。阶级斗争的弦本来就绷得紧紧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不能坐视不理。一群七一小将就冲出了据点,要去捉从小车上下来的那个人,那人见状不妙,抬腿就跑掉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要不是红总站派来的奸细,你跑什么?人没有抓着,可把小车给堵住了。现场被马路上的“马路兵团”群众围观,这些“马路兵团”多是同情红联站的群众,一气之下,就有人开始踢小车,随后众人发一声喊,竟将小车掀翻了。人山人海的“马路兵团”老百姓们可不晓得,这辆小车原来竟是刘格平的专车!

刘格平的这辆专车,当时究竟被掀翻了没有?时隔多年,在我的采访中,得到的说法并不一样。如当年十中七一的领导人之一马尚文,他还记得那辆黑色小轿车的车牌号是甲-5-8333,按他的说法,有十中的学生们在现场,只是踢了小车几脚,根本没有掀翻小车的事,再后来,学生们就撤回学校了。但也有一位读到我征求意见稿的朋友,是一位退休的老中医,2011年5月,我因糖尿病引发脚肿向他求医时,他向我回忆,当时他就在现场,属于同情红联站十中七一小将的马路兵团围观者,群众中有人喊那辆小车是刘格平的,结果无数人上去发一声喊,就把小车掀翻了。

刘格平这时刚刚荣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委,他的小车上坐的是何人,事后众说纷纭,但肯定不是刘格平。刘格平的专车被红联站的小将们和马路兵团的群众围堵和掀翻,这便给了刘格平一个口实。刘格平当晚即召开了重要会议,除了宣布他的小车被十中的“一小撮暴徒”掀翻外,还歪曲事实,宣布了两项重要情报:一、红联站在十中的据点里,不但藏着一名苏修特务和好多反革命分子,还藏着武汉百万雄师(孙涛注:武汉的这个群众组织因为支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二、红联站为了推翻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

十中据点里窝藏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在刘格平主持的会议上,杨承孝当即拍案而起,要支持刘格平同志,保卫刘格平同志,坚决踏平十中,彻底消灭红联站的一小撮暴徒。红总站的领导、省电力系统的造反派首领郝庭云当即响应。

刘灏皱着眉头发言了,他不敢公开与刘格平唱反调,却敢表达与杨承孝和郝庭云不同的意见:“中央也没有把红联站定成反革命组织呀,你们说的那个苏修特务,我知道有这么个人,也是个中学生,是个混血儿……”虽换来一些常委的支持,但刘格平拍板了:必须解决十中的问题!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常委不吭声了,摩拳擦掌的杨承孝,一下子显出得意非凡,不可一世的神态。

这天深夜,一支戴着“山西省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新总部”袖章的工人武斗队,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铁矛,从十中旁的宿舍区,悄悄潜入了十中校园内的学生饭堂。这是贾克明的人马。大楼内的红联站学生们发现了敌情,一群敢死队在邢晓光的带领下,也手提铁矛,冲进饭堂。一阵混战,赶走了“敌人”,抓获了6名“俘虏”。天刚亮,红联站就在大楼门前开大会,揭露刘格平挑动武斗的事实,还让一名“俘虏”当众对着麦克风反戈一击,向满大街的“马路兵团”交代他们是奉贾克明司令之命,要里应外合,消灭红联站的。红联站当众释放了这6名“俘虏”,此举又换来了“马路兵团”的阵阵掌声。

9月5日上午,杨承孝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调动红总站和兵团的各路人马,一齐来围攻太原十中。十中所在地东面的解放路并不太宽,无数的大卡车载着无数的勇士们,在解放路上挤成了一团。还有前来看热闹的老百姓,那一天的十中四周,真可谓人山人海了。这些被人称为“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们,同情弱者,对省革委调人来打十中的娃娃们从心底里反对。有两辆大卡车,都满载着戴柳条帽战士,在错车时挤在了一起,将一位来不及上车的“柳条帽”挤在了两

辆大卡车的中间。只听一声惨叫,那个“柳条帽”被撕成了两截,冒着热气的鲜血,顿时染红了路面和车厢板下的轮胎。杨承孝还未发起总攻,自个的武斗队倒先死了人,马路上更乱。“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也纷纷向路边拥去,自发地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十中红联站据点里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红联站的小将们,又开始声讨刘格平和杨承孝了。

杨承孝决不容许军心动摇,继续调红总站下属厂矿的武斗队来打十中。据事后刘格平让省革委举办的“平息 9·5 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称,共有 7 万工人参与了这场“平息暴乱”。当杨承孝调来的大批工人武斗队,将十中团团围定之后,刘格平通过东风兵团的广播车,向十中红联站的学生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派五至十名代表到省革委来,由刘格平亲自接见。二、由军区和 69 军派部队保护你们代表的人身安全。三、如果你们同意,即用广播回答。很快,从十中大楼的广播里,便传出了十中七一的回答,是四点要求:一、要求群众派代表参加接见。二、要求兵团也派出代表参加接见。三、包围十中的武斗人员必须立即撤走。四、刘格平必须先明确表态,我们究竟围攻你没有?冲击省革委了没有?然后我们才考虑派出代表与否。这四点要求,是当时十中大楼内十中七一的学生领袖马尚文、王忠强和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张玉峰、太原三中的学生魏荣福、重机学院的学生张明、太原机械学院的学生顾喜贵、山大附中的学生陈金发,还有太原合成纤维厂的工人刘和平等几名红联站核心人物一道商定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红联站的大、中学生,是很懂得需要群众支持,需要兵团这个盟友的重要性。刘格平对此却再没有回答。

兵团的二把手宋捷,此时以省革委常委的身份,在东风兵团的宣传车上,向十中大楼喊话了:“红联站的一小撮混蛋听着,你们老老实实下楼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说你们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只

有死路一条……”这是兵团的一种表态，当然是表给刘格平和红总站看的。随后，他又以省革委常委的身份，进入十中查询。出来后回到省革委办公厅所在的五号楼，向刘格平、袁振等省革委领导们报告，说十中大楼内，肯定没有什么百万雄师的人，也没有什么苏修特务，更没有枪支武器。请求刘格平下令停止攻楼。从宋捷当时的言与行止，也可以看出兵团领袖们当时的心态。见刘格平不表态，又要求刘格平派袁振与他再进十中查询。袁振不语，刘格平还是不表态。在宋捷反复要求下，刘格平让一位在场的省军区领导，随他再进十中。宋捷领着这位军区干部，刚进了十中校门，尚未进楼门就被围困十中的武斗队用棍棒打昏。醒来时，已被抬进省革委五号楼内。后来他被送到医院，围攻十中的武斗大军，继续攻打着十中。

兵团的这些头头们，明里是站在刘格平和红总站一边了，暗里还是同情红联站的学生们。杨承孝是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调的兵，兵团的不少下属组织也派来了武斗队。刘灏只好暗地里派出自家兵团司令部的人员，偷偷到现场和各个路口，悄悄通知来打十中的兵团下属的人马，快快撤兵。一些奉命前来参战的兵团下属组织，本身就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带队的领导们接到刘司令的密令，竟扛着兵团的大旗，悄悄掉头撤退了。比如太原重机厂查司令麾下的那些武斗队，有的就临阵掉转了车头，撤出现场。马路两旁围观的群众，开始为这些撤退的大卡车和车上的兵团勇士们鼓掌。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们，实在是最容易满足的。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常常联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中经常宣传形势大好的“文革”日子里，太原的老百姓们，凭号证一人一个月供应三两油、半斤肉，28斤口粮里，只能买30%的白面改善一下伙食。老百姓们那时最大的希望，早已降低成缺少油水的身躯，能安宁地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就成。

眼看着调来的各路武斗队步调不一致，于是，杨承孝下令，让决

死纵队带头发起猛攻。那些年轻的工人们，挥舞着枪支和铁矛向十中大楼冲杀时，一定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保卫山西的红色政权，必须消灭红联站的一小撮“反革命暴徒”。而据点里红联站的学生们和十中的七一小将们，也出现在楼顶上、窗口前，挥动手臂，将砖头扔向楼下的进攻者们。一位叫孟玲玲的十中初一女生，在窗口前挺身而出。她大概想向她认定是受了蒙蔽的工人阶级弟兄们，面对面地宣传一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昂着头，挥起了手臂，可能在她的中心，正在升起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她正骄傲地感觉到，自己正是在为保卫红太阳的万丈光芒，英勇地奋战着。就在这时，一排枪声响起，孟玲玲再也喊不出一句话来了。又听见一排枪声响起，在这座大楼里，曾发誓要和红联站的革命小将们一道团结、战斗的太钢普通工人、共产党员、刚刚 36 岁的李成义，也倒在血泊中当场身亡。

当时市井上传言的版本甚多，有的说那天参战的，有省体委射击队里红总站一派的战士们，他们的枪法百发百中。也有人说，决死纵队中的人枪法也不赖，杨承孝早下了命令，让他们动真的，只管往死里打。至于究竟是谁的好枪法，在这场武斗中结束了红联站两条鲜活的生命，那是当时省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想过问，事后就再难以弄清的历史问题了。

为了保证北京战友邢晓光的安全，在红总站的武斗队大批进攻十中前，马尚文就将邢晓光送出十中大楼，穿过校园，翻过围墙，绕道后小河街离开了。与坚决支持红联站的这位清华井冈山战士分手时，马尚文真有一番此时与君别，何日再相逢的悲壮感。邢晓光在这年秋天离开了太原，又到了长治，继续以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战士的身份，投身于山西的“文革”浊浪。1968 年元月 16 日晚上，长治发生了一场大型武斗，联字号李顺达等百十余人，在外地开会毕，分乘几辆汽

车返回长治时,被红字号伏击,百十余人全部被红字号活捉,成了俘虏。其中,就有坚决支持联字号的邢晓光。在1967年太原十中的9·5事件中,这位来自清华的大学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而在1968年长治的1·16事件中,邢晓光却受尽了皮肉之苦。在那个领袖带领全党和全民族走上歧路的“文革”年代,到全国各地革命串连,并直接介入地方“文革”的首都大学生们,不知有多少人如邢晓光一样,在1966年到1968年那两年多时间里,自觉充当着“文革播火者”和“职业革命家”角色。比起在本地闹革命的大中学生们来,他们那时的生活,确也充满了生命的悲壮,经历了人生的传奇。

还是回到十中。面对已经死人的局面,为了不再死人,楼内的红联站核心人物再次研究,决定同意出去与刘格平谈判。马尚文和十中的张文信、林平(女)、还有太钢工人陈虎雄、太原合成纤维厂工人刘和平、太原水泥制管厂工人张有福、北京钢铁学院学生李玉良等12人,组成代表团,先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扔出棉被,再一个个逐一跳下来,在刘格平派出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引领下,一个个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语录,排队进入了马路对面的省革委。

结果呢?所谓谈判,实际上是这12名代表,在省革委院内5号楼2层会议室里,连坐也不让坐,站着受了刘格平、袁振、丁磊、杨承孝等省革委领导一顿训,不容他们分辩,然后被分别隔离了。

马尚文得过一次脑梗,脑子不好使了。可说起当年固守十中大楼的“文革”往事,他的脑子好使得很,甚至能逐一回忆出了当时固守十中大楼的400余名红联站战士的姓名。悲哉!在本该读书的年龄,这一代人却遭遇到了“文革”的动乱。当时干革命的红心、对领袖的虔诚、曾深深地主宰过这一代人的行为,那确实是一段无法忘掉的历史。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一代人,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即便有所不同,那

并不重要。重要的,首先是要忘记,敢于反思,如此,才能从历史中找出各种教训来。

再说9月5日那天十中事件的结局。那晚,趁着省革委会议室里刘格平领着省革委的一干领导与12名红联站的代表“谈判”,杨承孝指挥外面的武斗部队,一举攻入十中大楼。依旧据守在楼里,等待谈判结果的红联站学生们,全部被当成“反贼”拿获,押解到十中对面的省委七一大礼堂,等候受审处理。

杨承孝在外面指挥战斗,刘格平急匆匆起草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其中编造说太原十中“一小撮反革命暴乱分子”,私藏武器弹药和苏修特务,抢夺刘格平同志的汽车,企图绑架刘格平同志……如此云云,要求党中央批准取缔山西的反动组织红联站。同时,刘格平又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公告,告知全省,称太原十中的“9·5反革命暴乱”是由美蒋特务和苏修特务操纵的。

刘格平和杨承孝自诩的9·5大捷,震动三晋,也震动了刘灏。

【11】刘灏对9·5事件的表态大转弯

刘灏开始反思。反思的理论依据只有两条。毛主席最高指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江青的指示说:要文攻武卫。红联站一直是文斗,你刘格平怎么就敢真枪实弹地去打十中呀?杨承孝分明是在武攻,哪里是武卫?

如果说七月会议前刘灏思想还有些消沉的话,七月会议后他的思想深处便有了一种要做大事,要在山西的政局中充分显示自己的欲望。那时党中央的“两报一刊”上常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事后看,这话倒也没错。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的人格得到了充分的扭曲,也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让刘灏这样原

本十分单纯的中学生，变成了自己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人物。他有良知，不愿意看着十中那些和自己一样年龄的中学生们，被杨承孝血洗受难。他有后台，山西省的“文革”开始后，谁都知道，兵团是靠保袁振起家的，兵团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袁振的某些政治意图。原先骂张日清“身兼十八职”的刘格平，七月会议后大权独揽，将红总站视为嫡系，当然也会被袁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与红总站决裂，与刘格平决裂，在山西能实现由兵团一家来掌权，这是刘灏也是袁振当时都心知肚明的政治希望。刘灏还有汤建中那样的高参和成群的幕僚。汤建中早就将山西此时的政局，与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做过比较。红总站的丁磊、郝庭云、杨承孝就好比曹操，挟天子刘格平以令诸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蜀吴联合，方可抗曹。兵团如果再不表态与刘格平杨承孝决裂，你堂堂刘灏刘司令，就要快变成人家杨承孝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了！还有众多下属组织的领导也给刘灏吹风：我们原先在红联站时受红总站的欺负，现在都成了兵团战士了，怎么还要受他红总站和杨承孝的小看？原因实在太多了，而在刘灏的思维中，只有兵团是山西最革命和最造反也就是最应该掌权的革命组织，一个在“黑省委”卫、王、王被打倒后才冒出来的红总站，你们凭啥想事事居我兵团之上，处处压我兵团一头呢？

眼看着刘格平和杨承孝调来的武斗队竟然真的开了枪，还打死了人，面对那些残暴的场面，兵团下一步如何表态？兵团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刘灏做出了重要决定：9月7日，也就是在9月5日杨承孝十中大捷后的第三天，兵团要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大会的主题很明确，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七个大字：要文斗，不要武斗。内容也很明确，那就是要揭露9·5事件的真相。

这是一次认真的策划。在袁振的指点下，在“汤高参”的参谋下，在宋捷等兵团司令部其他领导们的支持下，刘灏下定决心，要与刘格

平和杨承孝摆开决裂的架势了。

9月6日,兵团在省城的各下属组织,以及相邻地区诸如晋中和忻州的兵团下属组织,就都先后接到了兵团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务于明天上午在五一广场接受总部检阅,要全力以赴,全部乘车参加。各下属组织接到命令后,组织好能够出动的人数和车辆,便不时地报到了兵团总部,当晚累计,共有30余万众,3000余辆卡车。这个数字是刘灏的记忆。对此,20多年后我采访刘灏时他如此说:“共产党和政府都刮过虚夸风,那时群众组织报的数字还能没有水分?就算是到了1000辆大卡车,排在五一广场上,你们想想那个阵势!反正我记得,第二天广场上和广场四周全让大卡车给排满了。”

派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强大得可以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现代年轻读者不可理解。刘司令一声令下,省城的各路“诸侯”,以及相邻地区的下属“诸侯”,无不纷纷响应。初秋的早晨,太阳正在缓缓地太原盆地的东山升起,古城太原就提前变得热闹非凡起来。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还有郊区的人民公社,凡有兵团下属组织的地方,几乎全都有队伍出动。而外地来的车辆,也车流滚滚涌向省城。所有通往五一广场的各条街道,都可见到一辆一辆的大卡车上边,那些臂戴“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有的还同时印有下属组织的名称)红袖章的人们,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态骄傲,高举着的兵团旗帜迎风飘扬,仿佛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当时许多兵团下属组织还带了武器,准备以防不测。不少卡车上的兵团战士们,头戴柳条帽,自制的长矛铁棍,还有长短枪、手榴弹,就放在脚下。

这是一次以个人的意志所进行的政治大示威。兵团的将士们,正在他们19岁司令的命令下,纷纷聚集到了五一广场,向新政权显示着兵团的实力。他们要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在这个大革命中,他们的行为正被变得麻木了的灵魂和冲动着的热血

所支使着。在这些队伍中,特别是那些由红联站的“革命群众组织”转身一变后,成为兵团“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的人们,更为身份的转变而兴奋。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照办”二字的七月会议纪要中,写明了兵团是“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他们为自个和自个的组织现在成了“左派”而自豪。他们高举“革命的左派”大旗,接受“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兵团司令刘灏的检阅,原先红联站的这些战士们,现在也就显得格外地扬眉吐气了。

刘灏在他司令部众多副手和幕僚的簇拥下,登上了五一广场的主席台。兵团各路诸侯的头头脑脑们也登上了主席台。主席台下,是兵团的旗海和兵团的人海。刘灏向他的几十万兵团大军发表了讲演,明确表示了对刘格平和杨承孝的决裂态度。他说,9·5事件是刘格平和杨承孝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武斗事件,是刘格平操纵的一个妄图破坏七月会议纪要,欺骗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阴谋。兵团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一定要彻底揭露9·5事件的真相,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岁的中学生,用那时无比激昂也无比煽情的革命语言,表示了兵团与红总站的彻底决裂,也表示了兵团要与刘格平公开对立的态度。五一广场上,黑压压的兵团战士前所未有的兴奋,口号声响成一片。那些七月会议后退出红联站而加入兵团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们,更是激动万分,遥望主席台上的兵团司令,若不是怕犯忌,真恨不得跳起来山呼万岁。

兵团将士的卡车大游行开始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主席台前通过。刘司令挥手向他的将士们致意。他的将士们也在向着主席台欢呼。那一刻,刘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在这个主席台上批斗卫、王、王时,那是一种战斗,仿佛是向高地冲击,还无法体会被拥戴的幸福。何况,那时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还有他的反对派随时准备着冲

上台来,让他不得不在战斗中时时提高警惕。可现在,他体会到的幸福,是一种可以调动和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是这种权力使深藏在心中的英雄梦和领袖欲,得到了释放和宣泄。今天可以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明天就可以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登上山西权力的更高点。刘格平呀刘格平,杨承孝呀杨承孝,红总站呀红总站,你们还敢小看我兵团吗? 还敢小看我刘灏吗?

刘灏的公开表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他既已投入了“文革”的浊波恶浪,他的身子也就不再由他支使了。他只能顺流而下,而不能中途上岸或回游。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态度,是那个时代的晴雨表,党的领袖既已在刘灏这种年轻人的心中被牢牢地神化,那就不论自己的思维如何,最后必须自觉或被迫地与领袖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政治上高度的一致。这也正是刘灏在9月7日晚上,政治态度突然间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原因。

9月7日晚上,也就是在刘灏公然要与刘格平决裂的口号声在五一广场刚刚散去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用对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的批示形式表态了。自然是支持刘格平同志正确处理了太原的9·5反革命暴动事件。

林彪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副统帅,有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的“重要指示”。这“重要指示”是针对毛主席的种种“最高指示”而言的,但这种“重要指示”顺而延之,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指示,也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刘格平那份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处理太原十中9·5反革命暴动报告的批示,刘格平很快就传达下去了。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刘灏的心中震惊和害怕并存,不得不连夜召集兵团司令部的骨干人员,加班起草印制了一大批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严正声明。于是,在9月8日,这份署着1967年

9月8日这样一个日期的严正声明,便贴满了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

与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件一样,这个严正声明的上方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最高指示的下面是兵团严正声明的9条正文。我们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1.兵团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的作战部署。

2.热烈欢呼中央文革小组对刘格平同志和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9月7日对“山西核心小组”报告的批示。

3.重申坚决拥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对红联站的9条命令。

4.红联站必须无条件执行省革命委员会的9条命令。

5.一切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必须正确对待红联站的广大群众。

6.红联站的一小撮坏头头段立生之流必须低头认罪,红联站广大战士必须立即醒悟,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7.兵团战士誓与刘格平政委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8.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息9·5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9.刘格平政委在处理9·5反革命暴乱事件中自始至终是高姿态的,正确的,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兵团全体战士坚决拥护,坚决

支持!

在这9条观点式的严正声明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其中的第3条、5条和8条。

第3条提到了“重申”二字。重申什么呢？重申“坚决拥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对红联站的9条命令”。头一天，刘灏还在五一广场的主席台上对省革命委员会给红联站下达的9条命令进行批驳，认为这9条命令是刘格平和杨承孝的一个大阴谋，可现在一个“重申”，说过的话就可以不认账了。刘灏这样做，正是照办了刘格平曾经找他谈心时说的那句话：“你说过的话呀，可以不承认，有些话呀，你一承认就惹下麻烦啦。”

第5条的内容，实际上是说给刘格平和杨承孝听的，你们打死了人家红联站的群众，就是不正确对待红联站的广大群众。

第8条则是借着向解放军学习，一字不提在平息9·5事件中红总站和杨承孝的功劳。

至于第7条和第9条，那也是对前一天刘灏在五一广场主席台上的调子进行了重新更正和定位。

按实际情况，攻打太原十中红联站据点的功劳，应该记在杨承孝头上才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了刘格平，自然也就是支持了杨承孝的行动。可兵团司令头一天在五一广场主席台上骂了一通刘格平和杨承孝，第二天兵团发了严正声明，虽说转了个大弯子，还是一个字也没有提红总站和杨承孝的功劳。兵团和红总站在争夺山西霸主地位的问题上，矛盾业已无法调和。

通过9·5事件前后兵团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汤高参”的谋略和运用文字上的精明和老到，也不能不说年轻的刘灏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学会了刘格平传授给他的“说过的话可以不承认”的真经。

9·5事件以后，兵团在五一广场大集会大表态，曾让红联站的头头脑脑兴奋不已，也让红总站的头头脑脑愤怒不已。9月6日，太原城内，满世界是兵团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全是炮轰刘格平、打倒刘格平的内容。事隔一天，随着兵团的9月8日的严正声明，兵团支持刘格平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又覆盖了炮轰刘格平和打倒刘格平的大标语。兵团的出尔反尔让红总站由气愤而变为高兴，也让红总站由高兴而变为气愤。因为不支持刘格平，红联站在七月会议上没有戴上“左派”帽子，如今兵团重炮猛轰刘格平了，即便后面改成了支持，他们也认定那支持是假的。红总站认定刘格平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的蹦跹头了，便发明了一种“哈派”的帽子，先给红总站的下属组织们戴在头上。哈者，即溜须拍马之意也。“哈派”，即给“刘未老”溜须拍马的一派。不能叫红总站“保皇派”，人家红总站的许多核心组织，比如黄锐庵的那个东风兵团，在打倒“黑省委”的夺权中，是榜上有名的功臣。那时，红总站还想反夺权呢。“刘未老”的末日快到了，看你们这些“哈派”还能高兴到啥时！红总站的总指挥是省电力局的技术工人郝庭云，中国字可以谐音，“郝”字一谐音，就成了“哈”字，骂郝庭云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郝庭云就被写成了哈庭云。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对9·5事件表态后兵团急急忙忙发表声明的作法，红总站也给兵团戴了一顶“风派”的帽子。你刘灏前两天不是还要炮轰刘格平吗？怎么一夜之间就又支持起刘格平来了呢？这不是见风使舵、政治投机又是什么？红总站骂兵团是“风派”，只骂兵团这个组织而不去点刘灏的名，为啥？因为晓得刘灏对刘格平有意见，有看法，骨子里是反对刘格平的。打兵团，实际上还想拉兵团。红总站就不一样了，干脆就骂刘灏是个“投机商”。在对兵团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这一回红总站倒是和死对头红总站一样不谋而合了，你刘灏见风就使舵，不是投机商是什么？

【12】兵团以政府口气发布十项通告

在兵团、红总站、红联站的这种“三国”形势中，那阵子打得最凶的，还是红总站和红联站。红联站绝不甘心9·5兵败，他们一面派人去北京，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告刘格平的状，反映十中七一绝没有窝藏什么反革命和苏修特务，一面在10月5日，举行了几种形式的纪念9·5抗暴一周月活动。在十中，红联站自筹资金，办了一个“9·5抗暴真相展览”，还为孟玲玲和李成义设了公祭的灵堂。同时还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并在五一广场和湖滨会堂先后演出了《晋阳红旗颂》的歌剧。红联站宣传队的男女学生们，一身军装，朗颂词和演唱撼人心扉。其主题歌《革命自有后来人》如此唱道：

亲爱的战友啊，请放心，革命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红旗一展天下红，我们踏着血迹向前进，向前进。高山松柏树长青，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李成义，孟玲玲，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这样的演唱中，伴舞的中学生们竟有人扯开了胸前的衣服，露出他们的胸膛，将苹果截面大的毛主席像章穿透皮肉，别在了赤裸裸的胸前，任鲜血顺着他们年轻的肌肤，流进了腰间。台上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红联站的这些行动，迎合了中国民众同情弱者的传统心理，将刘格平推向了被老百姓指责的境地。刘格平呢？此时也让《山西日报》全面批判红联站，为他一手操纵的9·5事件叫好。《山西日报》接连发表了《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革命委员会好》《坚决维护省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等文章，矛头直指红联站的“一小撮坏头

头”。刘格平这时也要搞一个展览,地点选在迎泽大街的南工人文化宫,与十中的“9·5 抗暴真相展览”针锋相对,取名为“平息 9·5 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这是个官办的展览,由省革委下拨一笔专款,让红总站具体承办。展览中大讲刘格平面对红联站的 9·5 反革命暴乱如何“临危不惧”,并提到红联站在十中据点组织这场“反革命暴乱”时,有 7 万省城的革命造反工人如何主动支持刘格平同志,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这个展览刚开展,一天晚上,红联军尖刀战团的一伙中学生撬开展厅大门,冲进去将展览砸了个乱七八糟。

被骂为“风派”的兵团,此时却在被骂为“投机商”的刘灏领导下,做了两件事,一件与当时形势有关,另一件却似乎与当时的形势无关。这两件事的背后都表现出刘灏的一种心态,即想要把握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第一件事,是在红联军成立了“9·5 事件平反办公室”之后,刘灏在兵团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坚决以兵团工总司名义,成立了“9·5 事件平反联络站”,使兵团和红联军形成了互相配合,为刘格平主政的省革委后来不得不为 9·5 事件平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第二件事,是在这一年的 9 月下旬,由刘灏签发,兵团向省城社会各界发布了一个《兵团司令部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十项紧急通告》。这通告贴在太原的大街小巷,显示着兵团的权力。为了剖析刘灏在“文革”进程中的思想轨迹和思维心态,我们把这份文件全文照录如下:

《兵团司令部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十项紧急通告》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把“抓革命,促生产”两副重担担起来。把管理社会主义市场,保卫社会主义经济阵地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二、太原市严禁开放集市贸易。严禁和取缔一切黑市场和一切非

法经济交易、以物易物的活动。所有交换毛主席像章、语录牌的黑市活动，必须立即解散、彻底取缔。屡教不改者，必须严加处理。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严格履行市场管理各项条例。发动和依靠革命群众，切实做好市场管理工作。革命群众应当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四、凡是自动离开生产岗位或者一时受蒙蔽进城出售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的农村社员，应当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立即停止出售，对剩余部分带回或者卖给收购部门均可。本人要立即返回农村，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全面总攻击。

五、严禁私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严禁集体伙食单位到生产队或集市上抢购、套购物资。违者，一律没收。

六、对无证商贩，坚决、全部地取缔。对其中屡教不改的惯犯，根据情节轻重，按照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规定，分别给予没收、罚款、批评教育、警告等处分。

七、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凡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殴打绑架市场管理人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抢劫市场管理部门档案、材料；无理抗拒管理以及袭击市场管理部门的，一律按犯罪和阶级报复论处。对于其中的首要分子和打手，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八、国营、公私合营、供销社、合作商店和有证个体户，必须严格按照指定地点营业，严禁占用边道或随地设摊叫卖。应当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协助管理市场和维护市场秩序。

九、要求各革命组织，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做好政策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宣传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重大意义。

十、希望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财贸部门以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地、彻底地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三自”黑风,扫除一切害人虫。

通览这十条通令,可以看出,这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文革”期间的一种官方的行文口气。中央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七月会议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封成了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这是兵团作为一派群众组织的政治资本。而刘灏本人在山西造反最早,其潜意识中,就认定自己才是最革命的,把握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当然是舍我其谁了。更重要的是发布这种通告,能显示出兵团的权威,而兵团要造成自己这种类似于政府的权威,在那时也便是袁振的权威了。“汤高参”就给刘司令讲过,说刘邦先项羽一步灭秦后,首先发布了《约法三章》,虽然胜利果实被项羽一时夺去,但得民心必得天下,刘邦得民心的基础,就是那个《约法三章》。是耶?非耶?刘灏在20多年后对我作了如此解释:“当时红总站和红联站都骂我搞投机,我同意老汤(即“汤高参”)他们的意见,让兵团发布这种通告,也是要显示兵团的革命左派地位。当时我认为兵团发布这种通告,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为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贡献。”我笑问:“这是不是袁振在利用兵团与刘格平进行一种暗中的政治抗衡呢?”刘灏也哈哈一笑说:“那阵子要没有我们兵团,刘格平和杨承孝能把袁振放在眼里?但就我自个当时的思想根源来说,我还是想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把兵团真正带成一支能在山西掌权的革命左派队伍,这也是我在10月份极力举办兵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原因。在那个学习班上,兵团的其他领导公开批评我这个司令,我当时也是诚心接受的呀!”

【13】兵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刘灏所说的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1967年10月10日到10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省城南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一次盛大活动。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用了五天的时间，到会人员有1600多人，全是兵团各个下属组织的领导和骨干。当时有一条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从兵团司令刘灏，到参会的这一千多号人，可以说，他们的心是虔诚的。既然是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的“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和骨干，他们就感到了自己肩上确实担负着重任：要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保证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如此重任在肩，不认真斗私批修能行？而承担这些重任的办法呢？那就是扩大兵团的影响，在山西真正实现左派掌权——即兵团掌权。这也是这次学习班上每个与会者无须讳言的实际想法，红联站头上没有“左派”的帽子，自不必说；就是头上有“左派”帽子的红总站，就冲有杨承孝这样的人当骨干、打先锋，让他们掌了权，兵团战士们能放心吗？

开幕那一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可真不少。除了兵团司令部的领导们，还有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刘格平、副主任袁振、省军区首长郭永彪、驻山西69军负责三支两军的副军长谢振华、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张益三、晋中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任井夫等等。就连陈永贵，也从大寨拍来了贺电，向兵团举办这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表示了祝贺。

如今的读者们，可能要耐着性子，才能看下去刘灏所致的开幕词，但这种文体，却是在“史无前例”的“文革”10年中，最通行的讲话文体。在林彪丧生蒙古温都尔汗后，这种“文革”体的讲话稿，依旧在官场和民间流行，只是不再敬祝“身体健康”，而是只敬祝“万寿无疆”了。

全文如下：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开幕了！

这是全体兵团战士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是兵团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重要一步。

兵团战士要通过这次大会学习并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的新高潮，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全世界。

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斗私批修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伟大战略方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任务，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辉煌的新胜利。

斗私批修是当前最大任务，我们一定要掀起高潮，狠斗“私”字，狠批“修”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为了更好地斗私批修，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努力学

习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在行动上,克服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请当代的读者们千万不要以为刘灏开幕词中的这种认识和语气,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风格,不!这是那个时代共同的风格。就在那个开幕式上,刘格平和袁振先后都做了长篇重要讲话,其他领导人都做了讲话。他们的讲话风格,也是开头首先“敬祝”,结尾大声“高呼”,而讲话的内容呢,那调子,也和刘灏的一样:先是要“紧跟领袖”,“掀起高潮”,接着就是“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了。



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的宣传队演出

再往下,便是学习讨论,然后是兵团司令部一位负责人叶积凯做了开展兵团整风的长篇报告;另一位负责人李生全做了回顾兵团斗争史,展望未来继续为山西人民立新功的长篇总结;会议中间通过了好几个兵团的决议,诸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山西的黑爪牙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等等。最后是兵团司令部一位负责人齐福增致闭幕词,并通过了兵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其时,山西的党政军一把手刘格平,亲自来兵团办的这个学习班大会开幕式上做长篇报告,是他要争取兵团这支政治力量。刘格平知道,红总站有他的夫人丁磊在暗中操纵,可视为自己的嫡系部队,只要再控制住兵团,他在山西就好控制局面了。在宦海几度沉浮,总算在“文革”中登上了一个省权力顶峰的刘格平,不会不知道刘灏对他的态度,不过是迫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才转变的,而这个中学生娃娃的这种转变,是随机应变而非扎实牢靠。他必须也相应地做出支持兵团的态度来,才能拉住山西的这支政治力量。出于政治家的考虑,刘格平的这种态度中,有期盼的成分,应该也有真诚的心态。

以刘灏为首的兵团司令部的那些学生领袖们,应该说,他们对办这样一个大型的学习班,更好地解决兵团存在的问题,提高兵团的战斗力,实现毛主席所说的“斗私批修”,其态度是真诚的,感情也是真诚的。对领袖的忠诚和对革命的感情是一回事;因了这种忠诚和感情,被“文革”的发动者和操纵者们利用是另一回事。其价值走向中的失误和造成的可悲后果,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后人不应从这种结果出发,由此而去否认他们当初的那种真诚。正如我们现在可以从一些历史资料片中,看到德国民众对着主席台上的元首希特勒欢呼时,那种真诚的态度和感情,绝非是装出来的。“文革”初期的革命小将们,在那时代表一种革命,代表一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无比圣洁的感情。10

年“文革”动乱，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巨大浩劫，那是历史的悲剧。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比如再过几代人之后，对那种圣洁的感情，怕是就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了。一种圣洁的感情可以变成恐怖的破坏力，这正是历史给人间投下的怪圈。

我们可以从当时兵团办的报纸《兵团战报》上，找出刊载的报道以及刘灏的助手叶积凯和李生全的报告和总结，从中摘录出一些内容来进行佐证。

叶积凯：

……在政治上，不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忽左忽右，方向不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经常发生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兵团司令部的某些主要负责人最近以来对待红联站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摇摆不定和右倾。敬爱的江青同志多次讲过，中央肯定了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必须爱护他，谁反对革命委员会，那就是反革命的行为。山西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同志是长期受刘、邓迫害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近一年来，又在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刘格平同志的，山西广大的革命派也是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但是，红联站中的一小撮坏头头，长期以来，从1·12到4·14一直到现在，都在越来越疯狂地反对中央肯定了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刘格平同志。……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吗？对于这些明显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舆论，我们的许多同志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甚至有的对红联站寄予无限同情，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呢？更严重的是在9·5红联站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我们有部分负责同志，以感情代替政策，是非颠倒，敌我不分，对省革命委员会的决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

影响,给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我们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在许多负责同志的脑子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存在着严重的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兵团小将,虽然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有着十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领导核心不够坚强,有着严重的自由主义。重大事情不是集体讨论、决定,而是一个人说了算,根本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作风……

李生全:

……在思想上,兵团某些领导人不是毛泽东思想领先,而是自由主义领先,高兴的事就办,不高兴时就有再重要的事情也不管,根本不管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不组织领导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毛著,自己也不认真学习。不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经常是或左或右,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去处理问题。如对待9·5事件问题尤其是这样,事先不深入现场调查,不用主席思想去分析,只是凭个人主义思想去了解,说什么9·4和9·5都是反革命事件。(孙涛按:前者是指刘格平和杨承孝们编造的所谓十中学生掀翻刘格平小车一事,后者是指刘格平和杨承孝们攻打十中之事。当时兵团司令部的领导们,有人就持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观点,不同意刘灏在五一广场表态反对刘格平,支持红联站)又说“等几天再说”,结果是晚两天表了态,使兵团下面战士思想混乱。(孙涛按:这就是明显地在批评刘灏了)……领导机构不健全,领导核心不得力。我兵团目前有80%是工人组织,但领导核心并没有以工人为主,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虽然刘灏是兵团司令,但兵团司令部里的其他负责人,在大会上

这样对刘灏进行批评，难道不尖锐吗？

这些批评，在那个年代，确实来自于一种对领袖真诚的感情，来自于一种要紧跟伟大领袖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如今，回忆那个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断掀起虔诚疯狂的年代，我们无须就这些年轻学生们展开批评的内容做出评价，那个年代已经规范了他们的错误思维，一切早成历史的定论。但我们可以从中评价出一点，那就是这些学生领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那种真诚感情，和一心希望紧跟领袖的单纯的思想。

可以说，这些兵团司令部的负责人们，全是与刘灏一道造反起家的兵团骨干人员，他们是真心拥戴刘灏的，这种批评也就是爱之越深而痛之越切了。

作为刘灏的幕僚，在兵团没有任何职务，但总是被兵团上上下下称之为“汤高参”的汤建中，也是这次学习班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刘灏这个高中生而言，在那个年代，除了有宦海经历的袁振以外，可以说，爱读书爱动脑子想事儿的汤建中其人，是对他的思想变化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成年男人。汤建中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论是什么人举起了大旗，其目的都是要掌权。陈胜、吴广是要取代秦王朝，刘邦和项羽也是瞄准了关中的皇位。眼下呢？虽说是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造反，目的是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层层走资派，但打倒他们的目的，岂不还是为了取代他们，去掌握他们曾经掌握过的那些权力？红联站已经败了，兵团和红总站的斗争，就仿佛刘邦和项羽的楚汉相争，胜者，必然就是刘格平新政权中的层层掌权者。所以，兵团这个被中央肯定了的革命左派组织，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就必须按毛主席斗私批修的办法解决问题。唯如此，才可能在日后的掌权中，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了，在当时革命造反派们的理解中，所谓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就是由革命造反派掌权,而革命造反派,则只能是自个这一派而不能是对立面组织。这是兵团的认识,也是红总站和红联站的认识。在这种相同的认识下,兵团并不会因为办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比红总站和红联站高明了多少。

然而,回眸那段历史,还应该看到省城这三大组织的不同之处。在1·12夺权之后,红联站搞过内部整风;在9·5事件之后,兵团搞过这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虽然理论上都是错误的,但却体现出一种领导人的自省意识。而红总站呢,却恰恰缺少了这种意识。原因呢,可以从他们的主要领导人身上去找。红联站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杨保明、李青山、段立生等大学生们,在“文革”初期大多都受到过工作组的打击和整治,当毛泽东将刘少奇领导“文革”的做法定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们认定是伟大领袖支持他们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参加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文革”,不但能讨回被“资反路线”损害的人格,而且可以证明他们比起那些整人者来,才是真正地忠于伟大领袖。兵团的主要发起人刘灏和宋捷这些青年学生们,对“文革”的认识,却是在选取革命对象的渐进中完善的。既没有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就要在伟大领袖发起的继续革命征途上好好表现和锻炼。他们心中的“文革”,是要跟着伟大领袖反修防修,打出一个消灭帝修反的新世界来。红联站和兵团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大中学生,在疯狂的造反行为中,都还存在着许多理想主义的色彩。其自我整风调整班子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自我批评,都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折射。红总站就不同了。丁磊是刘格平的夫人,随着丈夫的夺权成功,其身份变成了山西的第一夫人。黄锐庵是省人委办公厅的年轻干事,早在中山大学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夺权后跟在刘格平身边,成为进入新政权高层的干部。郝庭云是省电业局的技术工人,“文革”已经改变了他的地位。杨承孝呢,则是一名文化不高但胆子不小,造反成

功的山大王。他们组建起红总站的目的,是要帮助刘格平掌好权,同时自个也要成为掌权之人。红总站的造反行为同样疯狂,但他们是成年人,特别是那些官场人士,因其实用主义多了一些,理想主义和自省意识必然就少了许多。

兵团举办的这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在齐唱《东方红》的歌声中开幕,在齐唱《国际歌》的歌声中闭幕的。这是“文革”时期很多大会的通例。在唱《东方红》时,大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而在唱《国际歌》时,又大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两首歌,在“文革”中是可以一道唱的。反映救星思想的《东方红》,在“文革”中可以超越《国际歌》,正印证出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人内心深处,那种难以摆脱的皇权意识。当一代青年人手捧最高指示时,那最高指示分明具有了圣旨的威严。当他们发自心底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无非在重演着中国历史上臣民们面对一代君主的心态。不了解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孕育出的这种文化,便无法理解“文革”中青年人领袖的那种虔诚。

【14】武斗继续发生

由刘灏亲自组织的兵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省城南文化宫轰烈烈地结束了,可兵团与红总站、红联站三大组织之间,彼此的口诛笔伐却始终没有停止。仅仅是口诛笔伐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就没有停止。岂止是没有停止,还在不断地升级。由铁矛而至真枪实弹,再由真枪实弹而至用汽车改装成的土坦克……在全省愈演愈烈的武斗中,兵团要扩充实力,红联站大多数下属想戴上“左派”桂冠,于是就接受了兵团的招安,经过兵团授旗而打起了兵团

的旗号。红联站的领导段立生们没有实力武斗了,但却可以坐山观虎斗,看你“哈派”红总站和“风派”兵团谁胜谁负吧。因为红总站一直认定刘格平和袁振都是党内的走资派,谁倒了他们都高兴。纵观全省各地,一下子几乎全分成了兵团观点的组织和红总站观点的组织。两大派斗来斗去,都是为了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真正掌起大权,然后跟着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这“到底”是啥样子?啥标准?那就是自己一派掌权,对立派完蛋。

于是乎,在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好派”与“糟派”再次难决雌雄。

在忻县地区,支持徐志远的联合总部与反对徐志远的 2·8 兵团,彼此都斗成了血头公鸡。

在晋中地区,总站组建的 13 县联防军,继续攻击军分区支持的总司派,总司派四千余工人,困守在晋华厂的大礼堂,与 13 县联防军对峙,武斗不断。

在晋东南地区,“红字号”的枪口对准了“联字号”的据点,“联字号”在省城活捉了“红字号”的头目。省革命委员会出面调停,在省革委五号楼的会议室桌子上,竟放上了一尺高的炸弹,那是红字号制造出来武斗而未炸响的哑弹,被联字号送来做对立面武斗的罪证。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晋城市北部古书院矿的一次武斗。“文革”开始时,这座矿更名为四新矿。四新矿的红色 28 公社武斗队,属红字号,在这里建起据点。地区 28 公社的武斗队,属联字号,要夺取这个据点。1968 年 2 月 25 日,地区 28 公社的大批武装人员,向四新矿发起进攻。在《四新矿“解放”记》(作者李方华、载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2012 年编印的《山西纪事》)这篇回忆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他的弟弟、一位不满 16 岁的小伙子参加了红色 28 公社武斗队,在与地区 28 公社武斗队的武斗中下落不明,当地区 28 公社的武斗队攻占了四新矿以后,他去停尸房里寻找自个弟弟的经过:

这是一排东西走向的教室中的一间，南北对开两个门。我从北面的门进去，一幅恐怖的惨象令人终生难忘。一座三间左右的教室里，足有二三十具死尸，横陈着七八口盛着死人却未盖上盖子的棺材，有上过红漆的，也有白漆的。死尸由东到西，大致分两三排。当时我也顾不上什么害怕，焦急地将尸体逐一细看，看了一遍，没发现有我弟弟，但有一中同学和听说过的熟人。讲台上与黑板平行陈列着的一口没上漆的白木棺材里，头南脚北躺着的是我下届的同学马保川，长长的个子，穿着新蓝制服，脚穿新白塑料黑条绒平底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正指着他的尸体大喊：“这就是马保川，坏透了。”讲台下，第一副红漆棺材里，红绸子被中裹着一具被炸飞了上半截颅脑的尸体，棺材头贴一张写着白粉笔字的红纸：“一中周玉明。”我对周颇有印象，他是33班的生活委员，一个个头不高、微瘦身材、稍尖下颌、俊俏的脸庞上透着几分稚气、几分机灵的毛头小伙子，据说是在一次埋设地雷时，不慎被自个的纽扣牵动了导火线引爆身亡。紧挨着他东边的一口红漆棺材，一床红绸被中包着一些残肢断臂、完全不见躯干的零碎尸体，死者姓名失记，看来他和周玉明一样，都是在红28尚有力量时丧生的“烈士”。靠北中部的墙下，一张席子上放着两具风干蜷缩、个头不大的男性年轻人的死尸，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呲开的口唇中露出的白白的牙齿，他们是红28的土坦克（用履带推土机焊上铁板装甲）手，在晋城党校的武斗中被对方用炸药包炸死的，其中一个是我们莒山知青队女知青徐凤兰的哥哥。二人死后暴死沙场，红28无力将其抢回，风吹日晒了好几个月，尸身风干成这个样子。还记得与周玉明排成一行的靠东边的一条席子上，两具断肢残臂的三十岁左右的夫妇中间，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儿童，他们是矿上的工人家属，一枚土制炮弹洞穿屋顶光顾了他们的居室，于是全家无一幸免……

此文的作者后来才找到了弟弟。他弟弟没有死,却做了俘虏。许多红 28 公社武斗队的俘虏,被地区 28 公社武斗队押着游街示众。全矿区的大喇叭广播着胜利者的口号,将失败者一律骂为“蒋匪帮”。在“文革”时代,民众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蒙蔽中,将对立面定为“蒋匪帮”,正是对自个一派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好诠释和最大的心灵胜利。

这些回忆会让读者心颤。而这却是真实的历史。整个山西全境大大小小的武斗,正是当时中国混乱状况的一个缩影。

让我们再描述几次具体的武斗。

其一,山西大学,兵团派 8·8 和红总站派 8·14 又开战了。1967 年 11 月 16 日,山西大学占据着图书馆大楼的 8·8 一派师生,为了能长期坚守,解决缺粮问题,决定去大饭厅抢夺粮油。这天晚上,他们派出人马,突然冲出图书馆大楼,冲向大饭厅仓库。这里原本是占据教学主楼的 8·14 一派师生的防地,可那一晚上他们猝不及防,挡不住对方的进攻,防地被攻陷,大饭厅里的灶具和仓库里的粮油,被 8·8 一派师生抢掠一空,悉数运回图书馆大楼。图书馆大楼内,8·8 一派师生自然要建起锅灶,先好好饱餐一顿再说。

8·14 一派师生,岂能容对立面如此嚣张!他们要向对方进行反攻了。经过周密布置,11 月 19 日上午,从教学主楼内杀出的 8·14 一派师生,冲进了图书馆大楼的屏障教工三楼。占据了这座楼,即控制了图书馆大楼的楼门通道,可以更有效地围困对方。不要以为这是在做游戏。双方的师生们,年轻力壮的不但手握钢筋棍做成的长矛,还有同一派的工人师傅们支援的各种土制长短枪呢。8·8 一派师生不甘如此被围,当日晚上,向教工三楼发起反攻,要将占据了这座楼的对立面驱逐出去。在这场恶战中,此楼西侧单元一层通往二层的木制楼

梯扶手突然起火。是攻楼者点火,要以此攻退守楼者?还是守楼者点火,要以此击退攻楼者?双方在烟火中继续恶战一阵,各自退回教学主楼和图书馆大楼的据点。

还以山西大学论,8·14一派和8·8一派的学生各自构筑工事,形成据点对峙,进而武斗之时,也有一些学生乘机离校回家,做了逍遥派。还有一些学生,则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可举山西大学中文系几名同学为例。8·14一派的吕日周,当准备武斗的同学要给他发一根长矛时,他问,“我戳死人,你负责?”发枪的人说,他负不了责。吕日周又问:“对立面看见我拿着枪,戳死我,你负责?”发枪的同学无语。吕日周说:“谁都不负责,这长矛我不要!”他联系上赵华胜、李银贵同学,先到总后太原办事处,写出歌剧《年四旺》,又与同学仝跃军住到运城,写出歌剧《刘胡兰》,还和张海通、张继忠等八名同学,到大同市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挣点钱补贴父母。他们双手没有摸过一下武斗的棍棒和铁矛。8·8一派的梁志宏、崔巍、薄子涛、郭鸿诚等几位相处好的同学一道,不参加武斗,躲进了并州路棉麻公司楼内。其时楼内已无人上班,他们找间大房子住下,先是协助太原市商业系统的一个群众组织办一份《进军报》,办了四期,对方不办了。他们则一直未回学校,设法找书看书,练习写作,他们的双手也没有摸过一下武斗的棍棒和铁矛。当时的这些学生们,并不是对“文革”有什么超于时代的认识,只是对武斗的一种自我抵制,对上大学偏遭遇“文革”,又希望读书的一种无奈选择。

大学生们不上课,不读书,却将大学校园当成了武斗的战场,将教学主楼和图书馆大楼当作了武斗的据点,山西大学如此,在全国,又有哪一家大学不是如此呢!10年“文革”结束后,山西大学这次武斗,被定为“11·19烧楼事件”。点火者是谁?最终也没有查出来。但此事却因8·8一派后来发生内讧,有人揭发是8·8一派的领导们下令

放的火。由此，使这一派的领导们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背上了包袱。

其二，山西大学的这种两派对峙的据点，一直到1968年9月27日工宣队进校才拆除。在这种对峙中，小型武斗时有发生。那时的大学生不上课了，有的学生，还做了中国大学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官职。如物理系68届的谢全柱同学，出身好，思想红，就担任了8·14一派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副部长。这一年的5月12日晚上，他正在主楼内值班，在楼顶上值勤的工人胡道忠跑来向他报告，说看见校门外好象有8·8一派的学生要进校门，担任文攻武卫指挥部副部长的谢全柱同学，当机立断，向胡道忠下令：“打狗日的一枪！”胡道忠奉命行事，重上楼顶，便向校门处开了枪。结果，没有打中对立面的学生，却把从传达室出来的看门老汉郭启章击中了。事后，山西大学8·14一派包庇凶手，反而指控8·8一派杀了人，而8·8一派，更是指控对立面为杀人凶手，两家的大标语，都从校内一直贴到太原城内。只是可怜了那位看门老人，无处诉冤，被草草处理后事。9月工宣队进驻山西大学，领导工宣队的解放军查清了此案。最后决定，对谢全柱同学给予记大过处分，准予毕业分配。对工人胡道忠，因主动投案自首，且能揭发指使者，交群众监督劳动。

其三，1977年年底的12月3日，兵团和红总站在太原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型武斗。曾在五一广场上发誓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兵团将士们，其实武斗起来也凶着呢。

那天晚上，决死纵队杨承孝手下的两位头领姚恩泉和王国太，带着决死纵队的一些人，在太原五一广场一侧的并州饭店里面开会，并州饭店楼下，渐渐聚集了不少闻讯而至的红联站的学生，高呼起“打倒哈派”的口号。决死纵队可不是好惹的，听见楼下的口号声声，觉得不耐烦，不知哪一位就往下抛了一颗手榴弹。那手榴弹可不是汽水瓶儿，当即在人群中爆炸，顿时，两人受伤，一名当场绝命。而当场身亡

的那一个，恰恰不是红联站的学生，而是兵团一名叫作卢东星的中学生。卢东星在铁匠巷小学上小学时，就是少先队大队长，“文革”前以优异成绩考入五中后，是五中初81班的班长。他被炸死时，年仅15岁。

悲哉！这位殉难的中学生，分明是在声援红联站的战友们时，不幸成了冤魂。不知是什么人就把消息送到了兵团工总司，也不知是哪位正在兵团工总司大楼里待着的兵团小头目，就以兵团司令部的名义打出无数电话，发出了调兵遣将围攻并州饭店的命令。兵团的一些下属工人组织当即出动，围住了并州饭店，要以血还血。更有改换了门庭的红联站工人队伍，也闻讯赶来，打着兵团的旗号，开始围攻并州饭店。兵团的工人阶级队伍此番出征，可不是小打小闹，十余挺机关枪，封锁了并州饭店外的一切通道，头戴柳条帽，手持长枪和铁矛的兵团工人阶级，奋勇冲杀，并州饭店刹那间成了铁矛挥舞的战场。决死纵队虽然没有死人，但伤者甚众。王国太等一千决死纵队头目被俘，受过皮肉之苦后才被释放。兵团那些占领了并州饭店的工人师傅们，自然也不忘狠狠地打砸抢一番，一个个都有了物质收获。

出事这天晚上，刘灏正和他热恋的女友、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同学张莉，还有他的高参汤建中在一起。他们在太原五中的一间宿舍里神聊神侃，谈论当时的“国家大事”。汤建中告辞刘灏离开五中时，已是快午夜时分了。他回到工总司大楼内刚刚睡稳，就被人喊醒，说并州饭店打起来了，说兵团的其他领导全去了太原六中集中议事，唯独找不见刘司令和“汤高参”。汤建中急忙赶到六中，果然见兵团的其他领导全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告诉汤高参，说派人去叫刘灏，偏刘司令不来，只传来一句话：“谁他妈的调兵武斗谁他妈的负责任。”决死纵队那天在并州饭店开会，杨承孝不在，而到会的所有头头脑脑，全部成了兵团的战俘。至于那天晚上，是谁如何得到了决死纵队正在并州

饭店开会的情报,又是谁以兵团司令部的名义调动人马前去武斗的?“文革”结束后,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负责审查刘灏的专案组,曾派人多方调查,只不过了解了些那场武斗的大致轮廓和场面。那个以兵团司令部的名义调动人马的电话究竟何人所为?最终没有结果,至今也是个无法解开的谜。为了写作本书,我也曾在事隔许多许多年后,专门为讨教这个谜底而询问过刘灏,他向我说了当时的一个情节:“我那时已经谈恋爱了,老汤走了以后,我还和张莉在一起闲聊,既不知并州饭店武斗,也没兴趣到六中跟他们去研究对策。”而汤建中,也在事隔三十多年后,向我们叙述了他当时所经见的上述过程。

这次武斗,刘灏不在现场,10年“文革”结束后,也为这次武斗事件,多次在交待问题时说不清楚。“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一种政治观点相同的派性组合,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次兵团一派打败决死纵队的武斗,堂堂兵团司令竟然不知道调人的命令是谁人下达的,足以说明当时群众组织的管理混乱状况。但不管这次武斗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反正兵团是这次武斗的胜利者。刘灏,这位即将迈入20岁的兵团司令,身处当时无序的历史中,此事又为他日后背上了一条无法逃脱、却又说不清楚的“罪名”。

自认为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刘灏,背后有袁振撑腰,当然想着要在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全面掌权。刘格平岂能看不出兵团的动向?而杨承孝更不是吃素的,到处扬言说并州饭店惨败,此仇必报!红总站与兵团的对立开始升级。红联站头上没有“左派”两个字,不敢有掌权这种奢望。当然,红联站是希望兵团全面掌权的。红联站的许多组织现在打的是兵团的旗号,兵团能全面掌权,岂不是红联站的人掌权了吗?

山西的局势,又处在了三大派明争暗斗,时时、处处、事事都可能使武斗一触即发的形势之下。

【15】十二月会议康生翻脸收拾刘格平

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关注并着手解决山西的问题了。这年12月,专门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在京召开。刘格平率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们一齐赴京,再次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圣裁。这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负责,但实际上把持会议的,则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一伙。与七月会议不同的,是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一个也没有被通知到会。对山西,或者说对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而言,这无疑是毛泽东主席让中央文革小组放出的一个信号:老人家要让由他发动起来的造反派们,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惜,在山西造反派们热昏了的头脑中,对此却一点也没有感觉。

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脑脑们,那时还摸不清十二月会议的动态和最后结果,真是身在山西太原,心系首都北京。他们一边派出人马,去北京打探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一边等着中央的召唤,时刻准备着进京去参加会议。在他们看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叫他们去,他们不去,怎么能分出个谁是谁非来呢?在等待的同时,三大派组织的武斗队也在扩充人马,积极备战。12月上旬,西山矿务局人民武装部的武器库,三次被西山地区的派性武斗队轮番砸抢。杨承孝的决死纵队装备了枪支,扬言要向兵团开火,以报并州饭店的奇耻大辱。兵团也严阵以待,有的武斗队装备不但不亚于决死纵队,单就武器而言,和正规野战军无异。

如太原十二中红旗的司令崔吉娃,通过晋南1·26一派的工人战友们,弄到一批武器,在十二中摆开了战场。校门口,架起了一架机关炮,并列三挺机关枪。其他装备,有长短枪和近万发了弹。十二中红旗

小将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和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拼个你死我活。教室成了兵营,武斗队集体食宿。操场成了靶场,崔司令带头习武。为了了解当时情况,当我认识了崔吉娃时,他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从他那中等个头,虎背熊腰的架势上,依稀能让我想象出当年这位初中造反小司令的英姿。这位16岁时就被刘格平安排成省革委常委的崔吉娃,声调依旧宏亮。他说:“要让我现在玩长短枪,肯定还有准头,那可是当年一颗颗真子弹喂出来的真功夫呀!”

再如兵团下属太原建筑专科学校的2·17红旗兵团,(孙涛注:该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在山西的1·12夺权后先夺了学校的权,2月17日,在该校学生王大壮的带领下另一些学生组织进行了反夺权,夺权成功后,联合组建了2·17红旗兵团,成为学校的掌权派)在司令王大壮的带领下,为了与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抗衡,武斗队人员的武器装备,就达到了野战军一个连的规模。这些武器从何而来?到军区的军械库去“抢”吧。七月会议后,这些学生们要和决死纵队斗一斗,需要武器,他们来明抢,军区就暗送。军械库卫兵立正站岗,上级的命令牢记心中: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革命造反组织开枪。军队搞三支两军,第一个就是支左。对来军械库“抢”枪的学生们,军民两家心知肚明,站岗的依旧站岗,“抢”枪的直管“抢”枪。

十二月的寒冬中,太原街头在一片冷清中,不时就传来了武斗的枪声。

而在北京,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这次会议,一直以小会形式讨伐刘格平。虽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有时也到会,但会议依旧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高级政工老手康生主持。这一回,康生对刘格平翻了脸,收拾起他曾在七月会议上坚决支持的这位三级高干了。下面根据一些与会者回忆,先看看整人高手康生,是如何收拾刘格平的。

康生指着刘格平大骂: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你和丁磊怎么那么胡

说八道？说什么空字 025、027 部队是依靠对象，山西军区是打击对象，69 军是你们的团结对象，简直不象样子呀！你是怎么搞的？要依靠 69 军，不要天天搞什么肃清张日清的流毒！（孙涛注：肃清张日清的流毒，可是康生在七月会议上大讲特讲的啊！）丁磊要调走！

康生还有更绝的呢。他会后让刘格平留下，大骂丁磊，说山西的问题全坏在丁磊身上，逼刘格平和丁磊离婚。刘格平无奈，悄悄把这话告诉了也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丁磊。丁磊一听就火了，大骂康生：“他怎么不离婚？他老婆怎么还在中央？我一个小人物有那么大本事能影响山西大局？”但吵归吵，刘格平不敢不听康生的话，丁磊也不得不听丈夫的安排。十二月会议还没有开完，刘格平就在北京军区家属大院，给丁磊安排了一套单元房。这位在山西刚刚当上第一夫人的丁磊，不得不离开山西政坛，也离开丈夫，住到了北京。

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坚决支持晋东南地区的革委会主任程首创。这程首创是位老干部，在晋东南地区支持的是红字号群众组织。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支持的是联字号群众组织，被红字号打成了张日清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联字号群众组织不服气，就把程首创打成了叛徒和特务。从全省派系看，晋东南红字号是丁磊的那个红总站观点，七月会议康生把红总站定为左派，会后刘格平支持晋东南红字号，按说，也是贯彻七月会议精神，可康生却无视这一点，现在又大骂刘格平支持程首创是犯了错误，根据联字号提供的材料，大骂程首创是叛徒和特务。刘格平对康生解释说：程首创参加的是薄一波的抗日决死队。康生当即打断说：薄一波就是个大特务！

康生有一次拿出《踏遍青山人未老》挥舞着，眼镜片后两眼瞪着，冲刘格平唾沫飞溅：你树个人威信是不对的！这本书要批评，要烧掉！净吹你，肉麻的很！刘格平解释这本书他没有看过时，康生一拍桌子说：我就不信你没有看过，我都替你脸红。

康生曾在七月会议上送给刘格平一条最高指示，十二月会议上重提旧事时却批评起刘格平和红总站来了：当时让 69 军支持你，是支持革命委员会嘛，这句话又没有发文件，你就传到社会上去了，成了派性的东西了。（孙涛注：此话在七月会议上就公开了，始作俑者康生这时却一点也不承担责任了）你刘格平用这句话，去压 69 军，你和红总站这样搞太不象话了！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古人对朝中权臣奸相的这种形容，用在当代康生身上那是再适当不过了。

虽然十二月会议上，由康生出面主持解决山西问题，但在周恩来的谋划和干预下，周恩来点将，毛泽东同意，驻晋野战军 69 军负责三支两军的副军长谢振华将军，出任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明确喻示着这支军队正在登上山西的政治舞台。山西的政局，即将由 69 军来主宰。在毛泽东主席的视野中，刘格平虽然是康生、江青的红人，而且在指证刘少奇的 61 人叛徒集团时立下了大功，但被钦命为山西的封疆大吏后，却把山西搞了个乱七八糟，岂能继续重用？张日清呢，是林彪树立起来的全军支左一杆旗，老人家也不会将主政山西的大权交给他的。当年井冈山上的红小鬼谢振华，如今驻山西 69 军的副军长、堂堂大将军，此时无疑才是老人家最靠得住的人。

谢振华早在 1955 年 39 岁时，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28 年，谢振华的父亲在家乡赣南崇义县发动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农民协会，之后惨遭国民党镇压，他的父亲也被杀害。谢振华逃脱了国民党当局的追杀，找到了党组织并参加了红军。他参加过长征途中著名的娄山关战役、抢占遵义城战役，又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再往后，抗日战争的烽火燃到山西，谢振华奉命过黄河入山西，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留下了他的足迹。打罢日本鬼子，再打老蒋，抗美援朝又奉命赴朝打老美，终于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百战将军。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以

卫恒为代表的前省委,被以刘格平为代表的新生红色政权取代了,当时毛泽东分明是支持和信任刘格平的。而现在,刘格平在山西的这个红色政权,分明变得让毛泽东既不能安心,更不能放心了。于是,谢振华这位当年的红小鬼,如今堂堂 69 军的将军,被安排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必将取代刘格平执掌政权。

十二月会议开罢后的 1968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对山西驻军下达了一个命令,毛泽东朱笔一挥,批示“照办”二字。命令内容,是根据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统一领导,由 69 军党委集体领导,召集其他在山西的部队统一安排。随着这道命令的下达,周恩来出面,对山西党的核心小组人员做了调整,军队干部除谢振华外,还将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补进核心小组成员,明确了谢振华是第一副组长。由谢振华组建起山西支左委员会,除了 69 军的其他领导外,张日清也是支左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很明显,在刘格平倒霉之时,张日清又翻上来了。

正式命令是 1968 年 1 月 3 日下达的,但在十二月会议上,已内部做了传达。此时的刘格平,还是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实际权力已经虚空了。这位为斗倒卫、王、王投书康生,冲杀在山西夺权第一线的老干部;这位为斗倒张日清和刘、陈、刘,利用兵团的那个 4·14 决议,终于在七月会议上大获全胜的山西最大的造反派;这位曾被兵团和红联站骂为“刘未老”,在红色政权中掌权的山西第一把手,此时真正是未老先衰,失却了昔日的威风。

七月会议上,刘格平得胜,张日清倒运,背后的大形势,我们在第六章第十二节中已有分析。十二月会议上,张日清没事了,刘格平倒运了,背后的大形势,是“文革”的发展,使全国武斗四起,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山西,煤炭产量急剧下降,对京、津、沪以及全国的经济造成了掣肘之急。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他的造反派们冲杀了,

只有依靠军人,才能掌控全国局面,转危为安。具体到山西,不依靠69军,岂有他人?七月会议后靠那几个军事院校支持刘格平,不是越搞越乱了吗?

谢振华确也是干才,在十二月会议期间,他主持山西党的核心小组迅速拿出了稳定山西的15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有:抽调全省三大组织的派领导500人,和他们的组织脱勾,到北京办学习班;在全省立即收缴各派的枪支弹药;在全省支左委员会统一安排下,抽调军队干部5000人到全省各地参加军管,首先对公检法、报社电台军管,不准再内外串连;成立太原市警备司令部,由曹西康任司令,兼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学敏任副组长,兼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全力稳定省城形势。

会外如此安排,会上,谢振华还要让全省三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了解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于是,十二月下旬,如刘灏、杨承孝、郝庭云等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一个个全接到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进京参加会议。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与会者回忆是二十七日,存疑。)在北京的京西宾馆,由谢振华将军主持了十二月会议的这次大会。谢振华指定由红联站的代表张玉峰首先发言。张玉峰是太工红旗负责人之一,分管宣传。几天前,张日清已私下安排他准备个发言材料,谢振华让他第一个发言,分明是听了张日清的建议。张玉峰便开始控诉刘格平,说刘格平支一派,压一派,搞了一本《踏遍青山人未老》,为自个树碑立传。说到刘格平迫害革命学生,组织武斗队攻打十中时,声泪俱下,并从包里取出一个小骨灰盒,里面是被枪杀的孟玲玲的部分骨灰。张玉峰哭泣着,要求刘格平给孟玲玲低头认罪,并将小骨灰盒交到陈永贵手中。这时,红联站到会的学生代表们全哭了,有的喊口号,让刘格平认罪。在这种情境下,刘格平不得不起立,向陈永贵手中捧着的那个小骨灰盒,深深鞠了一躬。

谢振华当即宣布,《踏遍青山人未老》是大毒草,要深入批判,还要以省革委名义,为九五事件平反。会上,刘格平当众做了检讨。

在这次会上,红联站的其他学生领袖,也做了发言,矛头直指刘格平。兵团司令刘灏没有发言。这位 19 岁的高三学生,对谢振华的每一句话,都要仔细听个明白。如老师公布标准答案时,他要对照自个的答卷一样。他暗暗庆幸,庆幸这一段兵团的大方向在他的把握下,没有出大错。

第八章

毛泽东要引深他的文化大革命。69军登上了山西的政治舞台。所谓的斗批改和清队，造成了遍地冤狱。九大前后，杨承孝要与69军决一死战。

【1】兵团要与“丁氏东风政府”叫板

1968年姗姗而至。

取代了卫、王、王的刘格平新政权，并没有让太原的老百姓们感到日子的变化。手持发下的各种副食号证，排一天长队，也不一定能买到配给的副食。市区最繁华的柳巷闹市，各种店铺的门面和外墙全被刷成了红色，可惜在一片“红海洋”中，店铺里商品的奇缺，比以前更甚。在全市最大的五一广场百货大楼内，空空的货架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省城三大派群众组织从上至下，准备继续折腾的革命热情，依旧无比高涨。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批评了刘格平，说他9·5镇压红联站的学生是错误的。红联站上上下下为此而激动不已，揭露9·5事件真相的材料，可是他们一份一份地送到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手上的。红联站勤务组的第一把手段立生和其他领导们，一致认定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了刘格平，岂不是支持了红联站？继续和刘格平斗争到底，红联

站一定要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兵团司令刘灏也由暗暗高兴，变成了公开向属下们表态：我们一直都是支持红联站为9·5事件翻案的。暗中配合红联站，让兵团工总司向中央送材料的事已无须再保密了。十二月会议还决定，让驻在山西的69军全面支左，副军长谢振华出任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同时决定让张日清重新出来工作。对此，刘灏更是十分高兴了。记得七月会议后，红总站和红联站都骂兵团是“投机派”，是靠“投机”捞了一顶“革命的左派”帽子。这一回，无论是红总站，还是红联站，你们岂敢再骂兵团“投机”吗？只有红总站的领导们，感到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他们是坚决支持刘格平的，刘格平在十二月会议上栽了，他们岂能不为自己的后台担心？

刘灏又要掌握他的大方向了。他通过兵团司令部办的《兵团》报，向全社会宣示了兵团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在1968年1月1日的《兵团》报上，发布了题为《为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的新年献辞，大批刘格平和他的夫人丁磊在山西夺权后，大搞独立王国，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罪行。随后，在1月12日的《兵团》报上，又发表了题为《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纪念1·12夺权胜利一周年》的社论。同期一版上，还发表了署名为“32111公社在险峰”的宣言：《扶刘开基上马书》。社论里说出了刘灏当时的观点：“让大批革命干部站出来，是我省现阶段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社论里明确提出了“打倒丁磊，彻底摧毁丁氏东风政府”的口号。还说：“不少组织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立场出发，不问干部大节、主流如何，一看只要是对立面解放的，自己这一派就持打倒的态度，以给对方扣一顶保皇的帽子，给自己捞一个造反的桂冠，这是十分错误的。”而那篇《扶刘开基上马书》，则指出刘格平派人将刘开基从北京揪回后，（指刘开基在刘格平夺权后，与赵雨亭一道进京找周总理告状，被抓回太原一事）至今关押着，是“丁氏东风政府”

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从而“彻底暴露了他们继续顽固地推行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嘴脸。”

刘灏与他的汤高参,还有兵团司令部的其他领导们,在他们的喉舌报纸上发表新年献辞时,尚不知中央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是什么内容。他们在研究“文革”的形势和下一步走向时,依据的是毛泽东主席在1967年的7月到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多次讲话内容,这些最高指示在10月底便传达到了全国各地。毛主席说了:“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还说:“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并且强调:“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刘灏从毛主席的这些“最高指示”中,找到新的一年兵团的斗争大方向,那就是通过解放干部,号召和吸引更多的各级领导干部们,或直接参加兵团,或成为支持兵团的力量。待到看了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后,刘灏和他的战友们更为他们先前的判断而自信。元旦社论的题目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还特别公开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社论称其为“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看来毛主席要整党建党了,刘灏认定,此时把握兵团的大方向,必须赶快“解放”大批干部,因为他们是党员,兵团要在山西掌权,将“文革”进行到底,还得依靠大批党员干部才行。要将原卫、王、王阵营中的副省长刘开基“扶上马”的态度,则是兵团要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唯有解放大批干部,让他们支持兵团,才有可能打破刘格平新政权中丁磊和东风兵团大权独揽的局面。兵团公开将刘格平的新政权骂做“丁氏东风政府”,是刘灏已经清醒地看到,

要想与红总站的主力军、由丁磊做后台，由黄锐庵任总指挥的省委、省人委机关干部造反组织东风兵团抗衡，没有大批干部特别是省级、市级机关的党员干部参加兵团或明确支持兵团是不行的。

然而，毛泽东岂能把解放干部这样的大事，任由革命造反组织去做！刘灏还没有来得及在“解放干部”上做出什么更加实质性的举动，红太阳却在北京发布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声令下，让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们全部到京报到，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班，在学习班里进行彻底的斗私批修。谢振华在山西支左执政的十五条措施中的第一条，就这样落实了。

接到通知，刘灏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呀呀！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是不信任我们啦！我是兵团的司令，让我也去斗私批修，这是怎么啦？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来都一心紧跟毛主席，从来都认为自己大方向正确，从来都是斗别人的私、批别人的修的刘灏，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参加这期学习班的，有山西三大派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地区和大企业的领导干部，加上带队的解放军官兵，共七百余人。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长是林彪，具体操办的副组长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山西班的负责人是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副班长呢，有刘灏、段立生、黄锐庵好几个。这个学习班，设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

【2】北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山西三大派组织的领导们进了学习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来人给他们判什么是非。更有想不到的事儿，这期学习班一办就

是9个月。自1968年元月起,山西这七百余入,就被“囚”进了学习班里进行斗私批修。每天主要的活动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就是对照语录找问题。已经20岁了的准知识分子、革命小将刘灏,还有形形色色的各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他们全都沉浸在自以为神圣的革命事业中不可自拔。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晚年给党和国家制造的险风恶浪里,他们全成了弄潮人,一心一意要将自己和自己领导的组织,划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革命左派,将自己的对立面打入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里。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跟着自己最信仰的领袖,给国家和人民制造着灾难,也在这场灾难中给自个制造着人生的陷阱。每天,大家全都按时起床,早饭后端上一杯茶水,各自到指定的地方集中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语录不是最高指示吗?林副主席不是倡导要活学活用吗?学习班的内容不是要斗私批修吗?大家念罢语录,就开始活学活用了,我斗你的私,批你的修,你斗我的私,批我的修。辩论、争吵、拍桌子、唾沫飞溅,是每个班里的必修课。不要以为中央只给山西办了这么个庞大的学习班,对其他一些乱的不可收拾的省,中央也把他们的头头脑脑们集中到北京,办起了同样类型的学习班。当时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巧妙地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如供神一样地把这些“学员”供在京城,莫非是让他们天天吵架?不是,是要稳定地方。全国各地都乱得不成样子了,各地的武斗中,死上几个人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周恩来总理想出的这一招,是要先让各地的造反组织先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无首之龙,在地方上兴风作浪的劲头自然也就小了。

毛泽东要把自个认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更要把他们可以大做文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总理再想如何稳定全国局势也是枉然。到了1968年的3月份,北京城里由中央文革发动的阶级

斗争最新动向,终于使山西学习班里的三大派“学员”们有了新的“学习内容”。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等职务,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时任命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军事院校以及其他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余人的大会,晚上9时许,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人登上主席台。林彪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22日的决定,他用他独有的那种嘶哑嗓音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于是,打倒杨、余、傅,就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揪出变色龙!成了那个大会的宗旨。林彪在讲话中,还肉麻地赞美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林彪的妻子叶群带头振臂高呼:“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林彪的干将吴法宪也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而江青也回报以高呼:“谁反对

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人民大会堂里一夜热闹，2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以红太阳的光芒，给大会送来了对打倒杨、余、傅，揪出军内外一小撮变色龙的支持。首都的形势是全国的晴雨表。全国军民又要按红太阳的意志，将文化大革命引深下去了。

3月25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公社发生武斗。新北大公社是支持校革委主任聂元梓的，井冈山公社则是反对校革委主任聂元梓的，而且认定聂元梓已经变成了“变色龙”。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七个院校支持北大井冈山公社的革命造反派，当天围攻北京大学，形成了大规模武斗事件。

3月27日下午，北京10万军民在工人体育场集会，听取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杨、余、傅问题的处理决定，并发誓打倒杨、余、傅，揪出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变色龙。

当时有句话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山西学习班里，红总站的头头脑脑们开始“活学活用”了。他们即刻把打倒杨、余、傅，揪出变色龙的口号，赋予了山西的地方特色。在山西军界，还能有谁是杨、余、傅的黑爪牙？变色龙呢？十二月会议刚刚决定让69军在山西全面支左，当然不能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负责三支两军的谢振华将军和政委曹中南，那么，只有张日清无疑！可怜张日清刚刚恢复工作还没有三个月，一下子又变成红总站要抓出和打倒的黑爪牙和变色龙了。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两天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社论，在庆祝湖南省诞生的红色政权时，向全党、全军、全民发布了一条红太阳的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对全国各地各种不同的造反派组织来说,学习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势必把自个一派划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而把对立面划成“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在大陆的代表势力,必欲与其血战到底不可!

【3】刘格平无法稳定山西的局面

1968年4月9日,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林彪,率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69军军师两级干部和张日清。林彪逐一询问了他们的军龄以示关怀,并希望他们支持刘格平,搞好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然而,当“文革”的概念被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后,山西的局面和全国一样,刘格平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是难以将全省稳定下来的。

原因太多了。在全省基层,驻军和人武部支持的群众组织,往往是持反对刘格平的观点;支持刘格平的群众组织,又往往是持反对驻军和人武部的观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希望69军和张日清的山西省军区指战员,支持刘格平稳定山西,刘格平自然也希望如此,但具体到军队支左时应该支持谁?刘格平和军队的认识分歧就无法调和了。

还有,山西的三大派组织,在学习班明里闹还不要紧,暗中各家都在策划着新的行动计划,以便消灭对方。伟大领袖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文革”既然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对立面组织一定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代表,不消灭对方,如何显示自个这一派在“文革”中唯我独革的至尊地位呢。如此一理解这条最高指示,再加上学习“革命是

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等语录,用武力打垮对立面,就是当时最革命的行动了。

5月8日,在太原发生了太钢大武斗,那次武斗曾被红总站称之为“1968年的第一个战役”,其目标就是要打垮太钢的兵团下属队伍新太钢造反兵团,让红总站的下属组织红太钢造反兵团在太钢全面掌权。这是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等领导人精心组织的一次大型武斗,事前,郝庭云亲自到现场侦察,确认了新太钢造反兵团盘踞的大楼。5月8日,中午12点,以红太钢的武斗队为主力,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等武斗队协同作战,围攻新太钢的战斗打响。设在太钢职工学校培训大楼内的新太钢总部,刹时间,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附近的居民或离家远逃避难,或用棉被堵住门窗闭门不出。下午5时,一声巨响传进了太原城内。太钢职工学校的那栋大楼被炸,新太钢的据点失守。死者再难复生,虽然负伤挂彩却还活着的俘虏,一个个相随着,或垂头丧气,或举着双手,走出了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的太钢职工学校。这次攻炸大楼死亡人数多少?现在已经难以找到文字记载了。据当年一名红太钢武斗队的机枪手告我,说新太钢的守楼人员中,有4人当下毙命。据另一位当年新太钢的笔杆子告我,说当时武斗双方共有6人毙命。而据郝庭云向我回忆,此次武斗共有5人死于现场,其中两名红总站的武斗队员系被自个的手榴弹炸死。一个是攻入这座培训大楼后,在新太钢领导王本宽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一支手枪,此人兴冲冲往出取这个战利品时,抽屉角意外地挂住了他腰间所插手榴弹上的引线,当下被炸身亡。另一个是在用手榴弹炸对方时,这手榴弹提前引爆,未炸死对方,却炸死了自个。

太钢武斗的消息当天传到北京,刘灏震惊了。新太钢是兵团工总司的一支主力,如此受挫,堂堂兵团司令岂能坐视不管?兵团在学习班中的头头脑脑们紧急暗里开会,商量对策。一致催促刘司令尽快潜

回太原,稳定军心。要不然,兵团岂不是要叫人家红总站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吗?5月9日,学习班的副组长刘灏悄悄溜回太原。第二天就紧急召见了兵团各路人马留在太原的其他大小头领,一来安抚军心,二来准备迎敌。刘司令口若悬河,虽口口声声叫喊:“我们要坚守每一块阵地……”却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方案和如何“坚守”的意见来。一位当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派性小头目,在“文革”结束多年后向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自嘲地说,我们当时总以为刘司令从北京回来,总要有啥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哇啦哇啦地叫喊了半天,只是让我们“坚守阵地”,现在想起来可笑得很,可我们那阵子可是抱定了要与兵团共存亡的决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国民党在大陆的代表了……

北京学习班里的“学员”失踪的越来越多,回到太原和山西其他地市的这些“学员”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兵团与红总站全在备战。红联站与兵团的联盟更加突显,两家将红总站视为共同的敌人。古城太原,阴云笼罩。各单位和各系统内,兵团与红联站联起手来,和红总站的大小摩擦不计其数。特别是在北城工业区、西山煤矿区和河西化工区,两大派之间的小型武斗不断,大型武斗一触即发。

晋中和晋南地区的武斗,规模更大。在《“文盲宰相”陈永贵》(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一书中,作者对晋中两派的武斗,作了这样的描述:

晋中野战军人数不多,号称有三个营。第一营绿帽、绿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和当时解放军的陆军差不多。第二营绿帽、绿衣、蓝裤、绿胶鞋、绿水壶,和解放军的空军差不多。第三营绿帽、蓝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四不象。帽子都是军便帽,没有大沿帽。这支派性野战军全部摩托化,有吉普车和卡车,机动性能很强。枪支不怎么多,

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单响步枪。陈永贵这一派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建立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平遥没有国家的兵工厂,他们把全县各种工厂组织起来,搞成一个军火生产序列,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用的“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后来我还看见他们生产出解放军用的半自动步枪和一小批轻便冲锋枪,还试制出了一挺班用轻机枪,还造出一批很不保险的拉线炮。他们一共生产出“五四式”手枪八百支。这种手枪除了没有准星,其他都和解放军的一样,烤蓝很好。我还看见过他们没有试验成功的小火箭。1969年7月,中央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后,大队解放军开进平遥,把这个军火生产中心给摧垮了,不然他们很快会造出更好的武器。他们造的武器出卖给各县本派的武斗队,价格相当高。文水县的武斗队骂平遥是军火商,卖军火给自己人比苏联的赫鲁晓夫还狠。平遥边上有个孝义县,那里造出一种大型左轮手枪,也相当漂亮,一次装五发步枪子弹。

平遥县为了保护他们的军火生产基地,还自己建立了一支城防卫戍部队,有一百几十人,全部佩带本地造的“五四式”手枪。平遥城人称“龟城”,有六个城门,城墙是国家保护文物,没有拆掉,里面人把城门一关,外面很难攻进去。临近平遥的汾阳县是“兵团派”的天下,“兵团派”想“解放”平遥,就必须研究攻城术。他们在造炮上下功夫。他们把氧气瓶的底锯掉,做成炮身,怕炮身强度不够,又在外面加了几道钢箍,再加一个支架,就成了大口径迫击炮。他们铸造的迫击炮弹,每发重75斤,相当不小,但射不远。原因是他们怕装的炸药多了,炮膛会承受不住,会炸膛。这些炮已试射过,正准备用它轰平遥的城墙,中央的《七二三布告》来了,解放军把它们全部收缴,不然平遥城可能倒大霉。

晋中地区东有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西有吕梁山革命老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很多,其中不

少打过仗的老队员掺合进了两派的武斗队。因此打仗的指挥水平都不低。晋中野战军吃亏的时候不少，一次被人家伏击打死二三十人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在晋南地区，3·18一派竟然命名和控制了一趟铁道部从未备案的318次列车，不但以优先权运输着武斗队伍，同时出售车票向百姓敛财。原南同蒲铁路（即纵贯山西大同至蒲州的铁路线南段）线上由铁道部安排的客车和货车，在晋南平原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飞驰在晋南平原上的318次列车。

那阵子，在北京，在太原，三大派的头头脑脑们，常各自寻个地方，悄悄聚会。名为分析形势，实为研究对策，看如何才能彻底消灭对方。每当兵团一派的头头脑脑们聚会时，“汤高参”总能语出惊人。有一次，他竟在分析形势时，说到了自己对贺龙元帅和杨成武将军的敬仰，虽然离题，却是真情流露，话语中便有了对打倒贺龙元帅的不满之意，同时捎带上了对林彪、江青打倒杨、余、傅的不理解和怀疑之词。他是个知识分子，个人对一些政治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为怪。他偏偏忘了，那个年代，是祸从口出的年代。话是公开讲的，自然会长腿。这些言论，日后全构成了将他送进大狱的罪证。

1968年的5月底，中央文革小组一声急令，命北京学习班溜回太原的所有学员，必须限时回到学习班报到。这一回，高居神坛上的毛泽东要亲自出面接见他们了。“文革”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千古未有的非常态社会。在“文革”形成的狂澜与燃起的烈火中，当各级政权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只有稳坐于党和国家与军队权力顶峰的毛泽东，才能做到既要挽狂澜于烈火之中，又要点烈火于狂澜之内。这也就是个人迷信处在顶峰状态时，被神话了的领袖在短时期内具有的威力。6月2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自山西、福建、内蒙、河北

等十几个省的各派领导人汇聚在一起。他们是群众组织的领袖、畸型政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平年代的武斗战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文革”主力。他们以无比虔诚的心，仰望着主席台，等待着主席台上升起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4】毛泽东要求刘格平拥军

刘灏这天着意换上了“文革”初期革命小将的装束。没有红五星和红领章的军衣军帽，蓝色的裤子，再用一条棕色的皮带扎在腰中，既勒紧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意志，也体现了一位年轻小将胜利者的姿态。他在急切的等待中，暗自心想：我就不信，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容得你刘格平在山西天天当土太阳，与我们革命造反派心中的红太阳争光！

晚上9时许，主席台上终于升起了大家期盼已久的红太阳。红太阳高举起掌舵的巨手，向着主席台下欢呼的人们频频致意。紧随其后的，是手举小红书的林彪。再稍后几步，是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权贵们。老人家确实是气宇轩昂、满面红光，与主席台上的各省负责人一一握手，一一做了最高指示。老人家走到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负责人站立的那一块了。眼见得老人家握住了刘格平的手，“红太阳”开始对着山西的“土太阳”说话了。台上，刘格平、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袁振这些山西政坛的首脑们，估计全都心情激动，而又战战兢兢地侧着耳朵，敬仰与敬畏并存，激情与担心交织，凝神息气，瞪大两眼，盯着毛泽东的脸，要知道，红太阳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山西的大是大非了啊！而台下呢，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们，也一个个凝神息气，但毕竟是在主席台下，毕竟是在全世界最大的大会堂里，最高领袖不是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讲话，而是和被接见的各省负责人说话，说了些啥？台下的人只能看得见老人家的嘴动，但就是

听不见老人家的声音。三大派组织的大小领导都在猜测：这一回的最高指示讲了些啥呢？最高指示一字千钧，山西谁是谁非，现在就看老人家的那张嘴了！

在学习班里，天天读语录时，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可现在他们却一个个全在心中祈祷、祝福、膜拜、期盼着，仿佛正在神殿里等候着神的训示和上帝的福音。接见终于结束了。早已急出满头大汗的各大组织的领导们，不等刘格平上车就把他团团围定，要探听出个所以然来才放心。甬看刘灏在五一广场上炮轰刘格平时嗓门老来大，在学习班里和刘格平争辩时也从不低声下气，可这时他挤到了刘格平身边，却显得分外小心也分外客气。学习班的副班长，这回轻轻地拉了拉刘格平的衣襟，心口儿惴惴的，小声问：“主席讲什么啦？”

众人都等着听呢。不管与刘灏是不是一个观点，红总站和红联站的领导们此时想问的话，不也正是刘灏正在问的话吗？刘格平此时却如落了架的凤凰，没有了精神。他不说不行，不说这些人就不让他走。他不照实说也不行，红太阳对他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的时候，旁边还有别的领导在场呢！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袁振……不照实说，能行？

“主席对我说：你要拥军，你只有拥军，他们才拥政。”

“就这些？还说了些啥？”人群中一片追问声。红总站的领导们希望还有别的最高指示，比如要如何支持刘格平，比如毛主席讲了红总站的大方向正确；兵团和红联站的领导们，也希望还有别的最高指示，比如批评刘格平，比如伟大领袖直接批评了红总站；等等。可刘格平开始摇头了，在一片追问声中，继续摇着头说：“没了。”

肯定是没了，刘格平恐怕不敢胡编硬造一句最高指示。

刘灏可真的高兴了。最高指示说，“你要拥军”，这不就是说你刘格平反军了吗？最高指示说，“你只有拥军，他们才拥政”，这不就是说你刘格平只有改变了反军的错误、或者说罪行，我们才能跟上军队拥

护你吗？而你刘格平要是继续不拥军呢？那还用说，军必反你！我们自然更不去拥你的政，自然还得炮轰你打倒你！甭以为这只是刘灏的思维，对兵团与红联站的所有领导而言，他们全是这种思维。特别是红联站，七月会议上你刘格平逮了一条最高指示，得意忘形欺我红联站，这一回，我红联站可要运用好这条最高指示，和你刘格平好好地较个劲儿了！



69 军副军长谢振华将军

红总站的领导们可一下子全发呆了。特别是那个杨承孝，当时就张口大骂：“照这么说，他张日清他妈的就没事了？”

张日清有事没事，反正他不再是山西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军队代表人物了。山西的各路造反派们都能感觉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动用驻在山西的 69 军这个棋子，借以稳定山西的局面了。

对刘灏来说，局面由此转化，是福？是祸？

他是军人的儿子，他想到了父训中的第四条，相信由军队全面接管山西，对他是福不是祸。

但是，刘灏怎么也想不到，被他这样的革命小将们当作心中红太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时已经不再需要借助千百万学生们的力量，来进行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了。

1968年7月28日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了北京的五大“文革”学生领袖。他们是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此五人中的聂元梓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属北京大学的中层领导干部,因写出被毛泽东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义上也被归入了当时的学生领袖行列。其他四人,则都是当时在校的大学生领袖。聂元梓在其所著《聂元梓回忆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中,曾记录了她对此次“召见”的认识。她认为此次毛主席是“召见”,而不是“接见”,虽一字不同,却证明“红卫兵已经当了替罪羊,该赶到山上和农村去了。该惩办红卫兵领导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了。所以这次召见实际上是毛主席亲自宣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运动结束。”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1968年7月28日,听说毛主席接见五大司令,我和几个外地到北京地质学院串联的学生,一直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总部等消息。凌晨时,王大宾至,神情沮丧,进门即说:‘你们还在等啥?去参军吧!’众人不解地问:‘去哪儿参军?’王司令说:‘7010部队!’见我们还是没听明白,随即解释:‘一把锄头为7,一担粪桶为0-0,还不明白?’说完,凄然辞去,我等都寂然。”

在山西,69军已经登上全省的政治舞台。然而,无论红联站、兵团、还是红总站,或者是它们延伸到各地市的下属组织的头头们,似乎并没有从北京这五大司令被伟大领袖召见一事上,看到自己命运的变化,大家还在尽力折腾着。

谢振华将军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远离山西的北京学习班里,完成山西三大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原本是尖锐对立的派性组织,现在要联合到一起,谈何容易?北京学习班里的各派领导们又忙开了。你谢军长不是要让我们大联合吗?那得看怎么个联合?说穿了,是对方投降?还是我们投降?因为

支持刘格平，兵团在七月会议上打了胜仗，虽然被红总站和红联站骂为“风派”，但兵团毕竟戴上了“革命的左派”帽子。又因为反对刘格平，兵团在十二月会议后又打了胜仗，这一回可没人敢说兵团投机了。这是刘灏的认识。红联站原本就是反对刘格平的，中央批评了刘格平，特别是毛主席让刘格平拥军，这不就说明你刘格平以前不拥军吗？兵团和红联站这一回站到了一起，红联站认定兵团和他们都胜了。红总站也没有认为自个败了。杨承孝就在红总站领导们的一次聚会上给他的战友们打气：“大家不要听刘灏和段立生他们狗日的胡说，中央又没有说打倒刘格平，刘格平还是山西的第一把手呀！毛主席让刘格平拥军，那是毛主席支持刘格平呀！毛主席怎么就没有让他们兵团的后台袁振拥军，再让69军去拥袁振的政呢？在山西，袁振和张日清他们再能乱忽悠，也没法子和刘格平比！”这东北汉子杨承孝嗓门够大，听他说是那么说，但红总站的领导们也看得出来，谢振华手里的权，现在是比刘格平大得多了！即便如此，杨承孝还是一再给大家鼓劲：“咱红总站头上戴着‘革命的左派’帽子，那可是经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他69军敢给咱往下摘？”

69军要在山西掌权了，刘灏决定去找谢振华将军摸摸底细。那天，他一个人来到京西宾馆，找到了谢振华将军。他慷慨陈词，希望69军不要对刘格平和红总站心慈手软。他最后还用毛主席的诗词力谏谢将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哪！”

听罢这位兵团司令的一番话，谢振华却没有表态，反而指着刘灏说：“你要带头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要带头采取主动态度，促进山西大联合的协议早日签定。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中学生刘司令很是失望。心想，你那话是官话，我当然明白。可事情明摆着，你不整倒他，他就会整倒你。我要真的带了头，我的兵团还不叫人家红总站一口吃掉？

谢振华又开口了：“只要你们三大派组织全部倒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山西的局面才能实现稳定。到那时，我们才能在基层完成大联合的任务。不但你要带头，你们三大派组织的领导都要带头。”

仔细想一想，刘灏明白了。大联合好办，难办的是大联合以后，革命委员会里是不是要重新分配委员和常委的名额？不过，这事儿这回由不得他刘格平了，只有紧紧依靠69军，以后在省革命委员会里才能真正掌权。他立即向谢振华表态说：“我一定听谢军长的话，我父亲也是军人嘛，我能不听解放军的话？”和新找下的后台套了一番近乎，年轻的兵团司令又继续向谢军长表态说：“我一定带头，让兵团在这次大联合中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具体地支持谢军长和69军的工作。”

1968年的9月底，设在北京的马拉松式的学习班终于结束。山西三大派组织的领导们，在学习班里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山西各地也纷纷开始在69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开始大联合。69军的各级指战员，渐渐走上了山西各级政权的领导岗位。

【5】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山西的形势

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会还通过了中央刘少奇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所谓“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中国共产党那时在错误的道路上，继

续在领袖毛泽东的指引下大踏步前行。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明明白白写着“一致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但在会场上举手表决时，还是出现了鲜为人知的一幕：曾担任过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中共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委员陈少敏(女)伏在桌子上，拒绝举手。会后康生质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她大义凛然地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会后不久，陈少敏就被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赶出北京，发配到河南罗山劳动改造。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直到9·13事件后才被容许回京治病。“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不幸于1977年的年底因病逝世。陈少敏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开除刘少奇的决定拒不举手的事，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媒体报道，传遍党内外。在那种非常年代，她独自唱出了一支壮歌，映衬出的，却是全党的一出悲剧。陈少敏理应流芳史册，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对当时那些会场上的中央委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

员们而言,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地举了手?有多少人是迫于领袖的权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违心地举了手?党内民主怎样才能走向正常?党内的不同声音,怎样才能能在党的会议上形成自由表达和讨论的局面?这是历史的教训啊!

话题再回到山西。那阵子,山西的三大派造反组织,名义上倒旗实现大联合了,实际上争斗从未停息。虽然69军正式介入了山西的政局,主持全军工作的副军长谢振华,也成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组长毕竟还是刘格平。张日清、袁振毕竟还在党的核心小组中。红总站的头头脑脑们常常在刘格平家中聚会,其夫人丁磊虽然住到了北京,却心系山西,从没有停止和红总站领导们的联系和接触。红总站的领导们则常与张日清取得联系,张日清说起山西的“土太阳”刘格平,依旧怒气冲冲,怎么看也不顺眼。至于兵团,袁振从来就是他们的后台,彼此间的接触自然更未间断。上层如此,基层的各派领导们,明里讲联合,各自暗中都在瞅着上面的动向,等待着重新一举消灭对方的时机。

1968年的12月8日,杨承孝和他统领的决死纵队,第一个明目张胆地无视在北京各家签下的大联合协议,重新树起大旗,要再一次革命造反了。这一天,杨承孝带着他的决死纵队弟兄们,在位于太原新建路的冶金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没有打出决死纵队的大旗,而是打出了写有“冶金工业部第十三新冶金”的一面大旗。会上,杨承孝发表了情绪激昂的讲话,指出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正被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引入歧途。谁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杨承孝点了名,那就是69军支左的谢振华,正在架空刘格平!会上,还发表了一份紧急声明:《关于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誓把我省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主要内容,是要坚决支持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言外之意,决不能让谢振华、曹中南这些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敢说真话的彭德怀大元帅被揪斗

们，借支左之名架空了刘格平。会后，在街头刷出了“将 12·8 革命风暴进行到底”及“坚决打倒谢振华”的标语。杨承孝是省城最大的造反派，换一个旗号重新拉起了队伍，使省城太原在跨入 1969 年的前夜，又泛起了大动荡的波澜。省城的政治波澜，必将波及全省，12 月 14 日，在晋中灵石县，两派群众发生了武斗，县人武部

副政委渠志凯被持红总站观点的一派群众殴打致死。12 月 18 日，该县人武部人员陪同渠志凯家属来到太原，要找刘格平告状。刘格平正在晋祠 276 医院住院，告状者寻到医院，刘格平身边的人不让见，双方发生了冲突。灵石县红总站派有人尾随而至，造出舆论，说灵石县人武部要派人谋杀刘格平政委。这件事，也给了杨承孝后来高调保卫刘格平一个借口，并写入了他 1969 年一月革命造反的“一五宣言”中。

在我们详述杨承孝的“一五宣言”前，先插叙一节，讲讲工宣队在大学的斑斑劣迹。

【6】工宣队在大学的斑斑劣迹

69 军的广大指战员，以及驻晋其他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他们那

阵子也无法跳出中央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会议所制定的错误路线。既要与广大群众一道批判刘少奇,批判各条战线的所谓走资派,还得弄清哪一派是真正的左派而去“支左”。在当时那种“文革”的泥淖中,他们一方面努力地稳定着山西的局面,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地推动着“文革”的浊浪。

当谢振华将军在北京忙着做工作,让三大派的领导们统统倒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在省城太原,省革命委员会也在谢振华的安排下,开始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组织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进驻大专院校。

提到工宣队,还得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8年8月25日下发的《关于派驻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说起。这是毛泽东在7月28日深夜“召见”北京的五大文革学生领袖后,对如何继续进行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做出的又一决策。这份《通知》的精神,在8月26日《人民日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有了最具体的阐释。这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那种鄙视知识分子的看法:“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团结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工人和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先发动学生,后组织工人和贫下中农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连续浩劫。

在这个精神指引下,9月27日,山西的第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红旗方阵的引领下,排着队,昂着头,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浩浩荡荡开进了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这些工人师傅们,来自当时的铁路系统、矿山系统和纺织机械系统。人民解放军驻山西

某部也派出一批指战员，参加了这两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面对此情此景，省城太原这两所高等学府的教师和学生们，人人心事惴惴，不知自个的命运，又将遭遇怎样的跌宕和磨难？

以山西大学为例。在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8·8红旗战斗队和8·14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两派师生，在表面上也倒旗了，也联合了，学校还成立了大联委，但派斗未绝，不过变了形式而已。明里暗里惨斗对方的两派师生，在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时，由于有了工人师傅们的带头，其手段也更为残酷。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情况。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是王光美。王光美有一位胞妹叫王光中。王光中在山西大学工作，其丈夫王净是位一般干部。王光中官儿不大，不过是山西大学幼儿园的园长。党中央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了，消息传来，8·14的学生们先把王光中夫妇揪了出来猛斗一番，而且以此攻击8·8是刘少奇的保皇狗，因为他们揭发说刘少奇的小姨子和连襟是8·8一派的观点。8·8的一些学生们也贴出大字报，以革命的义愤和斗志，表现他们与刘少奇的连襟和小姨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以此批驳8·14说8·8是刘少奇保皇狗的观点。可怜在国家元首刘少奇惨遭迫害之时，他远在山西的连襟和小姨子，也正在遭受着难以言状的迫害。遭批斗时，夫妻二人的脖子上，竟然被挂上了用铁丝吊着的又大又厚的木牌子。面对两派学生这种惨无人道，株连九族的斗争，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给予了支持。在工宣队的勒令下，王光中和他的丈夫每天中午都要站在学生大饭厅的门前，脖子上用铁丝吊着又大又厚的木牌子，一个上面写着“刘少奇的狗连襟”，一个上面写着“刘少奇的臭小姨子”。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工宣队让他们必须天天挨批挨斗，再受尽人格侮辱的“罪名”。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西大学一个多月后，即11月6日，

组织了一次名为“狠揭猛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山大的代理人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大会”。刘梅、宋华青等 20 多位校级领导被押上大会,其斗争场面,远胜于两派以往的各种批斗会。工宣队有的年轻师傅亲自上阵,对批斗对象扭胳膊让其坐喷气式的劲头,更是远胜于同时押送批斗对象的两派大学生们。这次大会后,各个系都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召开了各个系的对敌斗争大会。一批批教授、讲师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惨遭批斗。开展对敌斗争的大会和小会,开罢一个又一个。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的《刘梅教育生涯 50 年》一书中,收有曾担任过山西大学 8·8 一派领导的方培泉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直如朱丝绳,洁如玉壶水》,其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一天下午,刘梅领着家人,在大操场东南角的墙上张贴“冤案必翻”的情景。刘梅脸上那种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的坚定神态,震撼着我的心灵,动摇着我对“文革”的信念。

我还记得,为了迎头痛击“翻案”风,工宣队和军宣队召开由两派领导组织的批判会。不知是谁准备了一个好几斤重的大牌子,用一根细铁丝挂在刘梅的脖子上。没一会,脖子上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刘梅一边回答连珠炮似的问题,一边疼得牙根直抽冷气,实在是忍不住了,用手将铁丝移到衣领上。一位小战士见了,示意我旁边的一位外语系学生,过去把铁丝重新放到那道让人看了心都能发颤的印痕上。我真不知道,那位小战士与刘梅前世无仇,今世无冤,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仇恨。

工宣队的年轻师傅们,和那位参加了军宣队与工人阶级们一道

开进大学的小战士一样,他们是来领导大学的,是来对大学的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们进行专政的。他们的头脑里,带着伟大领袖告诉他们的使命和重任,对被专政的阶级敌人,岂能没有仇?没有恨?在庆贺九大胜利召开的大会上,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表现出的无比仇恨和无比愤慨,比大学的师生们更胜一筹。工宣队1968年9月27日进驻山西大学,到1969年9月19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促成两派大联合,对稳定该校局面是有成绩的,这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评价工宣队的一个标准。但工宣队在促成大联合后,对下一步继续占领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却无法脱开中共九大的错误路线。山西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工宣队对山西大学的“文革”做了这般总结: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角!“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无限忠于您的山大革命师生员工,响应您的伟大号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省、我校的代理人猛烈开炮!向着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炮!向着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炮!……

对山西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工作,做了这般规划: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遵照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教导,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大旗,认真贯彻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和您的无产阶级政策,抓紧革命大批判,过细地做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您的思

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胜利完成您所规定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誓把山西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下达了紧急加强战备的第一号命令。这个一号命令,在全国各地,再次引发了备战的高潮,马上就会打仗,而且是要打大仗的气氛在全社会弥漫着。山西太原的高校,也受命进行战备转移。

山西大学的转移地是山西昔阳县。太原工学院的转移地是山西襄垣县。

这一年的12月30日,山西大学全校师生,在驻校工宣队领导下,步行前往昔阳县。在一周的步行途中,还要在工宣队的安排下,不时地召开对学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批斗会。

【7】杨承孝的一五宣言

让我们再回到1969年全国的大形势上,反观山西。

1969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这篇社论中,对1969年做了如此规划:

1969年,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将是光辉的、极其重要的一年。

1969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1969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

为了实现1969年光荣和艰巨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统一我们的思想行动。

刘少奇被打倒了,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将是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派们重新分配权力的饕餮盛宴。官方不断组织着红色的欢庆,同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也继续在高层进行着黑色的政治迫害。

这一年的6月9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贺龙,在身遭种种诬陷和迫害中,背着莫须有罪名,悲愤地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73岁。

这一年的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身遭种种诬陷和政治迫害中,背着莫须有罪名,悲愤地含冤离开了人间,终年71岁。

当代中华民族的大英雄、铮铮铁骨的大元帅彭德怀,背着莫须有罪名,正在被囚禁处遭受着无休止的批斗和毒打,最终在毒打中骨折致残,半身瘫痪。彭总不屈的生命,在毛泽东为他制造的冤屈中熬煎着,熬煎中依旧期盼着党中央能为他抹去冤屈。彭德怀刚正不阿的生命,却等不到这一天了。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辉煌战功的大元帅,熬到1974年11月29日,悲怆地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76岁。

在红色的掩盖下,虔诚搅动着疯狂,国人在神的驱使下,继续着领袖指引的“文革”。

当中央和地方上的“文革”新贵们,纷纷想趁九大之机再次加官晋爵时,在山西,却因69军被周总理安排,被毛主席批准进入政坛,

使“文革”新贵刘格平无法再大权独揽。身为1·12夺权时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杨承孝，眼看着69军的谢振华分割了刘格平的权力，面对自己再难叱咤风云的局面，对69军发动了一次突然的袭击。不是武斗，杨承孝还没有与69军真枪真刀厮杀的勇气。此番，这位工人造反领袖，是请秀才作文章，要来一番文斗了。

一切全在秘密进行着，杨承孝的这次行动，也渗透到了省城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原先持红总站观点的派性组织领导，已经在驻校工宣队不知情的情况下，串连好了队伍。1969年元月5日，杨承孝带着他的决死纵队的人马，在五一广场集会誓师，同时散发了一份《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师宣言》，当时被称为《一五宣言》。那天一早，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的一批学生，也集合队伍赶到五一广场，散发《一五宣言》，呼喊早就拟定好的口号，参与了这次大集会。这些学生在后来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驻校工宣队的整治，被指参与了“一五逆流”。

这份《一五宣言》写得好生厉害。宣言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山西进行继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四一四打倒刘、陈、刘革命风暴后，掀起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夺权的第三次革命风暴。其矛头，直指山西政坛上取代了刘格平的谢振华将军和他带领支左的69军。

现将这份宣言全文录下：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战斗号召下，我省一场由工人阶级打先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动员，奋起猛击“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民战争已经打响了！一小撮刘少奇的爪牙、杨成武的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完全陷入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

12·8 革命风暴正在向纵深发展，席卷全省，其势锐不可挡，迅猛异常！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山西，那股“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在山西的一小撮黑干将，那个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的黑司令部的文武裴多菲俱乐部安插在山西的一小撮黑爪牙，对山西人民已经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我省 1·12 夺权胜利不久，配合谭震林之流，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方面，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另一方面，积极扶植保守势力，阴谋策划反夺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准备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四月红色风暴前后，组织了由刘陈刘在前台表演的反党集团，刮阴风，放暗箭，恶毒咒骂省革委，大肆攻击刘格平，全盘否定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妄图颠覆我省年青的红色政权。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疯狂地破坏革命、破坏生产，连续制造反革命暴乱，不断挑动大规模武斗，妄图借助武力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紧锣密鼓配合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大搞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顽固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力推行反动的“多中心”，把山西搞成了一个上欺中央、下压群众的“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早已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他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要造反，要斗争！把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革命的浪潮，排山倒海，造反的吼声，惊天动地！全省煤矿工人、钢铁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电业工人、交通工人、纺织工

人、冶建工人、化工工人、机械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各个部门的产业工人、各个行业的革命群众，统统杀上阵来，汇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向着“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敌人的气势被打下去了，敌人的阵角被冲击开了！

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几个反复，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刘少奇的爪牙、杨成武的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的竭力破坏，山西的工人阶级仍然没有形成一支主宰沉浮、左右形势、捍卫我省红色政权的坚强核心，从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想当年，在震撼世界、席卷全省的“一月风暴”中，光荣诞生了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引下，顶逆风，战恶浪，叱咤风云，气壮山河！把卫家王朝打了个落花流水！在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英雄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记下她光辉的业绩！

然而，正是在那股“二月逆流”中“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三番五次、千方百计对她大下毒手，终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被他们残酷地迫害、疯狂地镇压、无情地扼杀了！

从那以后，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被分裂，工人运动被镇压，卫家王朝死灰复燃，刘陈刘反党集团日益嚣张！

从那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红色政权肆意摧残，牛鬼蛇神到处泛滥，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令不能贯彻、落实。

从那以后，山西的大权被几个混蛋所把持，他们大肆推行反动的多中心，大力贩卖刘少奇的“黑六论”，把山西推向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边缘。

当前，正面临着我省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次革命，一小撮阶级敌

人,开始预测到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于是便孤注一掷,进行垂死挣扎!为什么12·18谋杀刘格平政委、12·24伏击8333部队的反革命事件连续发生?为什么许多地区直到现在还在抓人、抄家,施行白色恐怖,大批革命群众被迫外逃?为什么保守势力又拿起了武器,到处挑动武斗,残杀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全国各地参观大寨代表团途经阳泉频遭刁难,大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多次被劫?

这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一桩桩,一件件,多么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最烈!产业工人的大会师,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已经揭开了我省第三次革命风暴的序幕,一小撮阶级敌人惊慌失措,冷汗淋漓,广大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斗志昂扬!

毛主席教导我们:“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有利的情况,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为适应当前斗争的新形势,为彻底清算一小撮“二月逆流”黑干将镇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滔天罪行。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大军向全省革命人民郑重宣告:

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自即日起,恢复战斗了!汾河两岸杀声起,吕梁山下呼声急!让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和一切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面前发抖吧!我们正式宣判你们的死刑!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也就丧失了一切!”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明白布告全省:我们恢复战斗,就是要向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政权!把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所抢去的和骗取的一切权力统统夺回来!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最高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的天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灵魂!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指导思想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质的东西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要造反!我们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抵制,坚决砸烂!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保卫1·12夺权的伟大成果,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被一小撮“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宰割得支离破碎,践踏得遍体鳞伤,这笔账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省革命委员会必将恢复她的无产阶级权威,必将成为带领我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战斗指挥部!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相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谁胆敢挑拨军政关系,破坏军民团结,分裂中国人民解放军,败坏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自毁长城,我们就坚决打倒他!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刘格平政委,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陈永贵同志,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坚决支持徐志远!坚决支持任、王、张!誓死保卫大寨红旗!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两报一刊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紧急通告:凡我总指挥部原属组织,立即归队,凡愿加入我总指挥部的基层单位,立即报到,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立即投入战斗!

英雄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顶天立地,坚定不移!赤胆忠心,

勇往直前！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会在我们工人阶级钢铁般的团结面前望风丧胆、彻底灭亡！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们正式宣战！向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正式宣战！

决战已经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呼吁全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急动员起来，团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彻底孤立一小撮顽固抗拒历史潮流的阶级敌人，稳、准、狠地消灭他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这篇宣言中提到的 12·8 革命风暴和 12·18 谋杀刘格平政委的事件，在本章第 5 小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不再赘述。宣言中提到的 12·24 伏击 8333 部队的反革命事件，和提到的全国各地参观大寨代表团途经阳泉频遭刁难，大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多次被劫一事，也是当时两派武斗中发生的情况。1968 年 12 月 24 日，8333 部队去大寨参观，途经和顺时，当地红总站观点的一派，组织队伍迎接，并在和顺县城军民一道游行。在路过兵团红联站观点的总司派占据的大楼时，双方发生武斗，并且开了枪，死伤情况不明。当年大寨是山西的一块圣地，全省和全国去参观的人很多。以省城兵团、红联站和红总站三大组织而论，都曾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大寨给大寨人演出，向大寨人学习，沿途发生冲撞和武斗，也不在少数。这篇宣言的要害，不在这些具体事件，而在于要号召全省各地支持刘格平的群众组织，迅速掀起在全省革命造反的第三次革命风暴。

在本书第五章有关 1·12 夺权的小节中，我们曾全文引用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谁？是在刘格平指挥下，出尽风头的杨承孝呀！《一五宣言》要恢复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是杨承孝要重新在山西当造反派组织老大的一种政治诉求。在山西的“文革”中，这两份文件可谓典型。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试条理如下。共同之处有四点：其一，两份文件，都是以漫骂为战斗品质，用大帽子攻击为特色；其二，都有一种忠于领袖的虔诚心态，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自个意志才符合毛泽东思想；其三，要打倒一些领导干部，就要支持一些领导干部，（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没有明确支持刘格平，但实际上通告本身就体现了刘格平的政治主张）；其四，为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正确，反复用最高领袖的语录加以证明和解释。而不同之处呢，只有一点：前者堂而皇之地被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后者却成为杨承孝及参与者的一种罪证，被当局斥之为“搞逆流”。原因呢？很简单。前者适应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要打倒刘少奇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需要有人造反。后者违背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需要，中央要开九大了，要靠军队稳定局面，你杨承孝又要带头革命造反，岂不是“搞逆流”？两份文件，前者标志着山西群众造反组织达到鼎盛时期，后者标志着山西群众造反组织正在被逐出政治舞台。这个时间段，也是全国各地群众造反组织由盛而衰，最后消亡的缩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的执笔者，是北京来太原革命造反的大学生们，他们后来离开了太原，未闻有因此文章而被获罪者。《一五宣言》的执笔者，是太原冶金一中的一位语文教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文革”兴起，投身革命运动，参加了决死纵队，成了工人阶级中的笔杆子。后来杨承孝被谢振华整肃，最终被押赴刑场命丧黄泉后，这位语文老师，也因执笔此文被关押审查了好几个月。“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必须服务于极权政治的需要，顺者昌，逆者亡。由杨承孝两次牵头造反，结局不同，可为例证。

《一五宣言》发表后，元月12日，杨承孝又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吸

收红总站的一些下属组织参加,庆祝山西 1·12 夺权胜利两周年。说是游行,在马路上游行还不算,还冲进省革委(即府东街前省委大院)游了一圈。那阵势,分明是要向谢振华和他的 69 军示威,向还在担任着省革委主任和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刘格平表示:我决死纵队支持你的雄风犹在!

省城的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字院,如“文革”运动的晴雨表,此时,山西大学就有 8·14 一派的师生们,也发表了与《一五宣言》一个调门的《一七宣言》,宣布脱离驻校工宣队的领导,要重新杀向社会。在太原工学院,也有永红一派的师生们,做出了如此行动,以响应杨承孝决死纵队的《一五宣言》。这些师生在后来中央表态《一五宣言》是错误的以后,回到学校成了被对立面和工宣队批判整肃的对象。被称之为“搞了逆流”。

有杨承孝带头,在山西各地,又出现了工人上街,学生上街,以及冲击解放军驻地,抢夺枪支的种种行为。

【8】迎芒果大会被搅散了

1969 年 2 月 2 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五一广场,隆重召开迎芒果大会。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水果市场上,芒果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可在当年,芒果在大陆却是一种市场上见不到的稀罕水果。不仅仅是稀罕,它还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一种水果。那时国内的报纸上,常常宣传说毛主席不但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外宾,客人便将芒果作为他们珍贵的礼品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时刻关心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便将这些芒果,赠给了驻北大和清华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两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这些芒果不敢独享,又将它

们分赠给各省进驻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当地人民。山西省十分荣幸地得到了伟大领袖送来的几个芒果,这种无尚的光荣含着说不清的深远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这些意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便在太原五一广场隆重集会,称为迎芒果大会。山西进驻大学的工人师傅们,还有当时山西一千八百多万老百姓,如何去分享那几个迎来的芒果呢?没有人敢想,怕也没有人想过。即便有人想过,在那个年代,有了这种“反动”想法的人们,也是不敢说出来的。

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搞过这种迎芒果大会。后来传闻,清华和北大的工宣队分赠各地的芒果,很多都是用石蜡仿制的,放在玻璃匣子里,只能供人瞻仰,绝对不能食用。山西迎来的芒果,是真?是假?如是真的,下落如何?如是假的,供在何处?对山西“文革”的发展,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会场上出现了令组织者和许多参与者始料不及的变故。

那一天,到会的省城各界群众果然没有打出原先三大派的派旗。谢振华和曹中南站在主席台上,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也站在主席台上。心情最高兴的,大约莫过于谢振华和曹中南这两位69军的首长了。在69军的努力工作下,山西的三大派组织终于倒旗了,终于大联合了,虽然杨承孝不肯倒旗,闹了那么几下,好像也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虽然也有各色旗帜飘扬,但那是写着各单位名称的彩旗。山西的形势,可真是“一派大好”了。然而,突然就出现了问题。有些工人队伍打着旗帜来到了会场外,要向会场里冲,一些会场里的工人队伍主动配合,也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旗帜里外呼应。不是派旗,但分明又是派旗。什么派旗?请看:有的叫“冶金工人”,有的叫“钢铁工人”,有的叫“煤矿工人”,有的叫“电业工人”……原来这是红总站总指挥郝庭云、核心人物黄锐庵伙同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策划的高招儿。你69军不是说要听中央的话,不准再成立跨

行业的组织了吗？你 69 军不是让我们统统倒旗了吗？可我们这一回打出的旗帜是系统的工人队伍，看你能说什么？如果仅仅是打出这种旗号也没有啥，问题是这些队伍还打着热烈庆祝山西省 1·12 夺权胜利两周年的大横幅，还在天女散花一般散发着早已印好的传单。什么传单？还是那个《一五宣言》。

更可怕的，是那一天杨承孝麾下的游行队伍中，还抬着两具尸体，他们是在一次武斗中死亡的。抬着死人游行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它的意义在于激愤群众，向社会表白对方的滔天罪行。有死尸为证，还不说明 69 军与兵团、红联站一道，欠下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血债了吗？

原本是想让省城人民群众迎接芒果的大会，终于被红总站的领导郝庭云、黄锐庵，伙同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承孝带着人马，以庆祝 1·12 夺权两周年为名的大游行给冲垮了。广场上顿时大乱起来，主席台上的几位军人，这时便来到谢振华和曹中南身边，其他地方干部，也将目光投向谢振华。张日清急的冲负责会场保卫的李金时喊：“开枪、开枪！”李金时指着谢振华说：“问他、问他。”谢振华说：“乱来，这么多人怎么开？”张日清说：“朝天开！”谢振华说：“笑话！朝天也不能开！”结果是，这些个领导们，匆匆离开了主席台，各自坐上专车，在解放军战士保卫下，走了。这个大会也就乱哄哄地散了。面对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这种挑战，兵团与红联站决心还击到底。过去的派旗虽然三方都没有公开打起来，但两大派人马的厮杀决斗，又成了必然之势。虽有支左的 69 军，但山西的局势眼看就又要乱了。

各地的武斗也再次出现了高潮。全省范围内的停工停产此起彼伏。各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屡有发生。靠武斗抢占地盘成了各地并不新鲜的事件。

当时，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的文件，全

国军工战线会议和冶金战线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当然,这种抓生产的会议,具体操办人是周恩来总理。山西发生的问题,再次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必须表态,支持69军,稳定山西的局面。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出面,江青、康生参加,一道接见了参加这两个会的山西代表,同时接见的,还有被叫到北京的山西军工系统和冶金系统的一些派性组织的领导。杨承孝便是其中一位。

周总理主持接见,开门见山说:“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分裂了。原本是联合的,成立革委会了,当然还是不完善。有些单位,还需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根据真正平等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改组革委会,或者补台或者调整,这个原则对全国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你们那儿,也同样适用。……现在,太原,晋中,晋南的侯马、临汾,还是需要先把拖出来的,杀出来的,或者是赶出来的请回来,把这种形势改变过来。不能再分裂了。”

与会的江青和康生,不得不按周恩来总理的调子,也大讲了一通联合。山西不仅是煤炭生产的大省,也是军工生产和冶金生产的工业基地。周恩来总理要求山西稳定,目的是不要破坏了工业生产。毛主席要开九大了,江青和康生正等着在九大上坐进中央更高的位子,把持更大的权力呢,他们自然也不希望山西的局面乱起来,干扰了九大的召开。那个两年前在七月会议上曾经支持杨承孝的康生,这次竟针对杨承孝的那个《一五宣言》,点了杨承孝的名,大骂一通。

【9】九大前山西群众组织领导被斗私批修

为了让69军稳定山西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安排谢振华将军,让69军党委主持,在北京郊外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举办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大约到了7月底,设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那个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山西班,也奉命搬到这里。

从1969年的3月5日开始,先是山西三大派性组织的领导按时集中赴京报到,接着,省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加上按系统按行业列出的各级领导干部、有关人员也分批赴京报到。于是,全省凡是进入了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干部,和各个系统的造反派领导,一个不落地全部被召进了学习班。这回这个中办学习班可与上一回不一样,不是靠自己教育自己了,也不是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了。学习班的管理者和教育者,成了曾经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他们一部分人离开了清华大学,又开进了山西的“中办学习班”。对这些管理者和教育者们进行管理和领导的,则是谢振华将军和69军的党委。具体负责人,是时任69军副政委的戴秉孚。山西学习班的“学员”们,这一次可不比上一次了。上一次矛头对准了对立面,这一次呢,一个个全得斗自个的“私”,批自个的“修”,要自个革自个的命了。而像刘灏、段立生和黄锐庵等三大群众造反组织的大领导,工宣队和军宣队还要他们“解剖”自己,以便使他们在斗自个的“私”,批自个的“修”时,斗得更狠也批得更猛一些,从而成为带动其他领导们斗私批修的榜样。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被个人迷信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此时已将刘少奇彻底击垮,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再不需要造反派们去炮轰刘少奇的黑司令部了,军队支左,组织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全国的造反派们,正在被他们的红司令推上被革命的地位。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创造过历史,但领袖的需要,正在让他们被同一个领袖推向自己的反面。

1969年的4月1日到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京召开了。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林彪,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再看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林彪的老婆叶群,何德何能,竟双双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封建社会开明的帝王,尚要定一条后宫不可干政的规矩,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通过九大让江青、叶群全进了政治局,这次九大的胡折腾,可见一斑。九大闭幕了,全国人民都看到,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林彪,成功地让“文革”左派们执掌了大权,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在党中央常委内的地位,已经变成了一个点缀般的符号。

报道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电影新闻纪录片,也在山西的“中办学习班”播映了。大家从屏幕上看到,在人民大会堂里,“红太阳”正神采奕奕地升起在主席台上,会场内的代表们喊着、跳着,集中了那个时代最虔诚,也最疯狂的感情。毛泽东坐在了主席台前排的中央座位上,右边是周恩来总理,和坐在周总理右边的还未被打倒的几位老师、老将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毛泽东的左边,则是林彪,和坐在林彪左边因“文革”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各位男女新贵们。一左一右,分分明明。更重要的,是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白纸黑字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在领袖终身制的体制下,林彪这个所谓的接班人,必须是在毛泽东闭眼之后方能取而代之。一位终身制的领袖,指定了某人为接班人,无异于以前的皇帝指定太子。太子稍有急躁之心想早点接班,便会酿成父子反目的宫廷悲剧,这类故事,中国的历史上太多了。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为中国历史上的这类故事

中,又增加了一个现代的版本。

然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明向世人宣告,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红太阳”的万丈光芒,也照进了山西的“中办学习班”里,九大文件成了学员们天天必学的内容。虽然也在天天学习时,重复着九大文件中的那些官话和套话,但他们似乎从自己身上,却体会不到革命胜利的那种喜悦。因为,山西三大组织的大小领导们,都能感觉到一种成了革命对象的滋味。

69军将山西三大派的领导们全召到了北京,进了“中办学习班”去“斗私批修”,山西的局面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吗?非也。在那个年代,各派群众组织中,大头目下面还有各级小头目,而小头目在其所在的地面上,就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大头目。在北京开始斗私批修,已经做了革命对象的三大组织的主要领导们,其实根本控制不了下面的那些群众组织。在山西,基层的红总站派,依旧与呈联合态势的兵团派和红联站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小武斗。

【10】九大后山西基层武斗依旧不断

先以介休县城为例。

这个小县城里的两大派,一派属于晋中总站派,一派属于晋中总司派。总站派是掌权派,人多,总司派人少,但以矿务局的工人为主。学者介子平曾撰文,记述了九大后这里发生的一场大武斗: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晚间的“重要广播”发布了此消息。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有的地方连夜举行火把游行,唯恐忠心迟表,介休则在翌日进行了盛大的街头庆祝。游行队伍经过西

关正街汾西矿务局大门外时，办公大楼内的一派未经宣战，忽向另一派开火袭击，当场毙 23 人，伤 99 人，死伤者中多是无辜的观看者。……尸体甫去，血迹未干，便有大胆之人见利而不见害，现场拾鞋，但未见有配套者。

再以榆次县城为例。

离太原不足 30 公里的榆次小县城，如今因旧城的保护和开发，成了许多导演看中的外景拍摄地，其中，也不乏战争题材的影视剧。可是，在 1969 年的 5 月 11 日，这里却发生过一场真枪实弹的大武斗。

榆次两大派被人们简称为总司派和总站派。九大后两家名义上倒旗了，但总司派原先的一些武斗队，改成了护厂队。而总站派则改名为一把火，其大本营，就设在市委大楼和晋中地委招待所，其武斗人员还占据着榆次国防 525 仓库和榆次粮库。这一年的 5 月 10 日晚上，总司派从晋中的其他县集中了一大批武斗人员，对国防 525 仓库和榆次粮库实施了武装包围。5 月 11 日凌晨 5 时，总司派总攻开始，由于有军分区支持，攻打这两个仓库的武斗队火力占到绝对优势，枪炮声震撼了榆次老城区。经过一场激战，据守这两个仓库的一把火武斗队最后败北，逃离了榆次。总司派占领了粮库。一把火的武斗队逃到了太谷县。这次武斗死伤多少人？据 2012 年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山西纪事》中陈瑞、温晋生所撰史料记载，这场大型武斗中，双方共有 24 人致死，16 人致残，数百武斗人员负伤。

6 月 5 日，逃到太谷县的一把火武斗队放出消息，说要对总司一派组织反攻，总司一派组织人马去阻击，结果进入对方设好的埋伏圈，有 16 名武斗人员被俘，全被一把火武斗队打死。6 月 26 日，总司一派打听到一把火头目带武斗队驻进了太谷任村和太谷师范，遂组织两支武斗队奔袭对方。双方开火，共计 12 人致死，14 人致残。

再以晋南临汾为例。

到了1969年的7月1日，临汾的1·26派和3·18派，就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大型武斗。那场武斗，据当时的见证人讲，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当年解放战争中的临汾战役。

这是一场攻城战役。掌权的3·18派把革委会迁到侯马后，从各县调集了大批民兵，号称万人大军，有百门大炮，并于7月1日向守城的1·26派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坚战。城内约有5000人的武斗人员，抢了一个军火仓库，配备有新式机关枪等现代化的武器。这场战斗异常激烈，晋南地委办公大楼被炸，死伤了不少人员，武斗战场硝烟弥漫，一片狼藉。这一次武斗，以攻城的3·18派失败而告终。武斗中除伤亡人员外，1·26派像解放战争中我军对付被俘人员那样，对所俘的武斗人员集中整训，提出愿留下的，可以参加他们的武斗队伍，愿回家的给每人发一件衬衫、一条毛巾，听说，有的还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这一次武斗看似结束，但对立的两派都在积极搜罗兵马，修筑工事，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处在孕育之中。

……临汾城外攻城的3·18派，人多势广，……多是从农村以每人每天3元钱的工资招募来的，而守城的1·26派，虽然只有5000来人，但这些人都是各县清理阶级队伍时逃跑出来的，他们认为，在家也是一死，在这里也是一死，不如在这里决一死战，所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是很惨烈的。

（摘自新华社记者李果所著《我当记者》一书之《历险记》。该书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10月出版）

这样的武斗，在山西的全境，正在大大小小，不同程度地继续发生着。

呜呼,这些参与“文革”的武斗队员们,在历史的悲剧中,他们捍卫着、冲杀着,都将对立面当成了代表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敌人,当悲剧结束后,他们魂归何处!他们流尽的血,只能将那场悲剧涂抹的更加血腥、更加没有人性。

而当时,面对全省到处是武斗的局面,刘格平根本稳定不了山西的政局。谢振华、曹中南和他们领导下的69军,也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第九章

谢振华将军借《七二三》布告威力,杀一个,关一个,努力稳定着山西政局。山西的派领导们被囚在北京,革命的小将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1】中央发布了《七二三布告》

1969年的7月23日,中央为解决山西问题,有针对性地以点带面,发布了一个《七二三布告》。这个《七二三布告》即七月二十三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山西发布的一个布告。以中央的名义向山西发布告,可见山西武斗事态,已到了不以特别手段而不可能阻止的地步。

布告指出,在山西省的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坏领导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1.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2.抗拒执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3.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4.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和财产安全;5.抢占

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夺国家大量资财；6.用武力抢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物；7.制造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七二三布告》列出了中央决定采取如下八项措施：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及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除同蒲铁路段非法的318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和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领导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八、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布告特别强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最后号召山西的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在贴遍山西全省城乡的这张布告上方，印着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照办。

8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毛泽东签发的《八二三命令》，其中重申要坚决贯彻执行《七二三布告》。

以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这个布告和这个命令为手段，驻山西的69军，在谢振华将军、曹中南政委的领导部署下，开始在山西进行了全面军管。在对山西高层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也为69军扫清了一些障碍。

8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盛热难熬。驻中办学习班的原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们，各自向他们管辖的小组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没睡下的，急忙出门，睡下了的，急忙穿衣服准备出门。每个人都拿上自个的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吹响的哨声里排好了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还是对立面，一见面就乌眼鸡似的，可现在却都在用眼神彼此打探消息，传递着同样的不安和恐慌。自从传达了《七二三布告》，一个个心里正紧张着呢，今儿晚上的紧急集合，天晓得又要出什么事情！

排着队，步履蹒跚地走到了操场上，再一个个一排排坐在自个带着的小板凳上，等着开会。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一位负责人宣布开会，又宣布今天晚上，将有中央首长接见大家。主席台上果然就出现了大

人物。陈伯达领头，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随后，一个个神色严峻，脸上绝无丝毫笑意。

说是接见，实际上是训话。陈伯达口口声声要学员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最后就开始点名了：“刘格平和张日清，是山西两派组织的派领导，还有袁振也是个派领导……”

妈呀！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全被九大上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给点名了。陈伯达的那一口福建话让山西人十分难懂，但刘灏还是听懂了。他心中不由得一阵恐慌。看来，刘格平、张日清、袁振这一回都要挨收拾了呀！

“谁叫杨承孝？”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又用福建腔发问了。

杨承孝便朝台上的中央首长点着头站了起来，山西省的夺权总指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顺从的模样呢。

“特殊审查。”

还有啥可说？杨承孝当时就被叫出去，更确切地说，是被押了出去，接受特殊审查。刘灏目送着他的死对头消失在远处，手心里不禁捏出了一把汗。决不是为杨承孝，而是为他自己。

“谁叫汤建中？”陈伯达又点了一个坏人。

妈呀！这下子轮到兵团了。

没点司令的名而点了高参的名，高参的罪名是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他也与杨承孝一样，出列离队，去接受特殊审查。

台上的中央首长们又训了些什么话，刘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真有些想不通了。兵团明明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怎么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如今是左右开弓，连个是非也不分了呢？他又想，杨承孝和汤建中被“特殊审查”了，我呢？刘灏那时是啥话也不敢说了。

中办学习班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那次中央首长接见以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山西学习班宣布，由谢振华将军担任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主持山西工作，同时宣布将刘格平、张日清、袁振三人调离山西，由中央另做安排。在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前，依旧留在学习班斗私批修。由此，身经百战的谢振华将军，开始在山西展开了稳定局面的工作。

张日清后来调到武汉军区，担任了顾问。袁振后来调到安徽省，出任了省委副书记。只有刘格平最惨，带着夫人丁磊，被发配到唐山陶瓷公司参加劳动。这位三级高干身体不好，不能干体力活，技术性强的活儿，又干不了。夫妻俩被安排到剪贴花车间，一天八小时玩剪子，剪花花。更惨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老俩口的爱女秀花遇难，给老俩口留下了比政治伤痛更痛的心痛。

除了判刑的、发配的、中办学习班里的学员们，有的继续挨批挨斗，有的依然斗私批修，一直熬到1970年的7、8月，才有了结局。他们的结局，将在本章第7节《各种方式的上山下乡》中叙述。

【2】谢振华下令杀一个、关一个

毛泽东已经不需要跟在他身后，在“文革”中一涌而起，将全国各地搞得风生水起，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了。山西是能源大省，煤和电的输出事关全国的工业生产。把山西的这些派领导和省级机关的两派干部们稳住，是周恩来洞察毛泽东心事后的一种策略。稳住了他们，谢振华便能在山西开始全面落实中共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精神。谢振华“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治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首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主要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如对王

谦、王大任、刘开基、贾冲之、朱卫华、武光汤、王中青等省级干部，全云、王绣锦，赵力之、赵雨亭、王铭山等地级干部分别进行安排使用，推动了全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引自欧阳青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

当时，谢振华将军还分别清理了山西两个造反组织的核心人物杨承孝和汤建中。此举对那些先在北京、后移至石家庄住中办学习班的山西大小两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来说，不啻是个最现实的政治威慑。

杨承孝和汤建中被特殊审查后，就再没有回中办学习班，而是被单独隔离起来。他俩被押回太原接受处理前，又见过一面。派斗中的对头，此时已成了被囚在一起的“难友”。杨承孝早失却了昔日的威

风，竟向兵团的这位“高参”请教说：“你说说，咱俩会是个什么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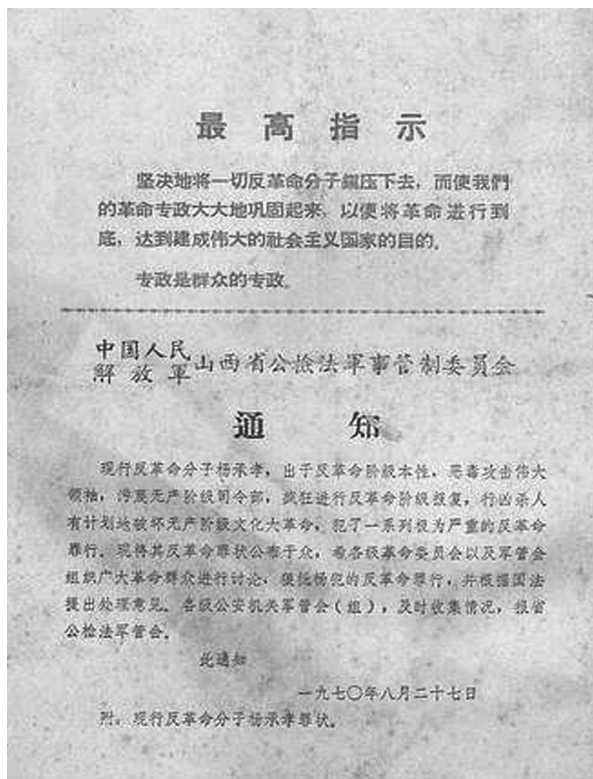
汤建中想都没想，就对他说道：“你是有血债的人，必死无疑。”

杨承孝浑身打了个抖，又问道：“你呢？”

汤建中颓唐地说：“我的事全在嘴上，命大概能保住的。”

这事还真让他说准了。

1970 年 8 月 27 日和



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揭批杨承孝罪行的通知

9月1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署名的两份《通知》，经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下发到全省基层单位学习讨论。通知明确要求：“希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及军管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进行讨论”，在狠批此二人反革命罪行的基础上，“并根据国法提出处理意见。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组)，及时收集情况，报省公检法军管会。”

一份是杨承孝的罪行。全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承孝，男，36岁，鞍山市郊区人，出身反革命家庭。原系十三冶金公司电焊工，文化大革命中混入群众组织，窃据了省革委常委、十三冶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其父杨绍周，外号“杨扒皮”、“杨阎王”，曾充任日伪警佐、警备大队长、蒋匪清剿大队长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杨犯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污蔑伟大领袖，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阶级报复，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恶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1969年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多次极其恶互攻击伟大领袖。并数次借唱革命歌曲之际，恶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长期偷听敌台广播，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57年，杨犯就污蔑合作化“搞糟了”；1959年庐山会议罢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官后，杨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杨犯借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说“人死的太多了，连买棺材都得排队”。

二、行凶杀人，进行反革命报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1967年4月，太原迎泽街派出所民警，中共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民警李希哲同志，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大字报揭露了杨犯的反革命家史，杨犯怀恨在心，主谋策划，于同年8月19日将李希哲同志绑架至省物资局大楼，杨犯私设公堂，非法审讯，指使用权暴徒使用钢鞭、木棒、三梭皮带轮番对李进行毒打，将李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致李活活惨死。李死后，李的父亲李宜基满怀悲愤前往质问，打手赵某某按杨犯的旨意威胁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死了活该！”又将李希哲的父亲活活气死。

杨犯还组织了大批专业武斗队，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经查证实仅十三冶专业武斗队就先后抓捕、殴打、关押、刑讯革命群众达1036人，其中有2人被打死，65人致残，两名孕妇流产。如该公司修造厂工人、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谌家福同志被非法抓捕后，除遭各种刑具毒打外，竟残忍地用竹签钉其手指，并边打喊：“就打你这贫下中农，就打你这共产党员！”谌的爱人刚生小孩不足满月，也惨遭毒打，致神经失常。

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杨犯无视中央“六六通令”，大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文化大革命。如1967年7月21日，在杨犯的指使下，攻打山西大学，将上千名师生围在楼内，停水、停电、停炊，一百余人被打伤，试验室价值八万多元的物资器材被抢走、损坏；1967年8月10日，杨犯亲自策划攻打山西农学院，将二百多名师生围困楼内，先用水攻，后用火烧，打伤打残师生二百余人，抢走损坏国家财产七十多万元；1967年9月5日，杨犯自任总指挥，镇压十中革命小将，使二百多名师生惨遭毒打，并调集射手开枪打死工人李成义、学生孟玲玲。打伤二十余人使国家遭受二十五万元的巨大损失。经查实，仅杨犯直接策划指挥的六起大型武斗就死亡革命群众15人，伤700余人，有的终身残废，致使许多单位停工停

产,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制造分裂,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杨犯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于1968年11月7日主持召开黑会,策划自上而下进行反夺权,致使许多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遭到破坏。

1968年12月23日,杨犯亲自调动两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并查封了山西日报社,殴打驻报工宣队、军宣队和报社职工二百余名,造成报社八个月停刊的严重后果。

1969年1月4日,杨犯召集了各地区的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宣布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了临时核心小组,杨犯自任组长。1月5日,正式抛出了一五反革命宣言书,明目张胆地提出“把一切权力统统夺回来”的反革命口号,矛头直指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宣言,是杨犯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黑纲领,是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动员令。严重地破坏了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从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

杨犯多次策划,挑起武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1968年6月28日,杨犯指派200多名专业武斗队员,到陕西金堆城进行武装反夺权,打跑一派群众,造成该地建设工程停工。1968年4月,杨犯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私自溜回太原,4月24日,亲自策划指挥了247厂的武斗打死过路人3名,双方死亡6人致使该厂停产三个月之久。据不完全统计,仅杨犯直接策划指挥的6起大型武斗,就使国家遭受一百余万元的巨大损失(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未计在内)。

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破坏战备，毁我长城。

杨犯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始终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1967年3月，驻晋部队某部奉命对十三冶实行军管，杨犯极端仇视。污蔑该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并煽动群众连续冲击军管会，刁难、围攻军管人员，致使该军管会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于8月份撤出。

1968年在杨犯的策划下，绑架了霍县武装部副部长张满永同志，杨犯亲自非法审讯，严刑拷打。同年杨犯指挥暴徒还非法扣留和毒打前往十三冶追捕坏人的化二建军宣队王金芳同志。此外，杨犯亲自策划指挥，先后冲击、抢劫了榆社、祁县、汾阳、中阳、沁源、线材厂、黄寨人武部、观家峪劳改煤矿等军事机关和劳改单位以及执勤部队的武器，计有各种枪340支、子弹2000余发。严重破坏了九五命令的贯彻，破坏了战备。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

七、招降纳叛，网络坏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太原市公安机关再三追捕抢杀贫农女社员降香莲的汪志时，杨犯不仅公开包庇隐藏拒不交出凶手，反而派汪犯到陕西破坏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致使汪犯长期逍遥法外（现已枪决）；化二建清出的土匪头子王某某，被杨犯窝藏起来，当派人追捕时，杨犯竟将追捕人员非法扣留、审讯。

八、违犯国家法纪，献媚洋人，破坏外事纪律。

1968年8月，某资本主义国家厂商代理人来太原，杨犯拒不执行外事部门的指示，擅自到机场迎接。当晚在杨犯主持下，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吹嘘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并伸出1967年玩枪自伤的左手让洋人看，诡称是在朝鲜负伤的伤痕。而后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省革委会常委，十三冶金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并说：“职务虽很高，但工资很

低,二级半电焊工。”9月10日在并州饭店宴请某资本主义国家厂商,宴会前杨犯接见了洋人,说:“我代表我们厂革委会感谢贵国对我们援助。”在国庆招待会上,杨犯卑躬屈膝向洋人逐桌敬酒,还让洋人为他干杯。

九、生活糜烂,流氓成性,冒充人民解放军,到处招摇撞骗。

杨犯流氓成性,曾奸污妇女4人,奸污6岁幼女一人。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窃据的职权,挑选多名女性青年,充当其“秘书”和“保健医生”,住高干房子,坐小卧车,外出坐飞机或软席卧铺,任意挥霍浪费。1968年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不仅将老婆孩子接去,还特意调去卧车一辆,随员七八名(实际是打手)。住在北京新侨饭店,人称“杨公馆”,每逢假日,带上老婆孩子游山玩水。

1967年,杨犯穿着军装,私带手枪,冒充人民解放军到东北招摇撞骗,被当地驻军扣留。

十、杨犯被依法逮捕后,拒不低头认罪,继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对他的逮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态度极端恶劣,反革命气焰极端嚣张。

总之,杨犯顽默固坚持反革命立场,长期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残害革命群众,严重的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我省,特别是太原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多次反复。杨犯罪恶累累,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另一份是汤建中的罪行。全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分子汤建中,男,37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分,上海市人,原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机务科副科长,1953年因破坏军纪受撤

消团内职务处分。汤犯的父亲汤家福跟随英帝 20 余年,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奴。其弟汤正平曾三次妄图越境投敌被判刑 7 年。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61 年以来,汤犯多次在广播电台机关和 528 工地借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汤犯混入群众组织,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在各种场合,采取多种手段,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先后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并州饭店、太原五一广场、北京后勤学院等地,多次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攻击和污蔑,在党的“九大”期间,竭力为“二月逆流”翻案,借“二月逆流”干将之口,攻击污蔑我们的副统帅,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翻案。当“七二三”布告发布后,汤犯又大肆诽谤中央对解决山西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妄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汤犯自 1956 年以来,长期偷听敌台广播,无耻吹捧帝、修、反,胡说什么“现在还不能肯定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等反动言论。

二、分裂、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

汤犯出于反革命目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进行攻击、分裂和诽谤。1968 年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恶毒诽谤说:全国的解放军“大都执行了‘二月逆流’,镇压了造反派”,特别是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余、傅被揪出以后,汤犯反动气焰更是甚衅(孙涛注:原文即如此。衅字应为嚣字)尘上,不遗余力的多次在北京后勤学院、民族饭店等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成

武鸣冤叫屈。汤犯在北京民族饭店，竟明目张胆的造谣说“中央信任某某部队，不信任某某部队”，还以“王牌军”、“嫡系部队”等极其反动的言词，恶毒污蔑、分裂人民解放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

汤犯以资产阶级派性为掩护，在群众组织领导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照办”是假的。汤犯还野心勃勃的搞了一套所谓“改组省革委方案”，自封宣传组副组长。

汤犯鼓吹、策划武斗，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于1967年底至1969年初，曾多次召开会议蒙蔽群众，鼓吹武斗，严重的破坏了局势的稳定。

四、汤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利用封、资、修一套腐朽、反动的东西，腐蚀、毒害青年，经常向本派的领导灌输封建皇帝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反动思想，“搞一派掌权”煽动群众组织，还让他们学习古书和“佛经”，胡说什么“这里边有辩证法的萌芽”，来毒害群众，制造思想混乱，阴谋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分裂太原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破坏太原地区的大好形势。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恶毒的攻击、污蔑伟大领袖，疯狂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证据确凿，认罪态度极坏，胡说什么他讲的“都是客观存在”，真是反动透顶。

即便以现在的法理和《刑法》论，杨承孝有命案，该杀。以当时党中央发布的《七二三布告》精神和“文革”中的那套理论看，汤建中有罪，是因言获罪的那种“恶攻罪”，也该判。从他的那些“罪行”中，可以看出他作为“高参”，对刘灏以及对兵团这个群众组织的影响。更重要



退休后的汤建中

的,谢振华的出发点,是在党中央将山西群众组织的后台统统调离山西后,他要用杀了杨承孝,关了汤建中这种办法,平息掉山西的派性。对兵团派没有拿“司令”刘灏来问罪,而是拿“高参”汤建中开刀,回头看这段历史,也可看出谢振华将军在那个非常态的时代,有他自己对人对事的认识标准。刘灏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有了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改正,而绝非杨承孝那样的坏人,必须彻底铲除而别无他途。

在谢振华主持的省党的核心小组会上,做出决定:杨承孝判死刑,汤建中判无期。不经法院审判,那时山西和全国各地一样,早没有了法院,而是以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和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党中央立即下文批复同意。

我们现在从当时公布的杨承孝的罪行看,这名山大王式的造反派,对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有思考和独立见解的,他至死也没有认罪。这一年的11月10日,杨承孝被押上了刑场,执行了死刑。

在省城太原,那几天人们纷纷传说着有关枪毙杨承孝的种种消息。据民间传说,决死纵队的那帮哥儿弟兄们就是不服气。怎么,我们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怎么就干错啦?传说决死纵队还策划过要演一出劫法场的老戏,救出他们的杨司令来。还有人传说,谢振华军长也有计谋,在给杨承孝执行死刑那天,让下属设了两个刑场声东击西,以

免决死纵队真的生出意外。是真是假,反正全是当时的民间传闻,如今落实与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杨承孝从五一广场看大字报时与刘灏相识,到自立山头,最后混成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最后再到被押赴刑场一命归西,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二级半电焊工,趁“文革”乱世,以“攀龙附凤势莫当”(杜甫语)而发迹的山大王,就这样在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走完了他还很年轻的人生道路。

据汤建中回忆,那一年的11月10日,69军的一位领导干部卢景源,亲自带好几名解放军战士来提他,宣布押他去参加五一广场的公审大会。当战士给他五花大绑时,卢景源竟下令说:“绑松点,一会儿就回来了。”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谢振华的干部对兵团的一种态度。刘灏的高参汤建中经公审大会后,看着杨承孝被押上开赴刑场的囚车,自个则被押上另一辆囚车,被送到一家煤矿劳改去了。

10年后的1980年,因杨承孝妻子薛春娥以所定杨犯事实不符为由,多次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查,查明原判事实属实,但定反革命罪不妥,经法院审委会裁定,改判杨承孝反革命罪为打砸抢罪,对于死刑维持原判。”(据《山西通志·政法篇·审判篇》。转引自谷峰著《新太原50年纪事》)

当年被判无期徒刑的汤建中,在某劳改煤矿里,度过一年又一年,直到1981年3月底才被无罪释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81年3月25日下达了关于他的(80)晋法刑二甲字第109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根据汤建中向本院提出的申诉,做如下判决:

“现查明:原判认定汤建中的罪行绝大部分事实属于言论。但这些言论有些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有些反映了客观事实,原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是错误的。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公检法

军管会(70)军管刑字第 501 号刑事判决。二、宣告汤建中无罪。”

汤建中被无罪释放后,重新回到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工作,直至晚年退休。在那个禁止独立思想的特定年代,他这种偏偏爱想事儿的知识分子,出身又不属于革命的红五类,原本就不该去想事儿,就是能想出个不同于“两报一刊”社论口径的思想认识来,也千万不能随便说给别人听。汤建中的悲剧,在于以自己活跃且敏锐的思想和雄辩的口才参加了兵团这个群众组织,又与这派群众组织的司令刘灏结为好友,可惜生不逢时,在那个不许个人有思想的特定年代,他成不了萧何,也成不了张良。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刘灏在中办学习班及其以后的命运吧。

【3】革命小将成了革命对象

1969年国庆刚过,在北京的那个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接到命令,全体人员要离开北京,转移到石家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继续办班。同时,省级机关原副处级以上干部,还有刘格平新政权里各部门的大小领导们,也统统被调到石家庄去办学习班。这可是个庞大的学习班,人员竟达八千多人。加上后来陆续被调来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的,这个庞大的学习班已经达到万人之众了。学习班全部按军队建制,排(也称区队)以上领导全是军队干部担任,副排长和班长,由军队干部指定根正苗红的学员担任。学习班的任务,也更具体了,一是在学员中清理阶级队伍;二是组织学员批判和揭发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三是最后集中火力批判刘格平、张日清、袁振。这个庞大的学习班,由陈伯达总负责。大批学员一到石家庄,刚安顿住下不久,具体负责学习班的部队首长,就宣布了陈伯达规定了五不准:

一不准串连,二不准开小会,三不准外出,四不准通信,五不准接受家属和朋友探视。在紧张的气氛中,许多人连食欲也减退了。每逢开饭的时候,你就听吧,那些成了清理对象的人们,那些属于群众组织中造反派领导的人们,一个个敲着碗筷,没精打彩地走向饭堂。叮叮当当的杂乱交响乐,显露着这些人不同的心理。被清理的对象们,不知自个的前途和命运如何。而曾在“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群众造反组织的领袖们,此时内心充满酸楚,想当初是一心跟着毛主席参加“文革”,原本以为是革命动力,怎么现在竟然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学生刘灏,就是在这种交响乐中,每日都要演奏三次的乐手。

石家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的中办扩大学习班里,一场大清洗、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开始了。有过所谓历史问题的人,不论是当权派,还是一般干部,全成了打击对象。李辅在其所著《所思所忆七十年》(溪流出版社 2012 年出版)一书中,回忆了他在被指定担任某排副排长后,在这个 30 人的排里,搞清理阶级队伍时人斗人的情况:

我所在的区队有五个对象:刘恒,有过脱党的历史,就当作叛徒进行斗争;徐绍良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事,就当反革命分子来清理;张思德被俘过,就作为叛徒,审理其叛党的问题;范振忠是个右派,就进一步深挖其反党罪行。

清理时,首先让本人坦白交待,然后发现疑点,梳理问题,重点追问。我们区队最费劲搞的就是张思德。一直追问其被俘后叛变、出卖同志的问题。张本人始终不承认,这样对立起来,就组织轮番批斗,有时一搞一个晚上,不让张思德睡觉。张也有老经验、老主意、老办法,不管你怎样斗,反正就是那几句话,最后也没有办法,只说其态度不好,没有弄出任何问题,不了了之。我们搞的另一个重点对象就是范振忠,这个人出身很好,参加工作也早,就是对领导不满,“反右”时发

过些牢骚讲过些怪话,结果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以后被劳改,下放农村,受尽了折磨,对现实更加不满,更加仇恨共产党,仇恨毛主席。曾经仿照毛主席制作了一个小木头人,埋到地里。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经过批斗,促进其坦白,就交待出这么一档子事。根据谢富治搞的“公安六条”,反毛主席是头等大罪,制作木头人埋到地里,更是罪加一等。当时也只凭本人交待,并未有任何证据,是真是假也不知晓。范说出此事,按当时那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那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挖出了一个隐蔽很深、本性不改、一个重大的定时炸弹,所以成绩很大。姓范的倒底年轻,经不起重压和诱导。坦白了的东西无法查证,先躲过了日夜纠缠。虽说又给自己加上了包袱,被划到了敌人营垒,但一旦反悔,也就什么也没有了。那时,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折腾人。

这种用政治高压手段和车轮大战弄出来的口供,是经不住事实来验证的。几年后又搞落实政策,当年弄出来的口供没有事实支持,只好一风吹。上述五个革命对象,又被安排回原单位工作了。而被整时他们心灵受到的伤害,怕是吹不掉的。当时的阶级斗争,越搞越厉害,今天还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成了革命的对象。当副排长的李辅,突然就被靠边站了。原因是他的岳父在另一个排里成了清理阶段队伍的对象,不知被逼出了什么口供,他这个根正苗红的女婿,也就受到了牵连。

各大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也全成了被揭被批的对象。中学生刘灏因为组建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当过司令,就成了活靶子。当了活靶子的刘灏想不通。当年他给别人糊大字报,用大字报埋葬着山西“黑省委”的一大批领导人。想不到如今自个也成了大字报埋葬的对象。原本在革命和造反中不断升腾着自我欲望的刘灏,现在的欲望却受到批判和压抑,他尝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也感到了无比委屈。

杨承孝被判死刑在刑场枪决，汤建中被判无期投入到牢狱，刘灏确实为之害怕了。不管是感到压抑，还是感到委屈，他不得不低头认罪，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进行着违心的“斗私批修”。

他这样检查自个：“‘文革’初期，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是捍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老人家。我带领兵团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了‘黑省委’。首次揪斗卫、王、王，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在1·12夺权中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带领兵团冲锋陷阵，让‘黑省委’土崩瓦解。后来在两派大联合中，我不图私利，坚决搞大联合……”

听他的检查，分明是在为自个的革命造反历史评功摆好呢。

也检查出了问题：“后来两派武斗，我迫于无奈才带领兵团起来自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思想……”

以往就善于滔滔雄辩的刘灏，在做了革命的靶子后，检查起来也是滔滔雄辩。无疑，这样的检查是无法过关的。原本18岁的灵魂就不够成熟，又在“文革”中接受了领袖的错误理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引导，如今22岁的灵魂也实在不知该如何检查才好。沉默、思索、按错误的理论去检查与错误的理论不符的错误行为，此时的革命小将，与运动初期的走资派一样，就是想不通也得往通里去想。这样做毕竟是一种痛苦。他想获得解脱，不知怎样就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功过是非让后人评判去吧！是拿定死的主意了，可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又是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在夜深人静之时，完成自己去死的愿望。

等到了深夜。同屋的人睡熟了。看来是一个好机会。死是容易的，但死也是困难的。去死毕竟不是去睡眠，如果死如睡眠一样，可以躲过一段时光而日后再能醒来，那就可以断言，刘灏这回是“死”定了。问题就出在22岁的刘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是非弄不明白，却明白死去了就不能再生。当他悄悄地爬起来，又像蛇行一般无声地爬

上高楼的窗口时，面对着高楼下的漫漫长夜仿佛面对着无边的苦海。他犹豫了。只是一刹那间的犹豫，同住一屋的军宣队的一位军代表，就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

既是警惕的谴责，也是惊诧的喝问。刘灏却如大梦初醒，被人家硬拉回床上后先是捶胸饮泣，继而沉默不语。从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跌入了沉默不语的境地，一句话，他就是对自个在“文革”中的所做所为，想不通究竟是哪错了。

那位军代表开始劝他了：“你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群众对你的揭发和批判，要正确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问题……”

刘灏当年就曾用“正确对待”来教育过卫恒书记，卫恒书记当年也因不能“正确对待”而被刘灏批斗过。在10年“文革”中，文化大革命永远是正确的，群众的任何揭发和批判也永远是正确的，不正确的，只能是落入靶心的所有革命对象，不论你以前是省委书记，还是造反派领导。

刘灏想自杀的事惊动了负责中办学习班的一位领导，他赶来劝导刘灏说：“运动初期你是有功的嘛，但后来你滑进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泥坑，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领导和群众也就原谅你了嘛……”是的，在那个时代，谁又敢说运动初期刘灏炮打“黑省委”是有罪而不是有功呢？

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能把“文革”的事儿讲清楚的阶段，彻底否定“文革”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中国共产党以“决议”形式否定“文革”，是好几年后的事情，而能彻底讲清楚“文革”，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10年“文革”不是脱离了历史链条的孤立现象。10年“文革”也不会因审判了“四人帮”，就可以成为不用我们每一个在“文革”中头脑健全的人再去回忆和反思了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能尘封，它的历

史意义就在于，它何以能产生？又何以能让一个执政党和全体国人，从上至下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刘灏终于能“讲清楚”了。就在他自杀未遂后，中办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刘灏带头登台去“讲清楚”。老老实实在地讲了，讲他如何对 1·12 夺权想过反夺权，如何在七月会议前后表面支持刘格平，暗中并不支持刘格平，如何与红总站争权夺利，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个半小时的个人检查，一边“讲清楚”，一边泪花儿如雨。不哭不行呀，不哭怎么能过了关？三十多年后，刘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我，说那时的泪花儿是真诚的，思想上压力太大，是想好好检查，可那些“讲清楚”的事，现在看来根本没有“讲清楚”。那时真诚的泪花儿，含着的是时代的虚假。他对“文革”的认识，也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他明白自个当时奉命“讲清楚”的那些内容，是用了那个特定时代里判断是非的标准。标准既然错了，何来讲清楚呢？至于一个能用虚假的泪花儿欺骗了的年代，这个年代倒是该让它的过来人和后人去好好地反思一下，去用辨析历史的眼光，来“讲清楚”它的发展因由了。

当刘灏在台上痛哭着做检查“讲清楚”时，坐在台下的许多原兵团下属组织的成员们，此时才得以一睹他们司令的容颜。他们何以能跟着这个娃娃似的中学生，在山西不断地掀起大风大浪？而这个娃娃似的司令，又何以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和感召力，成为山西“文革”中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不知他们当时想过没有？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形成决议否定“文革”后）想过没有？

中办学习班还有一个特别形式，就是将山西三大派组织的领导们全从中办学习班押回太原，让他们一个个登台，向全省人民做斗私批修的深刻检查。这时候，由于太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也日渐临近，兵团司令部和红联

站总部已趋于解散状态，红总站的各路人马也在其所在单位被军管后，被军管会下令回去归口，在本单位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其时69军的谢振华副军长因稳定山西局面工作得力，又被中央军委任命兼任了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他主持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为这些派领导们的检查组织了盛大的会场。主会场设在迎泽公园旁的湖滨会堂内。4年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首都红卫兵在这里扮演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刘灏就是在这里，升华了心中革命和造反的理想和信念。他曾经投身于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烈火葬送了一个时代也葬送了一个时代的青年。如今就要登台去做检查的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们，当时正是举着从北京送来的火种，发誓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而4年之后，这些当初革命造反的小将们，却要登台去做必须“讲清楚”的检查了。

还有设在各地的分会场呢。在五一广场，在并州饭店，在南北城区和河西区，在各大机关和各大院校以及各大企事业单位，古城太原的每一个老百姓，都将会听到这些派领导们在湖滨会堂里哭诉般的检查。当然，他们一个个要“讲清楚”的检查，依旧是用了那个特定时代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检查中，他们都向支持过他们的后台反戈一击了。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开始揭批刘格平、丁磊；兵团司令刘灏，开始揭批袁振；红联站勤务组的总负责人段立生，开始揭批张日清。不管怎么说，掌了山西大权的69军谢振华将军，在党中央将刘格平、张日清、袁振三人留在中办扩大学习班斗私批修，准备日后调离山西时，又毫无阻挡地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段，在努力安定着山西的政局。除此以外，谢振华还有一招：对头上顶着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几个派领导，要把他们全部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先让他们远离省城，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刘灏要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点，是远离省城太

原,地处偏远山区的太原古交区鹿庄大队。这里是刘司令“革命”一场的归宿,但还不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赵树理的惨死

曾经在省城风云一时的红联站、兵团、红总站这些群众组织,因领导们被谢振华安排得各奔东西,山西的“文革”,一时间似乎给人以曲终人散的感觉。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抛掉了赖以造反冲锋的红卫兵和学校里的其它革命小将,还有赖以革命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但最高领袖那种浪漫式的革命目的并没有达到。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全国各地重新建立的红色政权,必须把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对新一年斗、批、改方向,提出了四个“要”的内容:“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2月24日,新华社又发出通稿《清华大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介绍了清华大学在跨进伟大的七十年代以后,将革命大批判深入发展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对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

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在科技和生产中疯狂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批判,对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明及其在文艺领域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批判,对学校各学科封、资、修思想体系的批判,以及对哲学、教育、经济、历史等各个领域修正主义的批判,继续肃清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

当年的两报一刊社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而清华大学“文革”的方向,又引领着全国的“文革”。在山西省,这场革命大批判可以联系的对象很多,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成了被省革命委员会选中的活靶子。

赵树理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抗



日根据地最早自觉实践《讲话》精神的作家。1943年4月,担任中共北方局调研室调研员的赵树理深入山西左权县,完成了《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同年9月,这部小说正式出版,第一版就印了2万册,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着又印到4万册。山东、淮北、晋绥、冀中根据地也纷纷印刷发行。很快,这部小说就传到了国统区的陪都重庆。曾亲自采访过赵树理

“文革”中受迫害惨死的人民作家赵树理

的美国记者贝尔登,在一篇文章中称赞赵树理说:“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赵树理是从根据地和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大作家老舍和巴金。他的主阵地在根据地和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至7月5日,在中共建党25周年前后,赵树理的又一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其中6月28日未载,还特别标明“《李有才板话》停刊一日,特启。”连载首日,同时刊发了冯牧的评论《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同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周扬的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对赵树理和他的创作,高度总结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在“文革”中,毛泽东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将死去的鲁迅作为一根棍子,为什么对赵树理这样活着的“胜利”榜样,却要任其受迫害和被打倒呢?在新世纪一波又一波研究赵树理的热潮中,有学者作了如下分析:“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空想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诗人一开始就看出了赵树理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极力推行文学创作一体化,就与他的现代焦虑直接相关,而且毛泽东位于权力之巅,他的现代焦虑通过政治手段和神一般的影响力,严密地渗透了且控制了文学界、思想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所以,从一个一直着眼于未来实现第一个共产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家来说,他十分明了赵树理的‘落后’之处,所以他对赵树理不置一词,就是因为他明白赵树理要被他扫入历史,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为农民考虑的作家来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他才听任周扬把赵树理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摘自2008年第9期《浙江社会科学》刘旭著《文学史中的赵树理》,转引自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国赵树理研究》2011年第3期)无论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于1959年批判赵树理,还是“文革”开始后,山西省委和其后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规模地组织文章批判赵树理,他在作品中描写“落后”都是一

个核心话题。

早在“文革”之初，对赵树理的批判，就是先由晋东南地委出面，接着由省委决定全面兴起的。当时，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他的老家沁水县挂职，最早将他推向审判席的，是晋东南地委的领导班子。

1966年7月20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全云为首的13名地委干部，在地委大楼的三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大字报。当时，晋东南地委还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做出的决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的“八条规定”。这张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展开了对赵树理的全面揭发批判。……7月21日再次以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全云牵头，更大规模地联系了地委常委、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等17人，贴出了题名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三万多字的第二张大字报。（摘自陈为人著《斗争正未有穷期——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见作者所著《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晋东南地委如此而为，是奉了省委之命？还是他们自觉为之？恐怕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带头批判赵树理的地委书记王尚志，很快在遭遇造反的群众冲击和批斗后，不明不白地悲惨而死。副书记全云，也成了被批斗的走资派。10年之后，这位全云成了太原市委的副书记，又在王谦领导的揭批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四人帮伸向太原市的黑手”，备受批斗。制造悲剧者，又陷于别人制造的悲剧中，这已经是那场“文革”中的常态了。

在晋东南地委官方出面批判赵树理之后，1966年8月8日，省委

宣传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赵树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艺观点和许多作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8月9日《山西日报》第4版刊发长篇消息报道了此事。这个名为座谈会的小型批判会，由宣传部部长卢梦主持。据《山西日报》报道，应邀到会的，有“太原市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解悦、胡春琴、牛发和；太原市工人业余文艺作者张桂根、马晋乾；省城文艺工作者马烽、李太和、王孔文、陈令霏、叶汝莪；省市机关干部蔡肇发、曲润海、李瑞芳、张孔森、武振国、王一民；山西大学教师杨韶华、学生詹进宝等二十余人。”这些人在“文革”运动的强力裹挟下，先做了枪手，在其后的十年中，他们中除个别人有幸平安度过外，大多数人又被“文革”运动裹挟下的其他枪手击中，成了被革命、被专政的对象，也受尽了各种苦难，经历了各种思想的和肉体的炼狱。

受人民爱戴的作家赵树理，就这样被“文革”推上了不归之路。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不知开了多少回，赵树理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最初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再往后，因为赵树理年轻时，有过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的经历，头上又被加上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赵树理被戴上这些帽子，在被批斗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1967年肋骨被打断。到了1969年晋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赵树理被军宣队和工宣队定为斗争对象批斗，强迫这位老人站到三张擦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赵树理强忍屈辱，既不屈服也不认罪，被人推下来，摔碎了髌骨。

然而，赵树理当时被批倒批臭了吗？没有！

《太原晚报》2006年9月21日的《铁笔圣手一代宗师——纪念中国文学“山药蛋”派首创者赵树理诞辰100周年》专刊上，有当事人写的一篇散文，名为《偷偷看望赵树理》，回忆了当年山西大学几位大学

生,偷偷看望他们敬爱的大作家赵树理的情景。

……我们敲响了赵树理住宅的院门,良久,才有人来开门,是一位老太太。她的神色惊慌得很,望着我们没有说话。我们赶紧说我们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并诚恳地低声说:“我们想来看看赵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分明是“赵老师”三个字,让开门的老太太听出了我们并不是来造反的恶人,遂领我们走进了正房屋子。进屋后,我们才明白她就是赵树理老师的夫人。

……赵树理听说我们三个是山大中文系的在校大学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看看他时,便从枕头旁边取出一盒海河牌香烟来,让我们抽。还告诉我们他不习惯抽纸烟,并扬扬手里的旱烟袋说,只有抽手里的这旱烟袋才觉得过瘾。我们那时都不会抽烟,赵树理遂又将那盒烟放回到枕边,慢慢说:“我现在是黑帮了,你们就不怕?”见我们摇头,他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丝欣慰。我们说,我们都看过赵老师写的小说,特别是我和崔巍,还告诉赵老师说我俩正在偷偷看他的《三里湾》,想来听听写这部小说的经验。赵树理却不语,从吐出的烟雾后面,我能看到他那张如雕塑般无言,却藏着无限痛苦的面孔。我们只好语言苍白地安慰着面前受难的大作家,并自知话语的苍白无用,而不再多说些什么。在沉默中,后来赵树理老师便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来看我了,免得给你们添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我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不想说它们的是与非,你们还年轻,总能看到历史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我们默默地在赵老师的炕沿边上坐了许久,待我们起身告辞时,他一直送我们出门,并让老伴先开门看看,见外面没有人监视,才放心地送我们走出小院。在那个年代,我们由不得相互感慨,一位身处逆境的老人,此时想的最多的,却是不要给我们三个年轻的大学生带来什么政治上的麻烦。赵老师这颗善待别人之

心,现在想起,又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

……记得张志安先生在省里领导的关心下,最初整理出赵树理的故居时,我写了一幅字送到了赵老师的故居。内容是“风雨含悲逝,涛声依旧在。”字写得不好,但那却是我在风雨过后,重新踏进那幢小院时的感觉。

当时的这件小事,难道不是对那个年代的另一注解吗?

对赵树理的批判,从来都是官办的。到了1970年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下发了一个《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省里组织专门队伍,成立了批判赵树理的写作班子,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也紧跟不舍,抽调笔杆子,组建起批判赵树理的革命大批判组。7月24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署名的长文,题为《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第二天又发表了大寨人的署名长文,题为《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组炮制的《〈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一文,也在8月17日的《山西日报》发表。这次对赵树理的批判,持续了一年之久,《山西日报》是主阵地,辟出专版,设计了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臭”。各地市的报纸,也纷纷组织专稿,加入了这种大批判。仅以省革委发出那个“批赵通知”算起,1970年下半年的《山西日报》上,就发表了76篇批赵文章。

1970年9月17日,省、市革命委员会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内,召开了批判赵树理大会。赵树理被从关押之地军管专案组(临时设在原省高等法院内)直接押到会场。

批判会开始,赵树理被两名工作人员从后台押出来,站到主席台

上。此时，坐在第一排的一名军人，起身跳上主席台，一把将赵树理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揪了下来。赵树理一个趔趄，几乎被揪倒。批判会开始不久，赵树理就手捂胸口，频频向主席台的出口扭头。有工作人员上来，和赵树理说了几句话，转身从后台搬出个木椅子来，放到主席台右侧，让赵树理坐上去。赵树理手捂胸口，跌倒在地上。工作人员又从后台搬出个学生课桌样式的小桌子，放到赵树理面前，赵树理就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抓紧桌子，将上半身伏在了小桌面上。不一阵子，见赵树理的头趴在桌上晕倒了，工作人员才将他拖回后台。五天后的9月23日，赵树理含冤而死。

1970年9月18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太原市革委会通讯组和本报太原记者组联合写的报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省城召开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大会》。报道写道：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杨丛林同志，代表市革委会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我们太原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头彻底革命精神，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批倒批臭。”

“太原重机厂工人赵连贵、阳曲县城晋城驿大队革委会主任杨栓富、南郊道场沟大队贫农社员吴坤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太原某部一等功臣王运、插队知识青年、马头水大队珍珠崙生产队社员张克明、市革命文艺工作者阎雨生等同志，在大会上进行了批判发言。”

“在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后，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政工组副组长王文章同志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批判赵树理是我省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场重要战斗。我们同赵树理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全省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完成‘九大’提

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把彻底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

该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只有两篇文章。在这篇报道下面，是山西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继续深入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文章在指出批赵的种种革命意义后，强调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进行到底。’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就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要战斗。我们一定要把批判赵树理的这场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又强调说：“‘批判资产阶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战斗号令，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积极参加这场战斗，把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

赵树理死了。但对他的革命大批判依旧进行着。“文革”中停办的《太原晚报》，在1970年10月1日复刊并改名《太原报》后，便投入了批赵的行列。21日该报头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深入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

在当时批判赵树理的大量文章中，最常见的一句最高指示，就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句最高指示是针对小说《刘志丹》而发出的。据有些当事人回忆，1962年夏天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对彭德怀进行揭发批判时，康生递给毛泽东一个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纸条。由此，会议在揭批彭德怀的同时，又制造了“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大冤案。此案株连原西北红军官兵上万人，使习仲勋被审查遭软禁长达16年。直到1977年年底，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才主持为此案平反。

在“文革”中，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成

了各级政权构陷文字狱的一把上方宝剑。在山西,除了赵树理之外,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李束为等著名作家,都被这把上方宝剑高悬头上而遭到过残酷的批斗。当人的良知被摧毁后,摧毁的良知并不会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立即修复。当年写文章批判赵树理的批赵大军中,有不少人写的文章,署名是大批判组或别的化名,但也有署着真名者。他们当时是一般文化人,那时的大文化人都被打倒了,他们才得以受革委会领导重用且参与此事,许多许多年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已功成名就,也成了专家教授式的大文化人。可惜的是,对此事的回忆和反省,以我之陋见寡闻,只读过两人的文章。他们是作家崔巍和诗人梁志宏。

崔巍如是说:“文革”之罪孽,罄竹难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戕害最烈的当在精神层面,人人皆违心说话,违心为文,违心做事,完全沦丧了作为社会良知的道德感、责任感。就如我们当时那般,几个人都迷于赵公的作品,敬重他的人品,却又在助纣为虐,写着批判他的文章,这种人格上的双重性,大概只有专制暴政下才会出现。大家都成了任人驱赶的绵羊,听不见一声狮吼,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人格分裂来,仍然脸红。(摘自崔巍《为文的追忆》一文,见《文坛五同学》一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梁志宏如是说:“文革”两次卷入大批判,我都可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为自己开脱;但我毕竟在作家蒙难之时,对他们随风扬尘雪上加霜了。10年动乱是一场由“伟大领袖”导演、全民出场并以正剧形式演出的悲剧。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已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我们每个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人,都应进行深刻的反思乃至忏悔。为什么当领袖指错了方向,全党全民都会一味盲从和追随?为什么称作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大都随波逐流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防止历史的悲剧在中国改头换面重演。(摘自梁志宏《太阳下的向日葵》

一书,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

1978 年 10 月 17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等送了花圈。山西省委书记王克文、副省长武光汤、作家马烽、孙谦、刘江、贾克和赵树理的家属一道参加了追悼会。

10 年“文革”,并非只有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们推动着浊浪。

“十年动乱是一场由‘伟大领袖’导演、全民出场并以正剧形式演出的悲剧。”这话说得极好。正因如此,时至今日,还有当年的参与演出者,没有从自个当时的角色中走出来。更有一些未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人们,还在用一种欣赏正剧的目光,想重新走进这部戏中。

【5】运动的发展造成了遍地冤狱

当“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后,斗争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党内的所谓走资派,而是变成了民众中所谓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驻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进驻工厂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掌握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生杀大权。他们有典型经验在手,那就是党中央派驻北京六厂二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六厂者,即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六个工厂;二校者,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毛泽东主席最赞赏北京新华印刷厂的那个经验。

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手中握有专政的大权。他们“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

毫不留情。”

他们是怎么具体来运动群众呢？也有经验：“在具体做法上他们有时拿到大会上批斗，有时放到小会上深追，有时展开个别攻心战，交待党的政策，必要时打出几发‘炮弹’，施加些压力。”毛泽东主席以欣赏和肯定的笔调和语气，如此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北京新化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发向全国，成了指导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

山西与全国一样，在当时极左思潮引领下，全面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以山西机床厂为例，在1970年2月20日的厂报上，头版头条转发了《山西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推动革命生产新跃进》，二版上，刊出厂里革命委员会制定的运动群众的办法。共十五条。

- 1: 查一查谁整天沉默寡言，找一找谁整天坐立不安；
- 2: 查一查最近以来谁精神反常，找一找谁思虑重重，精神不振；
- 3: 查一查谁突然“病倒”，找一找谁愁眉若脸；
- 4: 查一查谁突然走亲串友，找一找谁近来请假频繁；
- 5: 查一查谁走路无精打采，找一找谁上班东游西串；
- 6: 查一查谁干活老出事故，找一找各种事故与谁有关；
- 7: 查一查谁与什么人接触频繁，找一找谁深夜外出串连；
- 8: 查一查谁开会常往背后钻，找一找谁听了发言心慌出汗；
- 9: 查一查谁散布消极言论，找一找谁在会上把方向扭转；
- 10: 查一查谁突然对人特别殷勤，找一找谁突然改换装扮；
- 11: 查一查谁最近随机应变，找一找谁经常耍两面手腕；
- 12: 查一查谁胆小怕事，工作缩手缩脚，找一找谁一谈阶级斗争就躲躲闪闪；
- 13: 查一查谁经常好标榜自己，找一找谁把自己的历史隐瞒；

14: 查一查谁到处探听情况, 找一找谁听见开大会就神色突变;

15: 查一查谁借故逃避运动, 找一找谁与黑线人物相连。

班前班后, 大会小会, 就是让大家这么查, 这么找。查不出, 找不出, 那就甭下班, 甭回家。在这种查一查、找一找的运动群众中, 极左思潮登峰造极, 清队学习班大搞逼供信, 致使发生十余起自杀事件, 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使大批干部和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进驻山西大学的工宣队在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的这种经验后, 对敌斗争搞得十分有火药味儿, 不但在教师中揪阶级敌人, 在职工中揪阶级敌人, 在学生中也要往出揪阶级敌人。斗争的手段, 也对伟大领袖批示的经验有所发挥创新。如“大量揭发别人”一项, 就搞起了人民战争。中文系的工宣队, 集中时间, 集中地点, 让学生们写揭发各种各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先要动员大家, 讲政治认识, 讲路线高度, 讲划清界线, 总之, 要求学生们不分家里家外, 不管是不是爹妈姐妹; 也不分校里校外, 不管是不是老师同学; 更不分这派那派, 揭发对立面可以, 能反戈一击, 揭发自个这一派的问题更好。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阶级敌人也无处不在, 你早揭发, 你早革命, 你自个有问题, 早交待, 你早主动。不能交白卷, 写得越多越好。在那种政治氛围中, 学生们开始揭发了, 出卖了, 可怕的, 是大家统统照此办理, 寻找各种各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人和事来揭发, 竟无内疚和自责。心灵之扭曲, 在“文革”中就这样一步步变成了常态。

清理阶级队伍硝烟正盛, 又开始了整党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山西与全国一样, 在当时极左思潮引领下, 这些个不断要进行的运动, 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些运动中, 还有一个是清查五一六的阶级斗争。

197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通知》。这份中央文件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指北京“文革”初期曾出现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学生组织。这个组织在1967年8月曾张贴大字报和印发传单，反对周恩来。1967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此文第二天刊于《人民日报》）公开提出要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似乎遍布全国。在当时运动接运动的残酷斗争中，各地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掌权者们，不弄出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来，岂不是自个的治下“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

劳动模范解悦，就是在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四位劳模，曾在1967年元月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并参加了刘格平和杨承孝的那个山西革命造反夺权总指挥部。解悦当时在太原纺织厂是红卫队的指导员，在张日清支持下，击垮对立面红卫兵，夺了权。后来解悦参加了中办学习班。1970年7月15日，中办山西学习班结束，解悦被下放到晋东南的高平丝织厂。远离了省城的派性斗争，虽结婚成家，却没有能过上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在清查五一六时，她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押回太原关进学习班。山西作家谷峰曾向我提供了一篇他专写解悦的文章《周恩来总理与劳模解悦的情缘》，记述了这位女劳模被关进学习班的遭遇。解悦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冤案，可谓当年山西清查五一六中的一个典型。

1971年初的一天,丝织厂的党总支书记和另一位不速之客,以省革委要办“学习班”为名,将解悦骗到了太纺职工业余学校土监狱关押起来,从此开始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监管批斗、形同囚犯的待遇。在太纺业校,支左的军代表说,这里办的是“五一六”学习班,是省革委会责成太原纺织厂专办的。还说,因为你解悦不是一般人,所以这个学习班是谢司令员亲自领导,曹西康参谋长直接坐镇,每天都要向首长汇报你的所有情况。

……在这里,除了批斗,就是罚站,坐喷气式,围着学生课桌跑步。没几天,她就站得脸胖腿肿,鞋袜都难穿上,尤其是她怀孕临产了,有关人员非但不送医院,还在这里让解围着桌子跑,美其名曰“催产”。后将她改名换姓送进晋祠二七六医院后,运动骨干们仍在医院刷出大标语,对她这个产妇进行批斗,甚至在解因难产住进产房后,仍有人对她念《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反复重复社论中康生对所谓“五一六”分子要拉,要用钢丝绳拉“五一六”的话。面对运动骨干的折腾,医院一些有正义感的医护人员也看不下去了,他们顶着压力,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对解悦进行“特别护理”,千方百计排除运动骨干对这个产妇疗养的干扰,令解悦得到少许安慰。

解悦产后,有关运动骨干不让她给孩子喂奶,不是给她打回奶针便是给她吃回奶药,硬是把奶整没了,还把她的孩子送到临汾的婆婆家去,连她的伤口发炎也只给她两片大黄。她出院不久,又被送回太纺业校的土监狱,有关人员不顾她产后身体虚弱,每日给她吃红面玉米面,吃不下也无人过问。一天,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替人看守解悦时,语重心长地劝她交代问题,别再受这洋罪了。“要我交代什么问题?”对方一解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要她交代所谓整康生的两箱黑材料的去向,还说这两箱黑材料是由北京民族学院的学生转来的,送

到太纺厂后，红卫队还敲锣打鼓地进行欢迎，将材料放到解悦的床下，解悦还专门开会，将两箱材料以转移展览东西为名，转移到太原古交、娄烦等地，说得有鼻子有眼。人家还声称已将两个箱子拿到手，全是整康老的黑材料，按说，就凭这个，把解悦拉到本市五一广场批斗后枪毙也足足有余了，但考虑到解还年轻，还想拉她一把，没想到解悦至今还如此顽固。

……从生孩子后第 17 天起，她又被罚站了，直到第 42 天，她终于身不由己，昏倒在地，一股黑血顺着她肿胀的大腿直往下流，有关领导闻讯到厕所看流的血不多，连医院也不让她住，继续往死里折腾她。据解悦回忆说，在两年多时间里，不算中小型批斗，停产召开光千上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就达 29 次之多，每次批斗完了，她一连几天都无法行动。

再以山西大学为例。山西大学在工宣队领导下，奉命转移到昔阳县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三个运动合并起来搞，两派的明争变成了暗斗，一派从另一派中往出揪各式各样的反革命，两派师生中，被揪出的各式各样反革命越来越多。这些，全在工宣队统一领导下进行，纳入了工宣队对敌斗争的胜利成果。

校党委统战部部长王西先生，原先当过中文系的系主任，在清队中被押回中文系办学习班。因不堪忍受被批斗时的人身侮辱，跳进老乡院里的茅厕坑中自尽身亡。

著名诗人、教授马作楫先生，在中文系一直代写作课。解放前，阎锡山曾办过一个企业叫西北实业公司，公司有个通讯社，类似于现在厂矿企业的通讯报道组。马作楫曾在那个通讯社里当过记者。国民党的西北王胡宗南，当年也建有一个西北通讯社，是特务情报机关，马先生曾当过记者的“此通讯社”，就被说成是“彼通讯社”了，这个“历

史问题”也就太大了。马教授要解释,被批成狡辩,被痛打落水狗,成了专政对象。

生物系有几名教师,都是解放前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因是同校校友,彼此间来往多了一些。在清队中被打成了“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遭到专政。此案轰动全校,有集团就有外围,于是殃及多人。

历史系罗元贞教授,是著名诗人和学者。1952年元旦,曾给毛主席写信恭贺新年,同时就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一诗提出建议,认为“金沙浪拍云崖暖”中,“浪”字不贴切,与同诗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有重复之嫌,稍欠完美。毛主席很快复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礼。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日后毛泽东再发表七律《长征》时,便采纳了罗元贞的意见。当时国内有十余家报纸报道过此事,并称罗元贞教授为毛主席的“一字师”。1964年5月2日,罗元贞教授曾约十余名省城诗友,在晋阳饭店吃饭,举办了一次诗词笔会,集诗近百首,后有参加诗会者赵云峰先生自费刻印成册,取名《红五月雅集唱酬集》。有人揭发说,那次晋阳饭店的诗词笔会,是一次反革命聚会,而且成立了反革命组织,罗元贞教授由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罗先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并曾娶一位日本姑娘为妻,他当年回国时,已与这位日本妻子离婚。就凭这段婚史,工宣队又将这位爱国知识分子打成了日本大特务!罗先生有《文革狱中作——步鲁迅先生韵》一诗,记下了其情其景:竟于长夜过春时!家破人亡发尽丝。外整贤良加大帽,内讧武斗舞帮旗。常忧巨乱伤邦脉,又倚泪窗写小诗。吟罢低眉无限感,月光如雪照囚衣!

教育系吴侗教授,南方人,高度近视,个头特小,顶多也就一米六稍多,还有点佝偻。他出身贫寒,曾经考上北京大学,因凑不足路费而改上了武汉大学。吴教授专业知识超群,英语极其出色,所编写的书籍是全国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某一天,改善生活吃包皮面条,恰恰

吴侗这个“专政对象”身体不好，擀得半指头粗的包皮面条吃不下几口，又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倒进了茅坑，另一个可恶的“专政对象”，就给工宣队打了小报告。“文革”中，告密者不少，工宣队便带着学生批斗吴教授。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啊，“糟蹋劳动人民血汗”啊，“反动学术权威本性不改”啊，为表达义愤，还推搡了一番。当晚，吴先生就跳进了那个鬼蜮般的井口。吴先生死前将个人物品收拾得有有条不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还穿得干干净净，可见对于那场邪恶的“革命”，他早已憎恶不已、悲愤交加、绝望已极，但骨子里的“正气”却未曾泯灭。于是，那次“批斗”就促成了他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乃以“绅士”般的死，捍卫了人格尊严，宣示了自己对“文革”的最后控诉和彻底决裂。

历史系有一名给师生食堂做饭的炊事员，（当时学校按系分别住在不同的村子里，需各自开伙，原学校大食堂的炊事员也就分到了各系工作）因解放前在阎锡山的部队当过兵，而且是一个特务连的兵，于是被当成了大特务批斗。这个当年的特务连不过是阎锡山部队中某团的下属连，此连负责团部的通讯，有报话机，还养着些骡马和信鸽，此人就是专门负责养信鸽的特务兵。他交待了，却没有人信，驻系工宣队怀疑他是潜伏的大特务，且一定怀有特定的使命，坚持斗他，逼他交待。此人于是高喊冤枉寻了短见，幸亏自己往肚子上捅的那一刀没有致命，终得死里逃生。

还有许多因“恶攻罪”而遭殃的师生们。提到“恶攻罪”，不得不追溯一下这个罪名的来源。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名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此文件被简称为“公安六条”。此文件中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因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和中

中央文革小组全面推行阶级斗争的 1967 年年初下发的，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扩大到凡是对中央文革小组那伙领导人有过非议和不满的人，全进入了“恶攻罪”之列。比如有的学生在床铺下垫了张报纸，被人发现报纸上正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每晚将两只臭脚放在伟大领袖的照片上，这难道不是现行反革命吗？比如有的学生悄悄说过，工宣队进来后，让咱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和宗教徒早晚念经一样了。此话被人揭发，这不就是赤裸裸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吗？再比如有的学生传了几句江青在上海当过演员，和毛主席不是初婚的话，这自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了，岂能不是反革命吗？

这种残酷的斗争，扭曲了人的灵魂。有的工宣队员领着学生和牛鬼蛇神“拼刺刀”时，口口声声逼问对方在旧社会逛过妓院没有？逼对方讲述妓院是什么样子，以满足其意淫心态。还有的工宣队员领着学生，对揪出来的女牛鬼蛇神极尽人身污辱。这号大大小小的对敌斗争大会不时召开，在学生中揪出的基本上全是现行反革命，在教师和职工中揪出的，则多是历史反革命。教师和职工们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那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从他们的历史档案中找个把柄，打他们一个历史反革命，实在太容易了。

两派的斗争，还制造了巩二成杀人集团大冤案，此案由杨韶华案引起。在第五章第 15 节中，曾介绍过山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杨韶华，因组织炮打关锋而死于学校后门外的一眼井中。当时省公安厅资深法医查验现场和尸体后，确认死者系投井自尽。到了 1970 年春上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驻校军宣队和工宣队又将破获此案列入重点，1970 年 3 月 9 日，在昔阳县的县城大礼堂，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军宣队首长宣布破获了杀害杨韶华的大案。案情介绍的情况是，1967 年 2 月 20 日，巩二成主谋，组织一千人把杨韶华抓到校武装部仓库，要其交

待炮打关锋的后台，并残害了杨韶华，将其尸体装进一个木箱子，两天后由张有理等人用小平车推到学校后门外的井旁。先计划扔下去，陈连根怕有响动，就用铁练子栓住杨韶华的腿，慢慢往下吊。3月8日尸体才被发现。事过三年成功破获了此案。会上，巩二成、侯光亮、陈连根三人，当场被押上主席台，并被五花大绑，押出会场。其他同案犯严成华、张有理、王志英暂不逮捕。另外几名同案人员，做了当众坦白交待。请注意，这些人，全都是参加8·14一派的教工和学生，其中巩二成资格最老。巩二成参加过辽沈战役，是塔山保卫战先遣营的老兵，战后全营只留下八个人，他是幸存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山西大学当了武装部的部长。“文革”开始，他明确支持保校党委的8·14一派，是这一派结合的领导干部。军宣队和工宣队制造的巩二成杀人集团一案，对8·14一派分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8·8一派分明是一种支持。问题是，所谓巩二成组织人马杀害杨韶华的案中人，吃不住专案人员的毒打，都认了，专案组叫怎么说就怎么说，唯独巩二成啥也不认。一年多以后，此冤案被纠正，巩二成一干人全被无罪释放。这位老兵真是硬骨头，没有按专案组编下的故事认罪，也没有自杀，终于挺到被无罪释放了。这也是一场内战，其残酷，不亚于当年他参加的塔山保卫战。

下面是山西大学那期间受迫害教职员和学生的一组数字：

从学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随之中断为止，学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就有265人；还有虽未被立案，但在各种场合受到批判斗争的教职工147人；两项共412人，占当时全校教职工的34.3%，有的系、部门竟高达60%。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名家属和学生被审查、批斗，很多人受到株连。仅仅所谓“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一案，校内外被牵

连受审查的就有 100 多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 8 人被迫害致死,7 人无辜坐牢,80 人挨过打。

(引自谷峰著《新太原 50 年纪事》中集《十年风雨》;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

在省城的另一所大学太原工学院,据官方记载,“文革”中共计揪出了 27 个反革命集团,蒙冤受害者 135 人;还有一百多人被打成各类反革命分子。

当时的中学生们,比大学生们的处境略好一些。军宣队和工宣队也进驻了中学,但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教职员工,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们,开始复课了。然而,中学生们一不小心,也会成为“反革命”,1969 年“九大”刚刚开罢,太钢十一校便发生了一件“大案”:不知是谁扯了《毛主席语录》的一页擦屁股。该学校当时是露天的旱厕,被撕的那页,叫工宣队发现了。被擦了屁股的那页,不是“语录”的正文,是扉页,是九大上刚刚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题词。学校的工宣队一个班一个班地检查,收缴学生们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破案,那时候,“语录”是人人携带、天天都读的“红宝书”。现在要上交,学生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课后,“厕所案件”渐渐在学生中传开,“阶级敌人”也很快就被工宣队抓出来了,“反革命分子”竟是平时腼腆腼腆、并不爱惹事生非的学生王太平。但,铁证如山,就是这个 14 岁的学生,随身带的“语录”书里少了这一页,撕痕完全一致。当下,这个学生就被厂里派来的民兵五花大绑押走了。当时工宣队准备将这个学生送公安部门“法办”,上面革委会领导看这个学生年龄太小,批示留在厂里,先让革命群众揭露、批斗他的罪行。这名学生由此中断了少年求学生活,开始了在学习班里的漫长岁月。他经常和厂里的牛鬼蛇神们站成一列,细瘦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在

日头下接受批斗，躬着腰请罪。他必须交代为什么要撕下那一页的“恶毒用心”。他最初的说法是，那上厕所太急了，忘了带纸，身上只有这本“语录”，他翻了一遍，觉得这一页只是四句话，已经背会了，不影响学习使用，所以就撕了这一页。这肯定是实话。但，当时，这样的交代显然不行。他只能一次次地挨打，被逼要找出反动思想的根源。实在熬不住，就开始胡编了，说什么觉得“副统帅”长得不好看之类……越胡编，他的罪名越大。直到两年后，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这名备受摧残的初中学生，才被革委会和工宣队从“牛棚”里放出来。

省委老干局《山西老年》原副主编王毓康先生，“文革”期间曾在太原市新城联校当过教员，对亲身经历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应我之约有过如此回忆：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如此残酷。作为联校校长的张德，竟然在清队学习班会上，揪住新城小学校校长韩炳和的头发，左右开弓，拍拍打了几个响亮的耳光，打得韩几乎晕过去，在场的女教师都吓得哭了。因为韩在解放前在东山煤矿当过几天矿警，他只好承认杀过八个矿工，后经调查八个人均健在。运动中吓得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教导主任李树屏，在院子里大喊大叫，张德命令民办青年教师将其五花大绑，吊在老槐树上用木棒打，打得李树屏满脸流血……在新城联校清队中除了没用“老虎凳”和烧红的烙铁烫人外，捆绑吊打全用上了。当时联校正式教师和民办教师加上临时教工，共有 102 人，就有 22 人被戴上各种帽子打成专政对象。

学校如此，社会上也是如此。当时在太原市娄烦县（其时娄烦县属山西省静乐县）造成的“三特分子”大冤案，也很典型。所谓“三特分

子”，即国民党、复兴社和新民会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多了，就有了三特反革命集团，此案完全是被当时当地的当政者们，在错误政策的指导下，用极左思维构陷出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案件。1969年4月，先是被打成“三特分子”的尹吉珍等十余人被开除党籍，之后，此案连续扩大，全县从县委机关到基层农村，被打成“三特分子”的人数，竟达到1136人之众。抗日战争时期，在该县工作战斗过的老干部、老党员，几乎全部被打成了“三特分子”。其中被打死逼死132人，致伤致残60人，株连一万余人。由于娄烦属革命老区，从这里走出去的干部、党员不少，此冤案涉及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这种阶级斗争深入到农村后，原本应该“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为了国家和自己好好种地打粮的农民们，一旦“与人奋斗”起来，热情更加高涨。农村的历史资料保存，相对较差，近些年来，虽有农村在党支部和村委会主持下编写村史，但史料不全，多有笼统概括历史阶段的现象。也有记述较全者，据张德一担纲编修的《太原市古城营村志》（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1版）载，1970年冬，南郊区革委会向该村派出11人组成的工作队搞运动。工作队一进村，先对村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他们已经分家另过的子女们多次抄家，以寻找他们的反革命罪证。然后办起大队集训班和小队学习班。大队班60余人，小队班90余人。当时全村人口3000余人，按团结95%的人民群众，打击和镇压5%的阶级敌人的比例，共搞出150余名斗争对象，正符合毛泽东主席常讲的那个阶级敌人只占5%的比例。由于批斗过于激烈，第七小队田二赖投井自尽，另有三人被判刑。

还可在全省举一个晋东南地区为例。据1974年中共山西省第三届七次全委会有关材料显示，晋东南全区“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搞逼供信，仅被逼自杀人员达到七百余人”，紧接着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阶段，“借运动对一派群众继续死整，自杀

人员又有二百余人”。两项相加，全区仅自杀者就达到近千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胡抓人，乱定性，有些罪名极有随意性。太原二电厂总工程师王振宇被群众专政的罪名便颇具典型。当时，所谓阶级敌人，许多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厂里两派组织和革委会，找不到王振宇这位高级技术人员的三反问题，就给他定了个反革命三开分子的罪名，即在日本人当政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也吃得开，在共产党当政时期还吃得开。王振宇是1968年八月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的。那时候，这个厂是平房宿舍，一排一排的。王振宇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也和工人们一起，住在排房院，里外两间屋，还连着一间小厨房。王振宇被揪出后的当天下午，一辆大卡车开进家属院，跳下十几个头戴柳条帽、臂戴红袖章，手提大木棒的工人，迅速堵住了王振宇的家门。王振宇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紧张的不知所措了。有个当头的宣布：“王振宇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了，现在要来搜查你们家！”于是这伙人开始翻箱倒柜拉抽屉，连厨房的米面，也要从口袋里倒出来用手抓一遍。他们抄走王振宇的笔记本、私人信件、折扇、字画，还有一个袁大头银元等等。这伙人刚走，排房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又来了一拨人，是上一拨人的对立面。当时，驻厂的军代表刚刚把两派撮合到一起，先成立大联委，再组建革委会。一派揪出某人，另一派也要去打倒此人，以证明自个组织的革命性。这伙人又拾翻了一顿，抄了几包东西才走。革命年代，人性之恶被发扬光大，一名同住排房院的工人，第二天一大早，拎着钳子改锥，铁青着脸撞进了王振宇家。王振宇的妻子和他说话，他也不理，径直走进里屋，三下五除二，就把电话拆下来拎走了。这部电话，是厂里给总工程师配置的工作电话，被这位革命造反的工人安装到他家了。抄家，是那个年代宣示革命的重要行动。凡遇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子，就要配合上这种行动。如果发布了最新

的最高指示，厂革委会组织的这种行动更不可落下。还以王振宇的家为例，纸糊的顶棚，早被来抄家的人戳烂了，屋外有的窗户上、墙上，被糊上一层又一层大字报。厂里其他被无产阶级专政了的人家，莫不如此。至“文革”后期王振宇被解放重新安排工作，他的家共被抄八次。

我们再举一个工人中的案例。太原市的王毓增、杭庆九、武承发、史锦华、阎仁寿、王金管、史增荣七人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就都是工人。这七位工人，除杭庆九当时已经48岁外，其他六人，当时均是二十刚出头，三十还不到的在岗青年工人。他们原本不是一个单位的，“文革”开始，单位乱了，不用上班了，就在社会上混。武承发参加了红联站，还是红联站勤务组的工作人员，嘴巴好，消息灵，爱交友，就认识了那几个人。这七位工人都是红联站观点，来往多了，一块吃个饭，喝顿酒，议论时世，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七个人中，除了杭庆九出身没有问题外，其他六人，都是黑五类出身，其父母都在各种运动中受到过打击。他们对“文革”不满，对“九大”不满，也在喝酒后，非议现实，骂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领导们，还骂过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一打三反运动刚开始，先是杭庆九因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单位的运动对象，他被专政了，要揭发立功，就将一块吃过饭、喝过酒，非议过现实的那六人交待出来，于是一个七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案就被揪出来了。1972年6月20日经太原市公安局军管会和中级人民法院军管小组判决：王毓增有期徒刑20年；杭庆九有期徒刑18年；武承发有期徒刑7年；史锦华有期徒刑10年；阎仁寿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王金管劳动教养3年；史增荣定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在1980年11月1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案平反的判决书中，先宣告王毓增、武承发、史锦华、阎仁寿、王金管、史增荣六人无罪。对杭庆九呢，则指出其“蓄意制造假案，后果严重，已构成犯罪。但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从轻判处”。即“改判为

免于刑事处分”。

上面只是我收集到的一些典型案例,其悲、其惨、其血腥,可见一斑。

还得说说太原五中。刘灏此时已经成了北京学习班里的学员,成天价“斗私批修”,成了被别人革命的靶子。其头上五中革委会主任的官职,已名存实亡,母校的运动,也没法过问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开进了五中,教职员重新成了革命的对象。2006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承的河流》一书中,对当时运动有如下记载:

1969年开始“一打三反运动”,全校教职工集中学习,集中食宿,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1970年,16名教师下放到古交、清徐、交城、孝义县劳动,有2人被遣送回原籍劳动,很多教师留本校学习班继续学习,只有部分教师分担学校各项工作。

对那些受打击、迫害教师们的命运,编著者用了“劳动”这样神圣的褒义词概括,可见“文革”的那场灾难,在年轻一代眼中真的淡漠了。须知,不仅仅是在五中,在全市、全省、全国,当时被剥夺了教学资格的老师,他们或被赶出学校,下放农村,或被遣返原籍,接受专政,那种命运,是一种流放,实际上与变相劳改无异。本书还记载从1978年开始,“校党总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10年动乱’中的冤假错案,至1990年,使近80余名教职工冤案昭雪”。

此类具体事例,举不胜举。当时山西的县(区)级当政者,多为支左的军人。“文革”本身就没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又处在“文革”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环境里,还执行着错误的政策(如《公安六条》),他们的战斗性越强,追求政绩的目标越大,结出的恶果便越多。以大专院校为主的所谓斗、批、改运动,加上在全社会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运动,再加上城乡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山西真是冤案遍地了。

【6】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回视中国的历朝历代，当酷吏横行之时，也总有如包公、海瑞那样的诤臣为民请命，想方设法平反冤狱。在山西，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以党性和良心，支撑自己的行为，坚持实事求是，做了不少平反冤狱的工作。军队支左干部程步鳌，就是一位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于1970年末调任山西省一打三反办公室任副主任，实际上主持工作。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一打三反”中，山西全省不少地方，将抗日战争时期的牺盟会和决死队当成反革命组织，参加过这两个组织的人，也全成了清理对象。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与当时阎锡山的部队有所区别，当时又称新军。这两个组织都是山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政权搞统一战线时建立的抗日群众组织，是中共统一战线在山西的一种特殊形式。阎锡山是牺盟会的会长，也曾供给过决死队枪支弹药，但主持牺盟会和决死队工作，并实际掌控这两个抗日组织的领袖，则是当时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的薄一波。1937年七七事变前，太原城内的牺盟会会员就达到了5万人，全省发展了牺盟会会员达到60万人。当时这些人大多健在，如何对待这两个组织，是有关这些当事人政治生命的大事。然而，其时，薄一波已经成了刘少奇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们打倒了。让他来评价定性这两个组织，第一不可能，第二说了话也不管用。在那个特定的年月，程步鳌终于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找到了有关肯定这两个组织的文字段落，还有相关的注释条款。毛主席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有了毛主席的这些话为依据，不就可以肯定牺盟会和决死队是抗日组织了吗？参加过这两个抗日组织的人，不就可以免遭专案审

查之苦和冤狱之罪了吗？于是，程步鳌和办公室的同仁们一道，起草了一份《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对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两个抗日组织，引证《毛泽东选集》中权威的话，为它们正了名。在 69 军政委、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曹中南主持的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份文件，会后即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清队整党建党领导小组 1970 年 1 号文件”形式下发全省，从而解放了一大批因参加这两个抗日组织而遭遇冤狱的受害者。在当时“文革”的浊浪中，如此的涓涓清溪，终于难抵浊浪滔天，省一打三反办公室因为做了不少纠偏工作，被省革委的一些高层领导批评为“翻案办公室”，程步鳌也于 1972 年的冬天，被不明不白地调出了省城。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合著,2005 年 1 月版)一书中,对这次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作了如下总结:

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一亿人,确是史无前例。这种毫无客观需要的“清理阶级队伍”,使大批干部和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的基本阶级队伍造成极大的损害和混乱。

归根到底,这全是“文革”中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可是在“文革”中,从一开始的“横扫牛鬼蛇神”,到“破四旧、立四新”,再到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乃至到山西的“批谢”和“清查扩大化”,情形已经变成了“既可杀,又可辱”(季羨林先生语)。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彭

德怀和贺龙等一大批与他一道革命、一道胜利、一道创建了人民共和国的战友们,还有如卫恒这样的省委书记们,一个个备受人生摧残、人格侮辱,或惨死冤狱之中,或生不如死,无休止地接受着批斗和折磨。更有无数的知识分子,颜面扫尽,被排到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成为臭老九。加上其他受害的群众,说冤狱遍地,一点也不过分。源头如此,上行下效,也就自有原因了。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文革”初始,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沿用了在各种运动中,向被运动单位派驻工作队的老方法,大批工作队进驻了北京的高等院校。北京如此,各地也纷纷效仿。工作队有权发动群众、运动群众、为群众划分左、中、右,并有权为右派定性。确实,当时在北京的各个高等院校,以及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工作队和领导运动的校党委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从南方返京后,将这种做法定性为“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被清算,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工作组也被清算。而当毛泽东发动大、中学生起来造反,批判“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名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向走资派发起冲击,从而形成了全国的造反运动后,他自个却又用了派驻工作组的方法,来运动群众和稳定局面了。只不过,工作组成了工宣队和军宣队而已。工宣队和支左的军人,同样操有发动群众、运动群众、为群众划分左、中、右,并有权为右派和各种被专政对象定性的大权。在短短四五年的历史中,出现这种相似之处,其原因恐怕就要从更远的历史去探寻了。

【7】各种方式的上山下乡

让我们再简略介绍一下太原广大中学生们的命运。

说到他们的命运,得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一

条最高指示说起。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一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大文章,在头版右上角,刊出了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山西,由于党中央对山西发布了《七二三布告》,谢振华将军正带着 69 军官兵费力地稳定着全省局面,以强硬手段全面收缴三大派组织武斗队的武器,因而这条最高指示直到 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才开始落实。1969 年 10 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 544 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标志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式启动。之后,从省里到各地市、县区和人民公社(后改制为乡),都组建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上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加上 80 年代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陆续回城,各级政府中的这个机构,终于退出了历史。

从 1966 年“文革”初起,大中学生们就是运动的主力军。“文革”中的大学生们还可以分配工作,无非先上山下乡,或者先到部队或农场劳动锻炼,其间有工资,一年或两年后一般都能好歹分配一个正式工作。而中学生们则没有这种机遇。让因“文革”而失学的中学生们去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家长们的抵制和反对。但事关“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针,孩子们不去,待在家里既不能继续升学,也无业可就,前途何在?除了一些有特殊门路的家长,可以送孩子去当兵外,大多数家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虽心怀忧虑不满,却绝不敢对上山下乡的政策表示出公开的非议。1969 年 11 月 25 日,太原市革委会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欢送全市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040 名知识青年胸前带着大红花,站在大卡车上缓缓经过主席台,在一片锣鼓声中,被分别送到了他们落户的农村。有

材料披露,此后一直到1976年,太原市先后有7万多名待业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形势不可更改,但对太原五中和六中的许多革命小将而言,却总不甘心落入这种命运。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表态的口号喊过了,决心书也写过了,可再想想,革命一场,上大学没指望了,能有个正式工作,可比去当农民强啊!刘灏去找袁振,李金渭也去找袁振,希望袁振帮助五中和六中的革命小将们,有个另外的出路。袁振还真就为保过他的这些小将们考虑了。有一次,当李金渭再次来到袁振家,向袁振诉说了战友们的希望后,袁振思考片刻,就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打去一个电话,说山西的煤矿多,这些年自然减员不少,能否让煤矿接收一部分原本该上山下乡的中学生,好保障生产。对方说这事可以考虑,但要请示一下周总理。事情很快有了结果,总理同意。袁振于是有了上方宝剑,运筹一番,让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劳动人事部门,联系几家大煤矿来太原招工。这事发生在袁振被中央宣布调离山西和太原之前,他用这种方式,回报了一直支持和拥戴他的五中和六中的革命小将们,这两个学校的许多兵团小将,因此而有了份工作,不再上山下乡。这事继续扩大,煤矿上劳动力需求量大,其他一些中学的学生们,也陆续被煤矿招工。仅以当时被太原杜儿坪矿招为矿工的中学生,就有太原五中65名、太原六中47名、太原二中31名、太原三中71名、太原七中43名、太原八中32名、太原九中41名、太原十中43名、太原十二中45名、太原十四中40名、太原十六中27名、山大附中45名、太原二十中三名、西山矿务局子弟中学64名。从1969年至1976年,在这个矿的各种井下事故中,这些学生们死亡15人。随后,其他几家确实需要新工人的大厂,也仿效这几家煤矿的做法,来太原市联系招工,又有一些中学生没有上山下乡,变成了招工对象。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三名学生常委中,宋捷要等着大

学分配,李金渭呢,没有去煤矿,直接进了太原半导体厂。唯有刘灏,是谢振华将军直接关注的对象,不得不先去古交山区“劳动锻炼”。

到了1970年,省城太原的中学生们,又有了一个特殊的就业机会,那就是去参加铁建兵团。所谓铁建兵团,是那一年由太原市警备区牵头,由各城区武装部和街道革委会具体负责招收组建,去完成修筑古交钢铁厂专用铁路线,以及北京至原平的京原铁路线土方工程的一支铁路建设队伍。公检法被砸烂后,原市公检法的一批干部,成了这支铁建队伍的团部和连部的领导。不政审,不体检,自愿报名,让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们,这次被卸下了负担。也让招工无望而迟迟不想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看到了另一种出路。虽然没有什么军装,却分明是由军人负责的,名声好听。还有实惠的,铁建的工资是每天1.32元,不论大小月,一律按30天计,即每月工资为39.6元,每月扣除饭费15元,每名铁建战士每月尚可领到工资24.6元。街道干部们挨家动员时许愿,说等工程一完,即可分配工作。有这等“好事”,不消说,呆在家里的中学生们蜂拥报名了。毕竟,这些“待遇”是上山下乡的那些孩子们绝然没有的。1970年5月7日,省城各城区参加了铁建兵团的中学生们,分别乘坐一辆辆大卡车,离开了父母,驶出了太原。这特定的一批中学生们,和一批小学六年级毕业后的准中学生们,大约有一万余人。

令这些孩子们想不到的,是铁建兵团那种超强度的劳动。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铁建的时兴口号一个接一个。5月初到工地,是“大战红5月”,5月一过,就是“大战6月向党的生日献礼”,7月呢,又是“大战7月迎接八一建军节”,到了8月接不上什么节日,就搞“劳动大竞赛”,9月就该“大战9月迎国庆”了,10月1日也不休息,开始了“10月大会战”,11月呢,口号又成了“冒严寒,战风雪,设擂台,比进度”,到了12月,就是“脱皮掉肉无所惧,大步迈向1971年”了。

我的骨肉同胞弟弟,当年就是一名铁建人。改革开放后,他在太

原市一家大型企业担任了副总。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的描述,很能代表当年铁建人劳动和生活的真实情形。

也就在那一年,仅仅17岁的我不得不扔掉了早已破灭的上学梦,背着父母帮我打好的行李卷,登上了铁建兵团招工的大卡车。去哪里?不清楚。修什么铁路?不清楚。怎么修铁路?更是不清楚。心中所有,只是一片茫然和终于可以为父母减轻一点生活负担的安慰。我如一粒被时代的强风刮进铁建兵团的小卒子,随着近一万名由太原招募来的青年人,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城市,向北进发了。

……17岁的青年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我17岁时却经历着每人每天平均要挖填土石方8—10方的重体力劳动。日复一日,每天抬大筐运土石方的单一重体力劳动,使我的体型至今都显出一肩高一肩低的畸态。记得第一次给连里拉粮,180斤的大麻袋压在肩上,我只觉得全身的骨头就要马上被压断一样,脚步想站都站不住,一直向前扑了好几步,才算是咬着牙挺住了腰。等扛到仓库时,司机老师傅才告诉我,当时他看到我向前扑着跑的样子,几乎吓坏了。他说:“小伙子,算你命大,你挺住了。如果你当时趴下,这辈子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与工地上苦和累相伴的,是我们事后称之为“半劳改”式的非人待遇。我们这些铁建兵团的战士们,全是知识青年。那个年代,知青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接受改造的社会群体。由这个群体组建而成的铁建兵团,连队的管理干部又都是原先公检法战线的干警们。造反派砸烂公检法后,他们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涌进了铁建兵团,他们之中不乏对知识青年的同情者,但盛行的极左思潮也让他们把知青当成了需要改造和接受改造的对象。在工地上干活时,不论是遇上风、雨、雪,他们都不让停工稍事休息。至今想起来,我都觉1970年的雨水出奇地多,在一片口号声中,我们冒着大雨在工地上苦干的场面充满了悲

壮。记得最厉害的一次，倾盆大雨大到三米以外根本就看不见人影，而铁建战士们却不能避避雨，依旧如机器人一般，在工地上重复着每天同样的负重劳动。一位当年太原三中的高才生，抹着脸上的雨水只说了一句：“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结果事后被大小会批斗了个不亦乐乎。那场大雨后的第二天，听到起床号后我往起一坐，一头又栽到了床上。后来才知道，我们连那一天一下子病倒了一半人。除了昏倒不省人事的，连里的领导还是把能叫起来的，全赶到工地上去了。

还有一次，那是在古交大山里，连里自己组成了爆破班，在河滩里进行爆破。我们离爆破现场太近，却没有安全帽。炮声轰隆隆响起来以后，领导才想到下达快速后撤的命令。我们在奔跑时，其余爆破点上的炸药也依次开始爆炸，漫天的石子从高空中落下，一群少男少女们一个个抱着头，在一点也没有遮拦的河滩里狂跑。不时有被石块砸中的人倒下，并发出可怕的叫喊声。一块足有脸盆大的石块从天而降，落到了我前面不足两米处。稍一楞神，又是拼力的奔逃。一直跑到河滩的另一边，伏在坝堰后，我才发现自个的肩上和身上出现了好几处肿块和瘀血。

如果说，那时的苦难还可以用我们稚嫩的躯体承受的话，那时对知识的渴求却常常使我们的灵魂几近死亡。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如地下刊物一样在铁建战士们中间暗暗流传。只有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或在山沟里，或在小路上，我们才可以哼唱从那本书上看来的，无师自通的歌曲。我们那时常常随着铁路土方工程的延伸而搬迁。每到一处新的山村，每住进一户新的农家，我便向房东寻找可看的東西，凡印有文字的旧书旧报纸，都成了我晚上临睡前在油灯下的读物。

我还能上学吗？神州大地上那时把所有的学校都砸烂了，可那个早已消失的梦，还是不时地在我疲乏的躯体进入昏睡后，伴着大山里的夜风，刮进我的心中。

(摘自李宿定主编、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 年 12 月出版的《文献名邦看今朝——平定现代名家与新秀荟萃》一书中孙琨著《穿越人生风和雨》)

1972 年的年底,这批铁建兵团的学生们,被陆续分配了工作。他们是不幸的,经历了无法言说的苦役。他们似乎又是幸运的,与他们之前和之后上山下乡插队的中学生们相比,他们毕竟提前回城了,且有了一份工作。1994 年,太原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名为《寻找铁建人》的大型专题片,记录了那批太原铁建人员曾经的苦难,和日后生活和工作的状况,我弟弟也成了该片编导寻找拍摄的对象。这部大型专题片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片断。

省城的中学生们上山下乡了,是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省级机关的干部们也被上山下乡了,不说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说要去走五七道路。(孙涛注: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解放军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学生也要如此,并特别提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文革”中被称为“五七指示”)就在省城那批中学生们成了铁建兵团的战士,被一辆辆大卡车拉出太原之后不久,从 1970 年的 7、8 月开始,被囚在石家庄学习班的一万多名原省级机关干部,开始“结业”了。极少数人回到了山西省的省级机关,还有极少数人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工作,以及到山西省的基层去挂职。剩下的近万名干部,则先回到太原,再带着各自的家属和未成年的儿女,去农村扎根。他们被下放到全省各地的农村,成了那个年代挣工资的特殊农民。我的岳父林菁华就是其中一例。他于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毅然离开求学的北京中法理工学院,回山东老家组建起抗日武装。建国后成为一名

行政九级的领导干部。1954年由华北行政委员会调入山西。“文革”中被江青康生点名批判，在北京入狱，放出后在中办学习班学习并接受审查，“结业”后带着老伴和小女儿被发配至灵石大山里接受改造，1971年4月12日在悲愤中客死他乡，年仅55岁。

中办学习班解放军的安排下，许多学员在“结业”前，左手握紧毛泽东语录小红书，右手握拳举过头，念了如下的誓词：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光荣地参加了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许多同志受到了您老人家和林副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我们一身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向您老人家庄严宣誓：

我们一定永远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伟大思想，无限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用您的思想统帅一切，不断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做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我们一定紧密团结在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做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模范！做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模范！做加强团结，“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模范！做“斗私、批修”，促进、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坚决响应您老人家“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

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宣誓人：（自念名字）

可悲和可笑的是，一年后的那个9月13号，随着蒙古国上空那架三叉戟飞机落地的轰然爆炸声，随着党中央揭露林彪密谋暗杀毛泽东，计划失败后叛逃的机密文件传向全国，一年前他们这些对领袖的誓言和对“文革”的信念，也在心中被炸成了碎片。

叙述这些，是想说明当时刘灏的特殊处境。他不同于红联站勤务组的一把手段立生，人家是省委党校的大学生，可以分配工作。他也不同于红总站的那位核心人物、东风兵团的领导黄锐庵，人家是省委机关干部，可以随省级机关干部一道，去做挣着工资的农民。在长达一年的北京中办学习班里，刘灏几乎是一个特例。这位兵团司令，头上还有省、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官帽，既是一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又是红色政权里的官员，可说到底，他还是个中学生。省革委没有让他与五中的同学们一道参加招工走进厂矿，也没有让他与五中的同学们一道去参加铁建兵团，倒是与北京学习班的那些省级机关干部们一样，让他上山下乡了，不同的是，人家那些干部们都有工资，他却没有一分钱的待遇。他被安排到农村，上面既不说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不说是去走什么五七道路，按当时与他谈话的军代表的说法，是要让他这位革命小将去基层农村“锻炼锻炼”，等以后再行安排。

【8】老劳模点拨刘司令

1970年7月15日。此时，太原缺少了许多盛夏的喧闹，全市因“文革”而滞留在校的中学生们，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参加了铁建兵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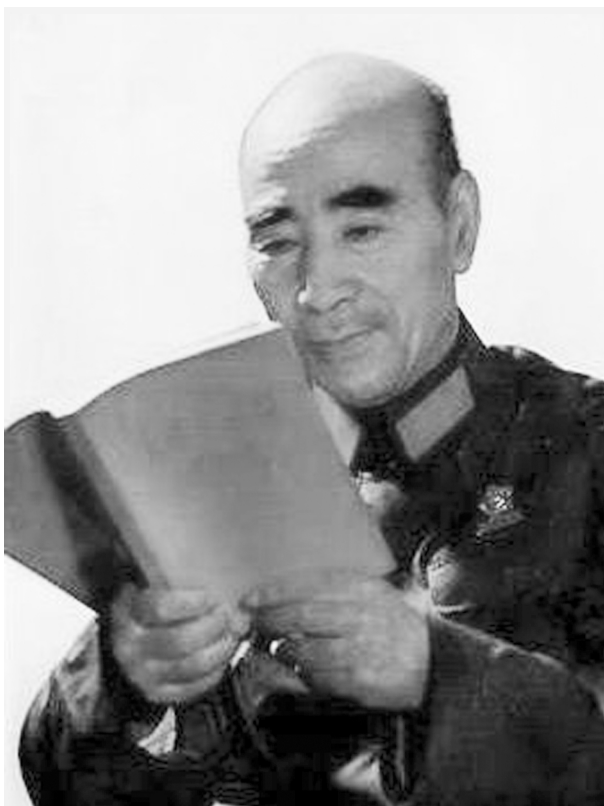
们的离去似乎让省城变得沉寂了许多。而刘灏呢,因为做了兵团司令和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这一天却从太原五中出发了。不像其他中学生们上山下乡落户时那样,有工宣队敲锣打鼓地欢送,有父母兄妹泪流满面来惜别,胸前能别上一朵大红花。也不象五中那些被厂矿招工的学生,以及那些参加铁建兵团的学生们,上路时有大批的伙伴同行。他是一个人踏上漫漫远途的。搭乘了一辆去古交的大卡车,伴着自个简单的一卷行李,离开了太原市区。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古交区的鹿庄。

大卡车驶出太原城向西并爬上了西山,刘灏从来不知道古交区在哪里,也不明白当时的古交区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遍地荒凉,沟壑纵横,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几乎不见人影儿。在他想象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可不是这样子。每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把革命的形势说得那么好,而现在,他却在极目之处,看到了真实的荒凉。刘灏是属于“老三届”的中学生。中国的“老三届”们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因“文革”而失学,而上山下乡,而改变了自个人生的命运。但他们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靠自身的奋斗,在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后脱颖而出,成了国内因10年“文革”而出现教育断裂后,充填进这裂缝中的人才。以刘灏的聪明和才干,他如果在困境中自学,等到新时代到来后,完全可能考入大学。但时代使他与别的同学们插队有了不同之处,那就是在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帽子。要知道,这帽子可是一种官职呀!

这官职那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一分钱的津贴,但因为头上有这官职,刘灏就是参加队里的劳动,人家也不给他记工分,更不会给他年终分红。也有好处,那就是这官职使他在鹿庄可以白吃白住,即便不去劳动,天天睡觉或在外边晒太阳,队里也没人敢来干涉。这是上面的安排,队里的干部明白这个小小年纪的插队中学生,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呢。他们在生活上很关照这位娃娃似的中学生,但

与刘灏却没有共同的革命话题。鹿庄的老百姓们，并不关心外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怎么样了，更不管这革命是不是还要掀起高潮进行到底，或者如广播里所说，又取得了怎样的伟大胜利。他们关心的是多挣几个工分，到年底能多分一点口粮。生活在这里的刘灏感到孤独。

全党全民思想被禁锢的年代已经太久了，由最高领袖一手捧起来的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们，自以为“文革”已经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当他们一下子又被最高领袖巨手一挥，打入上山下乡的洪流落入真实的基层农村后，面对老百姓缺油少盐的贫困生活，以及自个变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身份转变，加上面对要长期扎根农村的宣传，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刘灏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另类，因为头上的官职，他不相信自个会永远呆在鹿庄。每天送走日落，再迎来旭日。唯有去太原开会或者替生产队去太原办些能办的事情时，才能打听到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谢振华还在主持省里的工作，刘灏去找过谢振华，想说说自个的事，总不能就这么在农村呆下去吧！说来说去，就说到了兵团怎么支持 69 军，怎么和反对



江青为林彪拍摄的照片。在 1971 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 期合刊发表后不久，战功卓著的大元帅林彪就惨死在蒙古大漠了。

69军的刘格平和红总站一伙做斗争。听罢刘灏表功,这位少将司令员、当时正在山西主政的第一把手却不急,也不多表态,只对他说道:“你插队还不到一年嘛!年轻人,先好好锻炼锻炼再说。”听了谢司令员这话,刘灏只好再熬下去。

有一回又去省里开会,然后去大寨参观,刘灏与李顺达住在了一起。刘灏自打“文革”中认识了老李,就觉得这人实在,不和人斗心眼儿。再说,当年老李在晋东南是支持联字号的,而联字号是兵团一派的观点,是反刘格平的。所以,见了老李,刘灏就想多和老李聊一会儿天。他向李顺达诉了半天苦,说自个顶着个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帽子,可啥事儿也管不了,啥工作也没有。末了又加了一句牢骚话:“你说说,我这个常委像球个啥?”李顺达想都没想,就对刘灏说:“耗子呀!(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一直以为刘灏叫刘耗。他以前就对刘灏说过,你呀,怎么起了个名字叫耗子?刘灏解释过他那个灏字,并非耗子的耗,不过老李还是叫他耗子)你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不入党,你这个常委确实不算球个啥。”原本是想诉诉苦处,听听同情话,或者还可以请老李得空儿和谢司令员说一说,好快点给自个儿安排一个好工作,没想到老李一句话,让刘司令茅塞顿开。真想不到西沟村里的这位老劳模,能给自个指出这么一条光明大道来!细想,可不是嘛,自打1966年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光知道做了毛主席的红小将是革命的,光知道当上了兵团司令是革命的,怎么就没有想到还得入党呢?打倒了“黑省委”,山西还得有个党的核心小组,轰跑了刘格平这个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还得有个谢振华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文革”要革走资派的命,可不是革共产党的命呀!这道理以前就明白,可自个怎么就没有想到也要入党呢?即刻间,他既是对老李说,也是对自个大声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呢!”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组织基本上瘫痪了，更没有发展新党员一说。不过像刘灏这样的人，那阵子想入党，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比如在刘格平当政时期，刘灏就是写上一百份申请书，怕是也入不了党。可山西现在是由69军掌权，刘灏提出来要申请入党，基层党组织当然得看上面的眼色行事。于是，1971年的2月15日，23岁的刘灏，在古交区鹿庄被接收为一名共产党员。入了党的刘灏，还是一名没有工资，没有津贴，队里也不给记工分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9】谢振华安排三大派组织领袖做官

那时的山西政局，正在谢振华和曹中南领导的69军的努力下，渐渐趋向稳定。1971年4月7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太原隆重召开，谢振华代表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做报告。在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共山西省委新的领导班子里，谢振华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全国上下正搞“批修整风”。按报纸上的宣传，“批修整风”是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带领全国人民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又一战略部署。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全发了同样的通栏大标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八月，由七月号和八月号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出版，上面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江青以峻岭为化名，为林彪拍摄的一幅身着绿军装手捧毛选的彩色特写头像，题名为“孜孜不倦”。然而，其时，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之间，其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导火索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执意要改变国家政体，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则

坚持设国家主席。当林彪“孜孜不倦”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时，毛泽东却在1971年的8月15日离京南巡，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召见各地的党政军大员们谈话达13次。

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明确地将林彪定成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头头。他如此表述了对林彪的看法：“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如此给林彪定了性：“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用了“保护”一词，却又对林彪作了如下推理：“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龙章、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主席用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以皇帝式的绝对权威，对他一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问罪了。此时的林彪该怎么办？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向伟大领袖低头认“罪”吗？林彪显然明白，如此而为，他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也只能和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一样。如不低头认“罪”呢？其下场，也必然和彭德怀和刘少奇无异！也许，这正是毛泽东9月12日结束南巡回到北京，而9月13日，林彪便乘飞机外逃，坠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原因。

9·13事件以绝密文件在党内层层往下传达时，已经成了党员的刘灏，也在古交的大礼堂里听了传达。会场上，安静的怕人，安静的令人窒息。绝密文件中不断出现的林彪两个字，正被拿着绝密文件照本宣科的上级领导不时地提及，扩音器中，这两个字在礼堂里轰鸣着。刘灏与所有被通知来开重要会议的党员们一样，他们对林彪这两个

字的认识,还定格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里。而现在,毛泽东的这位亲密战友,写进新党章的接班人,竟在绝密文件中,变成了要谋害伟大领袖的元凶,变成了乘机叛逃的千古罪人!人们一时还难以从“文革”开始就对林彪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跳出,人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却同时又因为这种事实被写进了绝密文件,为这种不容置疑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种潜在的沉思产生的许多问号,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涌动着。

刘灏也在思考着。他已经是能看上绝密文件的中共党员了。文件中披露了林彪的那个所谓的“571 工程纪要”,与许多人一样,刘灏在读着这个“纪要”,潜意识中却不断出现另一种声音:难道不是这样吗?他理清自己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也理清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往下走。他感到自个和许许多多的党员、群众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受着巨大的蒙蔽和愚弄。他开始暗暗怀疑伟大领袖的



刘灏担任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党委副书记时留影

“文革”意义,不得不想一想自个的前程了。革命小将的身份已不再有什么用处,应当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才行。

好在已经有了党员的名份,他又下山回太原去找谢振华。

“谢司令,我已经入党了,这样下去不行呀!你总得让我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干才行呀……”

谢振华在那个时代的思维必然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刘灏是犯了错误的革命小将,他在中办学习班检查过了,回太原也在湖滨会堂检查过了,下乡锻炼也一年多了,当用自然还得用。谢司令员略一沉思后说:“你的工作嘛,会有安排的。目前团省委就缺一名书记,省委正在考虑合适的人选呢。”

刘灏那双近视眼镜片后的眼睛由不得一亮。他仿佛看到一条金灿灿的仕途正拓宽在自个的脚下。能做上这个官,那不就是迈上了开始在政治上渐渐走向大人物的台阶了吗?

想都没想,由不得就问:“谢司令,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过嘛,我先让你干古交区的团委书记,事情总得一步一步地慢慢来嘛!”

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区团委书记,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官职,以当时的待遇是行政 25 级的国家干部,月工资 36 元 5 角钱,比起兵团司令来,不知要正规了多少倍,比起那个只有职务而无实权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来,也不知要正规了多少倍。何况还有更大的诱惑在前面摆着呢。共青团的山西省委书记,那可是堂堂正正的地师级干部呐!

荒凉的古交山区,在做了区团委书记的刘灏眼中顿时有了生机,原先感到麻木和迟钝的老百姓,在他的眼中也可以忍受了。依旧还年轻的心期盼着新的任命。因了等待,时光便显得漫长。当时光流水般地逝去以后,在久久等不到任命的消息时,他便耐不住要去打听一下。消息是极容易打听清楚的,任命他当团省委书记的事儿原来吹

了。原因也简单，是谢振华的意见遭到了陈永贵的坚决反对。谢振华要举荐刘灏当团省委书记，陈永贵则死活不同意，谢振华又举荐段立生，陈永贵还是死活不同意。老陈有老陈的人选，坚持要从大寨大队铁姑娘战斗队里选一名铁姑娘出任团省委书记。老陈有老陈的道理：“一个兵团的司令，一个红联站的头头，他刘灏和段立生有啥资格！”有了不同的意见，而且是陈永贵提出的意见，谢振华只好把团省委书记的事儿放一放。陈永贵举荐的人他不用，他想起用刘灏和段立生的事，自然也得搁一搁了。可是，共青团省委还是得有个书记才行，最后，只好起用了忻州奇村的女民兵模范王银娥。这女娃谢振华看着不错，陈永贵也能通过。

陈永贵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世人皆知。当年老陈支持刘格平，支持红总站，刘灏就对老陈恼火的很。只是人家是大寨一杆旗，他嘴上不敢说半个反字。如今这个老陈又毁了他做官的前途，刘灏对老陈可就更加恼火了。面对老陈的头上顶着“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字的最高指示，他只能把气憋在心里。于是灰了心，再想一想，做个古交区的团委书记有啥盼头？正好这一年教育系统要复课，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占领上层建筑成了热门话题。北京大学来山西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到古交，让刘灏心中那个早已熄灭了的上学梦，又如死灰复燃。他想起了1966年“文革”前老师让他报考哈军工的情景，想起了自己早就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理想。革命了几年，造反了几年，那情景，那理想，似乎早就忘掉了。现在大学又要开办了，消逝的理想再次复苏。自己都23岁了，说小，是不小了，说大，也还不算大。想一想读高中时的成绩还满不错，做官的路叫老陈给断了，莫非他还能断了我去当工农兵学员，去北京大学读书的路？拿定了主意，刘灏就去报名。面试，口试加上简单的笔试，北京大学来招生的老师对他说：“你符合条件，全合格。”虽然五年没有摸过课本，但他的学习功底还是扎

实的,何况,那时招收工农兵学员,和1977年以后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是两回事,主要不是看成绩而是看政治条件。刘灏政治上是古交区团委书记,家庭又是革命军人出身,政审方面一点也没问题。

办好了这件事,他得去和谢振华司令说一声。

“谢司令员,我要上北京大学去了。”不是请示,而是告别。在炮轰刘格平的战斗中,刘灏自认为自己的兵团和69军是并肩作战,他刘司令不能忘了谢司令。

谁知谢振华听完刘灏的话,却把脑袋一摇,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你就甭去上北京大学了,要上,就上山西大学吧。”

刘灏急了,山西大学怎么能和北京大学比呢?他马上表态:“北大来招生的老师都看上我了,我不上山大。”

“不是让你去当山大的学生,我说是让你去山大当团委会的书记嘛。”

这回轮到刘灏摇头了,他陈述了好一阵子理由,无非是想去北大上学,无非是山西大学派性斗争复杂,自个不想去山西大学做官。

谢振华笑了:“你不想去山大,我看就先去太原市北郊区,当个区委副书记吧!年轻人,得一步一步地上嘛,好不好?”

学而优则仕。中国人崇尚权力,上大学还不是为了以后的前程?眼下不用去上大学就有好前程,刘灏怎么能不动心?再说,想去上大学,也是因为老陈坏了他当团省委书记的好事,才没办法去寻办法的呀!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刘灏要坚持去北大读书,可能最后的命运会掌握在自个的手中。但他陷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氛围,未能跳出所处具体时代的诱惑,不可能超脱出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维,也不可能不被做官的前程引诱。他点头了。也就是说,刘灏如“文革”初始把自个的命运与袁振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样,现在,他又把自己的命运,和正在山西主政的第一把手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然而,在刘灏的感觉中,谢振华和袁振这两位老革命与他的交往大有不同之处。按他的理解,袁振需要他,主要是需要他身后的兵团这个群众组织。谢振华呢?人家身后有整整一个69军和一个山西省军区呢,还能把个群众组织放在眼里?何况,现在都倒旗了,没有群众组织了,人家关怀他,是希望他脱离派性,能成为一个好的革命接班人。还有一点,从袁振嘴里,他先是能听到省委卫、王、王的事情,他也就是因此而炮轰“黑省委”的,后来还能听到刘格平呀张日清呀那些人的事。可谢振华不同,谢振华口口声声总把他当成军人的子弟,年轻的娃娃,只有当面批评他和帮助他的话,从来没有明示和暗示他为自个去做点什么事。

绝不是谢振华格外垂爱刘灏,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在成功地制止了两派武斗,解体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安稳了全省局面,并解放了原省委的主要领导王谦、王大任等一大批老干部,并将他们一一安排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之后,他还要按照那个时代党的政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造反派领导们。杨承孝枪毙了,汤建中判刑了,山西三大派的其他领导们,全部被谢振华安排了工作。有一些是原先省委、市委的青年干部。1971年,谢振华先从他们中各自选出一名,以高于他们“文革”前的职务安排了他们。这三人是兵团观点的刘少卿,被任命为省机械厅的副厅长;红联站观点的李辅,被任命为省委调研室副主任;红总站观点的吴春久,被任命为省科委的副主任。再往后,谢振华又将那些经过学习班的斗私批修,经过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后的原兵团、红联站、红总站的领导们,也分别作了安排。

1973年4月12日,当年的“刘司令”从古交区团委书记的任上,升到了太原市北郊区走马上任。先当区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至此,他可以算做一个很正规的副七品官了。

与兵团司令刘灏一样被谢振华安排了的,还有红联站勤务组的

第一把手段立生,以及红总站的领导、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黄锐庵。段立生也是前任太原市清徐县的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曾是刘灏、段立生死对头的黄锐庵,也和他俩一样,前任太原市北城区的区革委副主任,接着又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无论从当时还是事后来看,谢振华在枪毙了杨承孝,关押了汤建中以后,又能如此同样安排了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按当时党中央要求支左解放军“要一碗水端平”的说法,他的这一碗水还确实端的挺平。

【10】十大召开前后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官场邂逅

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到1973年8月24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那架三叉戟坠地后,引发的党内心灵地震和国民心灵地震,一直没有平息。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该通知附有《“571工程”纪要》。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中央在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会上下发并由周恩来总理宣讲了一份重要文件,即毛泽东主席于1966年7月8日在韶山滴水洞中写给江青的信。

本书不讨论这两份中央文件的真伪。本书只想说明,上面第一份文件,旨在证明林彪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妄图谋害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而第二份文件,旨在说明毛泽东早在“文革”刚刚开始,就看穿了林彪的本性,真是英明、伟大、料事如神。高层在用这两个文件修复全党、全民心灵,重塑伟大领袖英明、伟大形象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组织工作,九大上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出事了,唯有赶紧召开

十大,修改党章,才能从党章上把林彪取下来。另外,林彪空的位子,必须有人补上。

但是,与1969年的九大相比,十大召开前后,在民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政治狂热。老百姓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早就伴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失去了关注,当对报纸上依旧鼓吹的这些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心存怀疑又不能说出口时,更多的平民百姓们,关注的则是有关自身生活的那些文件了。

下面,是《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关于1972年春节凭证商品供应的通知》,这样的文件,常被商店抄成大字报贴出,任围观的老百姓抄录。

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

关于1972年春节凭证商品供应的通知

各有关公司和经营单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我市商业战线形势也越来越好,目前七二年春节即将来临,遵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使广大工农兵群众欢度节日,根据现有货源,经研究,对七二年春节凭证供应商品安排如下:

一:凭证商品:

1:猪肉。凭居民付(应为副。原件如此,下同)食证52号供一斤。53号半斤。(回民供应同等羊肉)如购熟制品,一斤号可买二斤,半斤号可买一斤。

2:羊肉。凭居民付食证54号可买半斤。

3:食糖。凭居民付食证55号供应半斤;不论红、白糖和冰糖,有什(应为啥。原件如此。)供什。

4:粉条。凭居民付食证56号供应一斤。

5:豆腐。凭居民付食证 57 号供应一斤。

6:肥皂。凭居民付食证 58 号供应一块。

7:洗衣粉。凭居民付食证 59 号供应一袋。

二:凭本(按:指政府发给每户人家的购物本)登记和限量供应

1:鱼。72 年元旦公布供应的,凡未购者继续凭本登记供应。

2:奶粉。凡一岁以下小儿,凭户口和购物本登记供应一斤,购物时应认真登记。

3:花椒、大料、海米、虾皮等分包出售。花椒两角分一包,大料一角分一包,海米、紫菜、虾皮包成一、二、三角小包出售,每人次供一包。

三:以上各项商品供应,时间从二月一日开始。希各经营单位广大职工同志,要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严格执行各项手续制度,应分包的分包,要登记必须登记,不得采取自由主义,更不得违法乱纪,以利做好市场供应。

1972 年 1 月 28 日(章)

物质生活如此,精神生活呢?

省城太原的女人们,开始编网兜、编彩色塑料花门帘,男人们则开始想方设法弄点五合板、纤维板,琢磨着打个立柜、做套简易沙发,让家里变得稍稍舒适一点。省城太原,也出现了自打“文革”开始后,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先由南郊区发端,成立了南郊区剧团,接着,北郊区也积极网罗散落在各地的艺人,成立了北郊区剧团。虽然只是排演样板戏和一些概念化、口号化的歌舞,但下乡演出后,给老百姓自我总结的那种“白天地头,晚上炕头,除了斗(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指夫妻性事)”的平淡生活,总算带来了一点点文艺色彩。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为艺术家们制定的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最高领袖需要歌颂“文革”的一片“大好形势”,被喻为“文化革命

旗手”的江青,要推广她的样板戏和“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文艺创作经验。“文革”初打倒刘、邓,要文艺先行,如今狠批林彪,也要文艺先行。太原市在1973年的4月,于侯家巷招待所召开了“文革”中的文艺创作会,虽然学习的重点是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江青的那套文艺创作三突出的歪理,但还是让60余名到会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可以创作的冲动。然而,极左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依旧是创作的政治标准,以参加这次会议的省城60余名年轻人而论,在接受这种观念和理论灌输后,他们创作的禁锢和束缚更加强化。当文学的新时期到来后,重新起跑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月30日,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毛



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常委一班人
右一为区委副书记刘灏,右四为区委书记赵治业

泽东要重用“文革”之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让王洪文成了党中央第三把手。到了1974年的年底，毛泽东又将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邓小平，补进了政治局委员。十大以后的中央，进入政坛的文革派和重新掌权的走资派，就这样再次邂逅了。

在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仿而效之，以王谦、王大任为代表的一批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和以刘灏、段立生为代表的一些原兵团、原红联站的领袖，也在谢振华的安排下，以不同的职务，进入了山西的官场。

初做了太原市北郊区的副七品之后，刘灏十分努力地工作。他不贪，不占，不好色，也不弄权。父母身为军队干部，刘灏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他的母亲从北京来太原看望儿子，给刘灏带来了父亲的嘱咐和母亲的关爱。他们希望儿子好好工作，既然作了基层领导，就坚决不能搞特权，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再有派性，要按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一点刘灏也确实做到了。作为区委领导，刘灏当时一个月挣36块5毛钱。不但在常委班子里最低，就是与机关普通干部相比，也是在最低的档次上。常委会上有人提议给他点补贴，从区委书记到区革委主任和全体常委，一致表示应该。可刘灏发言了，坚决不要这份“特殊”。刘灏的妻子是他五中时的同学，人称才女，能写会画，在五中的墙报上画毛主席像，那是全校有了名的。刘灏将妻子从城里调到北郊安了家，他一个副书记，按说对自个的妻子适当安排一下并不过份。组织部长就对刘灏说过，机关的部门任他为妻子挑选。可刘灏却将妻子安排在区委印刷厂做了排字工，他对组织部长说自己的妻子是工人，绝不能违规安排。

北郊区不是真空地带，也有曾经参加过兵团一派的干部，希望和他套套派性关系。但是，在对这些干部的使用上，他从不在常委会上与集体的决议唱反调。而有时候，当一些受难的老干部的子女找到他时，他却愿意伸出援手相助，甚至到了独断专行的地步。毛泽东的秘



曾自女士(右一)退休后赴太原宴请刘灏(右二),郭诚文(左二)孙涛(左一)作陪

书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含冤而死,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的第一批受难者。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的女儿曾自,被打发到吉林省最北端一个叫莫莫格的蒙、汉两族共居的村落插队,曾自的母亲董边原籍山西忻州,其时也被打成反革命被专政。曾自通过在太原北郊区工作的朋友郭诚文,想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太原北郊区。郭诚文去找分管知青的区委副书记刘灏,请示能不能开个绿灯。刘灏一口答应。有常委听说了此事,给刘灏吹风,说给这种人物的子女办事,风险太大。刘灏当即回答说:“我老子也当过走资派被批斗过,老干部的子女难道就该受制?”田家英的姑娘由吉林边疆转到了太原北郊区西岗村,后来,刘灏又把她分配到迎新街工商银行工作。这类事情,还可举出许多。刘灏“文革”初期造过省委卫、王、王的反,也保过一批老干部。他是军队老干部的后代,对田家英这样的受难者从骨子里充满同情。

刘灏当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想到会做了官。现在他成了基层一名党的领导,认定只要不怀私

心干好工作,大的方向上继续紧跟伟大领袖,在山西的具体问题上,紧跟毛主席派来的谢振华将军,自个还会一步一步地进步的。他认定区区太原市北郊区,不过是他政治生命中的又一道起跑线。这种想法,到太原清徐县做官的段立生有,到太原北城区做官的黄锐庵也有。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们留在了山西的官场上,最终,不得不去承受他们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第十章

穿上军装的江青炮轰谢振华，山西派斗烽烟再度燃起。山西的批邓被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推向了高潮。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

【1】江青炮轰谢振华

刘灏绝没有想到，曾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谢振华，在山西的政坛上，却会突然遭受到一种无法言明的磨难。

1974年1月1日，按“文革”中的惯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元旦献词》提出“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一伙将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掀起了高潮。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山西的一台新编晋剧被省委送到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汇报演出。此剧名叫《三上桃峰》。无论是编剧，演员，还是山西省分管文化的有关领导，恐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台凝聚着他们心血，一心按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提出的“三突出”文艺创作模式创作，原本想歌颂基层人民群众共产主义风格的现代晋剧，会被江青“看中”，进而用此戏作为突破口，将靶子锁定了谢振华，并企图将周恩来总理作为谢振华的黑后台，一路揪下去。

《三上桃峰》故事很简单。有一个叫做杏岭的大队，还有一个叫做桃峰的大队。杏岭的饲养员将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先批评饲养员，又两上桃峰大队赔礼，但桃峰大队绝不肯收下对方的退款。后来杏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三上桃峰大队，送一匹大红马，两个大队在共产主义风格中，更加团结战斗了。

这台戏，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编成的。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为《一匹马》。介绍河北抚宁县大刘庄第二生产队有匹病马叫菊花青，被队干部卖给了义庄大队桑园第二生产队。事成后，他们又买回一匹大白马。大刘庄第二生产队的干部们，后来反省此事，认为欺骗了对方，几次去买马的村子想赎回菊花青。买马的一开始以为对方卖后悔了，坚决不同意他们赎回菊花青，不料菊花青果然病死。闻听此事，卖马的牵上大白马要给对方作为赔偿，对方为他们精神所感，坚决不要这种赔偿。这次，县长从县运输站借来一匹枣红马，亲自送到桑园第二生产队，让他们使用，并对大刘庄第二生产队的干部们知错改错的精神作了表扬。最早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中路梆子戏的，是山西晋中青年晋剧团的编剧许石青。当时戏名叫《桃李争春》，剧中的两个村子，一个设计成桃园，一个设计成李庄。省文化厅要抓戏剧创作，看中了这出戏，派省戏研室的杨孟衡帮许石青一道创作，又有了《三下桃园》的本子。这都是“文革”前的事儿了。“文革”中，吕梁地区要搞戏剧调演，领导们想把这出戏加工成地区的品牌，就抽调当地工作的摘帽右派李旦初加工修改。原先晋中的剧团演这出戏，晋中是平川，买下病马的村子，可以叫桃园。现在吕梁的剧团演，吕梁是山区，那就改叫桃峰吧。于是戏名就成了《三上桃峰》。

1974年文化部要搞华北地区戏剧汇演，山西省选送的，就是由省晋剧团演出的《三上桃峰》，还是那个故事，不过，省里戏剧界的领导和名人们，都参加了对这出戏的加工，全都浇注了心血。早在1973年

的年底，文化部的于会泳部长，就派出几位文化部的专家，来太原看过这出戏。他们都表示，这出戏不错，可以选到北京参加调演。省委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王大任专门在省委常委会上讲过文化部专家们的意见，省常委会一致通过，这出戏可以参加华北地区戏剧汇演，希望在华北汇演中出成绩。

这出戏赴京演出前，陈永贵和李顺达陪同前来山西指导工作的商业部副部长和前来山西交流经验的湖北省的客人们，一道在太原山西大剧院观看了这出戏。陈永贵说这台戏好。李顺达表示，要让平顺县的县剧团移植上演这出好戏。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三上桃峰》的编创人员们，能编出一台歌颂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爱心和良知的戏来，让人耳目一新，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从农村基层走出来的劳模，对这台戏的叫好和欣赏，那一定是真心的。

然而，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为初澜的文章，题为《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该剧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人民日报》尚未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一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中，就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初澜是当时国务院文化部写作班子的化名，而其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则是江青一伙的死党，也正是此人在江青授意下，炮制出了这篇文章。

没理也要有理，是“文革”大批判的特色。江青怎么就能把《三上桃峰》这出戏，和刘少奇连上呢？因为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一个叫桃园的村子里蹲过点，而且创造了一个“桃园经验”。虽然那个《一匹马》的故事，与桃园这个村子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全没有一点关系，但经江青一连，这关系可就大了，初澜的文章一下子上了纲、定了性，《三上桃峰》成了被全国批判

的大毒草。

身经百战的谢振华将军,大约并没有过分看重《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有人批判《三上桃峰》,换一台戏不就得了?虽然是省委第一书记,但谢振华是南方人,恐怕连山西梆子的那种梆子唱腔也听不明白。在后来揭批谢振华时,有人说他审查过这戏,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戏。即便就是看过吧,有私心的饲养员卖出去一匹病马,两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都怕为此伤害了对方,最后的结局,是买下病马的一方,没有要求对方退钱,卖出病马的一方,又给对方送去一匹大红马,谢振华能说这故事有啥不好呀?何况,这出戏所以能赴京演出,是在文化部派出的审查人员来到太原,在看过这出戏并一再表示了肯定意见后,由陪同他们的山西省委分管文教的书记王大任向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经省委常委会一致通过,这出戏才得以赴京的。现在,既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这出戏了,山西省委总得有个态度。3月1日的《山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初澜的这篇文章,谢



200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搀扶着90高龄的谢振华将军步入主席台。

振华是省委第一书记,认为如此表态和行动,也就行了。至于山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更不会想到《人民日报》刊出一篇文章批判这出戏,将会导致刚刚平稳不久的山西,又出现了一场“大地震”。

这出戏的编剧有好几位,谁是原创,谁是后来在剧本不断修改过程中加进来的,本书无意去详细考证,因为,“文革”中盛行创作组,是不要什么知识产权的。但无论是许石青、杨孟衡,还是李旦初,他们三人,与省委书记谢振华,既不相识,彼此也从没有见过面、说过话,却是实情。可怜他们在其后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硬让他们交出谢振华这个黑后台时,善于编戏的他们,却实在编不出自个以及《三上桃峰》这出戏与谢振华的任何瓜葛来。李旦初先生在“四人帮”被打倒后,调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并在山西大学退休。直到2004年的夏天,李旦初的儿子张华夏(随母姓)在北京创业成功,父亲赴京看望儿子,才在儿子的陪同下,去看望了自己的所谓“后台”谢振华将军。虽是第一回见面,但回顾往事,一文一武两位老人,均是唏嘘不止。

尽管于会泳在批判《三上桃峰》的简报上,已经点了谢振华的名,还指出他就是要用这台戏给刘少奇翻案,是一贯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后台。但谢振华懒得去和于会泳打笔墨官司。不就是一台戏吗?你们给一台戏扣上了大帽子,撤回来不演不就行了?山西省委当即做出决定,撤回这台戏来,换一台歌舞进京。然而,令谢振华没想到是,江青会直接跳出来,公开与他叫阵了。

1974年3月8日,在首都二七剧场内,山西《三上桃峰》全体演职员奉命演出样板戏《龙江颂》,江青和几位中央首长观看。演员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赎罪式的演出。演出前,陈永贵专门来到后台接见了演员们,告诉大家,说今晚来了不少中央领导看戏,有江青同志、纪登奎同志、陈锡联同志和吴德同志,还有我也来啦!陈永贵又表态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责任在领导,没有演员的责任。又说江青同志讲

啦，一定要保护好演员。最后，陈永贵希望演员们演好《龙江颂》这台样板戏。本来到北京是演《三上桃峰》的，以前省里的领导说《三上桃峰》是出好戏，陈永贵这样的中央领导和文化部的专家们也说是出好戏，现在突然间，《三上桃峰》就成了大毒草，演员们的心情可想而知。谁也没想到演出完毕后，江青带着陈永贵提到的那几位中央首长，在一间贵宾间接见演员时，开始大骂山西送来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和王光美翻案。理由呢？是没有理由的理由：当年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时，他的老婆王光美三进桃园大队，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今天你们山西又搞出个《三上桃峰》，居心何在？一贯口出狂言，没理也有理的江青，其实批这出戏只是个借口，她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再次指向军队。江青那天身穿一身绿军装，当着其他几位中央领导的面，对着山西被接见的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狂呼了三声“炮轰谢振华”的口号，并特意解释说：“我今天穿了这身军装，就是为了来炮轰谢振华的！听说谢振华自称是军队的人，言外之意，我们就是老百姓，不能批判他，我今天就是带头炮轰他，你们也要起来同他斗争。”

紧接着，身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下令谢振华带他的一班人进京向党中央汇报和检讨“问题”。

按当时说法，江青不但是毛主席的夫人和亲密战友，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革旗手”，她身穿军装，在北京带头炮轰身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谢振华，山西能不炸窝吗？

3月15日，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山西赴京的省委常委谢振华、王谦、王体、王大任、李顺达、刘世洪、王庭栋、王银娥、曹中南等人，来到北京西苑旅社，这里是山西晋剧院赴京演出人员的驻地。中央首长陈永贵和一行山西省委领导，在这里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谢振华靠边站了。王谦主持了这次隆重的接见。陈永贵做了重要讲话。俩人说的核心话题，都是要根据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炮轰谢振华！陈永贵最

后大声强调：江青同志炮轰谢振华的讲话，我们可要好好地传达哩！等我们回去以后，还要具体部署，展开大批判。

【2】谢振华曾闯了一个“乱子”

谢振华与陈永贵不合拍，是有缘由的。

1967年陈永贵杀下虎头山，联络李顺达、解悦等各路劳模，成为支持刘格平向山西省委卫、王、王夺权的生力军。刘格平掌权后，陈永贵也进入山西的最高领导层，成为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奉党中央之命，在山西负责支左，对陈永贵是很支持的。特别是在陈永贵被困平遥古城之后，出兵解救了陈永贵，陈永贵事后对谢振华说了许多感恩的话。部队作家欧阳青在其《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中，如此描述了谢振华与陈永贵渐渐产生了认识分歧的过程：“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形‘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阳泉市支左的部队首长，发现了陈永贵在日寇占领阳泉期间，曾参加过日寇的特务组织兴亚会，当过日寇情报员的历史问题，并将这事报告了谢振华，陈、谢二人之间，便有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事件始末》一节中，做详细介绍，只要读者继续读下去，到那一节自会明白其中过程。

现在要说的，是谢振华对农业学大寨的认识，和对大寨精神的评价。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这是一个什么乱子呢？

刘格平倒台，谢振华主政山西后，如何农业学大寨，是他绝对必

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农业学大寨，是当时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定下的一项国策，大寨这杆旗就在山西昔阳县的虎头山上，谢振华首先在人力物力上，坚决支持大寨。1967年春天，大寨要在虎头山上修一座蓄水池，谢振华当即派出400多人的队伍，去大寨参加这个工程。400多个精壮的解放军战士，想想吧，那是何等强大的劳动力！1968年初夏，大寨又遭冰雹之灾，谢振华又命令驻在晋中祁县的69军某团，派出7个连的兵力，乘车火速赶到大寨，帮大寨人把被打倒的庄稼补种好。谢振华明白，陈永贵无论做报告和讲话，所提到的大寨人战天斗地夺取大丰收的那些话背后，如果缺失了军队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对大寨做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谢振华没说的，支持大寨这杆旗，他认为是一种责任。到了1971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谢振华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曹中南、陈永贵、张平化当选为省委书记之后，对陈永贵到处宣扬的大寨精神和某些做法，谢振华就有了不同认识。如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取消农村的集市贸易，在群众中搞大批大斗，这种大寨精神是否在全省推广？谢振华就持不同意见。陈永贵说大寨人是大公无私，谢振华却公开讲了，说大寨人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是谢振华和陈永贵在思想上产生的矛盾。在谢振华主政时，谢振华一边讲农业学大寨，一边支持和宣传李顺达在西沟村因地制宜学大寨的发展模式。如此而为，他就是希望用西沟的做法，纠正大寨那种极左的所谓经验。有一个时期，《山西日报》领导人为了体现省委第一书记的这个思路，每发一篇大寨的经验，必发一篇西沟因地制宜学大寨的做法。

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山西高层皆知，民间更有传闻，连一国总理周恩来也晓得了。

1971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重访山西的美国友人韩丁先生时，特意说到了谢振华和陈永贵的这个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

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让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他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期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很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嘛!”

周恩来总理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在那个年代,也就是周恩来总理敢说这种话。

谢振华主政山西后,在1972年1月召开的省委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虽然会上也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但在这个纪要中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基本上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应相对稳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能调动大多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坚决执行,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应该坚决落实。会议还批评了“左”比“右”好,“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等错误认识。可以说,这是谢振华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学大寨运动中极错左思潮的一种努力。当时,陈永贵主政昔阳,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的自留地全部收回,农民的副业,全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批资本主义,才能大干社会主义”等极左的做法被当作了大寨经

验到处推广。但当时陈永贵的职务，毕竟还在谢振华之下，对谢振华这种农村新经济政策，恐怕是无可奈何的。虽然自打跟上刘格平扯旗造反后，一步步已贵为省委书记，可还得在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的领导下工作呀！

谢振华呢，他是红军出身的共和国将军，而且是曾经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共和国将军。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受周恩来总理安排，先到山西支左，又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之职。在江青发起炮轰谢振华以后，在山西开始批判谢振华的各种炮声中，有人曾批判谢振华对永贵同志不尊重。剔除这号批判者想以此讨好陈永贵的成分，批判者说的事实一定是存在过的。试想，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一位省委第一书记，一位对大寨当时那种极左做法，有深刻的不同看法的党内高层的明白人，一位深知陈永贵历史污点，亲自目睹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种种表现的军队支左的高级首长，尽管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要使用陈永贵，尽管陈永贵步步高升，不做佞臣而做良将的谢振华，他能对陈永贵尊重起来吗？

到了1974年，毛泽东主席开始批林批孔，江青一伙人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直到《三上桃峰》成了一根导火索，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进而将谢振华定成了反“文革”、反大寨的靶子，陈永贵成为主宰山西命运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对谢振华下手之狠，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说说王谦。当初陈永贵追随刘格平起来造山西省委的反时，王谦是当时山西省委的第二把手。刘格平夺权成功后，王谦被投入大狱，受尽迫害。他和他的同仁们，曾被揪到昔阳，遭受过陈永贵率领下的造反派们的残酷批斗。那时，他与陈永贵分明是两个营垒中的人物。谢振华主政山西后，按党中央部署开始“解放老干部”，王谦被恢复工作，堂堂当年的山西省省长，被安排到太原阳曲县担任革委会主

任。1971年,山西省筹备召开第三届党代会,谢振华向党中央举荐了原省委常委王任进省委领导班子,却没有举荐王谦。原因何在?不得而知。省党的核心小组将名单报中央审批,周恩来总理提名王谦也要进省委领导班子。原因是王谦在五十年代任长治地委书记时,主持试办了一批农业合作社,当时受到了刘少奇、邓子恢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指责,认为办得太快,太早,不到时机。而毛泽东主席却坚定不移地支持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大办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这段历史周恩来十分了解,王谦也就由此再次进入了山西省委最高层。公允地看,王谦在重新工作后,在山西的派性斗争中,并无什么派性,在谢振华和陈永贵之间,最初也没有特别的倾向。更没有如陈永贵那样对一派组织表示过特别的支持。在《三上桃峰》这出戏上,王谦也和陈永贵一样,看戏时,并没有看出什么为刘少奇翻案的所谓问题来。

当江青提出“炮轰谢振华”的口号后,特别是中央明确了陈永贵在山西的地位后,陈永贵选择王谦做为他在山西施政的操盘手,王谦也就卷进了山西这场批谢的斗争,随着陈永贵的指挥棒,具体推动了在山西的新一轮整人大战。“文革”中,整人和被人整,并不是整齐划一,一成不变,革命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转换着,由上而下地折腾着。

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批谢,拉开了山西这次大折腾的序幕。

【3】中央政治局集体批评谢振华

山西省委12名常委,在谢振华率领下赴京,接受党中央的批评和教育。由个别中央政治局领导参加的小会,开了几次后,3月1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赴京的山西省委全体常委,早早等在

厅内,准备接受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批评。晚8时半,中央政治局14名首长来到会场,他们是当时毛泽东麾下的一班重臣。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十三人先到,分别就座。周恩来总理未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迟迟来到东大厅。这个中央政治局对谢振华的批评教育会,从晚上8时半开始,直至深夜12时20分才开完。

会议由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待。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批评谢振华的会议上,中央首长们的讲话精神,后来在山西科级以上广大党员干部中做过详细传达。现在,让我们根据当时的传达,将这次重要会议情况复原如下。

晚8时半,周恩来总理还未到。

王洪文神态严肃,宣布开会:不等了,现在开会。请先念、登奎同志先讲吧。

李先念:请登奎同志先讲。

纪登奎:请永贵同志先讲。

此时的陈永贵,已经不是当初追随刘格平,大造山西黑省委的反之,出任山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时的陈永贵了;也不是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领导下,担任省委常委、省书记的陈永贵了。此时的陈永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山西出了《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案后,在政治局委员中,一直由他出面处理山西的问题。纪登奎请他先讲,老陈也不客气,就第一个发言,矛头直指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和省委书记曹中南:……谢、曹二人检讨三四次了,大家一致认为还不够深刻呀。回去以后,山西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揭猛批他们的问题。我担心的是,谢、曹的检查怎么才能更深刻一些。

陈永贵居高临下地批了一顿谢振华和曹中南,谢、曹二人却一声

不吭,并不搭理他。陈永贵于是又转换了角度,把自个也摆了进去,一改刚才的凌厉语调,用很谦恭的话对其他政治局委员说:我看就请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指示吧。

张春桥开口了:我提议谢振华同志先讲一讲。

谢振华便发言,先讲了一些事情的过程,然后开始自我批评:同志们在会上揭发了我在山西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我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抓紧大事,在批林整风中,没有抓住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批了极左思潮,批了个性,整了群众,走偏了大方向……

王洪文打断了谢振华的话,开始上纲上线地定调子了:你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在批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把矛头指向群众的问题,实质上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谢振华解释:最近以来,在文教战线上出现了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与样板戏唱对台戏的大毒草《三上桃峰》。这戏在山西演了好几年,这次又拿到北京演出,江青同志看后,被中央制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谢振华分明是就事论事,并不认可王洪文定下的调子。

江青打断谢振华说:你们那个《三上桃峰》我并没有看过。

谢振华:江青同志指示晋剧院炮轰谢振华。

江青接着往下说:我们那次去是为了保护演员。你是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们那天去了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我们去的本身就是炮轰你。

谢振华表态:我完全拥护炮轰我,实际上是对我很大的教育,而且也是保护演员。

江青:但是,对你们省文化局的高级负责人可不能保护,是好几个人,名字我叫不出来,人名都是两个字的。(孙涛按:当时山西省文

化局的领导有李蒙、卢梦、贾克等)

谢振华继续向中央检讨,说自个没有抓好路线斗争,没有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张春桥这位备受伟大领袖赞赏的理论家上阵了:谢振华同志,你不能老用不抓大事,不抓路线这句话。我就不赞成你这个说法。你实际上是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路线,用资产阶级的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这怎么能说是不抓路线、不抓意识形态,不抓文艺呢?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连新疆都演了。

江青立即唱和:整个西北都演了,河北也演了。

张春桥继续开火:你大张旗鼓地批极左思潮,而且抓得很紧,怎么能说你不抓大事呢?

这是,已经到了8时50分,周恩来赶到了会场。

江青接着批判:我完全同意春桥同志讲的,我看你不是不抓,而是狠抓。我看到一个材料揭发你,你说演革命样板戏,请我我也不去,你说过没有?

谢振华硬硬地回应:我没有那么说。

周恩来问谢振华:你不愿意看样板戏,有吗?

谢振华当即回答:样板戏我都看过。

江青越扯越远:还有一种谬论说,你们只有八个样板戏,实际上已经有二十多个了嘛!他们说八个不成样子,要一个一个打掉,那就让帝王将相、牛鬼蛇神上台好了!

江青扯完了,谢振华继续检讨:……我的错误是没有团结好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在一打三反、清队、整党、清查5·16当中,使一部分不同观点的群众受到了排斥和打击。特别是我有两次讲话都非常错误。(孙涛按:“文革”中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主席的决策。既要去支持左

派,必然要对群众组织有一种界定。谢振华在支左中讲过“一派基本正确,一派基本错误”的话)有些地方搞了一点扩大化,使一部分群众受到了打击。

江青趁势追问:你是哪一年到山西的?

谢振华:1967年初。

江青:晋东南事件你在吗?(孙涛注:指1868年元月16日傍晚,长治红字号伏击联字号的大武斗。联字号的李顺达等一百余名核心人物被红字号活捉,李顺达被打伤、扣押。之后,谢振华派部队去长治制止武斗)

谢振华:在。

江青:当时我很奇怪,就是有过那么一次遭遇战。当时我在大会堂开完会,忽然进来很多人,就是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他们,还有一个总参的,另一个是作战部的,可能很坏,叫李静。一进去就铺上地图,就要到晋东南开枪,我当时听了很紧张。我没有走,郑维山坐到我对面,要开枪权,要扫荡权。我说不能开枪,要想办法宣传,可以挖坑道,可以开装甲车去宣传,队伍可以站在后面嘛,就是要把两派里的坏人清出来,但是对两派群众要保护。人民解放军只有义务保护人民,没有权力开枪对待人民。他们硬要开枪权。这是哪一年?我记得,曹中南同志你参加了。

曹中南回答:是1968年2月。

江青:你们完全站错了,不是保护人民,而是镇压人民,是开枪,是扫荡,一贯下来的。那次我是坚决顶回去了。你们把广大指战员带到群众的对立面,是军阀。

谢振华辩解说:我们没有按郑维山的办。

江青不容谢振华辩解:你还是那么办了。你现在还是按原来的做法,镇压群众。你要把来龙去脉的根源挖一挖,说清楚。听说你还和陈

伯达有过华北之行？

谢振华：我只和他到过内蒙。

王洪文又来狠的了，大声责问谢振华：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

谢振华也大声说：我没有后台。

江青继续发难：我为什么要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

谢振华又冷冷地回敬说：我没有后台。

王洪文和江青所迫的“后台”，无非是指周恩来和邓小平。

这时的周恩来总理一声不吭，邓小平也始终抽烟不语。

王洪文大怒：你谢振华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

江青也发火了：你在山西支一派，压一派，搞派性，还给林彪修行宫，跟上陈伯达跑内蒙，这是你的罪行！

谢振华反驳说：为林彪修行宫是中央军委的秘密工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去内蒙是参加华北地区协作会议，和陈伯达没有关系。我派部队在平遥救过被围困的陈永贵，在晋东南长治救过被围困的李顺达，这不是搞派性。

谢振华这是将王洪文和江青的批判顶了回去。

汪东兴开始批谢振华了：学习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你们山西为什么不学？这是道路、路线问题。

谢振华：我们没有学好。

汪东兴：不是没有学好，是根本不学，甚至抵制。

王洪文逼问：是没有好好学？还是不学？

谢振华：只学表面，没学实质。

王洪文：不学大寨路线你学什么？

谢振华不接话，似乎不屑搭理。

华国锋发言了：谢振华你的态度不好。学大寨在山西遇到了阻力，这个问题你是清清楚楚的。据我了解，有些人反对大寨，《山西日报》登一篇大寨就要登一篇西沟。我不是说李顺达同志的好经验不可以登，但是在山西要登大寨就必须登西沟，这是一种什么指导思想？

谢振华直率地回答：搞平衡。

华国锋继续发言：毛主席树立了大寨红旗，你们山西不敢不学，就把大寨和西沟搞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全国各地都请陈永贵同志和大寨同志去做报告，但在山西就推不开，学不好。你不能很好地认识自个的错误，群众不会满意，不会通过。我担心你这样回去，会把山西搞成什么样子？我担心山西可能引起反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谢振华：我的错误很严重，回去认真检查改正错误。现在写了个初步检查。

汪东兴：听说你检查以后又推翻了。

王洪文调门老大：这个检查能不能通过，要看山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如何！

汪东兴：他不是检查，完全是翻案。

王洪文又逼了上来：你出尔反尔，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全推了，将来山西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又要要把责任推到陈永贵身上了。

江青：你是省委第一书记，应该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我有错误，应该由我负责。

江青：我希望在座的山西同志，如果还有两派的话，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孙涛注：一个敌字，要给省委第一书记定性了）只要你们都团结起来，只留谢振华一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也塌不下来！

王洪文：你现在这种态度，能把山西问题解决好吗？关键在于你谢振华的态度。我觉得山西会出问题，陈永贵同志的担心有道理。

谢振华赌气了：我回去，人家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周恩来当即纠正：批评什么接受什么，这话没有原则。是你的可以承认嘛。不是你的也接受，那怎么行呢？

纪登奎又开始揭发：你因为一张照片就骂人家《山西日报》记者。

王洪文：就处理人家记者。

纪登奎：嫌他的照片小。……王谦你把登照片的情况谈一谈。

王谦：登照片是曹中南同志的事，因为照片只有半面，回去就开常委会，把《山西日报》、新华社的记者批评了。……通知接待墨西哥总统时，外交部决定以陈永贵为主，谢、曹有意见，问为什么这样决定？结果又问了外交部，外交部批评了。

周恩来问曹中南：曹中南同志，有这回事吗？

曹中南应答：有。

周恩来批评曹中南：太庸俗了吧。新华社记者有权拍照片，你把人家处分了？

曹中南：批评了。

周恩来：批评也不应该。

张春桥：谢振华同志，你估计回去山西形势如何？你准备让山西向哪能个方向发展？在中央面前讲，我们有些不放心了。

谢振华：回去以后，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做好工作，特别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周恩来：山西在座的十二位，在家的四位，大家都不要沾染资产阶级派性，要站在党性立场上，这样才能团结，共同对敌。……曹中南你是怎么想的？

曹中南：我有许多严重错误，党指挥枪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陈永贵又开始揭发谢振华了：北方农业会议，报告上写了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让陈伯达一笔勾掉了。让陈修改报告，是谢振华送的。

李先念：谢振华同志，你说你是批了林彪的，批了什么东西？

谢振华：我过去受过林彪迫害。三十年前他要开除我的党籍，是毛主席保护了我。主席写了那篇《星火燎原》的一封信，油印件我一直保存着。我是批林的……

江青：我想起一件事，给谢振华说几句公道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我到过他那个组。谢振华给了我那封信，是《星火燎原》。是毛主席批判林彪的，上面还有谢振华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油印本子。我交给汪东兴保存这个事情可以说，你是知道林彪的。至于以后你是真批林还是假批林？我就不了解了。你谢振华老虎屁股摸不得，大家说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说你是土皇帝！你不挖一挖根子，很难脱胎换骨。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你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我和你是同学，你是大队长，凶得很呢！

谢振华顶了回去：我在马列学院学习过，和你是一个小组的，不是什么大队长。

王洪文又把谢振华往林彪线上扯：问题是真批林彪还是假批林彪。

江青：林彪在五台山修行宫，你知道吗？

谢振华：我不知道。913以后才知道，去年才去看了一次。

江青质问：你不知道？那怎么修的？

谢振华：郑维山直接派63军一个团去修的。63军对我保密。

江青：你把账都挂到中央、挂到群众头上，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在真空中吗？你可能受过林彪打击，但你思想是容易受他影响的。

谢振华又要争辩，周恩来摆手制止：林彪叛党叛国，是全国出的大事，要激起我们的仇恨。允许人家说过了一点也可以嘛。这个态度人家不会服你。你要考虑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国际主义这样的大问题，气魄要大点，不要计较小事。

倪志福：认识要提高一步，你思想上解决了没有？是不是在中央

这个会上暴露暴露？

张春桥：谢振华，你说过，如果我回去检查，我这一派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是省委书记还是一片头头？

纪登奎：担心自个一派，还要搞发动！

王洪文：你现在执行的路线代表不了群众。我担心，山西来的同志是不是把话都说了？思想解决了没有？有什么不同看法，今天就讲。

周恩来点名让李顺达发言：李顺达同志，你清楚了吗？

李顺达：清楚了。过去不了解，这回开会才清楚，问题确实很严重。

周恩来：你是不是和永贵同志有点矛盾？

李顺达：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呢，老陈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我和老陈是少年的老战友，我俩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为啥有人叫我们闹对立？这是啥意思？是风言风语把我们分开啦。对谢、曹的问题，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

周恩来赞许地说：是啊，这样说痛快。

谢振华请示：回去以后，山西的分工，是否请中央在这里明确一下，是不是由陈永贵同志和其他同志主持，我在他们领导下工作。

江青明确对陈永贵发出指示：回山西后，由你主持，继续对谢振华进行批判。

王洪文补充：谢振华到读书班推迟一下，希望你在山西检讨好了以后，再到读书班。

陈永贵最后表态了：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要不是做工作来，山西早就大乱起来啦。只要谢振华同志检讨深刻一点，大家的气就小一点。我当然要回去做工作，只要是对党有利的事，咱掉了头也会去干。我不满意他俩压人家一派，难道我回去还要压另一派？希望谢、曹不要顾虑，常委同志们都要做工作。

周恩来此时对陈永贵的指示意味深长：回山西后，你们对谢振华

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你负责保证。

这个会议时间不短,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始终不说话。眼看会议要结束了,邓小平突然说了几句令人费解的话:谢振华你要注意,你相信有些人会站在你这一边,我看靠不住。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你们也就统统地垮了,统统地光了,最后剩下你一个光杆了。也可能会有少数人跟你走。

这是批谢振华呢?还是说其他人呢?真是棉里藏针。等到日后邓小平露出针时,中国就改天换地了。那是后话,不提。

王洪文宣布会议结束。山西省委的领导权,就此易人。陈永贵和王谦开始执掌山西的大权了。

这一年的3月21日,陈永贵和王谦以山西最高首长的姿态,带领着谢振华和赴京的省委常委们,从北京乘专机回到太原。

谢振华挨批,山西“文革”局势急转直下。

【4】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批谢(一)

山西省委的12名常委全部回到山西,随即于3月24日召开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贯彻中央汇报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为了加重批谢的火力,又决定从3月27日开始,将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会议变成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全省县一级的县委主要领导和县委部分常委都参加了会议。谢振华靠边站了,曹中南也靠边站了,陈永贵还要在中央工作,太原北京两头跑。于是山西的这次省委扩大会,主事的是陈永贵,但日常主持会议的重任,落实到了王谦头上。王谦作为当初“黑省委”的第二把手,现在又成了实际上主持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这会从3月24日开始报到,一直开到7月底,一开就是四个多月。刘灏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

由陈永贵主持,由王谦为大会秘书长的这次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的批判主要是四个问题:一、谢振华搞了《三上桃峰》这出戏;二、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三、谢振华批了个性,受到毛主席批评,1972年,毛泽东批评山西“批个性”,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四、让谢振华交待批极左思潮的后台。

第一个问题先就批不下去,这个戏有分管的省委领导负责审查,再往深里批,谢振华无非就是负个领导责任而已。

第二个问题严重的很,可帽子好戴,证据难寻。有一次批判会上,针对别人给他戴上的这个大帽子,谢振华拿过话筒做了答复:“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些下了贼船,可我现在还没有上去呢!”谢将军身经百战,很是镇定。中央没有人说过谢振华上了林彪的贼船,批判者们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此事也就再批不下去了。还有人揭出林彪在平型关修纪念馆,谢振华出了大力。但一查,原来那个纪念馆是北京军区修的,当时谢振华还提了不同意见,说毛主席在红军东征时到过山西,渡过黄河首先到的石楼县。石楼还没有为毛主席修东征纪念馆呢,先修平型关纪念馆怎么能行呢?

第三个问题很好笑,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韩承潢,在《绝对不要低下你那高贵的头》(见《菏泽百年名人大观》丛书、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文中,对这件事有过回忆:

原来是山西省河津县委领导班子在整风中,没有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而是把每个人揭露出来的种种思想作风问题整理集中到一起,经过解剖分析和归纳综合,找出大家共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即共性问题。然后,集中力量,针对这些共性问题,刻苦读书学习,认真分析研究,揭露其危害,深挖其根源,制定出改正的措施,以求整个班子提高认识,端正作风,增强能力,从而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山西日报》报道了他们的整风经验，并在编者按语中说，一定要把思想作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充分地揭露出来。“个性问题揭不出，共性问题就抓不住”，整风的任务就完不成。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看出：这完全是一篇正常的通讯报道，是一个成功的整风范例，丝毫没有什么“批个性”、“反马克思主义”的韵味。可是不知为什么，“英明领袖”毛泽东竟然做出了如此吓人的结论，而且通过中央领导人之口、经过中央的正式渠道传达了下來，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山西省委、报社党委以及河津县委的头上。

省委在曹中南书记主持下，当时就此事已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检查。此事翻来叠去，也批不下去了。

第四个问题和谢振华确实沾点边儿。林彪叛逃坠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谢振华在山西批过极左思潮，在一些会上也带头批过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这是在执行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人民日报》在1972年8月4日报道了中共太原市委批极左思潮，生产出现新气象的事迹。但对明明极左的林彪，毛泽东主席却在周恩来强调批极左后，定下了与周恩来不同的调子，给其定性为极右。江青等人，便借机只准反右，不准批左，以此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1973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明确提出了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谢振华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怎么敢和已经走上神坛的毛主席唱两个调子呢？所以，山西批极左思潮确有其事，但很快就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定下的新调子，把林彪当做了极右的靶子来批了。在反复批谢中，倒是揭发出一个谢振华的“黑九条”来，像是九条施政纲领，是批谢的那些人从谢振华秘书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批判者们说，谢振华的这个“黑九

条”，是象彭真“二月提纲”一样的反动纲领。这事上了大会简报，好象铁板上钉钉了。但原红联站勤务组的第一把手、现太原市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去找王谦，说大会必须对这件事作纠正。为啥？原来所谓的“黑九条”，是段立生写给谢振华的一封信，是他对谢振华提出的九条工作建议。王谦起初不信，以为段立生在替谢振华承担责任，听段立生说得信誓旦旦，二人难免发生口角。王谦说，即便是你写的那九条，谢振华看了，那就是他的思想。段立生回敬说，谢振华还看《毛选》呢，毛泽东思想能成了谢振华思想？见王谦对此事不公开纠正，段立生就在会场外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明那个“九条”，是他写给谢振华的工作建议，并非谢振华制定的什么纲领。这件事也就再批不下去了。

会上还有人对着谢振华面对面揭发，说谢振华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跟着林彪“起哄”。这倒确有其事。那次中央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地点在庐山。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搞了几条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书里抄下来的有关天才的语录，林彪大谈毛泽东主席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到会的中央委员们，一看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和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提议，都表示了拥护。其时，毛泽东和他培养的接班人林彪之间，早已暗中争斗不息，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各自怀着不便告人的政治用心。但作为一般的中央委员，怎么能明白党中央的主席和副主席之间，会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由暗变明地成了矛盾的双方呢？再何况，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首脑？拥护伟大领袖当国家主席还能有错？直到毛泽东点名批了陈伯达，同时把林彪凉到了一边，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才开始重新按伟大领袖定下的调调说事，不再议设国家主席的事儿。这些中央委员们，当时表态支持林彪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态度，事后被称为“起哄”。现在批谢时有人提到了这事，真好象是对谢振华“刺刀见红”了。会场上

立即传出一片要谢振华老实交待的吼声。谢振华却冷冷地说：“庐山会议上起哄的又不是我一个！”自然就有人追问还有谁？谢振华依旧冷冷地说：“咱们这会场上就有，我不能说。”与会的人们马上就明白了。主持会议的陈永贵，当时在庐山会议上，也是起过哄的。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能不是天才吗？林彪要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事儿能不拥护？至于在这件事上，伟大领袖和他的接班人是怎么想的，其政治用心是啥？当年在庐山会议上，陈永贵和谢振华都不是事前诸葛亮。

陈伯达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他曾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来山西视察工作。谢振华当时是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相当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自然得陪同陈伯达视察。陈伯达要从山西再赴内蒙古自治区视察，谢振华将他送到了呼和浩特。有人把这事也拿出来揭发，说谢振华跟着陈伯达“跑了一段”。揭发者言之凿凿，会场上却传来阵阵窃窃私语。那位揭发者，成了当天饭桌上人们取笑的对象：“你小子要能爬成个省委书记，中央下来个政治局常委视察，看你小子在人家面前，准跑得比谁也勤快！”

因了《三上桃峰》一出戏，谢振华在会上天天挨批的同时，山西文艺界也成了被清理的重点。《三上桃峰》的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不是接受批判就是深刻检查。省文化系统的领导贾克、卢梦、李蒙等领导人，全部被打倒批斗。

谢振华是主要批判对象，曹中南有时陪着挨批判，有时也被单独批判。曹中南在1967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就成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3月，谢振华出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安排谢振华担任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九大后，谢振华开始在山西全面主政。1971年4月，谢振华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曹中南当选为省委书记。这两位带过兵、打过仗的老

军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中被安排到山西当政后,王洪文、江青、陈永贵、王谦通过一出戏,挖来批去,竟给他俩弄出一条要挖深批透的“谢曹路线”来。

最初看了报上那篇初澜写的文章,刘灏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儿会与谢振华有什么关系,也根本想不到江青天天批林批孔,会拿谢振华做了活靶子,他还没有来得及理顺思维,太原街头就乱了。冷落了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又铺天盖地般出现在省城太原。原红总站的铁杆儿们,现在要给死在谢振华刀下的杨承孝报仇了,有人化名为反潮流战士,用大字报和大标语开始炮轰谢振华。他们的炮弹里装着的内容是:谢振华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谢振华支持《三上桃峰》,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更为可怕的罪名,是谢振华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的陈永贵,曾经整理过陈永贵的黑材料。

【5】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事件始末

所谓整理过陈永贵的黑材料一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两本书对此事有详尽记述,一本是《百战将星谢振华》(欧阳青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一本是《“文盲宰相”陈永贵》(冯东书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现将有关内容摘抄如下,供读者去判断。

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

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有一丝疏漏。”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

在宾馆第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很想当党的九大代表，没料到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他转念一想：应当主动找谢司令交待，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69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做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69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党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摘自欧阳青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他们占领区以及和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交战拉锯区，常威逼利诱一些人，参加当地的维持会或他们的一些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就是当时驻在阳泉的日寇成立的一个图谋“以华制华”的组织。“文革”期间，多次与陈永贵打过直接交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在他的《“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如此写道：“陈永贵的这件事在昔阳县档案里早有记录，不是什么新问题”。

10年“文革”中，“农业学大寨”是红太阳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陈永贵是大寨红旗的擎旗人。大寨红旗不能倒，大寨红旗的擎旗人陈永贵自然也不能倒。只有谢振华那阵子得吃哑巴亏。陈永贵的那个历史问题，是他主持上报的党中央。是周总理让他对陈永贵的那段历史“不要扩散”。既“不要扩散”，他就无法对山西人民讲清楚事情的原委，也就只好背上整了陈永贵黑材料的罪名。

陈永贵回到山西，在这次省委扩大会上主持批判谢振华，谢振华身为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省委扩大会上成了被批的对象。但是，对于社会上盛传的谢振华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一事，这两个当事人从未在会上提及。谢振华遵照周总理指示，对此事“不要扩散”。陈永贵呢，一定也不愿意让别人再抖出这事。

但这事儿，还是叫阳泉市“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给当众抖出来了。那是在与谢振华面对面拼刺刀的大会上，谢振华对有人说他整理了陈永贵的黑材料一事，好歹不做回应。于是有人就点了周云涛的名，让他交待阳泉市的军管会是如何整理陈永贵黑材料的。周云涛就站起来，先对着主席台主持会议的王谦大声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见台上的王谦不吱声，他于是就说起来：“那我就说了，我周云涛一没搜集，二没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他在台下讲起了事情的经过，话题已经挑明，台上的王谦才喊周云涛，让他再莫往下讲了，然后急匆匆宣布散会。

太原的会上不再提这件事了，可这件事，北京军区却要过问了，还要查一查。查的结果呢？

北京军区就把69军党委弄到北京办学习班，肃清谢振华的流毒，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让大家讲清楚陈永贵的“黑材料”问题。……69军党委的人，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

什么错误。开始,他们不低头,不检查。但是,打倒谢振华是江青发出的指令,当时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能不听,于是就一个劲儿压这些委员们,压的时间长了,慢慢一个一个顶不住了,就违心地服从了,最后只剩下一个69军政委戴秉孚,他坚决顶住。

事情很巧,这件事最后竟被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一句不疼不痒的话吹掉了。

1974年春,江青等“四人帮”在全国搞起了批林(林彪)批孔(孔子)的运动。他们从《人民日报》、新华社抽了一大批记者去北京,说是去蹲点了解各地批林批孔的情况。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部主任范银怀和政治记者武春晓去了北京。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他们两次,接见时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都没怎么讲话,主要是江青等‘四人帮’做布置,除了北京市、上海市以外,安排各军种、兵种、大军区、省军区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每处派两名记者去蹲点。江青对他们说:“你们要象当年杨子荣上威虎山那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学会自个保护自个。”杨子荣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主角,他当年上威虎山是为了擒拿土匪头子“座山雕”。现在把这些记者去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大军区、省军区,比作上威虎山,那谁是“座山雕”呢?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四人帮”是要搞乱军队,以便插手、控制军队。江青在接见时还说,大家到位以后,可以把材料直接寄给她和春桥、文元、洪文。姚文元听不下去了,悄悄对她说:“还有毛主席。”江青才说也可以直接寄给毛主席。但没有说材料可以寄给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当时去各军种、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记者都穿上了军装,我们称他们是“老假”,意思是他们是假解放军。但是他们有尚方宝剑,人们讨厌他们,又惹不起他们,他们除了军事会议,基本上什么会都可以进去听。范银怀回来对我说,这事坏了,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还不能不去,不去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可吃不

消。总社领导也觉得这很不正常，如履薄冰。范银怀正好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有一天他拿上准他参加各种活动的证件闯进了整69军党委的会场。他听了一阵，看见会开僵了。一般来说，他们这些记者开会只带耳朵、只带笔，是不说话的。这次闷了半天，范银怀抽了不少烟，憋不住了。因为他太了解这件事了。他在1963年采访大寨时，就在昔阳县看过陈永贵的档案，早就知道陈永贵历史上的事。他觉得，档案里写的明明白白的材料，不应算是“黑材料”。他不冷不热地冒出了一句话：“这算不算黑材料啊？”主持会议的人愣了。范银怀当时算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特殊记者，他怀疑这不是“黑材料”，这显然是有来头的，于是再不向下追查了，马上散会。从此，这个黑材料事件就不了了之。戴秉孚并不知道这个记者是谁，他回到山西，有一次见了山西分社的军代表王步初（当时许多机关都派了军代表，许多工厂进了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起在北京挨整的事，提到有一个戴眼镜的记者救了他一命。王步初就告诉他，那就是范银怀。范银怀后来也再没过问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的话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到80年代中期，我才把戴秉孚当时向王步初讲的话告诉他。

（转引自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文盲宰相”陈永贵》，1998年3月版。）

这便是当时所谓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事件的有关过程。

在当年山西的文革斗争中，部队干部们翻腾出陈永贵历史上做了结论的问题，有没有借此阻断陈永贵仕途的想法？一些地方干部揭批谢振华整理了陈永贵的黑材料，有没有借此要加重谢振华罪行的动机？是否还有省委高层领导干部以批谢为名，故意抖出陈永贵的那段历史想搞臭陈永贵？那就只有当事人心知，局外人不好猜测了。

【6】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批谢(二)

再继续说山西的这次省委扩大会议。

眼看谢振华被江青炮轰,不能死保了,再看看人家老陈一步一层天,不但不敢反,怕是连轰也不能轰了,怎么办?刘灏这位太原市北郊区的区委副书记又拿出了当年的劲头,将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刚刚站出来的“老走资派王谦”。

不妨选择一些刘灏发言的梗概来说明当时他的斗争策略。

“谢振华虽然没有看《三上桃峰》,但他支持了《三上桃峰》,这不对,是应该批判。但你王谦就没有责任?你也是省委的领导嘛!你明明知道《三上桃峰》是一出为刘少奇翻案的黑戏,你审查这台戏那天,你把我也叫上,是咱们一道看的嘛,你当时还带头鼓掌喝彩呢!你这是什么动机?……”

“《山西日报》每发一篇报道大寨的文章,必发一篇报道西沟的文章。谢振华拿西沟和大寨搞平衡,(绝不能说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这纲决不能上,刘灏年轻,可懂得政治定性的厉害)这也不对,但你王谦对大寨是什么态度?你是反大寨的老手了!(此一说,指的是“文革”前省委曾决定核实大寨的土地一事,经核实,大寨的总产量所含亩数和所报土地亩数不符)你过去就反对人家陈永贵,还是先反省一下你自个的反大寨问题吧……”

“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以来,成绩还是显著的嘛。比如说……比如说……再比如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分为二才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错误要批评,但成绩也要肯定嘛……”

段立生的发言,基调与刘灏基本相同。而原红总站领导黄锐庵的发言,则代表了另一些人的观点,那就是将火力集中到谢振华身上。

虽然黄锐庵与刘灏和段立生们一样，也是被谢振华安排做了官的原群众组织领袖，但此时批起谢振华来，却火力甚猛。有一次，黄锐庵上台批谢，提到谢振华重用了兵团和红联站的人，举例时就点了侯光天的名。侯光天在校时，确实是山大8·8一派的负责人之一，毕业后在基层工作了几年，被调到省委办公厅会务组。侯光天听黄锐庵点了他的名字，当即上台主动发言批谢，也点了黄锐庵的名，说谢振华重用了造反派头头黄锐庵。批谢会上互相攻讦的乱象，可见一斑。

在扩大会议上唇枪舌剑，在扩大会议下是大字报相见。刘灏又拿出当年炮轰卫、王、王时的办法，在五一广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致王谦的公开信”，奉劝王谦不要支一派，压一派，不要搅乱了山西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

不要以为只有刘灏在活动，会上会下搞小活动的人多得很。且以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为例。这位昔日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在山西1·12夺权后被刘格平和张日清投进了监狱。后来张日清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砸烂了，张志安也在蹲了一年多大狱后重新获得自由。卫恒死了，但王谦被解放了，站出来又成了省里的领导了，他当然还要支持王谦。其时，这位昔日山西机床厂的工人，已经调入太原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小组。做了专业诗人的张志安也写大字报，也以革命群众名义给省革委扩大会议秘书处送群众反映。他不用真名用化名，自认为是形势的需要和革命的需要。工人联合会被定为反动保皇组织，用真名不行，用化名天晓得是谁写的？先将刘灏的言论批上一顿，再送刘灏一个爱称：“谢振华的贴身小棉袄”。

这次会上会下的派性活动多得很，不必再一一列举。曾在1967年一举跟着刘格平夺了“黑省委”的权，坚决打倒卫、王、王的决死纵队，他们的领导杨承孝被谢振华下令枪毙了，现在陈永贵王谦开始掌权批谢，他们的大小领导都成了批谢的主力。陈永贵当年支持红总站

世人皆知,红总站的各色领导们,如郝庭云、黄锐庵等,都跟上陈永贵和王谦,成了批谢的炮手。而兵团和红联站原先的大小骨干们,则都与刘灏和段立生的态度无异。

也有当年的造反派组织领导,采取了另外的态度。原太工红旗的领导李青山和杨保明,他们都是当年红联站的发起人。对待这次陈永贵和王谦主持省委扩大全委会批谢,其态度就与段立生不一样。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支持陈永贵和王谦批谢,才能和江青以及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与段立生私下未达成共识,看到段立生已经在并州饭店门口,贴出批判陈永贵和王谦的大字报后,他们也写出联名大字报,表明了与段立生不同的观点,贴到了迎泽宾馆门外的墙上。

不要以为只是唇枪舌战,政治斗争是要流血和死人的。且举两例:

省戏研室有一位戏剧评论家赵云龙,和《三上桃峰》这出戏没有丁点儿关系,就是因为写过一篇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章,对江青提倡文艺创作要“三突出”提出点不同意见,也成了清理对象。在受到批判后,含冤自尽,以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对“文革”作了无言的抗争。

太原纺织厂的原党委书记杨丕夫,在1967年1月“文革”初期被厂里的红卫队夺了权,又被张日清派部队抓进大狱,直到1969年春天才被放出。到了1973年,经谢振华提议,这位老干部又被委派回太原纺织厂革命委员会帮助工作。江青炮轰谢振华以后,这个厂原红卫队的一派人马,立即将杨丕夫和谢振华连在一起批判。杨丕夫的遗孀张美玉在1996年3月,如此回忆她丈夫的遭遇:

在一次会议上(孙涛注:指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的一次批谢会上),陈永贵点了杨丕夫的名,说谢振华“举逸民”起用叛徒杨丕夫。杨丕夫同志经过几年的折磨,身心上本已受到严重摧残,现在又加上

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亲口点名，精神上再也撑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是被迫自缢，含冤身亡。

山西的这场斗争，根子还在上面。毛泽东要搞“批林批孔”，“四人帮”要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江青逼谢振华交出后台，就是这个用意。延安时被谢振华批评过的江青，与谢振华结下矛盾的陈永贵，在整谢振华时自然一拍即合，步调一致起来。山西当时的省委在陈永贵和王谦领导下，执行江青“炮轰谢振华”的意图十分得力，谢振华主政时刚刚安定了没几年的山西政局，再次被搅乱了。

谢振华先后在大小会议上接受了 20 余次批判斗争，也做了一些检查。但应该肯定一点，谢振华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始终坚定地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公开也没有扩散。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设他像袁振将华北局会议上党内斗争的情况告诉刘灏一样，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原原本本告诉了刘灏，或者告诉了别的什么人，再让他们传到社会上，在山西，以至在全国，那将会造成一种怎样的混乱。从“文革”初期刘灏敢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到陈永贵、王谦主持批谢振华时，刘灏敢在五一广场给王谦贴出一封公开信，相信只要谢振华授意，刘灏肯定敢把陈永贵当年给日本鬼子清水小队队长每周送情报的事儿，也在五一广场用大字报公开的。

谢振华虽然检查了，也接受批判了，但王谦想让山西省上上下下团结在陈永贵周围搞好工作，却只是一厢情愿。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陈永贵在山西几乎成了一尊神，但现实是农民依旧吃不饱饭。对大寨红旗不敢也不便说出口的怀疑，正在让山西的许多干部对大寨的那号做法偷偷地打着问号。陈永贵原本就是支持红总站的，此时原先红总站的那些大小领导们自然高兴，必欲跟着陈永贵和王谦再登新的仕途。王谦作为“文革”之初省委第

二把手,曾饱尝兵团和红联站小将们的炮轰和揪斗,对谢振华将红总站的一些领导安排在基层锻炼和任职,他没有意见,但对谢振华将兵团司令刘灏、红联站领袖段立生也安排在基层县委工作,自然不会高兴。而山西原来对立的三大派组织,虽然已经按谢振华的部署,表面上统统倒了派旗,但他们的派性观点并未根除,原先红总站的那伙人,跟上陈永贵和王谦批起谢振华来了,兵团和红联站的那伙人,岂能坐视听之任之?

长达四个多月的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终于不了了之,原因是5月31日,谢振华上书毛泽东主席,让神坛上的毛泽东终于表态了,在谢振华的信上批了“到此为止”四个大字,转政治局执行。

谢振华被调走了。曹中南也被调走了。但是,6月12日到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集山西省委常委和太原市委部分常委开会,根据王洪文和江青等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形成一个“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简称十一条)。中央办公厅7月16日印发了这个十一条,山西省委办公厅7月21日翻印了这个十一条。在7月23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由王谦传达了这个十一条。

第一条主要内容,是指出“对谢、曹的错误是揭是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意思很明白,谢振华和曹中南的事儿,并没有“到此为止”。

第二条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谢、曹“拉山头,搞分裂,破坏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团结”;“抵制了学大寨”;“支持大毒草《三上桃峰》”;“搞一言堂,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罪行。

第三条的主要内容,是让山西省委“发动群众,进一步批谢”。

第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山西新的当政者记取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和曹中南“以我为核心”所犯的种种错误,在工作中要讲党性,不要搞派性。

第五条的主要内容,是指在下一步的批谢、曹运动中“不要搞人人

过关,不准打人和抓人。”这也说明批谢、曹要注意方法,但不会停止。

第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连”,“不批林,不批孔,拉山头,闹分裂,是绝对不容许的。”

第七条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不可“借搞批谢振华的错误而否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挑拨军民关系。”

第八条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在山西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对错误受到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要由谢、曹负责。

第九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整顿和调整山西的各级领导班子。对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凡是代表性不足的,应该补台”。所谓补台,谁都明白,那就是要调整领导班子是也。

第十条的主要内容,是讲要抓革命,促生产。

第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讲各项工作都要加强党的领导。

陈永贵和王谦在山西要按这十一条,继续批“谢、曹路线”,必然要涉及到一些干部,要继续肃清“谢振华流毒”,也必然要涉及到一些干部。由江青炮轰谢振华开始,到王洪文、江青等专门针对山西下发的这个十一条,在山西引发的动荡,再次波及各条战线。

【7】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

1974年11月,山西省选举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安排在晋祠宾馆举行。当时的参选人员,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各地市领导、以及各界代表近三百人。原红联站和兵团的头头脑脑们,凡是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前都抱定了不选王谦的态度。还有一些对王谦主持省委扩大会批判谢振华,用对待陈永贵来划线的做法有意见的干部们及各界代表,也要借此次的无记名投票,体现一次自个的意志。进会场时,宋捷抢先坐到了王谦身旁。选举开始了。宋捷飞快地

填罢票,故意把票举到王谦面前,大声说:“我可没投你的票啊!”按宋捷事后说法,他如此而为,是要为不选王谦的代表们鼓气。通行的过程走过,发票,画选票,投票,唱票,结果出来了,王谦落选,韩英当选。

王谦是“文革”前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是省委排名卫恒之后的第二把手。“文革”中先被打倒,投入监狱,出狱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在后来各地解放干部的大形势下,他又进入了新省委的领导班子,并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协助陈永贵打倒谢振华,成了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山西历届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都是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惯例。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遭江青炮轰,被打倒了,王谦主持了省委工作,中央也安排他要当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团的团长,例行程序,先得补选为山西代表。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偏弄出了个王谦落选的结果。

韩英是九大后被中央安排的山西省委书记。在九大前,周恩来曾主持召开全国煤炭会议,韩英当时是大同矿务局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他有个发言,讲各派都要顾全大局,狠抓生产。阳泉矿务局的老工人王体也有个发言,反对武斗和打、砸、抢,主张搞好生产,这两人给周恩来留下很好的印象。九大期间,讨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周恩来总理提出,山西煤炭对国家贡献很大,中央委员会应该有山西煤炭战线代表人物,让山西提名。刘格平那阵子陷入派性争斗,又不了解煤炭战线,提不出合适人选,周恩来便提到了韩英和王体。这两人一下子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韩英被安排成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王体被安排成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韩英并没有参加九大,却意外地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这次被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又是一种意外。

王谦的落选,意味着山西支持谢振华的原红联站和兵团的领导们,以及对陈永贵王谦利用派性“批谢”早有看法、且持有投票权的干

部们和社会各界代表们,用画选票的权力,在对抗陈永贵和王谦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胜利。这个胜利的挑头人,便是段立生、刘灏、宋捷等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参会者中,对王谦有意见、有看法,不想选他的人不少,但选谁替代王谦?如果按各人意愿随便选,票数绝对分散。正是段、刘、宋这几位造反派领袖,会前和不少代表酝酿(说成串联也行),商定取代王谦的人,既不能是造反派,也不能是跟着陈永贵和王谦的那些人,还得是党中央认可的干部,韩英于是就成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对象。

消息很快从选举现场向外界传出,兵团和红联站要大大庆贺一下了。省城出现了许多大标语:王谦落选大快人心!王谦支一派压一派决没有好下场。署名呢,全是“革命群众”。

如果单纯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看,谁当选或谁落选都无可非议。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王谦落选就让党中央即刻表态了。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山西省委就此事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说“这是一起我党历史上少有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政治事件”。这种定性,也暴露了王洪文的思想认识水平之浅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党的总书记换过多次,比如遵义会议,大家选张闻天(洛甫)取代博古(秦邦宪)成了党的总书记(也称总负责),这不就是一些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不选另一些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了吗?再说了,山西这次选举,并非中共党内的选举会议,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各界人士坐在一起,选举出席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王谦名下得了那么多反对票,也决不全是共产党党籍的人士所为,即便是有共产党党籍的代表没投王谦的票,也是将票投给了省委的另一名书记韩英,怎么就成了“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呢?但那时的王洪文,是排名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口出歪理,下面谁敢公开反驳?对山西而言,这又是一次政治上的大震荡。在省城解放路省

委旁门的大墙上,立刻出现了题为“王谦落选事件的真相”的大字报。署名当然也是“革命群众”。直到20多年后,已经退休的张志安才笑着对我道出了真情:那阵子我天天往王谦那里跑,那张揭露兵团和红联站的头头段、刘、宋们会前串连好,在会上不选王谦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

对王谦的落选,当时红总站也马上亮出了观点:兵团和红总站一小撮坏头头以派代党,对抗中央绝没有好下场!署名呢,还是“革命群众”。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给山西的这次民主选举定了性。但当时的党中央为什么没有责令山西重选?我们不得而知。中央分明认可了这次选举结果,1975年1月13日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中央让王大任当山西代表团团长,让王谦以列席代表身份列席会议。在1月12日晚上四届全国人大各代表团团长参加的预备会议上,王大任坐到了山西代表团团长的座位上。王洪文、张春桥、吴德等中央首长先后讲话,对山西王谦落选一事做了许多严厉的批评。事后王谦整肃不选自个当代表的一些当事人,所持上方宝剑,也是王洪文的那个批示,和王洪文、张春桥、吴德等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

【8】邓小平的整顿和毛泽东的批邓

历史进入了1975年。

先从山西政局说起。由于王洪文亲自过问了王谦落选这件事,且有了那种所谓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批示,山西省委便要查清这件事了。于是,段、刘、宋三人被分别停职审查。段立生是太原市清徐县委副书记,刘灏是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宋捷则是团省委的中层干部。这三个人,段是原红联站领袖,刘和宋是原兵团领袖,如果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三人就是罪魁祸首。三人所在单位的专案人

员调配好了,那就查吧。但查来查去,无非就是上会前代表们互相间议论过不选王谦,说是会前串连可以,说是有组织活动,就没有什么证据了。刘灏是在1975年1月被宣布立案审查的,直到1976年2月,才被宣布重新恢复工作。查了一年,时任太原市北郊区区委书记的白玉,被王谦亲自召见过几次,但实在对刘灏不选王谦一事,找不到定成有组织行为的证据。没有投王谦的票,刘灏承认。上会前和什么人议论过,也承认。但说这就是有组织行为,他不承认,事情也确实不是什么有组织的安排和布置。停职了一年,查证了一年,这事只好不了了之。同时,被立案审查的段立生和宋捷,也都恢复了工作。

再说全国的形势。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月8日到12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在“文革”中乘风破浪的山西劳模陈永贵,也出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中积累的各种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在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下发的这个《决定》,加上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正雷厉风行地对

全国铁路系统的大整顿,对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抓经济和生产,无疑是一个促进。

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后,在1975年大刀阔斧抓各条战线的整顿,分明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种巧妙的否定,此举受到了江青、王洪文等“文革”派们的百般反对,也引起了病榻上毛泽东的警惕。在1966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同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97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然而,邓小平却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为由拒绝。邓小平敢拒绝“圣意”,无疑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震怒了。于是,1975年的11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央和各省市的130余位负责人赴京,参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把持了这次替毛泽东主席传达“圣意”的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个来势凶猛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由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一掀而起。

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13期刊登的署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信号: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对重新上台后,在教育等各个方面大行整顿的邓小平再度下手了。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一次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说法,还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下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呢?一切全都明确了,老人家要重新打倒邓小平。而老人家一手扶持起来的“文革”派江青、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要继续深入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的狼子野心，也已经通过由他们炮制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在全国人民面前昭然若揭。

1975年的中国，政治风向就如此变来变去。

“文革”的第10个年头，即更加变幻莫测的1976年，在一场大雪中取代了1975年。

【9】周恩来逝世

1976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全国人民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江青竟敢在周总理的遗体前不脱帽。

全国人民也都通过看报纸和看电视，知道了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没有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人们私下猜测着，除了猜测政治上的原因，更多的，是猜测那个多年来沉浸在万寿无疆祝颂中的老人，恐怕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在对他的造神运动中，他已经被神化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心里。即使对伟大领袖搞的“文革”有所怀疑，在三个人的场合下，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即便是知心的两个人，恐怕也不敢多说。更多的人，则是在有了这种想法后，自个先就在心里否定了自个。毛主席怎么能支持他的夫人批周恩来总理呢？在那个年代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既明白这样的事，又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

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2008年2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权威的评价：“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情况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

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我们祖国的汉文字,实在太伟大也太具有概括力了。胡锦涛所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八个字,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种描述,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种种处境,是一种十分准确的高度概括,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其他的解读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容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

……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1975、9、12”。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

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见 1986 年 8 月由周明主编、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中《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

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著名作家梁衡在 2010 年第 3 期《领导文萃》上刊发了《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一文，对“文革”中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述和总结：

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周恩来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帖耳，不置一词，为毛泽东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我们设想，如果 1958 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革”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

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曾任美国第37任总统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先生,1972年2月访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没有中国“文革”中派性斗争的派性,也不具备大陆中国人的那种传统文化视角,更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他是西方的政治家,对中国政治家周恩来的了解和评价,可能看法上更客观一些。他在《领袖们》(转摘自《民族英雄周恩来》一书,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2012年2月版)一书中,如是说: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恩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恩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奋斗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进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像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恩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在他们的最后年月里,这两人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据说,在周恩来的晚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帮派要迫使周恩来下台,这可能还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周恩来预料毛泽东死后可能会出现权力斗争,因此,他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毛泽东的晚年,则是在一种预想不到的、时而倒

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中度过的，并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一段时期里，毛泽东支持温和的讲究实际的派别，但时过不久，他又变得不耐烦了，联合起极左分子，发动另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对中国那十年“文革”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的作用，这位美国总统的一句话说得很是精彩。他说：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文革”中所以还能卫星上天，从中国当时的党政两位领导人的角度看，这位美国总统的话，确实有理。

问题是，这样一位“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总理，从遵义会议后一心侍奉着毛泽东这位现代君主，在“文革”中又一心想做好现代君主的支持者，而最后还是做了毛泽东“文革”的目标。周恩来虽然比毛泽东还要小4岁，却在毛泽东批林批孔批邓的“文革”新浪潮中，撒手人寰了。

在北京，出现了老百姓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对伟大领袖的“文革”理论，对“文革”新贵们的种种劣行，开始了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调门不同的思索。

但是，毛泽东虽在病榻之上，却决不容许在自己生前或死后，有任何人怀疑和否定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既然可以将曾经首肯的接班人刘少奇打垮，可以与一手提拔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决裂，在维护“文革”的信念上，老人家更是至死不变，不容许出现生前和死后的任何对手。周恩来从“文革”开始，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

导的“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虽然没有一句口头上的非议和明确的反对，但在行动上，却与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新贵们总不合拍。到了批林批孔时，“文革”新贵们首先在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抛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讯号。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出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说：“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将孔子称为“宰相儒”来批判。同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刊出了署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丘其人》。借古讽今地描写孔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之后，在北京和上海的许多报刊上，连续发表大量的影射文章，将周恩来比作“当代大儒”和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中国的普通百姓们，尚能从这一篇篇影射文章中，读出“文革”新贵们射向周总理的毒弹，周恩来是具有何等聪明才智的大政治家，他本人岂能不知这些“文革”新贵们的狼子野心？可怜的是，“忍辱负重”的一国总理，病卧在床，在即将走完生命的历程时，对“文革”新贵们，已是无可奈何了。一位将死的政治老人，为中国革命和民众解放奋斗一生，对自己撒手人寰后的政治命运，岂能不想？他内心最怕的，恐怕就是在他死后，他忠心侍奉的伟大领袖，如对待刘少奇和那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一样，在其夫人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怂恿下，将他打成投降派和复辟势力总代表。

当时，全国的老百姓唯一能感到欣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总理追悼会，是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也就是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邓小平还在主持着中央的工作。

下一步，神坛上的毛主席会让谁来接替周恩来总理空出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当时全国人民都关注的大问题。

【10】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刚刚过去,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为了全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上旬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分批召集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帮助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这些领导在思想上转好弯子。会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内容中,毛泽东多次重复他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观点:“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由毛泽东提名出任了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

江青也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立刻通过别的途径传向全国。就在这次打招呼会议期间,也就是1976年的3月2日,江青在京西宾馆召集了12个省区的党政负责人,开了一次由她主持的会议。她一人在会上大放厥词,以女巫般颠三倒四的声调和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并号召大家坚决批臭和打倒邓小平。与其相配合的,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文革”新贵们掌控的写作组的文章,继续影射周恩来,批判邓小平。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更是明目张胆,连续刊出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文章。《文汇报》在3月25日的一篇文章里,竟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

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公然暗示“文革”的胜利，必须将死去的“党内那个走资派”周恩来和被他“扶上台”的“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批倒批臭。

毛泽东在他的谈话中所说的“一些老同志”，是有特指对象的，那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老同志。虽然毛泽东主席和江青等“文革”新贵们，要坚决维护“文革”的伟大胜利和历史意义，但是，当走上了神坛的老人家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10个年头之后，除了党内高层的领导干部们，对神坛上的老人家和老人家一手导演的“文革”进行不断思考的普通中国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而在中国的知识界，这种思考更是如星星之火，在暗中潜行着，燃烧着。

震惊全国的“太原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即为一例。

“文革”初起时，张珉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的学生，组建起重重院联合总部，同时也是红联站的发起人之一，任红联站勤务组成员。赵凤岐是红联站观点的基层干部。1975年4月两人被抓时都是31岁。张珉当时已经毕业，在太原化肥厂汽车队当机械员，赵凤岐在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当副部长。他们在参与“文革”中，开始反思“文革”，进而批判“文革”了。1974年，他们根据社会上反对“文革”和反对“四人帮”的政治传言，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也叫做保卫党内以周总理为首的“老派”领导人的“基层党支部”。其宗旨，明确支持周总理和朱老总、叶老师，反对“四人帮”，并明确提出对毛泽东那些“文革”理论的质疑和反对。他们承认中共党章是他们的纲领，但对形势的看法，又和当时的党中央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他们中的成员张耀明根据大家的讨论，于1974年写成了《论现状》一文，是使这些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据石名岗先生《“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一文总结，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自党的九大以来，我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

二：这条路线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脱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片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提出一种实质上是以搞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

三：这条路线在对待党的历史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评述，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根据需要肆意歪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四：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在分配上，体现为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行物质奖励。

五：中国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甚少的国家，若这一少部分人也不能自觉拼命搞科学技术，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靠什么来提高呢？难道仅靠学大寨就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吗？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牛棚去改造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真正走向工农相结合的历届毕业生，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可靠栋梁，我们希望国家委以重任。

六：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惜的是，这批宝贵财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态度暧昧，热情不高。原因在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永跟不上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条条，他们根本看不清，摸不见。

七：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认为，以党内斗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党的领袖、领导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权通过电台、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案。而苏联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以我划线，把个人与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在政治上，肉体上判处死刑，强行剥夺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力，不让人讲话，实行党内独裁，导致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八：文艺作品完全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声筒。在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点也无“浪漫”可言的创作公式，作品内容成了大同小异的填词，阶级斗争是唯一主线，英雄人物“高大全”到常人不可理解的高度，所谓“三突出”模式，更是公然宣传英雄创造历史，老百姓只配跑龙套而已。

这些聚集在一起思考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大批老干部是错误的，似乎中国革命只有他一个人一贯正确，这是违背马列主义常识的。如果把周恩来总理也打倒，中国前途不堪设想。他们还认为，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列举的那些社会现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应当引起重视。

这是多么可贵的思想解放，多么可贵的真理求索啊！

1975年5月，党中央决定，王谦出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省革委主任，免去谢振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职务。从1974年3月开始，也就是在陈永贵领导下山西省委批谢、曹开始，谢振华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之职，就已名存实亡，那时王谦已经主持了山西省的党政工作。为何历经一年多时间，谢振华才终于被免职，王谦才终于被中央委任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党中央是如何考虑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亲自抓这个

反革命大案,张、赵二人和一些参与他们活动的人,被定为“太原张、赵反革命集团案”,他们二人和其他一些受牵连者,共有12人被投入大狱。其家属亲友因此而受到了政治歧视和种种打击。高院的一些法官,对此案一直有看法,但在省委第一书记的干预下,他们无力扭转局面,只好想尽办法拖延。

在省高级法院的同志审理案件期间,王某(孙涛按:此王某即指王谦书记)已经给案件定了调子:此案要从重从快处理,三名主犯要判处死刑,其余要犯也要重判。当有关同志向王某汇报中提出,这个“现反”案子疑点不少,他们(指张、赵等人)可不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暗示可否从轻处理。王听后坚决反对。对案犯强烈的同情心和司法工作的责任感促使高院的同志们以各种借口拖延这个案件。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左”的东西尚未清除,但法院多数同志认为,张、赵等人反“四人帮”无罪,至少不应再判死刑。但王某在听取汇报后仍未改变观点。由于他的坚持,1977年11月19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张、赵等12名案犯仍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在审判期间,省高院的办案人员顶住压力,又在审判程序上做文章,极力创造条件,将此案件由省高院作一审,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作二审,寻找为其平反的转机。当案件转送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等同志听取了汇报,指派专人认真审理了此案,有关人员下到省城太原,在省高院同志的配合下,一一提审案犯,听取他们的申诉意见,了解案情,最终写出了彻底平反的意见。不久,这个案件在胡耀邦主席(孙涛按:应为总书记)的重视下,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研究决定一致同意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意见,并由其督促山西省高院平反这一案件。

(摘自谷峰著《新太原50年纪事》,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对待这个案件的政治态度上,除表现出了极左的做法,将张、赵等人抓捕入狱外,还想扩大战果,对原红联站领袖段立生,以及原兵团司令刘灏,加紧审查,多次责成由他们所任职县区的第一把手与他们谈话,动员其自首,交待是否也参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但终因他们与此案没有关系,查来问去,没法将他们与此案联在一起法办。

段立生向我回忆过,说张珉等人也找过他,邀请他加入他们的活动。段立生认为,这种非组织活动是违反党组织纪律的行为,表示不能参加,而且表示,再来清徐县找他时,绝不可再说这类话题。同时劝阻张珉等人,议论领导人,到省一级为止,党中央的领导人,不可瞎猜、乱议。后来,在审讯张、赵集团时,审讯人员曾向多人发问:“段立生为何没有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张珉等人的回答都是“段立生太正统。”

刘灏也向我回忆过:说张珉等人也找过他,聊过所谓中央成立了周恩来任主席、叶剑英任军委统帅、邓小平任总参谋长的第二委员会的故事,他对这故事根本不信。在他心中,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这些老一代革命家,要和江青、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斗,也不会搞这种地下党的办法。对这些故事就不信,也就拒绝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活动了。张、赵被抓后,有一天晚上区委突然召集常委会,省公安厅的车和人就停在区委大院。常委会由区委书记白玉主持,就一个议题,让刘灏说清楚和张珉与赵风岐有没有联系?刘灏如实说了,说他连那些故事都不信,还能参加他们的组织?如果刘灏确实参加了他们的组织和会议,那个晚上就被王谦派来的人抓走了。当年张、赵集团里,有人向我回忆刘灏当年的态度时,如此说:“刘灏聪明,对我们曾相信过的高层那些事,他从没有相信过,也就不可能和我们搅在一起了。”

段立生和刘灏,当时都是在县委和区委副书记岗位上任职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相信党中央不会

分裂的正统思想,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7 年 11 月,王谦不仅不对此案提出平反意见,反而为此案定了从重处理的调子。其中,张珉、赵凤岐、罗建中三人被判处死刑,张耀明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 6 人,分别被判处 7 至 15 年有期徒刑,还有两人,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交原单位管制 3 年。

1979 年初,在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此案所有被抓被判者,才终获公开平反。胡耀邦曾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平反材料上批示,要求在春节前释放张、赵等人,让同志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但王谦则要“先改判,后释放”,直到正月初八才释放了张、赵等人。1979 年 2 月 27 日,山西省委在省城湖滨会堂召开了此案平反大会,会前,这些被害人与王谦发生激烈争执,要求王谦必须公开承担责任。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讲话中,承担了造成这个大冤案的责任。我在采访当年红联站一派的核心人物、原省委七一公社的领导人李辅时,他告诉我,张珉在改革开放后皈依了基督教,赵凤岐因患有多种疾病,也不得已而提前退休了。

被定为“太原张、赵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李兆田,曾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他 1965 年从山西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晋中水利局。“文革”中,在晋中“总司”一派中担任过领导。谢振华主政山西时,被调入省水利厅,担任了副厅长。在 1974 年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上,被批为谢振华重用的干部。也就是在那时,他在与张珉、赵凤岐的接触中,对“文革”做了反思,并参与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正是这一代人,他们曾虔诚地紧跟领袖投身于‘文革’,也正是这种经历,让他们开始反思‘文革’,开始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永贵们搞的那一套,终于走上了‘文革’反对者之路。

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经过痛苦的思维,不再相信“文革”的所谓伟大意义,正在形成一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力量,这

种力量最终演变成了身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大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自觉反动，从而引发了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同时，也引发了毛泽东在病榻上对邓小平的再次打击，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将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定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由北京市委出面，对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进行了血腥镇压。

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在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民群众也形成了一种自发的集会，群众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演说，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形式，发起了对“文革”的声讨。各种花圈、挽联被送到这里，广场四周贴满了人民群众创作和转抄的大量诗词。

太原的五一广场，在10年“文革”中，是各派政治力量集中表演的地方。

“文革”年复一年已10年，这里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这一次五一广场的大集会，没有人发动，也没有人组织，全是人民群众一种自发的聚集，他们当中，有当年的兵团派、红联站派，也有当年的红总站派。10年的历史，理清了人们的思维，“文革”之伤痛，加速了人们的反思，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早已深深地厌恶这场内乱了，正在消弭着彼此间的派性和隔阂，开始了对“文革”自发的批判、自发的抗争。无须一一举例了，从李大纲身上，便折射出这种转变。这位原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队长，曾在五一广场参与组织过批斗卫、王、王的大会，也曾因退出刘格平领导的1·12夺权和炮打中央文革，带着队伍，顶着雪花儿冒着严寒，来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文革”的第10个年头，面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和“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他又一次来到了五一广场，在人群中发表了反对“文革”和批判“四人帮”的演说。山西高层与北京一样，也将太原五一广场的这次民众聚集，定为反革命事件。李大纲被列入了抓捕名单。当时在省委办

公厅工作的侯光天，在向王谦书记报送名单时，说了自己对民众悼念周总理的看法，同时请王谦书记放过李大纲。侯光天与李大纲在山大上学时，都是8·8派，也曾一道批判过王谦。听罢侯光天的话，王谦无语，却当下提笔把李大纲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只是，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不同，王谦放过了李大纲，还是得执行中央的精神，不放过名单上的其他人。当时好多在五一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抗争的年轻人，一一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

以天安门广场大镇压为发端，这次全国性的镇压过后，中央又部署了“追反追谣”运动，追反，即追查参与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各地类似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追谣，即追查参与这些事件以及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但跟着散布了反革命谣言的各种坏人。太原也开始了层层追，层层查，各级党委让广大群众互相揭发，弄得人心惶惶，大批无辜群众再次因悼念周总理，反对毛泽东的“文革”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受到打击和迫害。

【11】张铁生的山西之行

在本章第8节《邓小平的整顿和毛泽东的批邓》中，讲到刘灏在1976年2月被恢复工作，继续担任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一职。也就是在这个月的19日，当时被媒体誉为反潮流英雄的张铁生，在太原湖滨会堂作了一场报告，会议的主持人，是省委书记王大任。

张铁生1950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文革”前是一名初中生。正是这名在“文革”中回乡务农的初中生，在1973年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与进入中央高层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斗争中，得到了毛远新、江青的赏识和利用。

事情需要从两个文件说起。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

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中的文化课考试，决定在全国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作了修订，明确了必须进行文化课考试。

两个文件，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当时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最有发言权，让那些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兵上了大学，他们连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懂，怎么教学呢？

张铁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后，在文化课的考试中闹出了笑话。他的语文考了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在考理化时他不会答题，就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无非是讲了讲自个的情况，为不会答题作了些辩解，写了些牢骚话。不能过分责怪张铁生，这封信只是他的一种情绪渲泻罢了。问题是此事被毛泽东的侄儿、当时位高权重、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知道了，当即指示《辽宁日报》，在7月19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铁生的这封信，大标题是《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说：“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并耸人听闻的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红旗》杂志也转载了这封信，还配了评论，批判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进行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明利用张铁生这封信，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张铁生呢？恐怕他也没想到，一封牢骚信竟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自个还被沈阳农学院牧医系破格录取。到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他又被选为代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还受到了王洪文和江青的接见。之后,张铁生又被任命为沈阳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就这样,这位回乡务农的初中生,先作了白卷先生,又成了反潮流英雄,继而成了一颗新的政治明星。

1976年的春节是1月31日。过罢春节,张铁生就带人到北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寨大队传经送宝。一行人先到清华大学,张铁生作了报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毛泽东的秘书、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接见了。又到大寨,张铁生在昔阳县作了报告。此事惊动了山西省委,省委常委会上,第一书记王谦提出三条意见:一,要请张铁生到太原来看看;二,张铁生来太原后一定要请他作报告;三,张铁生到太原后,省委全体常委出面宴请他。省委书记王大任当即提出异议,说省委常委全体出席宴请张铁生,接待规格太高,他毕竟是个学生嘛。王大任建议,由他自个出面,代表省委宴请一次就可以了。在其他常委的赞同附议中,王谦同意了这一条。

2月10日,王大任书记在湖滨会堂主持大会,张铁生应邀作了报告,大讲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太原市教育局要尽地主之谊,与张铁生也有过接触。山西大学党委不甘落后,也请张铁生去学校作了报告。

中共北郊区委当时也接到了听张铁生报告的通知,区委副书记刘灏分管文教,自然该由他率领区文教系统的领导去听报告。但刘灏没去。他非但没去,还给区文教局局长樊应昭打了招呼,结果是,由省委安排的这个报告会,太原市北郊区文教系统的大小领导,全部缺席。原因很简单,在刘灏看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可以,但不进行文化考试不对。你是小学水平,或者是初中水平,坐进大学的课堂,老师讲课你听不懂,岂不是老师为难,你也受罪?至于考了白卷还有了理,成了反潮流的英雄,岂不是无知者无畏?如此就是反击了右倾翻案风,

他想不通。当时,社会各界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得很。这也是刘灏敢给下属打招呼,下属们便懒得去听这种报告的原因。

这一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后,辽宁省将张铁生定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现行反革命”。11月18日,《山西日报》刊发大批判文章,题为《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文章开头就如此定论:“今年二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派那个由他们豢养的假英雄、真右派,匆匆忙忙窜来山西,在太原市湖滨会堂作了一个长达三万字的报告。一霎时,晋阳大地上空,一股乌云上下翻滚,一阵反革命噪音甚嚣尘上。”当时,清华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典型,大寨更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到这两个地方学习参观的人太多了。张铁生确实是毛远新和江青等人树起的反潮流英雄,但他带人去清华、来大寨,是他们学院的安排,并非王、张、江、姚那四个人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指派他窜来山西的。那时毛泽东早已病重不起,还管得了个张铁生参观大寨的事吗?至于他在湖滨会堂作报告,那是受山西省委的邀请,在省委书记陪同下办的事。批判张铁生的这篇文章,先给他的山西之行戴上一顶大帽子,是“文革”时代大批判文章上纲上线的做法。对省委邀请张铁生来太原作报告一事,大批判文章避而不谈,正体现了这篇大批判文章不顾事实的文风。而在太原市,在山西大学,那些陪同过、接待过张铁生的干部和学生,则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了清查、整肃。

1976年,是中国大地发生政治震荡和地质震荡的一个龙年。国人在这种震荡中,不约而同地思考着、担忧着中国的命运。

【12】红太阳最后的光芒

刘灏那些天也在思考和反思。身为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太原市

北郊区的区委副书记，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隔世之中。他已经不再是“文革”初期太原五中一个高三学生的思维了。经过近10年“文革”的风雨，他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基层区(县)委的副书记。如果说，当年在古交的大山里，听到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时，他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那么，眼下，这种感觉就愈加浓烈。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他的思想处在一种迷茫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究竟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完全胜利了呢？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不但敢于炮轰老将军谢振华，怎么还敢于全国人民热爱的周总理为敌呢？其实，这种对“文革”的反思，在他心灵深处已经很久了。刘灏的父母全是老军人，是受到过冲击的军内走资派。作为老军人的儿子，他热爱毛主席，也热爱周总理。他趁着夜幕偷偷去过五一广场。他被那里的气氛感染着，在那种气氛中，他不得不回忆和反思着“文革”中一年又一年的往事。党报上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让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经受锻炼，不要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接班以后那样，让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同时也要让像他这样的年轻一代，经受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新的革命考验。在那个年代，报纸和广播电台宣传的全是这号道理，当时的刘灏还不能、也不敢怀疑这个道理，可红太阳支持夫人江青，把斗争矛头先对准谢振华，再要揪出谢振华的黑后台，将矛头对准周总理，这道理还有道理吗？

那时有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说毛主席叫来王洪文和邓小平，要和他俩下棋。谁先和毛主席下呢？邓小平不表态，王洪文则以年轻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抢先一步，坐到了毛主席摆好的棋盘前。第一步棋当然是由执红棋的毛主席先走了。毛主席一起手就先拿掉了自己的红帅，王洪文一看，这是啥走法呀？当下傻了眼。毛主席摆摆手，让他把位子让给邓小平。毛主席不再吭声，等邓小平接着往下

走棋。邓小平想也没想，拿起自己一方的黑将，一下子放在毛主席那边取掉红帅后腾下的位置上。于是，毛主席就笑了。

其实不是毛主席笑了，是编这个故事和听这个故事的老百姓们笑了。当时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再次打倒邓小平了，怎么会去找王洪文和邓小平来下棋呢。这个民间盛传的故事，不过是一种民意的反映。由谁来接替周恩来总理？或者更进一步暗暗想下去，由谁来接替毛泽东主席？全国人民都在偷偷想呢，难道刘灏就不想吗？

他当然要想了。但想来想去，无论邓小平和王洪文谁接替了周总理，或者进一步说，谁接替了毛主席，他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在他当时的思维中，道理是明摆着的：如果邓小平在中央掌了权，肯定还要学大寨。1975年9月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陈永贵致开幕词，将大寨的经验总结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一个坚持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农业典型，被陈永贵变成了执行极左路线的典型。虽然邓小平在那个会上大讲农业战线也要整顿，还在大会发言中与不时插话的江青争辩，但依旧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按刘灏当时的思维，也就是说，邓小平掌了权，虽然还要搞整顿，抓经济，但农业学大寨的路子不变，陈永贵还是农业学大寨的一杆旗。刘灏的这种思维，也是当时人们的惯性思维。当时，谁又能想到中国的农业，决不能再搞学大寨那一套了呢？即便想到了，恐怕也不敢说，或者先就自个否定了自个这种“危险”和“错误”的想法。具体到山西省，大寨擎旗人陈永贵是狠揭猛批谢振华的总指挥，他要让王谦肃清谢振华的流毒，自然也不会放过刘灏这个“谢振华的贴身小棉袄”了。现在毛主席不停地批邓，邓小平看来又要倒台了。那么，如果王洪文掌了权呢？王洪文的政治背景倒是靠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但王洪文掌了权，就等于江青掌了权，再具体到山西省，江青要炮轰谢振华，陈永贵也跟上江青

要批倒谢振华,王谦呢,跟上江青和陈永贵,也唱着同一个批倒谢振华的调子,自然还是不会放过被人称之为“谢振华贴身小棉袄”的刘灏了。

左思右想,刘灏就是想不出个好前程来。

自打“文革”开始扯旗造反,无论是炮打黑省委,还是在对待刘格平夺权问题上的来回反复;无论是无休止的派斗,还是去北京住学习班斗私批修;他始终想着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背离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要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领导岗位后,更是不断学习毛主席的各种最新最高指示,总想着如何才能按毛主席的教导,将老人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也会老去,也会死亡。在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年代,年轻人心底的虔诚,更促进了刘灏这一代准知识分子的个体无意识。领袖在不断地折腾着,全党在紧跟领袖折腾着,似乎只有不断地紧跟着折腾,才能体会到英明领袖的伟大。直到林彪摔死,直到批林批孔批开了周总理,国人在集体无意识中开始渐渐苏醒,刘灏这样的年轻人,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思考。既是为了自个的命运,也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正是这种思考,让他对红太阳的光芒越来越不理解了。

甚至,他在心中,竟然偷偷地怀疑起红太阳的光芒来了。

然而,红太阳却又一次发出了令刘灏不敢质疑的光芒。

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此决议内容如下:“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其二是:“中共中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此决议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

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泽东在病榻上再次打倒了邓小平,用的依旧是以个人意志突然袭击的战术。老人家早就废弃了党内的民主,高居神坛之上,惯用一人的意志去统领全党和全民的意志。党中央主席的提议,政治局的一致通过,怎么就能连邓小平党外的行政职务也一下子就撤掉了呢?宪法形同虚设,全国人大的任免权形同虚设,全国政协的参政议政权更是一句废话。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两个班子里,打倒谁和起用谁,都是伟大领袖的一句话。所以,仅一句“提议”,因为是最高指示,邓小平的党内职务没有了,党外的职务也全没有了。

虽然打倒了邓小平,头脑始终清醒的伟大领袖,却也没有重用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而是起用了在政治局排名靠后的华国锋,让华国锋一下子出任了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面对毛主席的这种人事安排,时局下一步如何发展?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将怎样搞?躺在病榻上的伟大领袖还没有发话呢,全党在等、在猜,刘灏也一样,他的思想又陷入了矛盾和混乱。他无法解释从北京到地方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不敢怀疑自己心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却又对老人家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既弄不明白,也想不清楚,但还得尽力去照着办。党的高级干部们,比如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那时尚且要经常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最新调子,不停地来“转弯子”,何况一心忠于毛主席,更不可能跳出文化大革命思维的刘灏呢!

【13】王谦在山西掀起批邓高潮

遵照毛泽东主席在病中的最高指示,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立即召开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

宣读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并由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各地奉命行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向中央打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各主要城市都组织了拥护中央决议,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一时之间,全国大小报刊上塞满了这类表态性的文章。

中共山西省委又要表态了。曾跟着江青和陈永贵打倒了谢振华的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此时又要行动起来表态要坚决打倒邓小平了。1976年的5月11日,在省城太原的杏花岭体育场,王谦主持召开了有省军区党委领导、省、市党员干部、太原市所属县(区)三级党委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7万人参加的批判邓小平动员大会。在会上,王谦以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了中共山西省委坚决支持和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的政治态度,将矛头直指“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带头高喊“坚决打倒邓小平,与邓小平血战到底”。王谦演讲毕,省军区司令王扶之、太原市委书记黄志纲也以同样的批邓高调做了发言。会后,王谦带头,领着与会的7万干部群众,步行大游行,天黑后,游行队伍又打出火把。火光闪闪,映红省城大街,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表达了山西省委要愤怒声讨邓小平反革命滔天罪行的政治态度。刘灏所在的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一班人马,也在区委书记赵治业的亲自带领下,领上基层的党员干部们,进城参加了这次大集会和大游行,紧跟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声讨和打倒邓小平。

5月12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发表了重要消息,大标题是《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军区党委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高潮》,对中共山西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这次活动,作了如实报道。

5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三家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文章把邓小平与刘少奇、林彪并列,称为“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并且指出同走资派的斗争“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王谦作为“文革”后期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在这次亲自主持的大集会和大游行中,表达了他打倒邓小平“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这样做,无非是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生怕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掉了队,生怕在中央发布两个决议后批邓不得力。“文革”10年中,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如一首民谣所说: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官员们,也常常需要不断地表态和转弯子。在那样一个大革文化的命和不要独立思想的年代,封闭和高压不但造成了民众思想的萎缩,对党内高干们而言,也是如此。真理



毛泽东再选接班人,选中华国锋

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大悲剧所致,王谦如此,并不奇怪。

1976年的7月6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11日，朱德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致悼词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毛泽东主席同样没有参加朱德委员长的追悼会。

在“文革”中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虽然享受着全国人民在各种集会场合上，高喊着比万岁、万万岁还要虔诚的万寿无疆的祝福，却依然走到了风烛残年之际，病魔缠身卧床不起的传说，在国人心中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事实。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即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1976年的夏天真是一个让中国人难熬的夏天。在那个夏天，刘灏渐渐又萌发了一个想法，他又想去上大学了。原因很简单，“文革”已经10年了，在这斗来斗去的10年中，他感受到了政治的无情和残酷。无情让他厌倦，残酷令他后怕。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再次倒台，表明江青、王洪文的势力正在继续上升，而江青、王洪文是支持陈永贵和王谦炮轰谢振华的，一个不选王谦事件，就被停职了一年，如果继续待在山西，政治环境只会对自个不利。刘灏的父母亲毕竟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他们也希望儿子找个机会，回到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机会肯定是有的。刘灏是中共太原市北郊区的区委副书记，他就分管着教育这条战线。经他的手，太原市北郊区基层又一批可以上大学的工农兵们，即将去大学校园读书去了。他如果也想去，那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甚至找来了一些过去高中和大学的课本，开始抽空复习。假如要去上大学，他自信自个高中三年的学习功底，比那些没上过高中的工农兵学员们要强得多。在那个年代，刘灏在山西既没有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山西的政治环境也容不得他洁身自好。如果能跳出山西，脱离山西官场，踏进一所省外的大学，相信刘灏将获得另一种人生。

他想明年就走这一步，离开山西，离开目前身在其中的山西官场。

然而，历史却不容许他走这一步了。

这一年的8月23日，发生在太原铁路局的一次恶性事件，让刘灏背上了莫须有的政治黑锅。

【14】王谦在太原铁路局被揪斗

需要先说说太原铁路局的建制演变。

1949年6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铁道部，将同蒲铁路管理局与石家庄铁路管理局合并，成立了太原铁路管理局。

1950年8月，国务院接收军委铁道部，太原铁路管理局下属太原、临汾、石家庄三个铁路分局。

1951年8月，国务院铁道部将天津铁路管理局和太原铁路管理局合并为天津铁路管理局，下属天津、北京、张家口、石家庄、太原、临汾六个铁路分局。

1953年1月，铁道部再次成立太原铁路管理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

1963年2月，铁道部撤销太原铁路局，在山西境内设太原、大同两个铁路局。

1969年月12月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决定成立太原铁路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和一个工程总队。后铁道部恢复，太原铁路局下属太原、大同、临汾三个铁路分局的建制未变，而下属工程总队改为基建处。到了1976年，依旧是这种建制。了解了这些历史，在下面的叙述中，关于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称呼，读者就会理解了。

再说说太原铁路分局两派的简况。

1966年“文革”初起，太原铁路分局也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一派

为太铁红旗造反兵团，简称太铁红旗；一派为红色铁路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铁总。在省城的“文革”演变中，太铁红旗最早是红联站的部队，在七月会议后，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红铁总则加入了红总站。

太铁红旗的司令，是一位工人师傅，叫陈德才。政委是太铁分局南机务段工会副主席张安邦；副政委是太铁分局工会的宣传指导员王弼现。他两人是干部，也就成了太铁红旗主事的领导人。而红铁总的领导人，是太铁分局的一位列车长周万喜。他们都是“文革”中响应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组织队伍，参加“文革”，根子正，出身好的年轻工人和年轻干部，也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太原铁路局的机关就设在太原，局机关的干部和职工，也分别参与了分局的这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

1968年9月，太原铁路分局在69军派驻军管会首长的带领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的部队首长，是革委会主任。在这个班子里，张安邦和周万喜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副主任。那位太铁红旗的司令陈德才，因为是一线工人，没有进入革委会领导班子。太铁红旗的副政委王弼现，由于文化水平较高，说说写写都行，先进入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工作，1973年3月，他被省委任命为太原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张安邦则被任命为太原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

那么，原红铁总推出参加大联合政权、出任了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的副主任周万喜呢，这时非但没有升官，还蹲进了监狱。原因是1969年谢振华负责在山西全境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时，驻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军管会查明，在两派的一次武斗中，太铁红旗的一名成员、通讯工段的工人宋锦，是被红铁总一派的武斗人员打死的。直接凶手被判死刑，周万喜作为红铁总的负责人，负有

领导责任,被判处5年徒刑。到了1974年,谢振华被江青炮轰,陈永贵和王谦主持批谢时,周万喜一案,被列为谢振华制造的冤假错案,这一年的8月,周万喜被平反,提前出狱。

周万喜将被如何安排工作呢?太原铁路局党委和革委会,要让他当工人。且不说这种安排合适不合适,问题是中共山西省委在1975年3月下发了一个晋发22号文件《对周万喜处理的批复》,明确了“周万喜的工作,由太原铁路局分配做工人工作”。也就是说,在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的权力布局中,周万喜将由此出局。

现在需要提及著名的1975年中央9号文件了。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开始大力整顿全国铁路系统。9号文件的第四条规定:“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应久拖不决,防碍大局。”但是,什么才算“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干部和头头”呢?在各地的确认和执行中,就会有各地的思路 and 标准。

山西正在批谢振华的流毒,谢振华主持山西省委工作时安排的一些干部,自然也就归入了“流毒”的范围。在山西省委、太原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驻太原铁路局工作组合力对太原铁路局的整顿中,有一些干部被定为“调离干部”,王弼现和张安邦均在此列。而平反出狱的周万喜呢,则要求重新分配工作,认为被安排工人是错误的,是谢振华路线对自个的迫害。

且放下省城太原,再说说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时任大同市委书记的赵力之,在其《赵力之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1976年,北京、上海、天津煤炭告急,4月2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纪登奎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求大同救急,保证煤炭运输,特别是京、津、沪的用煤。他说:“老赵你要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大同的煤炭运出来,无论如何要保证京、津、沪的用煤,假如国庆节总理举行招待会,电灯突然灭了,怎么办?这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大事啊!”当晚,市委在大同铁路分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及时进行传达部署,研究贯彻执行措施。会后,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除留一人在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分三个组带领机关工作人员下到口泉站、大同站、机务段蹲点。……

我们进入分局蹲点的市委领导同志,首先是帮助分局党委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在那个年头,“四人帮”到处插手,铁道部门是被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他们煽动派性,挑拨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使分局分成两大派,一派支持党委书记,另一派支持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我们经过耐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服他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求大同,存小异,顾大局,识大体,各自多做支持自己那一派的工作。经过整顿,运输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运量有了显著提高。担负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平均日装车由四月份的759车,到六月份提高到886车,到9月份便把大同煤矿积存的100万吨煤全部突击运出去了。为此,铁道部向大同市授旗予以表彰,时任部长的万里同志表示感谢,省委要市委汇报,我们较为客观地进行了总结。之后,省委把大同市委的做法报告了中央。中央肯定了大同解决这个问题做法。中央办公厅同志电话通知我去一下。我到北京后,袁木同志约见了,把预先已排好的文件大样(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让我看。文件内容加进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我看后没有提什么意见。袁木同志说,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请你签字,然后我们就送审以党中央文件下发了。于是我便签了字。我从北京回到太原后,立即向王谦同志(省

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报告了这一情况。1976年6月26日,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1976)12号文件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正式接到中央文件后,省委和大同市委都进行了传达贯彻。

实实在在地讲,当时大同市委的报告,原本没有提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不是我们觉悟高,认识到“批邓、反右”是错误的,更不会预料到后来会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实在在地讲,我们在大同铁路分局蹲点期间主要是认真耐心地做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说服他们顾全大局,团结合作搞好煤炭外运,保证京、津、沪的需要。同时特别注重了恢复铁路运输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而不是靠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工作,促进运输的。但是那时的形势又只能违心地说话办事,因此,我没有提任何意见,便签了字。

赵力之的这种回忆,是实在话。从中也可以看到,在总结工作成绩时,那种上纲上线,务虚第一的写报告方法源头所在。在太原铁路局和太原铁路分局,正是由于务实不足,没有认真做好两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结果导致了一次大的事件。

1976年7月中旬,王谦亲自坐镇大同,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大会。太原铁路局和下属分局的各级主要干部都参加了大会。大会高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经过49天的学习讨论后,于8月21日结束,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太原铁路局的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弼现,太原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张安邦都参加了会议。

前面提到,此二人已经成了“调离干部”,怎么又来开会呢?原来,王弼现与张安邦等几位被调离的路局和分局的干部,在1976年春

天,去了北京上访。经铁道部万里部长过问,又经铁道部和山西省委沟通,两家达成共识,让他们回来继续担任原职务,在原先的岗位上搞好本职工作。会议快结束时,省委和太原市委、太原铁路局党委又达成共识,让周万喜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铁路分局的革委会副主任。问题是,有关领导还没有做好两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这消息就被走露了。

按说,下级对上级任命的干部,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甚至可以越级反映,但“文革”思绪依旧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盛行。一场要阻止任命周万喜职务的密谋开始了。太原铁路局政治部干事张金高、太原铁路局保卫科代理副科长种志远、太原铁路局公安处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和、太原铁路局工程处技术员陈岳秋等人,组织人马,决定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8月23日,太原铁路局党委要在太铁俱乐部召开贯彻大同会议的大会,并邀请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副书记马杰等领导参会。而张金高等人也决定,在大会开始前,揪斗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局级领导,以阻止对周万喜的任命。

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大会尚未开始,早已组织安排好的一群工人,就将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领导在机关拦截住,拉到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上,开始游街批斗。王弼现和张安邦等其他领导到了会场,见到坐在俱乐部贵宾室的,只有王谦一位领导。原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在路上听到会场有变,小车掉头而去。副书记马杰的车被拦下,人被截走。王谦真算得上是条硬汉,路局、分局到会的其他领导请他离开,以避免发生意外,他却安坐不动,并指示让王弼现等人坐上他的小车,去阻止游斗谢治国等领导的行为。王弼现等人便钻进王谦的专车,去追赶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他们果然追上了游斗谢治国等领导干部的队伍。但不仅没有拦住队伍,下车劝说的王

弼现面对被极左思潮煽动起来的工人们，反而被骂为叛徒并遭到了殴打。

在得知王谦到了会场贵宾室后，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一干主要组织者紧急商议，陈岳秋提出要揪斗王谦。虽有不同意见，但陈岳秋却坚持干下去。他带人返回太铁俱乐部，将王谦绑架到一辆早已备好的邮政闷子车内，等车开出了太铁俱乐部，又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沿街游斗。

其时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侯光天在其《岁月浪花》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车进行到府东街省委大门口时，我们得知消息赶了出去。看到这种局面，我立即冲到卡车前，与他们交涉，给王谦同志摘掉牌子，并让王谦同志坐下，结果被他们拒绝，并将我强行推走。当游斗结束后，受史怀璧同志委派，我和周贵同志将王谦书记送到晋祠 276 医院检查休养。

可怜这位从“文革”开始，就被斗了一次又一次的原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紧跟江青和陈永贵批判谢振华的现任省委第一把手，这一回，又被基层的造反派们揪斗和游街了。

陈岳秋策划揪斗王谦，临行动前，给王大壮打去一个电话。此时的王大壮，早已分配了工作，在太原市建工局上班。他已经不再是山西省建筑专科学校兵团的领导、身挎盒子枪的王司令了，接到陈岳秋电话，连声说现在早过了揪斗当权派的年头，劝陈岳秋不可一时冲动。对方听不进去，撂下了电话。王大壮急忙骑上一辆摩托车，赶往出事现场。眼前的局面，他已经无法控制。只见一伙工人已将王谦架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开始出发游街。陈岳秋的手下有人认识王大壮，二

话不说,就将一个写着副总指挥的条子,贴到了他的摩托车后架上。仅就此事,王大壮可能日后还住不进大狱,毕竟他赶到现场时,陈岳秋组织的行动已经开始,说是想阻止,他没有能阻止上,说是当上副总指挥参与指挥了,他也没有能指挥上。问题是王大壮和陈岳秋,算得上是“文革”初期就结识的战友,是弟兄。事后公安机关要按中央和省委指示,抓捕这一事件的策划人,陈岳秋又偷偷去找王大壮,王大壮又偷偷送他离开了太原。待日后省公安厅在全国通缉陈岳秋,陈岳秋在南方某地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后,王大壮也就因协助其偷跑,被关进了大狱。

得到王谦被揪斗和游街的消息后,在太原市北郊区做副书记的刘灏,虽然事前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为昔日兵团的部下今日雄风犹在,着实心中有点高兴,你王谦跟上江青和陈永贵整倒了谢振华,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但转念又想,今非昔比,眼下中央正在搞铁路系统的整顿呢,揪斗领导干部,肯定不符合大方向。他很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又引出什么其他恶果来。

果然,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后,中央立即指示要严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

我收集到一份中共中央 1976 年 8 月 26 日给山西省委的电话通知件,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大约是当时省委印发至有关党委、部门向党员和干部众传达的依据,全文如下:

山西省委:

据了解,8月23日下午,太原铁路局召开贯彻中央(1976)12、13号文件,学习大同经验汇报会议的时候,陈岳秋等个别坏人蒙蔽和煽动少数人,挑起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事件,绑架、打伤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王弼现等同志，破坏中央(1976)12、13号文件的贯彻执行。中央要求你们立即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一、省委贯彻(1976)12号文件，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是正确，必须继续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二、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对陈岳秋、梁永智等几个打人凶手，要立即逮捕法办。被揪走的太原市副书记马杰同志，要责令他们立即送回。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抓人、扣人。

三、省委要继续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个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发展大好形势。

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有错误的同志，要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转好弯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充许犯错误，充许改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

五、任何人不准串连，不准拉山头，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占据党政领导机关。现在占据省委机关的人，要立即退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

1976年8月26日

(根据录音整理)

根据中央这个电话通知，中共山西省委遂于8月27日上午，举行广播大会，贯彻中央指示，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了这一事件的一

批策划者、指挥者和打人凶手。在被逮捕的这些人中,还有王弼现和张安邦,他俩的罪名,是“8月23日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1978年12月27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78)法刑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判定王弼现、张安邦为8月23日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王弼现被判无期徒刑,张安邦被判有期徒刑20年。

其余张金高、种志远、程子和、陈岳秋等22人,分别给予了判刑和免于刑事处分。其中,张金高、种志远二人被判无期徒刑,程子和与陈岳秋二人被判有期徒刑20年。

1980年10月15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了此案,下达(80)晋法刑一上字第44号刑事判决书,其中第二条判处程子和、种志远各有期徒刑5年;判处张金高、陈岳秋各有期徒刑4年。第四条宣告王弼现、张安邦等15人无罪。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时间,是1978年12月27日。其时,正是王谦以省委第一书记之权势,在山西大搞倒清查,划大线,切西瓜,炙手可热之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时间,是1980年10月15日。其时,中央已任命霍士廉取代王谦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被免去职务的王谦,到北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被法律宣告无罪后走出大狱的王弼现和张安邦,还是因为有“文革”中造反组织领袖的身份,被调离山西。周万喜在太原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位子上干了几年后,被调到榆次站当了站长。

发生在太原的这次揪斗王谦事件,是中国“文革”进程中,省委第一书记被群众揪斗的最后一例。那些组织者和参与者,曾经是红联站的战士,后来也当过兵团的战士,虽然他们这次行动,只是本系统一些人组织的一次造反行动,但他们用“文革”初期的方式造反,足见“文革”思维在群众中的流毒。而当局硬要把这笔账,算在早已解体的

红联站和兵团的原领袖们头上，将王弼现、张安邦投入大狱，判处重刑，还要将段立生、刘灏、宋捷等怀疑为更大的后台，反复审查，也足见王谦这样的老干部们，运用起“文革”中有罪推断的整人手段来，比造反派们要娴熟的多。

【15】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下午。

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的常委们正在开例行的常委会议。身为副书记，刘灏也坐在常委们开会的会议室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出了沉重的哀乐，那种肃穆凄婉而又凝重悲哀的音乐，一下子慑紧了区委全体常委的心。上午就接到上面的重要通知，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有重要广播，看来，是谁也担心而谁也不敢说出口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留下的一副照片

果然，传来了哀乐声中的新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

举国震惊。一个小小的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的常委会议，立即解散休会。刘灏从会议室出来，面容与所有的常委一样不知所措。正好有不知趣的下级照老例去请示他们的主管副书记：“这下一步的工作……可怎么办呀？”

刘灏一脸悲痛地回答说：“天都塌了，谁还知道该怎么办！”

确实，在太原市北郊区委的大院里，没有人知道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唯一能办的，也是当务之急要办的，就是在大礼堂设灵堂。

天安门前开追悼会，各地也在同时开追悼会。面对着毛主席的遗像，刘灏的眼泪是真诚的。他从1966年开始，就投入了至今尚未进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中，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又做了官。10年了，他时沉时浮，自认为是事事紧跟毛主席，而从没有想到毛主席一旦闭了眼，“文革”该怎么办？他又该怎么办？

过去想过，想不出个眉目来，于是也不愿再去多想。可现在他必须想一想了。可想一想还是想不出自己将是个什么结局。

还得具体到山西，因为他认定自个的命运系于山西的政局变化。

想来想去，陈永贵听上江青的话，是山西批判谢振华的总指挥，山西现在又是紧跟陈永贵的王谦掌权，虽说他没有公开反对过陈永贵，但公开支持过谢振华，公开反对过王谦。王谦一直还在“肃清谢振华流毒”，不停地找机会整肃反对过他的人，刘灏明白，只要他不昧着良心，不投靠王谦去给谢振华落井下石，王谦是不会放过他的。从北京数到山西，刘灏对未来，还是想不出个名堂来。

在北京，一步步踏上神坛的神，再不能发出最高指示了。被毛泽东生前视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在亲自下令于天安门广场上为逝世的毛泽东主席兴建纪念堂的同时，又联手叶剑英等党内元老，在1976年的10月，将追随毛泽东推进“文革”路线的王洪文、张春



“四人帮”被押上审判席

桥、姚文元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等党羽一网打尽，将王、张、江、姚定性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押上了特别法厅的审判席。王、张、江、姚们追随毛泽东大搞“文革”，党的九大后趁势而上，恐怕没有想到，最后落了个代其受过的结局。之后，由上而下的一场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大运动开始。在全中国，如刘灏这样只有中学资历的革命小将，党中央决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其“文革”的那段历史了。然而，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却不放过刘灏，要将他押上山西 10 年“文革”历史的祭坛。这次整肃他的起因，便是王谦认定他是 8 月 23 日太铁恶性事件的幕后指使人物。那时是疑罪从有。刘灏先是在太原市北郊区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关进监狱。虽查来查去，他和 8 月 23 日太铁揪斗王谦的恶性事件，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但山西的政治形势，已经注定太原市北郊区，将成为刘灏不得不面对的人生“滑铁卢”之地了。

第十一章

王谦在山西“划大线、切西瓜”，山西又开始了充满派性争斗的清查扩大化。该如何反思“文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命题。

【1】山西充满派性争斗的清查扩大化

当“四人帮”垮台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便成为10年“文革”后的又一场政治运动，从上而下地全面展开。1976年的11月初，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王谦为首的山西省委，要继续“肃清谢振华流毒”，不说“四人帮”如何“炮轰谢振华”，而是把江青“炮轰谢振华”和陈永贵、王谦“批谢”时，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当作了“四人帮”黑手来清查。这次三干会前，王谦拍板，把卫生厅副厅长李瑞芳、省委组织部处长刘志英、省总工会常委杨国和、山西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聂庆垒四人隔离审查，投入监狱。他们四人在“文革”初期是兵团和红联站的观点，“文革”后期反对江青“炮轰谢振华”，不赞成陈永贵和王谦“批谢”。李瑞芳曾是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刘志英则是省委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发起人之一，运动初期给王谦的老婆送过大字报。“文革”初期，机关干部发起成立一个组织，或者参加一个组织，是普遍现象，将这四

名干部逮捕,是公然在清查运动中,要强行形成一派去整另一派的局面。几天后,又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亮等省级机关领导干部被隔离审查,一一投入监狱。

刘灏所任职的太原市北郊区委,原区委书记白玉在1975年秋天,调回太原市委出任秘书长,原太原市水利局局长赵治业,接任白玉,出任了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书记。区委副书记阎福旺,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一直做情报工作,文化程度不高而资格很老。抗战期间,他蹲过日本鬼子的监狱,后来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初始,又蹲过共产党的监狱,平时对上对下说话都大大咧咧,群众威信很高。他原本与刘灏并不相识,刘灏被安排到北郊区任职后,工作勤勤恳恳,也尊重阎福旺这样的老同志,两人在工作上相处很好。王谦要把刘灏定为8·23事件的后台,对这种做法,阎福旺就会上会下,公开表示过反对及对刘灏的同情。眼下区委要根据上级精神,开展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阎福旺又公开表示:“咱小小一个北郊区,谁能和‘四人帮’联系上?千万不能整群众,搞冤案。”赵治业虽然来北郊不久,但抓刘灏的案子,真能抓出个8·23事件的幕后主使来,岂不迎合了省委书记王谦,这点政治敏感性岂能没有!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开始,赵治业先给刘灏办学习班,接着对阎福旺发难,说阎福旺说过,以刘灏的水平完全可以当区委书记,这就是要跟上“四人帮”在北郊区搞组阁名单。他一石双鸟,把副书记阎福旺和副书记刘灏,先后定为揭批对象。区委常委中,由此一下子分成了两大派。14名常委中,以区委书记赵治业为首的9名多数派,将对此持不同意见的5名常委阎福旺、刘灏、尚祥志、米忠旺、席玉兰列成了打击对象,将他们打成了“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先定罪名:两名区委副书记背着区委书记搞过一个组阁名单;再找证据,区委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在区委机关在编的180余名干部中,一下子揪出56个大大小小的“四人帮”的“黑爪牙”和“小爬虫”。而

其中被隔离看管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干部就有 20 余名。抄家、诱供、批斗、各种手段都用过了，结果是，从那 5 名区委常委到其他被审查和被专政的干部，全没有查出他们与“四人帮”有什么牵连。至于刘灏是 8·23 事件的幕后主使，只是怀疑，说刘灏和阎福旺有什么组阁名单，更是子虚乌有、天方夜谭。待到后来给这些人平反时，整人者却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被平反者，还得说几句感谢组织的话。这是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做法，中共北郊区委和有关当事人，当然也是如此。

纵观全山西，原先跟着谢振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物，那时几乎全成了被清查的对象。还有跟着他们的人呢。还有在他们领导下的下属呢。一层一层清下去，山西的清查运动，终于形成了倒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没有人再说江青炮轰谢振华的事情了，原先兵团与红联站的那些领导想提这些事儿也不行，他们大多数都进了学习班，与刘灏一样，开始接受审查和批判。江青炮轰谢振华和支持陈永贵都是事实。江青完蛋了，但在山西，陈永贵还是一杆不倒的旗。于是在山西还有另外一个划线的标准，即王谦规定的“划大线、切西瓜”，那就是凡反对过大寨和陈永贵的人，就得受清查；凡没有紧跟着陈永贵和王谦狠批谢振华的人，就得受清查。这么一划线，就成了省委制定的清查标准，全省就有几万人成了被清查的对象。陈永贵那时继续红得发紫，“农业学大寨”依旧是不可动摇的毛主席留下的最高“旨意”。在山西，跟着陈永贵的一派人，整起原先跟着谢振华的一派人，出现了许多事后看来是十分荒唐和可笑的事。

先举一名老劳模为例，他就是西沟村的那位全国劳模李顺达。李顺达其时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头上被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反大寨的代表人物”。要论当劳模的资历，李顺达要比陈永贵长，陈永贵成了大寨红旗的擎旗人，李顺达可是一心一意要学好大寨。李顺达搞合作化时，就在西沟村的山上种树，满山的树木一片绿。陈永贵在大寨村

的山上平田整地修大寨田,李顺达说要学陈永贵艰苦奋斗的精神,但绝不能为了修水平梯田,就去砍了山上的树。学大寨也要因地制宜原本没有错,却被指控为和陈永贵步调不一致,得让他“讲清楚”。晋东南地委和李顺达所在的平顺县委,都成立了李顺达专案组,平顺县竟有上百名干部被打成李顺达帮派。李顺达的一位秘书,清查中被抓,关入大牢,戴了两个多月的前铐后铐,出狱没几天,就肝硬化死在了病床上。李顺达有个弟弟,叫李贵达,原本在太原工作,清查中被揪回晋东南,遭轮番批斗后,查出患了直肠癌,也不准看病。更让李顺达心疼的,是为了批他李顺达,肃清他的流毒,地区和县里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进驻了西沟村,除了在大喇叭里天天点名批李顺达,还要砍西沟村的树。说不砍倒这些树,就不能肃清李顺达的流毒,就不能扫清西沟学大寨的障碍。仅核桃树,一次就砍倒了800多株。那可是李顺达带着大伙好不容易在山上种活,而且都结了核桃的树啊!李顺达看着那些被砍倒的核桃树,简直就要气疯了!李顺达和陈永贵一样,“文革”初起时,都是听从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老劳模,但在许多问题上,他又和陈永贵认识不一致。都说李顺达是老实人,可老实人的脾气也有犟的时候。他成了被清查的对象,集体的树被工作组砍倒了,还使许多人被株连,但他就是不检查,更不认罪。李顺达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可是,由于成了被王谦点名的清查对象,1978年2月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他被取消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资格。

再举两名老干部为例,

第一位是卫、王、王时代省委的秘书长史纪言。史纪言和赵树理是长治四师的同班同学,交谊深厚。虽然后来没有和赵树理一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但当年也是革命阵营中的文学爱好者,当了省委秘书长之后,被同仁们称为晋东南的大才子。他被重新安排工作后,成

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既是副部长,当然是一人占一间办公室了。史纪言爱跑基层,1975年秋天到太原北郊区下乡,其时的区委书记白玉和副书记刘灏作陪。到了果区,就给史纪言弄了一小面袋苹果。史纪言要给钱,区委有一正一副两位书记陪同着,岂能让他出钱,这苹果就带回去了。这是问题之一。刘灏1966年造省委的反时就和史纪言认识了,后来史纪言被解放出来工作,刘灏是区委副书记,有事进城公干,就抽空跑到史纪言办公室聊一会天。史纪言上下五千年的事,比刘灏知道得多,刘灏爱听他神聊。有一次,两人正聊着,一位同僚找史纪言,一推门就看见了这一老一小聊得热火。这是问题之二。这两个问题在清查开始后,一经告密人告密,前者就成了“串连”,后者就成了“密谋”。史纪言被关进了学习班,可怎么也交待不出他与刘灏“串连”了个啥?又“密谋”了些啥。

第二位是曾任山西省冶金厅厅长,后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李一夫。这也是一位老党员,老革命。1974年3月8日江青穿上军装在北京二七剧场接见《三上桃峰》剧组演员时,高呼“炮轰谢振华”,其后,山西省委在陈永贵和王谦领导下,开始批谢。在此期间,李一夫公开说:“谢振华要干,我陪几年,谢振华要被逼下台,我也不干了。”于是,在山西的批谢中,李一夫就成了被批对象。“四人帮”被打倒了,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用“划大线、切西瓜”的标准来作为山西清查的政策时,李一夫又在一次会上公开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即当时坊间流传的李一夫公开反对省委的三句话:“第一,省委清查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脱离了中央制定的清查运动的规定,自立了标准;第二,山西清查联系实际,首先应当联系江青穿上军装炮轰谢振华这个实际;第三,请张铁生来太原作报告是省委第一书记(孙涛注:指王谦)批准的,报告会省委书记(孙涛注:指王大任)主持的,要查这个问题,省委应先作检查,而不是先查听报告的群众。”然而,这样一位敢说真话

的老干部,却一下子成了省委要清查的“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在省委统战部和省冶金系统多次被批斗。

就连新华社山西分社这样的中央机关驻晋单位,中共山西省委也对其进行了大清查。分社社长方言被关进监狱,好些记者被立案审查。原新华社山西分社老领导马明在2008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撰文《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对此有详尽回忆。文中写道:

按中央规定:分社由总社和省委对分社实行双重领导,是以总社为主的。分社领导班子一般由总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见商定。但是省委没有征求总社意见,就将原有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靠边站,另行指定了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分社工作,又专门派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新兰(原任大寨人民公社妇联主任)带领的清查联络组进驻分社指导清查运动,还违背有关规定查阅了一部份‘内参’底稿。这样一来,山西分社成为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清查重点单位,这在全国省、市和自治区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更耸人听闻的大案呢。在临汾地区,就清查出一桩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所谓的“武装暴乱”大案。新华社记者李果在《记者的使命》一文中,介绍了这桩冤案的始末。

1977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临汾地委一些领导人,受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影响,给蒲县县委书记杨桂舟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和搞“武装暴乱”的罪名,多次对其进行批斗,致使杨桂舟死亡。为杨桂舟开车的司机张七斤、县委办公室主任高宪阁、蒲县铁厂厂长耿玉文,连同在柏山上看庙的桑宝珍老汉,也被关进监狱。……在临汾地区,“谈蒲色变”,人心恐慌,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这确实是一起冤假错案。蒲县是吕梁山区的一个贫困县，杨桂舟当县委书记后，艰苦奋斗，办事讲求实效，踏踏实实带领农民学大寨，修梯田，改变生产条件。……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好书记，临汾地委一些领导由于派性作祟，却对杨桂舟进行诬陷。蒲县县城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柏树郁郁葱葱，人称它为柏山。山势险峻，山上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庙宇，相传是东岳大帝黄飞虎的行宫，所以人们又把它叫作东岳庙。一位姓桑的孤老头常年住在山上护庙。他在山上挖了一个储藏山药蛋、萝卜的地窖，竟被人诬为挖战壕。加之部队拉练时，曾给蒲县一些干部和村民留了一部分子弹，让他们打猎使用。这样，在清查“四人帮”时，杨桂舟被诬陷为要在蒲县搞“武装暴乱”，并把杨桂舟曾冒雪踏冰到农村查看农民修大寨田的活动，说成是为“武装暴乱”察看地形。就这样编造成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武装暴乱”案，并在省城清查“四人帮”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因为展览中只有子弹没有枪，于是又从武装部借枪照相，做成图片展出。

……中央对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新的省委领导对制造这起错案并顶着不予平反的临汾地委个别领导及制造这起错案的有关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并为杨桂舟召开追悼会，彻底平反了这一起冤案。

（摘自新华社记者李果所著《我当记者》一书之《记者的使命》。该书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出版）

再举一个灵石小县为例。据原灵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建祥在其所著《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2008 年 11 月自费印刷）书稿中回忆，在清查运动中，灵石县原陈永贵支持的一派，开始大整武装部支持的一派，在常委班子里和县委、县政府大院清查完以后，又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1977年5月1日,为了进一步深挖“四人帮”的“黑爪牙”,来了个全县大收审,一夜之间收容了干部、群众五百余人。收容所就设在县城东街原县政府大院。收审对象清一色“总部”观点。与此同时,各公社都办起收审队,平均每个公社收审三十人以上,全县又收审约五百四十余人。这样一来,全县又挖出“四人帮”的“黑爪牙”一千余人。一个小小的灵石丙等县,先后在干部、群众中挖出“四人帮”的“黑爪牙”共两千多人,都被戴上了“反大寨”的帽子,遭到了打击迫害。政法干部任宏毓、公社书记杨长胜、武装干部杨克强、公路站长秦兴元、硫磺厂厂长张富保、汽车司机武斌等都是在收容所里被逮捕判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的清查也很典型。这个县“文革”中两派惨烈斗争,你整罢我,我再整你,整人者和挨整者,如鏊子上的烙饼来回翻着。鏊子还是那个鏊子,但鏊子下的“文革”这团火,则由不同时期的不同干部掌握着燃火权,任凭民众如烙饼般来回受折腾。著名作家赵瑜在其《牺牲者》(2013年11月征求意见稿)中,对这个县的情况有如下记述:

该县武斗期间,先是大规模冷兵器鏖战,1967年8月26日,长矛大刀,荒野杀戮,一战杀伤杀死上百人,捣毁汽车38辆;继而农村包围城市,联字号守城红字号攻,工农商学一律停顿,古城长期戒严,铁路桥梁多次被炸,次年二月,69军肖选进将军率领野战连队挺进高平,却因支持联字号而被围攻被打,红字号武装抢夺部队长短枪170支,60迫击炮两门,4支火箭筒,4000余发子弹;然后,五县联军在军分区指挥下,全面围剿高平红字号,攻打多处农村据点,连续作战50天,惨案横生,致红字号溃败;战后,联字号军政大批抓捕城乡红字号

成员,关押到集中营昼夜毒打。该县红字号被治罪者面积甚大,重点注册骨干多至 2738 人,定案为“土匪”的群众竟然达到 168462 人。也就是说,太行山上一个县,一派将红字号 17 万人定了罪,编成档案多达 19 卷,枪决重判一大批人;待到 1977 年“揭批清”时,王谦主政省府,事情又翻过来,1 月 12 日至 14 日,仅三天时间,高平县突击逮捕王学科等联字号头头近 40 人,重点清查 1308 人,6000 多人被关进清查学习班交待问题,种种罪名无法复述。

还可以在省级机关里,举一个知识分子众多的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为例。这个单位隶属于省文物局。清查伊始,这个百十余人的小单位,就有张新华、李正云、邓林秀、梁宗和、柴泽俊、陈哲英、英珍、刘士英、李梅贞、高礼双等 30 多位文物工作者被列为清查对象。高礼双被关押在南文化宫一间昏暗的屋子里,长期见不到阳光,面色苍白,头发胡须蓬头垢面。有一次他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窥望,被一位女同志碰见,吓得惊呼:“鬼!鬼!”张新华被隔离在省委党校进行批斗,受不了非人的打击和折磨,愤然割腕自杀,幸被人发现,抢救及时,挽回一条命。刘士英丈夫住院,她在交城县的五七干校被隔离批斗,不许陪侍丈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专案组才准她去探视,丈夫却已绝命而去。遗体火化后第二天,刘士英就被逼回干校检查,因悲愤过度,昏倒在干校的院子里。

上行下效,省委不检查自个的问题,下面的各级党委,也将原本应该自个检查的问题,推给了一般群众。原太原市政协副主席、2012 年春上被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授为太原市首席文化专家的王继祖先生,当年就遭遇了这种不幸。1976 年,山西大学校方组织几位优秀学生代表到清华和北大参观学习,名曰交流教育革命的经验,即将毕业的王继祖是代表之一。山西省委请张铁生来太原传经送宝,山西大

学校方也出面请这位白卷英雄来学校做报告和搞座谈会，校方组织了几名学生，做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王继祖被选中参与其事。全是公干，没有一点私下的活动。可清查一开始，山西大学校方就将王继祖等学生列为清查对象。这些学生已毕业离校，王继祖回到了上大学前的工作单位太原工交大修厂。山西大学校方将检举材料寄到太原市的清查办公室，王继祖就成了市里督办的清查对象，隔离了，挨了一顿整，但查来查去，查不出他究竟和清华、北大以及张铁生有什么非组织活动的“黑关系”。凡搞运动，总是群众先倒霉，这号事多得说不完。

不必再举例了。还以刘灏所在的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机关为例，当时清查被揪出来的那 56 个大大小小的“黑爪牙”和“小爬虫”们时，有一条后来听起来让人发笑的“清查标准”，那就是清查当事人为什么不积极批判邓小平。比如让被清查的对象老实交待，为什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你没有写大批判文章？为什么通知你去杏花岭体育场，参加由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召开的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议和打倒邓小平的集会和游行，而你却没有去？

具体到当时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第一把手赵治业，还有区委直接掌控的清查办公室，他们让刘灏交待什么呢？

那时“文革”还没有彻底否定。两个“凡是”还是金科玉律。正如 1981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 25 条所言：“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从中共山西省委到太原市北郊区委，一面还在继续维

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面又让刘灏交待问题，难不难？对专案组人员来说，运用上“文革”中常见的“思想犯罪”的推断手段，在两个“凡是”的理论指导下，也不难给刘灏生造出罪名来。你没有直接指挥8·23揪斗王谦事件，可你是不是在思想上指挥了？你虽然没有直接反对陈永贵和大寨红旗，可你是不是在思想上反对了？你虽然没有和“四人帮”有直接组织关系，但你是不是思想上和他们一样？你虽然口口声声说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思想上是不是一直反对毛主席和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呀？

思想是个无形的东西。用这样的思维在思想上一深挖，全有了，不仅是刘灏，在太原北郊区，那56名被清查的对象，全有了可以逼其交待而且可以批判的东西。区委书记赵治业先把5个倒了运的常委打成“帮派体系”，定性为“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再寻找罪证，于是就有了种种笑话。那位被审查的常委席玉兰，当时还是年轻姑娘。一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生，是来自太原市北郊区的工农兵学员。入学前就与这位姑娘相识。后来一个进了清华大学，一个在太原市北郊区被提拔成了区委常委。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给做了区委常委的姑娘来过几封信，清查中就成了这个女常委“和清华大学有联系”的罪证。在被阶级斗争的弦绷了十多年的专案人员心中，“四人帮”派迟群去清华大学活动过，清华大学又是“四人帮”的“黑窝”，有清华大学的来信，不好好查一查能行？

【2】刘灏的一条“大罪状”和段立生的“选举名单”

刘灏那时还有一条“大罪状”，叫做“转移了谋杀省委领导王谦同志的凶器”。1993年的《火花》杂志（由山西省文联主办）7月号和8月号的合刊里，有当事人写的一篇散文，名为《枪和刀未构成惊险小

说》，对这件事有如下回忆和描述：

那年我即将 30 岁，已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市郊机关做通讯组组长，工作的极不顺心。上面让批邓，还要结合“三株大毒草”来批。看看上面发下来的“三株大毒草”，那内容又极符合自己的思想，便写不出批判文章到报上去发表。通讯组组长懒得写文章，总得找些事做。宿舍区兴起沙发热，我也找太钢的朋友弄来两根废铁管，折成两个简易沙发架子，只等组装成型。朋友说，得刮掉铁管上的铁锈，才能刷油漆；朋友又说，这事不比弯管子造型打眼儿，不难。给你找个刮刀，你先慢慢干着。我不想逮住朋友用个死，于是请朋友帮着从厂里找来一把刮刀，下班回家，时不时地刮刮铁锈，再用沙纸打磨铁管。沙发终于做就，且在铁管支架上刷上白漆，家中突然就显出一些富贵和豪华。那刮刀呢，也就被我暂时扔在了床底。

问题就来了。“四人帮”倒台，极左思潮在基层大滑坡。我所在的市郊那个机关，十几个常委哗啦啦就斗将起来。北京有“四人帮”，基层岂能没有？北京有组阁名单，基层岂能没有？王洪文要在上海搞第二武装，基层岂能没有？大斗一场，有 5 个常委终居少数，被多数常委团结起来打成了“四人帮”集团。机关还不足 200 名干部，有 50 多个成了这个集团的反动分子。这被审查被隔离被发动起来的群众用大字报批得一塌糊涂的 5 个常委加 50 多个反动分子，始终交待不出个组阁名单。但既是反动的东西，不痛打不会倒下。于是，我的家终被抄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抄家也事出有因。被打倒的五位常委中有位副书记，当年是省城的造反大兵团司令。我当年不认识司令，司令也不认识我。司令到基层做了党的副书记，分管通讯组，我少不了得听副书记指示和向副书记汇报工作。副书记当司令前是五中学生，也爱看书，我从司令家也

借过些书还有几本中央到地方批林批孔的材料汇编。这是公开的事儿，自然有人见过。见过的人揭发这事，那些书和材料自然要先冠之以“黑”字。那么不抄家能行？

于是，抄走了书架上那些书和文件汇编，还抄出了那把刮刀。同时，我一部 30 万字的长篇小说手稿以及发稿剪样、退稿信种种，也尽数抄去。只是终未找出组阁名单。大会上，我那把刮刀被义正辞严地声讨为“黑手们妄图谋杀省委领导的凶器”。其时，我已被单独隔离，连上厕所身后都跟着“卫兵”，只有在大会上老老实实听审，绝不敢辩白一句。那些书和材料以及小说，如何就能和篡党夺权联系起来？那把用来刮铁锈的刮刀本是工厂车间常见的小工具，如何就成了那位副书记谋杀省委领导的凶器！几年后机关又发下红头文件，给我平反，还说要把非法抄走的东西尽数退还。书籍材料汇编还在，刮刀也在，我的发稿剪样也在，只是那部 30 万字的长篇手稿不在了。追问，专案组同志笑着说，大伙传着看，好看，也不知传到哪儿去了。

我好伤心，30 万字呐！

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三株大毒草”，是“文革”后期邓小平搞整顿时，向下面传达的三个文件，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试图在当时“文革”的条件下，从全局到具体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发展经济。后来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文，将这三个文件统称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进行批判。

当刘灏也落到了被他属下的干部们造他反的时候，面对起来造反的一些机关专案组人员将“转移了谋杀省委领导王谦同志的凶器”这顶帽子，强行戴到他头上，并将他按倒在地时，他无法辩解的困顿、

冤屈,与当初卫恒被造反的学生们诬其保存了蒋介石画像,并被按倒在地时的困顿、冤屈,大约具有了一定的相同之处。这种好笑、好悲、让当事人有口难辩、欲哭无泪的故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在太多了。“文革”中从运动初始横扫牛鬼蛇神的红五类学生开始,到一茬一茬的造反派们揪斗走资派,再到各种专案组整人,都是延用了有罪推断的手法。先断定你犯了某某罪,再收集用以批斗和打倒你的各种材料,这种材料,也就无须鉴定其真伪了。如果没有事实和行为可以定案,那就挖思想,挖思想是个虚的,但却又很实。说你思想上有了什么罪行,那你肯定就是有什么罪行了。诬陷这种整人的手段,在“文革”中已经被各类人都运用得十分娴熟了。北郊区的这种清查,煽动起一些党内外热爱搞政治运动者们的斗志,他们对被隔离审查的对象,除了上纲上线斗争,逼其交待专案组设想好的罪行外,有的专案人员还用被子捂住当事人痛打,或用车轮大战让当事人几天不能睡觉等野蛮手段,显示自己的革命义愤。

再说说段立生。这位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担



孙涛(右)采访刘灏(中)宋捷(左)留影

任过红联站勤务组的领导人。在谢振华将军主政山西时,先做了太原市清徐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做了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1976年12月,山西的清查运动刚开始,他就被离审查,关进了监狱。我曾采访过段立生,问他:“清查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段立生说:“那就给你说说专案组给我列出的第一号问题吧。”于是,他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清徐县有几个村子,产杏,而且是百年老树,名曰沙金红。这沙金红杏通体透红,内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乙,含量远远超过苹果。此杏皮薄肉甜,可增加人体钙质和软化血管,对治愈支气管炎和胃疼也有奇效。段立生做了县委副书记,给县里办事,难免要找市里和省里的领导,待沙金红成熟季节,就想到要给市里和省里的领导送上一两箱尝尝鲜。自有跑腿的司机去办这事,可给谁送,段立生要拉个名单。想起一个写一个,就写下了大约二三十个人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称其关系户。拉完这些名单,随手在名单上面标了四个字:送杏名单。清查一开始,段立生被隔离审查,投入监狱。专案人员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就查出了这个名单。段立生的字太随意,太潦草,专案人员看来看去,就看出了问题。他们将“送杏名单”认作了“选举名单”,再一推理,这是不是策划让大家不选王谦当四届人大代表的什么名单呢?或者,这就是一份要搞政变的“组阁名单”吧!立即将原件用塑料文件袋封好,列为段立生的第一号问题。专案人员让段立生交待他列出“选举名单”的前因后果,段立生交待不出,拒不承认列过什么“选举名单”。一拖再拖,一问再问,专案人员好执著,认定证据在手。段立生也好无奈,就是交待不出他有什么“选举名单”。最后刺刀见红,专案人员拿出了封好的那张纸,逼问他:这些“选举名单”,可是你段立生亲笔写下的呀!看你这回交待不交待!段立生一看,原来如此,只好苦笑着说:“我这是‘送杏名单’,你们去调查一下,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吃过咱们县的沙金红呀?”我问他:“你这名单上有些啥人呀?”段立生



孙涛(右)与段立生夫妇留影

说：“具体我也想不起来了，那时我给县里办事，和省里市里不少部门打过交道。比如刘开基副省长，一直分管农业，对清徐支持很多，我就想让老领导吃一箱箱清徐的沙金红。那个送杏名单，就是这么来的。”

有罪推论，就会给被整的人弄出种种罪名来。“文革”中，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大批老干部被整时如此，刘灏、段立生这些造反派挨整时，也是如此。

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在一步一步地否定“文革”，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和中共清徐县委这样的基层党组织，也得不断纠正自己的“文革”思维。当时太原市北郊区的各种清查专案组，给56名被清查者定的“罪行材料”，最后都以没有事实而一风吹了，形成文字者，也当着当事人的面做了烧毁。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以这种方式否定“文革”思维，改正错误做法，凡此种种，一直到1981年4月25日区委为受错误清查的受害人召开平反大会，才算了结。清徐县的所谓段立生帮派一案，受到整肃者，最后也以统统平反了结，此处不再细述。

也有的单位领导，不愿承认自个清查扩大化，硬要给被清查错了

的同志,做出一个清查结论,以说明给对方办学习班没有错。原太原六中 32111 公社的负责人李金渭,也是六中革委会主任,后来分配到太原电子系统工作。清查开始,就给他办了学习班,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他想报考大学,却因是被清查对象,单位领导不容许报考。查了几年,也没查出他和“四人帮”有什么牵连,但后来还是给他做了个政治结论:“文革”中带人打死一条狗,犯有一般性错误。也确有此事,1967 年 5 月,李金渭在外办完事回学校时,在离学校不远处被一条狗扑来咬伤小腿,六中的一些学生见状,有人扶他去医院,有人就合力将那条狗打死了。几年查出这么个事来,却让李金渭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

【3】山西另列清查标准的一些原因

1982 年 3 月 25 日,在全省清查善终工作座谈会上,时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一书记的朱卫华在讲话中说到,全省列为清查对象的共有 15369 人,涉及人数为 35569 人。全省只有 55 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错清查的面占到 99.9%。这只是属于官方统计的缩水数字。如当时的太原市北郊区,明明清查了 56 名干部,却只说给刘灏和阎福旺两名区委常委办了清查学习班,阎福旺清查错了,刘灏的问题还需要研究云云。

在谢振华和王谦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一直在省委办公厅会务组工作的侯光天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1976 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即在全国开展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山西在王谦书记关于“划大线,切西瓜”的思想指导下,无限扩大了中央关于清查的范围和标准,将山西搞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千万多人的山西,就清查

出了几万人,有据可查的晋东南一万,太铁系统一万,太原市一万。我们不足 20 人的办公室,也有 5 人被清查,占到四分之一。

这次清查是对谢曹路线的继续清算,尽管 74 年毛主席就作了“到此为止”的批示,但依然对谢振华同志不依不饶。也是一场煽动派性的斗争,用一派清查另一派,使山西的派性重新复活。同时在一些地方还进行了“倒清查”,即用该被清查的人清查了不该被清查的人。

这次清查运动所带来的恶果,直到 80 年 10 月王谦同志被调离山西,霍士廉同志担任省委书记起才开始予以解决,并在随后予以纠正。

(摘自侯光天自编的《岁月浪花》一书)

1980 年年底至 1983 年年底曾担任罗贵波省长秘书的荣奋先生,对山西的清查扩大化问题,也有记载。在其《八十年纪实》一书(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出版)中,他谈到清查结束后,省里的一些调查情况:

省(里)派人以太原市作了调查,清查涉及到 1.6 万人,官方数是 5260 人,相差一万多人;运城地区、吕梁地区和其他地区官方数与调查数均有出入。如吕梁地区临县、交城、文水三个县经调查,清查涉及上万人,而官方报数只有 2414 人。1981 年至 1983 年之间,人民群众向时任省长的罗贵波反映清查问题的信件达 7482 件,其中反映清查人数在 40 万左右。这个数字虽然不可信,但也不是象官方统计的只有 3 万多人。估且按官方报数评价,除了太铁和太铁机车车辆厂两个单位外,全省错清查的占 99.9%,这是官方承认的数。那么还有 0.1% 的人数,即 55 个尚待研究,没有定性。可见,山西的清查不是一般的扩大化,而且基本上都错清了。

198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记者许仲英、田培植撰写的文章《长期影响山西安定的两大问题得到澄清》,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在“四人帮”横行时,由于所谓“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山西不少干部、群众吃过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又变成“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列为山西省清查运动的两个主要内容。许多受迫害的同志一再提出申诉,山西省委前某负责人坚持错误观点,拒不予以改正。现在,党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山西省委已经采取措施,清理“左”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颠倒了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山西可望走上真正安定团结的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对山西在清查另列标准有具体的总结和描述:

大寨和昔阳是江青多次活动的地方,可是,山西省委却决定,大寨昔阳的问题都免于清查。相反,当“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山西省委就曾以“谢、曹路线”和“反大寨”两个问题整过不少干部和群众。“四人帮”倒台以后,又将“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说成是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而且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作为清查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对曾经支持或同情过谢、曹,发表过对大寨表示不满的言论,或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抱有某些看法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清查。

……山西省委直接抓了以两名常委为首的“帮派体系”,省委组织部58名干部,有15名被列为清查对象。各厅、局、地区仿照省委的做法抓各自的“帮派体系”。省卫生局抓了以前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省公安局抓了以正副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太原市抓了以市

委4个负责人为首的“帮派体系”，临汾地区抓了以一名副书记为首的“帮派体系”。许多县和基层厂矿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也抓“帮派体系”。临汾地区共18个县、市，抓出了13个“帮派体系”。……在清查中，有的地方和单位，由于以派划线，出现了让一些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甚至打砸抢分子领导清查工作或主持办事机构的情形，以至沿用了“四人帮”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故伎，胡乱捕人，自设监狱，不择手段地对清查对象逼供信，造成了严重后果。

1980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群众工作部编印的特刊第八期《对山西省清查和善后工作的一些看法》中，对山西的清查工作出现的问题分别做了概述：

一、严重地扩大化，伤害了許多人。全省究竟清查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实数字。据省清查办公室负责人讲：全省可能达到3万人。而据一些干部估计，仅晋东南地区被清查的就达1万人。太原铁路局一个系统也有1万人。太原市被清查和强令“三大讲”的达1万余人；北城一个区，有干部700人，被清查的就占226人。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无辜受到清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李秉壁，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等等也都被清查了。这些人被大会批，小会斗，不少人被关两三年之久。还有不少人被撤职、免职、停发工资。虽现已证明这些人绝大多数无问题，但单位领导还坚持说“清查是应该的，正确的”，“不清查怎知你无问题”等。

二、违法乱纪刑讯逼供，甚至打死打残。不少单位确定审查对象，是先定性，后找材料；先关进“学习班”，后逼供。为了使被审者承认有罪，便采取各种刑罚，如跪石子，跪砖头，跪三角铁，压杠子，火柱烫，烟头烧，皮鞭抽打，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仅铁路系统被打死逼死

的就有十多人。

三、有的单位领导人品质恶劣，派性严重，借清查之机，打击报复……

四、当年紧跟“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的人，却受到保护，甚至成了清查工作的领导人……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状呢？这份文件中有下述分析：

一、背离了中央规定的清查标准，自行一套。很多地区和单位把对大寨、对陈永贵和王谦同志的态度作为清查的标准。运城地区搞了6条，阳泉市搞了8条20项。全省因所谓“反大寨”被清查者不知有多少，在山西成为一个“谈虎色变”的问题。因所谓反王谦而被清查的也不计其数。例如1974年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王谦落选，那些未投王谦票的人，不但当时就受到打击，在这次清查中，还重复王洪文讲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是一个奇闻”的谰言，对他们大都进行了清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因所谓未给王谦发“慰问电”，也成了清查他的一条“罪状”。

二、搞派性，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所谓谢振华“帮派体系”混为一谈……

三、把工作中的意见视为篡党夺权。1976年9月，王谦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省委有几名常委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会议结束时，王谦说“会是开得好的，去年一年，常委是团结的。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受到邓小平的干扰破坏，出了些问题，根子在邓小平身上。……我这个人很厉害，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还能正确对待，同志们对我提的意见我很感激。”但揭批“四人帮”时，王谦一反常态，把这些人定为“四人帮”伸向山西的“黑手”，说这些人是从省委内部“发难”，阴

谋“篡党夺权”。于是在山西,凡是给省、市或本单位领导贴过大字报或提过意见的,一律被认为是“篡党夺权”,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清查。

四、根据中央规定,清查“四人帮”的时间应以四届人大召开前后为准,但山西却着重在1976年七、八、九三个月。因为1974年谢振华下台,是江青、王洪文以及纪登奎、陈永贵造成的。如果按中央规定就会查到他们身上。王谦在这一时期完全按照“四人帮”的腔调,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却比这些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王谦在杏花岭召开7万人的动员大会,声讨邓小平,以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邓小平是“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中国的纳吉”。点名攻击谩骂几十次,还带头游行;组织百万人收听“批判三株大毒草广播大会”;张铁生在大寨、太原、文水三地大肆放毒,是王谦同意的;还组织民兵两万人大游行反对邓小平。这在全国是独此一家,连上海和辽宁也未这样干。再如各地市普遍召开“理论讨论会”,并在各个口组织宣讲团、出版黑书等,王谦都是批准者,这都不算问题,但别人给王谦提个意见,就算参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因此,在山西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执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无罪,骂邓小平无罪,而反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罪,给王谦或本单位领导提些意见就有罪。这是很不公平的。

五、王谦提出的“划大线、切西瓜”的口号,在清查工作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清,而是“一开两半”,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人划了出去……

(转摘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百战将星谢振华》。)

“四人帮”在山西最大的动作,人所共知,那就是江青一手制造了《三上桃峰》大冤案,进而炮轰谢振华,搞乱了山西。而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场“文革”结束后的政治运动中,主政的省委第

一书记王谦因为做了“四人帮”批谢的忠实执行者，便另行一套，制定了“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以指导运动，明目张胆地在全省开始了一派对另一派的整肃。随着王谦被调离山西到山城重庆去任职，山西的倒清查和清查扩大化才得以纠正。

有四点还应该述及。

其一，197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而且不顾事实，把大寨树成了与“四人帮”做坚决斗争的典范。为了衬托大寨这个典范，就得找到反面典型。反面典型很多，曾亲自参加这次大会的李辅，时任山西省襄汾县委书记。他如此回忆这次会上揭出的那些反面典型：

会上虽然也讲学大寨，但主要是在全国部署揭、批、清“四人帮”罪行的运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大会上有一些典型发言，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如温州不学大寨，重副轻农，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当地群众没有粮食吃，25斤粮票就可以在温州领一个姑娘。革命圣地延安，群众饥饿，出现了人口贩子。其他一些贫困地区用粮票去延安换媳妇。山西西八县特别是河曲、保德从延安换回不少媳妇。还有的去四川泸州买姑娘。无锡地委一个领导，看到农业学大寨搞一刀切，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发出“不批陈永贵，柴米油盐贵”的心声，被作为“四人帮”爪牙攻击学大寨的言论，受到批判。许多民不聊生的典型事例，当时是揭发“四人帮”破坏学大寨的罪行，实际上是“四人帮”利用学大寨口号，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那些卖儿卖女的血泪事迹，不是不学大寨的结果，而是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把农民作为奴隶，不让其自由劳动、自由创造形成的恶果。（摘自《所思所忆七十年》，李辅著，溪流出版社2012年出版）

大寨这个原本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经过“文革”，渐渐变成了一个大批促大干的极左典型。华国锋执政后，又通过这次大会，把大寨树成了与“四人帮”斗争的样板。在华国锋大会作的主旨报告中，更是把原先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上升到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当时集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职于一身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就这样在理论上，将“四人帮”和“文革”中的派性群众组织联系到一起了。帮者，即“四人帮”，是被特别法庭审判案的反革命集团，是敌我矛盾；而派者，则是“文革”中的群众派性组织，党内存在派，群众中也存在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如山西的红联站，是中央肯定过的革命群众组织，兵团和红总站，更是中央肯定过的左派革命组织。华国锋把帮和派连在一起，还要大清查，势必把“文革”前几年曾经存在过的各派群众组织，都排列在册，划线分类，形成了一派整一派的斗争。大批群众受批挨整，自然难免。

其二：江青“炮轰谢振华”后，王谦主政山西，但陈永贵如太上皇一般直接插手山西。昔阳的干部不断走出大寨，走出昔阳，进入山西政坛。如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成了省委书记，李韩锁成了省委副书记，昔阳一个公社书记张福元被提成省委秘书长。一时间，在山西，昔阳干部最红、最抢手。他们是陈永贵的嫡系，以对待农业学大寨和是否支持陈永贵来划线分派，在全省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所作所为，很有代表性。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南埝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谦亲自点将，将他安排到平定县担任了县委书记。平定是王谦的故乡，王谦此举应是出自公心，想给故乡派个好父母官，改变一下平定农业学大寨的后进面貌。李锁寿上任后确实苦干实干，既抓平田整地，又抓水利建设，把学大寨弄得红红火火，没得话说。李锁寿也很亲民，有这样一个故事很有代表性：

那是李锁寿刚到平定不久，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乡下农民赶着猪从县食品公司往外走，好生奇怪，便问：“这头猪不卖了，怎么往出赶？”赶猪人一脸无奈，说：“怎么不肯卖？食品公司说猪不够斤称，硬是不收。”李锁寿问明卖猪人家住石门口公社，离县城好几公里路呢，不免心生怜悯，再看那猪的个头膘情，凭他的经验，估计卖个三等不成问题，遂对那人说：“把猪赶回公司，我帮你卖。”卖猪人抬头看看这位陌路相逢的汉子，不知是哪路神仙下凡来帮他排忧解难，便半信半疑转头往回赶。李锁寿见到过秤人，指着猪劈头就问：“这头猪你们为什么不收？”过秤人是个年轻的愣头后生，连眼皮都没抬，随口答道：“不够等级。”李锁寿不免有些生气，问：“怎么不够等级？”年轻人抬头瞟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你这人真烦，一看那猪个头就知道不够等！”李锁寿听后真的生气了，硬邦邦甩过一句话：“原来你没过秤呀！不过秤，凭什么说这猪不够等级？”年轻人听了，横眉怒目，待要发作，李锁寿却抢先一步，一把夺过磅秤上的秤砣，说：“看来你这孩不会收猪，回村去吧，等学会了收购再来！”此事自然以那头猪如期收购结束，而那个过秤的年轻人被通知卷起铺盖走人时，方才知道与他理论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摘自孔令贤所著《心碑》，见《孔令贤散文选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王谦在1980年10月10日所写《回顾和总结》一文中说：

从1975年之后，为了推广大寨昔阳的经验，省委先后从昔阳调出了一批干部，到地、县和省直一些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其中有近二十名干部是经我同意调出和安排领导职务的。对于这些调出的同志，职务安排过过（孙涛按：王谦是山西平定县人，过过是平定土语，即过分了之意），致使工作受到影响，也使这些同志滋长了某些不好

的倾向。对于这些方面的错误,我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对于陈永贵的错误意见和要求,有些我是抵制了的,对他的派性是有所警惕的。但是对他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有的有过妥协,也有的丧失了原则。我曾经讲过一些地区和单位存在着反大寨的影响,也曾在会议上讲过个别反大寨,这样讲是错误的。(转引自荣奋《八十年纪实续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1月第一版)

王谦的这种回忆,还是客观的。

昔阳这批干部能吃苦,用昔阳话说,能受。他们愿与百姓同甘共苦,想方设法要带领大家学大寨。但有一条,反陈永贵就是反革命,这无疑李锁寿那批昔阳干部们真实的信条。平定有个普通工人叫岳增寿,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反映大寨的问题,揭发陈永贵无法无天的劣行。李锁寿亲自主持万人大会,将岳增寿五花大绑,以反革命罪逮捕,绝不留情。

其三:接替谢振华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王谦,是个有名的硬汉,如果他能反对以对待农业学大寨和是否支持陈永贵来划线分派,陈永贵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遗憾的是,王谦主政后,在揭批谢振华和批邓时,和“四人帮”步调一致,在华国锋提出“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后,又在山西具体制定了“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和陈永贵结成了政治联盟,在清查中另立标准,在划线分派这号大问题上,王谦和陈永贵保持一致,在一些小事上,也是如此。“文革”后期,农村如过年放花炮、闹红火这种民俗,已经开始恢复。“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个春节,因为昔阳县和大寨村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省委便层层通知各地农村,必须和昔阳、大寨一样,过革命化春节,不能放花炮、闹红火。从这件小事上,也可窥见王谦跟在陈永贵身后,亦步亦趋的状态。

其四：王谦将原兵团、红联站的大小领袖们划入清查对象的同时，也将原红总站的领袖郝庭云划入了清查对象。当年谢振华枪毙杨承孝的同时，将兵团的汤建中判了无期徒刑，玩的是政治平衡术，眼下王谦此举，玩的也是政治平衡术。郝庭云被隔离清查后，在省电力系统大会批，小会斗，王谦却让他夫人葛植清去郝庭云家，安抚郝庭云的妻子祁文静说：“让庭云沉住气，不会有事的。老王也有难处，要顾全大局，也是不得已这么做呀。否则会让人家抓住把柄，说老王只清查一派。”政治斗争总有牺牲品，王谦为了政治需要，便把曾保过他的郝庭云也押上了祭坛。

【4】刘梅校长大海般的胸怀

在中共山西省委另立标准，大搞倒清查和清查运动的扩大化时，在山西，也有身居高位的党的领导干部，以自己大海般的胸怀和人格，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了这种扩大化的错误。其时已调至太原工学院出任院长的刘梅就是一例。“文革”初起时，刘梅是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也是全省最早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山西大学的8·14派最早保过刘梅，8·8派是造校党委和刘梅反的。待到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垮台，刘格平等人在山西夺权成功后，造反成了主流，山西大学的这两大派群众组织在社会上虽然是不同观点，在校内却全部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校党委和刘梅。刘梅校长不但挨过无数次批斗，还挨过造反师生的打。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中，他却坚持不写任何揭发学生的材料，也不给山西大学和社会上有关单位派来的外调人员，出据山西大学业已走出校门的任何学生“文革”中曾斗过、打过自己的揭发和证明。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作战部长王守仁同学的故事，就可见其一斑。王守仁在“文革”前考入山西大学教育



与退休后的老校长刘梅合影。前排左三为刘梅，后排左四为作家孙涛，右一为作家韩石山，右三为晋中地委副书记侯光天。

系，下乡搞社会调查时，结合所学专业写出了一篇好文章。刘梅校长听说了，主动来认识这个学生，鼓励这个学生。殊料“文革”开始，王守仁却起来造反，成了8·8红旗战斗队的作战部长。清查中，如果刘梅一句话，王守仁能躲得过去？以他当过8·8红旗战斗队作战部长的经历，定他个“三种人”，毁了他的一生，岂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令山西大学许多师生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对刘梅校长有过忘恩负义和革命造反之举的王守仁，想考研究生时，却得到了刘梅校长的帮助。刘梅校长不但没有训斥这位学生，而且给他找房间、找教材，找辅导老师，还让他住在太原工学院安心复习功课。王守仁终于如愿考入了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还可再举一例：一位学生在“文革”刚开始揪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抄过一位老师的家，还动手打过这位老师。毕业后他分配到基层，曾经主动登门，向这位老师道歉。但是，当他后来在某市要被提拔进入领导班子时，这位老师出具的证明，却成了他仕途上进步的障碍。刘梅校长知道这件事后，主动去和这位老师谈心，请这位老师为这位同学的进步

扫清了障碍。此类事例甚多,不再赘述。

在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有关清查运动的对象如何确定,曾有过明确的文件精神,对当年革命造反的中学生们,网开一面,不再追究。原因呢?没有说。那还用说吗?“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全党都陷入了个人迷信的泥淖,那些中学生一腔热血,涉世不深,无论是官办红卫兵们横扫四旧的大迫害,还是革命小将们的炮打各级党委走资派的大造反,他们手里捧的是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给他们撑腰的,是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一次又一次的大接见,给他们理论支持的,是一篇又一篇两报一刊的社论。现在“文革”结束了,“四人帮”被抓了,让当年的中学生们再去当替罪的羊群,确实也说不下去。对大学生们呢?那可就要清查清查了。然而,有着长期革命阅历的刘梅校长却坚定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之错,而非参加“文革”的学生们之错。当时二十郎当岁的大学生,在那种环境,在那种氛围中,不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不起来批判所谓的反动权威,不向自己这号当年山西大学的“头号走资派”造反,岂不成了世外桃源中人?他在多种场合阐明过自己的观点:“文革”的发生,不在我们党内找原因,不在我们教育体制上找原因,把“文革”之罪全归罪于大学生是错误的。

可惜的是,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以及全省各地市当时的主要领导,缺少了一些像山西大学刘梅校长这样的胸怀。

【5】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山西 10 年“文革”的历史已经叙述完了,至于刘灏的结局,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叙述。

现在,让我们改变一下话题。当中国的 10 年“文革”已成历史之

后,这段历史正在集体的遗忘过程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甚至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塑造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无论是当初被官方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10年后被官方媒体称为“10年动乱”或者“10年浩劫”的“文革”,在它的发展和走向中,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是混乱的,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山西,这种变化,足可成为全国的一种缩影。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从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北京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歧,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编审阎长贵在《陶铸是被谁打倒的》一文中(此文刊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披露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指导全国运动的一些批示,特转摘如下: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

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评。在省委支持下,各级党委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

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 32111 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赵日昌等;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兵团的赵凤田、段立生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

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就是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

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从1967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己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四: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69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

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领导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山西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使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

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山西的10年“文革”,就是这样过来的。目及全国,大致情形不也是这样吗?开始“文革”,是中央全会的决定,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和靠边站了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对这种

决定举手同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几乎全都疯狂地、虔诚地参与了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从上到下，到处轰轰烈烈，到处势如破竹，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研究10年“文革”历史，必须将业已被固化的历史还原为当初的原生态，后人才能真正认识到10年“文革”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10年“文革”何以能成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

为写作此书，我常常坐在静谧的省图阅览室中，借助那十年的旧报纸，重新穿越那10年的腥红历史。也常常和一些“文革”当事人和亲历者，在品茶闲聊中，回忆那10年的疯狂场面和荒唐场景。我看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从最初的卫恒、王谦、王大任，到取而代之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再到由支左战线而走上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的谢振华、曹中南，最后到批林批孔时代执掌了山西党政大权的陈永贵和王谦，这一任又一任党的高级干部们，在那10年光景中，又有谁不是高



2014年春节过后孙涛(左三)及夫人林利利(右二)同李大纲(右一)及夫人任巧仙(左二)诗人梁志宏(左一)小聚。

喊着毛主席万岁，高喊着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努力地、自觉地、不敢有所怀疑地紧跟着毛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按照领袖毛泽东的种种错误理论和观点，领导进行那场名为革命、实为浩劫的大运动呢？他们的这种自觉性，与当时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刘灏、段立生、黄锐庵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许许多多年轻学生、年轻干部，年轻工人们心中的自觉性，都是对伟大领袖的虔诚迷信，都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失去独立思考的一种盲从，归根到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在中共党内和国民心中留下的病态。在呈病态的主流中，全国各地一级又一级的党组织中，无论被造反夺权还是后来重建之后，又有哪一级党的组织，在那10年历史中间，讨论过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政治灾难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报刊和广播，在那10年历史中间，又有哪一家不是用错误的舆论导向，天天教育和推动着全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呢？还有中国特定政体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们，在那10年间，又有谁家以反对“文革”的意见参政和议政了呢？组成执政党的广大中共党员们，组成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们，面对“文革”中的一排排浊浪，为什么没有筑起一道摧不垮的堤坝，还当时中国一个清平世界呢？特别具有反讽味道的，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向各地党政负责人大讲特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时，一次次用个人迷信之伟力，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不断地夺取和引深所谓“文革”的伟大胜利时，全党的各级领导们，大约都没有想到走上神坛的领袖，在变成已经践踏了民主，正以个人意志统领全党和全民走上错误道路的现代终身制君主之后，全党和全民又该怎么办？

如皇帝般的领袖终身制，必然不要宪法，不要民主，不要监督。“文革”中的那种大民主，只是毛泽东发动民众打倒政治对手时的一

种手段,他绝不容许那种大民主对准他所推行的“文革”。在这种专制操纵下的大民主运动中,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胆敢为刘少奇说话者,便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推而广之,遇罗克这样的年轻人发表文章反对血统论,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枪决;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做了一点批评,对“文革”做了些反思,就被判处死刑,1975年4月4日临刑前,还被割断喉管,不让她呼口号;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就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毛泽东后来用军队推进他的“文革”时,他最早赋予学生和民众的那种大民主,已经被他收回去了。再往后,他在病榻上下令打倒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民主运动残酷镇压,更是他对民众大民主的真实态度。

不要民主和监督,必然会形成专制。而专制的保证,则是必须让全党和全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行愚民政策,强化个人迷信,领袖可以为所欲为,执政的共产党缺失了人民的监督,党内的监督部门和社会上的参政议政党形同虚设。党内斗争的同时,广大民众也被卷入你死我活的内斗。有人形容“文革”是台绞肉机,今天作刀片,明日为肉丝。“文革”中不停的内斗,正是如此。10年“文革”的教训,难道不是这样吗?

【6】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

研究“文革”历史,不能不正视群众组织的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表面上看,是一种独立的社团,但实际上,各种群众组织又和深陷于“文革”泥淖中的党内领导干部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群众组织的一些政治诉求,代表了一些党内领导干部的政治诉求,党内领导干部的一些政治诉求,又要通过群众组织来实现。特别

是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经过组合发展,形成了大的派别以后,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山西,官办红卫兵组织,是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其领袖刘普德是省委树起来的学毛著标兵。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全国赴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时,刘普德是由华北局推荐,站在最高领袖身边的全国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代表。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刘普德是可靠的革命小将。可以这样说,山西省委要领导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倚靠刘普德领导下的这类群众组织。

群众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因为其口号和行动都是支持省委的,认定以卫、王、王为首的省委是革命的,要在省委领导下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领袖张志安和省委领导们,也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刘灏、宋捷等学生领袖们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起初向省委造反的目的是要为袁振翻案,所以这个组织和袁振的联系密切,对立面组织将他们骂为袁家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组织从诞生到消失,其活动一直和袁振的政治活动有关,而袁振也正是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翻案的目的。

红总站的实际掌门人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红总站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庵从组建省人委办公厅东风兵团开始,就是刘格平家中的座上客。刘格平夺权成功后将黄锐庵升任为省革委常委,结成了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领袖新的政治同盟。红总站和另一位发起人郝庭云,当年是英武帅气、浓眉大眼的帅小伙,人聪明,办事有胆识,很得刘格平和丁磊赏识。他和刘格平一家相处甚好,丁磊当年还想把自家的姑娘嫁给他呢。

至于红联站勤务组的学生领袖们,在山西“文革”初期的大分化大改组中,特别是4·14事件前后,他们和张日清等省军区首长、和刘志兰等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多有来往。原太工红旗领袖、红联站发起人李青山曾自费印制了《文革记忆——“文革”中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书中就有省军区首长暗中要与他领导的红联站组织结盟的回忆:

1967年6月27日晚上,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赵冠英、李佐玉等在太原武宿机场接见我和其他红联站组织部分头头,对4·14风暴及刘格平表态。他们对刘格平的所作所为很气愤,认为刘不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起来与他作斗争。

在本书有关七月会议的记述中,提到张日清在北京街头与红联站的几位领导人匆匆见面一事,也可见双方政治友谊之深。

1969年6月19日,在太原十中,发生了一起小型武斗,那时山西的政局,已经由支左部队控制。驻晋69军副军长谢振华,主持省革委工作,省军区副政委刘世洪,主持太原市革委工作。在太原十中,七一派掌权,马尚文成了十中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十中革委会工作。七一派的对立面是子弟兵派。子弟兵这一派人少,但能量不小。他们占据了一座旧式小楼,常在省城贴出大字报,揭批谢振华和刘世洪等部队首长支一派压一派。6月19日那天,马尚文组织七一派的学生们,突袭子弟兵派据守的那座旧式小楼,计划全部捕获对立面同学,铲平子弟兵的据点。楼内子弟兵派的学生们,发现七一派的学生们来围攻他们,有两人急忙跳楼逃生,当下就造成了一死一伤的后果。

6·19事件之后,马尚文多次因组织了此次武斗,被审查,被处分,甚至被逮捕关入大牢,但他始终一口咬定,此事是他一人决定,一手

组织,并无后台指使。直至他古稀之年,才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原来,当时 69 军外联组组长芦景源,还有刘世洪的秘书黄广益,曾分别找他谈话,要求他尽快除掉对立面子弟兵的据点。当时部队支左,假手一派,摧毁另一派,如此而已。

山西省的 1·12 夺权后,袁振和刘格平先后组建起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各地市的这种红色新政权也先后组建成功。伴随着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出面成立了红总站,全省众多的派性组织,渐次分别归属了红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三大组织开始争夺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也多有亮相,要与群众组织一道,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时,刘灏派出各路小分队进驻省城各厅局,点名道姓地支持一些领导干部,红联站也如此,要与他们支持的领导干部联手。但从全省大局看,当时红总站因为是刘格平的嫡系组织,团结的各级领导干部人数最多。当年官方批评群众组织时,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说群众组织有“资产阶级派性”。派性,难道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吗?无产阶级难道就没有派性吗?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是不是一种派性?当这种党内的派性和群众组织的派性融在一起时,群众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党内斗争的另一种队伍了。

当谢振华受中央之命,在山西负责支左以后,与各路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也多有来往。原红联站的宣传部长张玉峰,就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1968 年元月,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们,全被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张玉峰也是其中的学员。大约是 4 月的一天,有一位解放军战士自称是谢振华将军的警卫员,到学习班找到张玉峰,说谢振华军长要见他。张玉峰只在会上见过谢振华,和堂堂 69 军的副军长连话也没有说过一句,更不知人家要找他干啥。来人带着小车,领上张玉峰直奔北京郊外八大处。到了一处大院内的办公楼前,这位解放军

让张玉峰下车,领上他往前走。那座办公楼前,有几位解放军首长正围着一副单杠,在单杠上练大回环的,正是谢振华将军。谢将军一圈又一圈,练得老到,围观者不时喝彩、鼓掌。等谢振华终于完成了杠上的动作,双手离杠,双脚落地后,才向张玉峰招招手,张玉峰即紧随将军,步入楼内将军的办公室里。既没有寒暄,也没有让座,谢振华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坐下,从桌上取出一份薄薄几页纸的打印材料,递给了张玉峰。只说了一句,有这么一个材料,你们看看吧。张玉峰急忙翻看那几页纸,是一份揭发材料,大意是经向韩培义(孙涛注:刘格平当年没有随同薄一波等61人在具结文书上签名出狱,与他一道如此行事者,还有一位韩培义)调查落实,韩培义与刘格平后来刑期已满后出狱时,也在一份具结文书上签过名,具结文书的内容,与薄一波他们签字的具结文书内容大同小异,足见刘格平也是叛徒。张玉峰还想多问将军几句,不料将军已拿起电话,喊来那位警卫员,让他送客人回去。

我追问:谢振华就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肯定地说: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给我讲这件事时,说他坐在小车内,一直琢磨谢振华将军给他这份材料是啥意图。当时山西的群众组织,红联站是人所共知的坚定不移反对刘格平的组织,一定是军队不好出面调查刘格平的历史问题,谢振华想借红联站之手调查了解一下刘格平的这段历史。红联站勤务组分管材料收集的负责人,是山西农学院的任荣庭,张玉峰后来就将这份材料交给了任荣庭。至于这份材料的出处,材料上写着一个小组织的名字,当时社会上三大组织名下,各种小组织多得很,传单可以到处寄,张玉峰说他已经记不起署名的是什么组织了。这份材料的真伪姑且不论,这个故事,却可以再次印证群众组织和党内领导干部们的关系。谢将军身经百战,面对政治对手,如此排兵布阵,不留任何痕迹。

在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间,也有用派性无法解释的交往,这种交往中,显示出的是人性的闪光。贾冲之的女儿贾甲申和儿子贾潞安,曾给我讲过刘灏保护他们父亲的故事,这件事,便无法用派性而只能用人性来解释了。贾冲之是1965年省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上当选副省长的,同时继续兼任省煤炭管理局的局长。刘格平组织和领导了1967年山西省的1·12夺权后,省煤炭管理局太阳升造反兵团将贾冲之揪回局里,非法关押,天天批斗。贾冲之的女儿贾甲申和儿子贾潞安,都是太原五中的学生,也是刘灏手下的兵团战士。姐弟俩去找刘灏,希望刘司令伸出援手,搭救他父亲。其时,也有贾冲之的老部下,省经委的干部尤俊卿代表贾冲之的一些老部下,找到刘灏,介绍贾冲之的革命履历和人品,希望刘灏救出贾冲之。尤俊卿还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煤炭部的造反派关押揪斗,已经被打死了。贾冲之被煤炭系统造反派关押批斗,很可能步张霖之后尘被害。如果按派性观点,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太原批袁振时,贾俊是工作组组长,贾冲之是副组长,刘灏为袁振翻案,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省委派驻太原的工作组。但刘灏却没有计较这些,既是同学的父亲遇难,就得管。当即决定,派出十二中红旗的司令崔吉娃,带人去救贾冲之,并商定了具体方案。贾潞安先以送饭为名,摸清了父亲被关在煤管局招待所一层西侧的某房间内,又告知父亲兵团小将要来救他,让他配合。当晚崔吉娃带人带车,突然出现在煤管局招待所楼前,看管贾冲之的几名太阳升造反派出来,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十二中红旗的小将们推搡到一边,这些中学生们又冲入关押贾冲之的那个房间,架起这位副省长,出楼门,上汽车,扬长而去。

先是把贾冲之藏到太原五中的化学实验室里,几天后,又由刘灏和崔吉娃具体安排,将贾冲之转移到晋祠附近一位老乡家的中。这里是刘灏一位同学的老家。贾冲之在这户善良朴实的农民家中,一住就

是近三个月。这期间,贾潞安又悄悄找到他父亲的秘书黄建中和司机师傅,让他们与贾冲之建立了秘密联系。近三个月后,贾冲之有一次回到太原家中,不幸被煤管局太阳升造反派们发现,再次被抓回局里非法关押。贾潞安有了刘灏、崔吉娃帮他救出父亲的经验,这回找了几名要好的同学,趁贾冲之在太阳升几名造反派押送下去工农兵医院看病的机会,再次将贾冲之从医院劫走,转移到徐沟一处小山庄,这也是五中一位同学的老家。贾冲之在这里又躲了几个月。也正是在这种避难的日子里,贾冲之竟集中精力,完成了引黄河之水到太原的引黄工程规划初稿。其拳拳报国之心,天地可鉴。贾甲申一家已移民美国多年,2014年她回国探亲,与弟弟贾潞安一道宴请刘灏,再致谢意。

王谦和红总站领袖郝庭云的交往,也是一例。1976年7月底的一天,已经斗倒了谢振华,在山西当上了省委第一书记的王谦,派亲属去找郝庭云,将其接到晋祠宾馆二号楼,亲自接见。其时,兵团和红联站的原领导和骨干们,形成了反王谦的社会力量。郝庭云在谢振华掌权时,曾被整肃,投入了大牢。此时虽已出狱,并未搞什么社会活动,但王谦还是很看重这位群众领袖的政治能量。王谦私下接见郝庭云的用意十分明白,郝庭云后来回忆说,王谦的目的,是想让他帮助收集社会信息,在关键时刻,能拉起队伍支持和保护王谦。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的武装割据,到后来夺取了全国政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就连刘格平奉旨造反夺权时,也要先成立一个党的核心小组,将群众组织的造反夺权,纳入党的领导之下。现在,我们再从群众组织的形成,透析一下“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的关系。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形成,杨承孝那种“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的认识和做法,只是一个例外。以山西大学8·8和8·14两派为

例,都是由几名骨干学生领袖发起,众多学生参加,然后再开全体成员大会选出领导班子,最后形成了一个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兵团、红联站这样的群众组织,其发起的青年工人和学生领袖们,则首先要求省委承认他们建立组织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然后才挂旗、刻章,再吸纳下属各种人马来扩大队伍。他们在炮轰和打倒一些领导干部时,也必然会支持和拥护另外一些领导干部。刘灏组建的兵团是最明显的,无论是一开始炮轰卫恒,还是后来炮轰刘格平,袁振则始终是他们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而这些群众组织的领袖们,都是根红苗正的青年人,其中也有中共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造反,(按当时党中央的文件说法,这党的领导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他们的共性。

这些群众组织无论观点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有许多共同点。

他们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他们都认定自个执行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代表。自个一派要打倒的,就是走资派。

他们都信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定自个是可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没有法治的理念,可以揪斗和专政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

他们都拥军,即便受到支左部队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和部队开战,但依旧认为那是支左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是希望军民鱼水情的。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环境中,按当时的“文革”理论,认为参加“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要担负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世界革命的重任。

他们在武斗中,全按伟大领袖的伟大教导,视对方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对其充满仇恨。

而这些共同点,又都是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

的绝对权威下衍生而出。

这是一种虔诚引发的狂热。当高居神坛上的领袖看到这种狂热已经使全国变成一种无序的状态时，他赋予民众的这种结社自由，也就到了由他来终止的时候了。九大前夕，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相继建立后，毛泽东用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军宣队开进大学、军队对厂矿的军管，各省军人掌权等等举措，让风起云涌了三年的群众组织，终于在全国烟消云散了。有“文革”历史研究者提出三年“文革”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文革”中出现群众组织这一时段而论，确实也就是“文革”初起到中共九大召开的三年时间。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大小领袖们，有的被抓了，有的被上山下乡了，有的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之后党内的斗争，直至“文革”结束，也再无群众组织可以依托和利用。

可以说，九大之后的“文革”，是党内斗争的继续。群众组织从1966年形成，至1969年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年中，“文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待群众组织退出历史舞台后，如上一章所说，在山西，“文革”已进入第四和第五个阶段，全国也基本如此。而这时的“文革”，已经在“文革”的大运动中，套入了各种小运动。诸如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等运动；诸如各省不同内容的运动，如山西的批谢、曹，等等。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虽然还可以看到当年一些群众组织领袖们的活动身影，但他们已经不能再用那种大民主的结社方式活动了。他们加入了党内不同的派别，在九大后“文革”继续扬起的浊浪中，伴随着党内的斗争，继续着他们的人生沉浮。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中，革命的对象，已不再是党内的当权派，广大民众中的各色人物，都可能变成运动的目标，倒在血腥的内斗中。

【7】刘灏被无罪释放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始吧，因为我们的故事就要结束。

1977年，“文革”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思想，正在全国盛行，刘灏可以讲清楚“文革”中自个的历史，却讲不清楚是与非。刘灏的问题，当时主政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不但要亲自过问，而且还要亲自来做决断。于是，就在1977年的4月10日，刘灏从太原市北郊区专案组办的学习班被押走，投进了省里的一所监狱。没有逮捕证，罪名呢？也没有法律依据，就因为他是“文革”初起时，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造反派领导，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

狱中的愁苦是刻骨铭心的。刘灏扳着手指，一天一天地数着过日子。

从1977年4月10日入狱，到1979年12月31日对他下达逮捕证，刘灏虽然被关在监狱里，名义上却还是隔离审查。对刘灏下达逮捕证一年多以后，接替王谦主政山西的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着手解决清查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于是，1980年12月25日，刘灏终于被宣布无罪而走出了监狱。

在这前后，被王谦下令投入大狱的李瑞芳、李文亮、刘志英、杨国和、段立生等人，也相继被宣布无罪而走出了监狱。

在“文革”之初，伴随着原中共山西省委的倒台，一批原省委追随卫、王、王的干部们被投入监狱，他们后来被无罪释放了。在后来的批谢、曹和山西的清查扩大化中，一批追随谢、曹的干部们被投入监狱，现在也被无罪释放了。既无罪释放，则说明当初将他们投入监狱错了。但是，那个年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无罪释放的这些人，没有人向他们赔情道歉，国家更没有赔偿法向他们赔偿一说。这是历史，我们的历史，就这样真实地走过来了。

公允地说,刘灏当初革命和造反,起因是要为好朋友的父亲,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的袁振打抱不平。他和老干部刘格平起来造反的动机不同,和杨承孝起来造反的动机也不同。等到谢振华主政山西后,更是遵从父命,依靠解放军,接受谢振华这位老将军的教诲和安排,更没有将自己捆在“四人帮”的战车上。中学生刘灏是山西10年“文革”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一个省的造反司令,就全国而言,也是有代表性的。他是从一个中学生的位置上,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所诱导,一心要听从领袖的教导,一心要学习和贯彻红太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一心要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要带领兵团掌握“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先是自觉,后是被大形势不断推向政治舞台的准知识分子。在10年“文革”中,没有参与打、砸、抢,也没有亲自组织武斗,更没有投靠在林彪名下和“四人帮”集团中。党中央派霍士廉来山西接替王谦,平反冤假错案,将刘灏无罪释放,是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刘灏而言,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受益者,他希望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尽自个的能力再为党和国家、人民做点工作。这是一个年轻人正常的希望。在这种希望中,他也常常强压下心底的怨气。无罪而被关押,这强压下的怨气,又让他不知该如何是好。在山西的十年“文革”中,他革过别人的命,自个也被别人革过命,这样的人和事,又何止刘灏一个!

【8】胡耀邦来山西解疙瘩

1981年6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会议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同志分别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审议,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辉煌的历史文献。

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会发表公报: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奋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在党的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胡耀邦在6月29日全会的闭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今天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

席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的同志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那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呢?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胡耀邦激昂慷慨、热情奔放的讲话,激起阵阵掌声。

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后不到两个月,即到山西视察,他到的第一站,就是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

高平县在“文革”中是武斗重灾区。在基层跑了几个县,调研了几天后,胡耀邦在8月17日下午,在太原湖滨会堂,给山西省直系统县

处级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其用意,就是希望山西省级系统的干部们带头解疙瘩,不要让“文革”在广大干部心中结下的疙瘩,再影响山西的改革开放大业了。赵瑜先生在《牺牲者》书稿子中,详细描述了这次大会,介绍了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现摘录如下:

胡耀邦是很善于演讲的。他一开始先说:“人这么多,三千八百多人,天这么热,我普通话没有学好,话又难懂,恐怕不能讲得太多。”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地方党员们的距离。

总书记(孙涛按:此时应称党中央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全委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取代了原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先把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个简单概括,倡导“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他讲到农村责任制冲破了三十多年的老框框,换来了增产。针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牢骚,胡耀邦说:“哪能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呢?没有嘛,解放前土地是私有的,后来土地入股,现在不叫土地入股,不搞坐地分红,而是责任制。”

他并不回避“文革”结束以后,全党“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组织上的涣散,领导上的软弱;说“有的人批评不得,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两回事,批评是两个字,打棍子是三个字嘛!”

胡耀邦讲到:山西搞经济的调子比较低了。人均生产总值为6000块钱,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十亿人口,总产值6000亿元,每人平均6000块钱,山西正好处在这个中等水平。但潜力很大,优势突出,因而“建议省委再深入讨论一下”,努力把本省经济搞上去。

接下来,一多半时间,胡耀邦把话题全部让给了“解疙瘩”,他表示“这是我今天着重要讲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借助山西古代大家柳宗元的《晋问》,首先讲到山西人民

有五大优点，一是朴实，艰苦朴素，节衣缩食；二是“好谋而深”，思考周到谨慎；三是“和而不怒”，不爱发脾气；四是“忧思而畏祸”，不愿若事生非；五是“恬以愉”，安适自在，乐观主义。据此，胡耀邦话锋一转，联系实际说：“山西人民很讲和气，更谈不上武斗，我们的祖先是不赞成武斗的！”

将近4000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十五年来，这个大会堂举行了几百次会议，上演了无数场闹剧，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听众从来没有这样专心过。胡耀邦讲到了人们心中最关切的大难题。

胡耀邦说：“山西脱产干部48万，这支强大的队伍应该是2500万山西人民的带路人，指挥者，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山西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批干部，散布在全国的干部粗略估计不少于10万人，加上军队的就更多了。现在我们湖南、江西的好些干部是山西人，山西干部是我们的父母官。山西干部总得看有许多优点。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几天来，我同省委以及一些地、县委的共同商量，感到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48万干部结下的疙瘩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简单说是多、大、紧。

“这些疙瘩是怎样结下的？干部中的隔阂是怎样形成的？山西1966年以前，18年比较平稳，麻烦比其他省少，1966年以后的14年，麻烦比其他省多，比许多省都多，持续时间长。从1966年起，断断续续延续到去年，14年中间，有过六次折腾！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具备了解决干部疙瘩的好条件，但是没有把疙瘩解开。三中全会以前，某些问题尚属有情可原，而三中全会以后，当时的省委领导觉悟迟，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简单说，中央对王谦同志，对陈永贵同志的看法，是公道的，既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做过工作，又承认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人。特别是王

谦同志,在‘文革’中相当一段时间是挨过整的,是吃过苦头的!但王谦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有些事情办得不好。最近我们谈了一次话,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四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正因为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最近中央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孙涛按:此时应称党中央主席)对于王谦的公开评价。绝大部份干部听众,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接受了胡耀邦的看法,觉得以上看法坦诚公道。既承认王谦历史上的贡献,同时承认王谦挨过整,吃过苦头,不是“四人帮”的人,同时指出他“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三中全会前后犯过错误,认识错误以后还要分配工作。这就把山西头一个大疙瘩解开了。至于陈永贵和学大寨运动,胡耀邦在评议了王谦之后,未做任何评说。

接下来,胡耀邦分析:干部之间结了疙瘩,这个账应该算到谁的头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党风败坏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如果要算账,我的意见,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就这一条,让3800多名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倾向和不同担扰的省直机关干部们,一下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山西干部一个不留——全都让运动整怕了。人要整人,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起而斗争保护自己,直至把对手整倒。而今日讲话,与往昔有大不同,“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春风吹到了娘子关,雁门关,吹到了太行山、吕梁山,吹到了大河之东,高山之西,春风原来如此温暖。……

胡耀邦继续讲演:

“我们的干部中存在着疙瘩,不团结,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它是涣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搞四化的绊脚石。疙瘩解不开,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钻空子。我们要找出积极的办法解决干部之间的

不团结,解开多、大、紧。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距离此地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靠省委。要解开干部之间的疙瘩,我的意见,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依靠大家的自觉性?我提出八个方面的办法,供同志们讨论。”

以下,胡耀邦提出解疙瘩的八种办法,极富指导性。此前十几年间,中共从未有过此类提法。

胡耀邦的八种办法,第一条说,“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的,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胡耀邦进一步解释道:“参加过批斗的同志,特别是主持过批斗的同志,要积极赞成这个方针……批斗错了就要平反,其他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不平反纠正不善终,行不行?不行嘛!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你在这里工作不解决,过两年别人来了也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自己解决比别人解决好,随便冤枉一个好同志,不行了,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时代,结束了!你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这是封建的东西,阎锡山搞‘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我们不能搞这一套。”

第二条说,“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以后不要耿耿于怀,要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胡耀邦讲:“要彻底想清楚三层问题,首先,为什么要批斗我?第二,我是不是也错批过人家?这种情况在‘文革’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有,我就敢向大家报个名。人家批错过我的情况不少,我批错过人家的情况也有。‘文革’中,海军司令部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个材料,证明一个同志是逃兵,我写了八次,都说不是,但我把错误扩大了,这还不是缺点吗?1975年恢复工作后,我向炮兵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员写了一个检讨,我错了。所以说‘文革’中,人家批错过我,我也错批过人家,家常便饭,在劫难逃;第三,要想清楚,

如果揪住人家不放，再向组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合乎不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三条想通了，我看问题好解决。鲁迅诗中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同志相逢，怎么办呢？还是你骂我，我骂你，这有什么好处？要讲风格，讲风度，有胸怀，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条办法，“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我建议不要勉强留下，本人也不应要求留下或派回去”。胡耀邦阐述此理说：“易地闹革命，既不降职，又不减薪，各方面都方便。谁也不能赌气，赌了气，我非留在那个地方不可，不留在那个地方我不干，这就不好了。我们又不是三岁儿童，不能凭意气办事。”

第四条，“某些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我主张在作好思想工作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也就是不排除采取一些组织措施。

第五条，“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贡献，又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六条，“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无条件为党为人民工作。”胡耀邦强调：“党内不应有特殊党员，除了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之外，不能说党给我什么条件我才工作。”这是针对长期不上班的同志而言的。

第七条，“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胡耀邦敏锐地指出腐败现象：“现在，基层干部有三个不正之风，一是平调社员的东西盖房子，二是安排自个的子女，三是请客收礼。我看这种现象不但山西有，在全国相当数量的干部中，恐怕都存在这些不正之风。”胡耀邦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防止腐败这一命题，如今看来，是有预见性的。

第八条，“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在今日政坛看来，这

一条似乎无关紧要,而在当年却是一大难题。那时,干部终身制问题尚未解决,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无从建立,新老干部之间不能正常交替,老者不愿让权,新人上升缓慢,全社会权力交替继续呈现窒息状态。封建社会尚有科举之路可循,历经民国战乱,1949年之后反而无路可进,获取权力,要靠阴谋与斗争。文革造反派之构成,年轻人何其多也。毛泽东直至去世也不会退位,接班人这件大事,他始终不能解决好。而世界上发达昌盛的开明国家,再好的总统也不能连任两届以上。不久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酝酿组建中央顾问委员会,也是为了解决这一“吏制制度”难题,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迫在眉睫。因此,胡耀邦山西之行,经过郑重思考,提出新老干部要团结合作,同样是解开思想疙瘩重要一环。……

分析以上八条意见,说明胡耀邦从落脚高平到省城大会,先是接受了晋东南干部提出的“解开思想疙瘩”的建议,进而总结出山西干部之间疙瘩结得多、结得大、结得紧这一普遍现象,又经过一连数天调研思考,最终形成了一套解开疙瘩并尽快终结“文革”遗留问题的完整办法。细看八条意见,条条具体而有针对性,不说空话。针对“靠谁解疙瘩”这一关键问题,胡耀邦提出,“第一不要靠中央,第二不能单靠省委,主要靠干部的自觉性”。这是极富创意的,也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决政治难题的又一典范。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

沉痾得良药,久旱逢甘雨。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4000人纷纷站立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惊屋动厦。很久很久以来,人们不曾站在同一立场,为同一个人,为同一场讲话而鼓掌欢呼了。

胡耀邦讲话迅速传遍了山西城乡,各级干部竞相传阅讲话稿。怨仇易解不易结,解疙瘩唤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符合人心。

被无罪释放走出大狱的刘灏,有了自由之身,各种信息也就很容

易获得了。王谦被中央调走了，省委正在纠正农业学大寨中的那种左的做法，他出狱前，中央就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省里、市里的党报上，都披露了省委和中央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新精神。接着，陈永贵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种种消息，都让他看到了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力度。对自个的问题，他也理得更清楚了。“文革”开始，他批斗过卫、王、王，那肯定是错了。后来，他住进中办学习班，也被批了，特别是清查中，更是除了被批被斗外，还被无罪而关进了大狱。正如胡耀邦说的，人家批我斗我错了，可我也批错斗错过人家呀！胡耀邦的讲话，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希望能被重新安排工作。

【9】“文革”是运动治国的巅峰状态

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关和的理念，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许许多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讲究民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些文化精髓，国人耳熟能详。

但历史老人有时却只能看着历史走入误区。

据官史《当代中国的山西》披露：山西省在1949年前后确定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约6万人，直到1980年7月才给51900名“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省错划右派分子11274人；在“四清”运动中确定了96800个案件，1980年7月复查94600件，纠正错案6500多件；及至“文革”，又在夺权、清队、一打三反、追查5·16、整党、揭批清等诸次运动中，构成冤假错案23.86万件，总共涉及受害人高达103.1万人。

这就是历史！而有些运动涉及到的受害人，这部官史还没有统计。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直到1966年开始,十七年间,党和国家的掌舵人毛泽东主席,不停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下面这些较大的运动,许多老人一定还记忆犹新。

一:关于加强和巩固政权的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二:关于加强思想统治方面的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工商界整风运动;

反右派运动;

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

农村四清运动;

三: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公私合营运动;

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大跃进运动;

大炼钢铁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其他方面的运动: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扫盲运动；

以上这些运动，全是领袖发出指示，下级层层贯彻，广泛发动群众，对准反面典型，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夺取最后胜利。在一些运动中，还要下达指标。如反右戴帽有指标，连除四害，都要下达指标。

建国后的十七年间，户口的城乡二元制，区分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人群，城市人口的生活，明显优于农村人口。在这两类人口中，又出现了“地富反坏右”一批“贱民”，他们的子女，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经济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各色劳动者，只能依赖现行的体制生存。在党内和民间，思想的禁锢，让如彭德怀那种敢讲真话、实话，敢质疑现实的人，已经没有了话语空间，党内和民间的思想被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自由表达意见的途径被全面封死。理论上的混乱，现在再看看当年党中央向国内和国际上连续发表的“九评”，就是一种记载，而在党内和民间，却不容许有另外的声音。全党和全民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斗来斗去，终于迎来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文革”大运动中，又套进去各种不间断的运动，党内斗争和全国的内斗，也就在运动治国的环境中，达到了巅峰状态。

“文革”，是运动治国的延续，也是运动治国浪涌的集大成者。“文革”十年，可谓运动治国的巅峰。

于是，在“文革”中，就出现了一种让后人似乎无法理解的现象，无论党内党外的各种派别如何厮杀，双方都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激昂口号，都在以自个的行动，不惜以流血和生命，演绎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悲剧。在这种悲剧中，做为个体的人，无论职位高低，全没有法律保护，没有道德约束，没有生命尊严。运动

治国,损害的是人的良知,和人的生命,破坏的是国家的秩序,和经济的发展。

让我们再读一些具体的数字。

在“文革”的10年内乱中,全国的经济损失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先从一只“麻雀”说起。据国家大型企业太原重机厂建厂60周年有关资料回忆,1967年到1969年,即太原武斗最盛的那三年,该厂给国家造成55000吨机器产品和4000万元利润的损失。

再以太原为例,《古都腾飞——太原经济述略》(郝小军、王建设、齐宏明、雷钦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三版)有如下记述:

这10年,把三年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冲刷的一干二净,使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下出现蓬勃生机的工业生产重新陷入了严重混乱的境况。

10年中,全市工业经济以至整个经济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社会总产值下降了0.2%;工农业总产值下降了1.4%;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3%;地方财政收入大大低于1958年至1966年的增长速度。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7.2%。

在《山西大事记》(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76年12月条目下记载:

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十二亿斤。钢产量倒退了十年,生铁产量倒退了十一年,钢材产量倒退了十二年,棉布、棉纱、火柴、灯泡、保温瓶等主要轻工产品也倒退了十年左右。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倒退到1970年的水平,是历史上赤字最大的一年。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合著,2005年1月版)一书中,作者根据李先念1979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对“文革”中全国的经济损失作了如此概括: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数字所包含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整整30年中建设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这就是我国国营企业的全部家底。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经过30年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同样一份家当。

据李立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山西》记载:

据统计,山西“文化大革命”中除去武斗死亡的人数,非正常死亡19998人,其中许多属于被迫害致死。

19998人!李立功是以省委书记身份主编《当代中国的山西》这部史书的,此书也属于官史。那么,“文革”中,山西各地的大小武斗中,那些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将鲜血流尽的无谓的牺牲者们,又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这恐怕是官方难以统计的一个数字了。死者,生命已经长逝,生者,怎么能忘记他们的悲剧呢?

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上至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包括知识分子们,下至工农大众们,在不断的政治动员和党报文章的宣传鼓动下,互相撕咬,彼此揭发,将良知付于东流,把邪恶奉

为正义,随着最高领袖不断发出的最高指示,民众响应冲杀上阵,极左的浊浪,早淹没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内斗之惨烈,真个是史无前例。

运动治国,斗字第一。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社会正在变成一台巨大的绞杀机。而“文革”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对广大青少年人生观、道德观的侵害,则是官方和民间都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重新浴火重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快快复苏,以神州大地深厚的文化基因,修复多年来运动治国给国人心中留下的伤痕,真是紧迫而现实,路远而任重。

“文革”在毛泽东心中是一件伟业。毛泽东作为开国伟人,发动“文革”的直接目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文革”的终极目标,则是要摧毁和改造他亲自建成、并运转了17个年头的国家体制。他认为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各级政权中的当权者,有不少人正在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要动员亿万民众向这些当权者造反。一边是领袖终身制,一边是要让各级当权派变成群众运动的对象接受教育。他希望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各级政权,在“文革”中实现三结合的构架,实现干部老、中、青的结合,形成军人、被解放的老干部、和造反派领袖们的互相监督和融合。他想依赖领袖崇高的威信,和七八年就来一次的运动,不断消灭政权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他们不断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再“解放”其大多数使用;同时,不断让年轻的造反派进入各级政权,以保持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建成一种理想化的、坚持他的正确路线的各级政权。但残酷的现实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宪法,在“文革”中,却将宪法置之脑后。在他的“文革”伟业中,无论怎样设计体制,始终是坚持人治而非法治。当邓小平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治国理念,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体制又回到了“文革”之前的构架。从中央到地

方的“文革”领袖被统统除尽，各级政权中的当权者，一边控诉着林彪、“四人帮”，一边用手中的权力将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的人治，变成了邓小平的人治。各级政权中的权力，如“文革”前一样，依旧没有被关进法治的笼子。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中贪腐人数超过了“文革”之前，原因正在于此。

【10】对山西四位“文革”典型人物的政治分析

现在，我们选出山西“文革”中的四位典型人物，分别做一下政治分析。他们分别是袁振、王谦、刘灏、段立生。

其中，袁振和王谦，可视为老干部的代表。刘灏和段立生，可视为造反派的代表。

从整个“文革”的历史看，老干部和造反派是两个对立的阵营。但从具体的地区和具体的事件及具体的当事人来看，这种一刀切的划分，并不实事求是。“文革”的正式开始，是党中央集体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事。也就是说，“文革”是毛泽东主席发动、党中央集体通过，号召全党全民积极参与的一次大运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是当时判定是非的标准。无论是老干部，还是造反派，都在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由于理解不同，执行的方式和程度也有不同，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公开反对者，那是要掉脑袋的反革命。待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被否定，许多当时之是，成了后来否定之非；许多当时之非，则成了后来肯定之是。在山西十年“文革”的历史演进中，老干部和造反派们，全有过当时之是，后来之非；也全有过当时之非，后来之是。他们时而做为运动中的批人斗人者，时而成为运动中的被批被斗者，各自的角色，在不断地转化着。

先将他们四人的简历分别叙述如下。

袁振。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之初，他的职务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后为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九大前被解除职务。1975年9月被党中央分配到河北省，任承德地委书记、承德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党中央将其调任安徽省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又升任省委副书记等职，成了主政安徽的党内改革派万里的主要助手。是光荣离休的老干部。

王谦。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之初，他的职务是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党的九大后成为被“解放”的老干部，先在太原阳曲县担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后任山西省委书记，1974年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被批被斗后调离山西，王谦遂升任省委第一书记。“文革”结束后，1980年10月被党中央调离山西，去重庆市任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是光荣离休的老干部。

刘灏。“文革”之初，他是太原五中的高三学生。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被推为司令。1970年到太原古交区鹿庄下乡插队，1971年2月入党，1972年提干，先后任古交区团委书记、太原市北郊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三种人，开除党籍，成为普通职工。

段立生。“文革”之初，他是省委党校在读大学生。是红联站发起人之一，后被推为红联站勤务组组长。1970年到太原清徐县城关公社平泉村下乡插队，1971年3月入党，1972年提干，先后任清徐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清徐县团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打成三种人，开除党籍，成为普通干部。

再看看在山西“文革”的政局变化中，他们角色的转化。

一：卫恒、王谦、王大任主政阶段。

王谦。省委在“文革”之初，层层抓伸手派、野心家，给下级许多领导干部罢官、在大学给学生们按左、中、右排队，准备运动后期一一处理，抛出王中青、赵树理等一批领导干部和艺术家做为批判对象。这时，王谦做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这些事情的决策者、参与者，是批人斗人的角色。在后来群众造反组织向省委造反时，王谦又变成了被人批被人斗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确定的政治标准，王谦犯了走资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双重罪行。

袁振。在“文革”之初因向省委提意见，被打成伸手派、野心家，成了被人批被人斗的角色。后来依靠群众造反组织翻案，与刘格平携手向省委夺权成功，又变成了批人斗人的角色。此举受到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肯定，成为山西新生红色政权里的革命领导干部。

刘灏。无论在学校将造反矛头对准党总支，还是组建炮轰省委指挥部，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都充当了批人斗人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确定的政治标准，属于革命的小闯将。

段立生。参与组建红联站，在炮轰省委时充当着批人斗人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确定的政治标准，也属于革命的小闯将。

二：刘格平、张日清、袁振主政阶段。

王谦。与省委其他领导一样被夺权，被专政，是被人批被人斗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确定的政治标准，属于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袁振。与刘格平夺权成功后，成了批人斗人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件确定的政治标准，属于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

刘灏。由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参加了刘格平、袁振领导下的夺

权，刘灏是批人斗人的角色。后在同刘格平、杨承孝们的对抗中，成了既是被批被斗的角色，也是批人斗人的角色。在中央召开的七月会议上，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被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确定为革命左派组织，刘灏也成了革命左派组织的领袖。

段立生。由于红联站反对刘格平、袁振和杨承孝的夺权，红联站成为刘格平的批判对象，段立生出任红联站勤务组的总负责人后，与刘格平、杨承孝们对抗，既是被批被斗的角色，也是批人斗人的角色。在中央召开的七月会议上，红联站被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确定为在4·14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的革命组织，段立生也就不算革命左派组织的领袖，而只能算是普通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了。

三：谢振华、曹中南主政阶段。

王谦。王谦1970年被“解放”，在太原阳曲县出任县革委会主任。1971年，谢振华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三次党代会后，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被调回省委，先任经济部门负责人，后任省委书记，1975年出任省委第一书记。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山西的批谢、曹运动中，紧跟江青、王洪文等人的意图狠批谢、曹；在肃清谢、曹流毒，狠批所谓谢、曹线上的干部时成了批人斗人的角色。

袁振。在中办学习班里，成了被人批被人斗的角色。按当时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的话说，袁振犯了“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

刘灏。在中办学习班里，成了被人批被人斗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说法，属于犯了错误的革命小将。经过被批被斗再被插队到农村锻炼之后，又按当时毛泽东主席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被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

段立生。在中办学习班里，成了被批被斗的角色。按当时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说法，与刘灏一样，也属于犯了错误的革命小将。经过被批被斗再被插队到农村锻炼之后，与刘灏一样，又按当时毛泽东主席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被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

四：陈永贵、王谦主政阶段。

王谦。在抓捕张、赵反革命集团、抓捕五一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组织省城批邓大会等事情上，是批人斗人的角色，在处理太铁问题时，又成了被批被斗的角色。后来制定划大线、切西瓜政策领导全省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时，是批人斗人的角色。

袁振。调离了山西，在山西已无政治活动。

刘灏。在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后，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有关批示，刘灏被停职检查交待是否此事件的组织者，成了被批被斗角色。后查无结果而被恢复工作。在太铁造反派揪斗王谦事件后又被怀疑为后台，接着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继续成为被批被斗角色。

段立生。在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后，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有关批示，与刘灏一样被停职检查交待是否此事件的组织者，成了被批被斗角色。后查无结果而被恢复工作。在太铁造反派揪斗王谦事件后，被怀疑为后台，接着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继续成为被批被斗角色。

以上是他们四个人在“文革”中的角色转换。

另外，从工资待遇看。

王谦是行政八级，月工资约 277 元。

袁振是行政七级，月工资约 310 元。

刘灏参加工作后,行政级别定为 25 级,月工资为 36.5 元。

段立生按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定为行政 22 级,试用月工资 45 元,一年后月工资升为 54.5 元。

当他俩后来都做了区委和县委副书记后,工资依旧如此。

“文革”中,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倡导从年轻人和劳动模范中提拔干部。对这类干部,只增加工作责任,不增加工资待遇。刘灏与段立生,以及与他们同一时期提拔的年轻干部们,工资待遇没有随着职务的改变提高,这是事实。但他们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却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年轻干部比那些劳模思想活跃,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也比他们强。以刘灏、段立生为例,他们在基层工作时,口碑不错,由于有文化基础,在工作中也没有弄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那样的笑话。(孙涛注:“文革”时坊间传说,基层劳模吴桂贤被提拔到国务院当副总理,在接见某外国医学代表团时,对方提到中国的李时珍对医学有很大的贡献时,译员刚译罢,吴桂贤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再从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态度看。

王谦。在山西推进和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力,由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被党中央调离山西,后赴四川任省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袁振。1978 年 12 月在河北承德市委第一书记岗位上,被党中央调任安徽省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之后又升任省委副书记,配合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成为推进和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省级领导。

刘灏。王谦调离山西后,刘灏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山西全面落实而被无罪释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受益者。

段立生。王谦调离山西后,段立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山西全面落实而被解除隔离审查,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受益者。

从王谦、袁振、刘灏、段立生四人在“文革”中的角色转化看,无论他们做为批人斗人者,还是成为被批被斗者,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大

环境。而以当时的政治大环境看，他们在做批人斗人者、或做被批被斗者时，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能解释通的，所谓“大方向正确”是也。当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并宣布结束“文革”后，成为被批被斗者获得平反，也都是按当时新的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行事，所谓“拨乱反正”是也。老干部王谦、袁振都有过批人斗人“大方向正确”的行为，也有过被人批被人斗又被“拨乱反正”后，终获平反的结果。造反派刘灏、段立生也都有过批人斗人“大方向正确”的行为，也有过被人批被人斗又被“拨乱反正”后，终获无罪释放的结果。

如果我们再举一些老干部和造反派一一剖析，除触犯刑律者外，多数人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无论将十年“文革”称之为十年浩劫，还是十年动乱，或者是十年内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潮流中，老干部和造反派，都是受害者，也没有什么一贯正确者。在“文革”这台绞肉机中，无论老干部，还是造反派，都扮演过刀片和肉丝的角色。

从1966年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向刘少奇、邓小平造反，到1976年毛泽东下令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在山西，前有紧跟伟大领袖，向省委造反夺权的刘格平、袁振等一批老干部，后有紧跟江青、王洪文等中央“文革”派，批判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组织批邓大会并带头游行的王谦等一批老干部。而如刘灏、段立生这样的造反派，在成为党的基层年轻干部后，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化，加上他们对“文革”不断的反思，已经和担任群众造反组织的领导人时的思维不一样了。比如毛泽东在病榻上再次打倒邓小平后，中央的“文革”派又以党中央名义，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批邓动员大会后，刘灏所在的太原市北郊区，有李加里等个别干部贴出大字报，响应党中央和省委号召，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原区

委书记、老干部白玉。此时白玉已调任太原市委担任秘书长。刘灏坚定地明确地反对这些人炮轰白玉，对稳定区委机关的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段立生所在的太原市清徐县，县委书记曹效禹也是一位老干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段立生也以支持曹效禹的工作态度，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山西的第二号走资派王谦，“文革”初期被批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山西的代理人，“文革”后期，又追随江青批谢、主持批邓大会，带头游行批邓。红联站中一些“文革”初期紧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革命造反的年轻人们，“文革”后期却暗中集社，开始反对江青、张春桥等党中央的“文革”派，批判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这些，都说明无论老干部，还是造反派，在“文革”中不断的政治抉择中，是在不断变化的。还以刘灏和段立生两人为例，如果说“文革”之初，他们是尽力与中央文革小组保持立场一致的话，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再到江青炮轰谢振华，在山西大搞批谢时，他们已经明确地站到了江青、王洪文，以及其追随者陈永贵、王谦的对立面。

“文革”是一锅粥，而且是米和面混煮的粥。这粥经过十年煮来煮去，已经分不清米汤和面糊了。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人家批错过我的情况不少，我批错过人家的情况也有。”胡耀邦同志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现在同志相逢，怎么办呢？还是你骂我，我骂你，这有什么好处？要讲风格，讲风度，有胸怀，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可惜的是，在山西，象刘灏、段立生这类当过造反派，又成为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年轻干部们，虽没有贪腐行为，也没有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政治上最后的宿命。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受益者，肯定会拥护和践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刘灏和段立生们，却失去了这种效力的机会，在1983年开始清理“三种人”之后，他们被当时的太原市当局硬往“四人帮”线上一挂，全

受到了整肃。现实中的强权,就是如此地戏弄着历史。

【11】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

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10年“文革”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毛泽东。反革命集团何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两个集团是也。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四人帮”呢?王洪文是在林彪死后,毛泽东亲自提拔的又一个接班人,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毛泽东搞“文革”倚重的秀才笔杆子。要说利用,是毛泽东先利用了他们,他们又利用了毛泽东而已。《决议》中的那种表述,为尊者讳的文字运用再清楚不过了。

10年“文革”是一段政治历史,却绝非毛泽东一时兴起而为,其源可以从1966年再往前探寻,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中共高层斗争的延续。10年“文革”也是一段文化历史,在毛泽东刻意要砸烂所谓旧体制而制造的文化荒漠上,却在全国涌现出无以计数的年轻人,在紧跟领袖的革命和造反中,强化了旧体制里业已存在的领袖专断、思想封闭和随之而来的个人迷信,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从中共走上神坛的最高领袖,延伸到民间普通百姓的一种专制文化现象。其源更深更广,可以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积淀中去探寻。但探寻历史原因是一回事,现实是,官方总要拿一些人来为这一段逝去的历史承担责任。

1983年,中共山西省委开始按中央部署,在整党中清理“三种人”,刘灏再次成为革命对象,两年后,被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报请市委批准,开除了党籍,同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成了太原市北郊区一

名普通职工。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建功说：“刘灏、段立生不用什么材料，他们不会杀人放火，就凭他们是头头就可定他们‘三种人’”当时的区委书记李海恒在与刘灏谈话时，就明确告诉他说：“对你如何处理，全是上面的意思。”太原市北郊区那块土地，终于成了刘灏前半生的归宿和后半生的开始。

对刘灏的政治结论是“三种人”。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当年官方的解释，是指“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打砸抢这种行为，比较容易界定，但“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 and 帮派思想严重”，则在界定中弹性极大。

以刘灏为例，他起来革命造反时，中央高层尚未形成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更没有“四人帮”一说。如刘灏这样的中学生们，是听从毛泽东的号召，按照党中央文件精神，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指引，积极投身“文革”的革命小将。他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被中央肯定



当年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领袖如今成了朋友。前排左起为红联站发起人李青山、杨保明、兵团发起人刘灏、红总站发起人郝庭云；后排左起为十中七一发起人马尚文、红联站于永革、张玉峰。

为左派革命组织。谢振华主政山西后，刘灏听从谢振华的安排，经过学习班炼狱般的七斗八斗和自我检查，又下乡锻炼，才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谢振华没有上了林彪的贼船，刘灏自然也没有追随林彪了。至于和“四人帮”，刘灏更是没有丁点儿关系。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王洪文主持中央会议批判谢振华，而刘灏却是支持谢振华的基层区委副书记。追随“四人帮”批谢振华的，不是刘灏，恰恰是接替谢振华主政山西的王谦。说刘灏“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没有根据，但他曾是山西一大派组织兵团的司令，曾是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这是事实。当时的当政者把“三种人”的界定范围一扩大，一模棱两可，就可以定性了。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 1983 年 4 月 23 日联合下发的 1983 年第 6 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不搞记录在案，个别触犯刑律、当时已成年的学生另作处理。”该文件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信任。”在山西的十年“文革”中，刘灏并没有触犯刑律之事，按上述文件规定，如他这样的中学生，连记录在案都不搞，更不应该给戴上三种人的帽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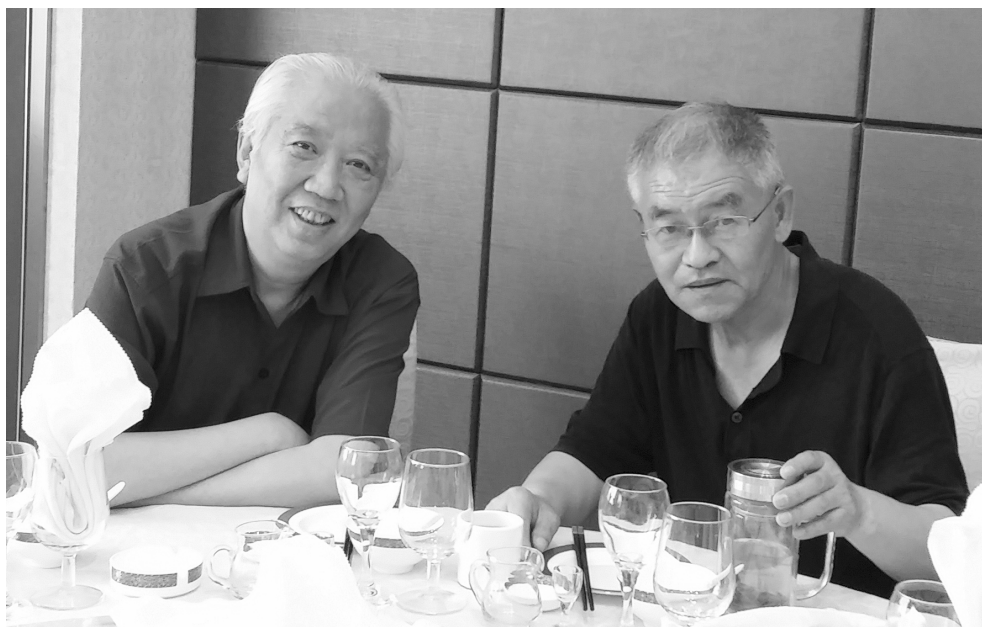
当年红联站的领袖，与林彪、‘四人帮’也没有任何联系的段立生，与刘灏一样，也被定性为“三种人”，被太原清徐县委报请太原市委批准，开除了党籍，撤消了一切职务。当年红总站的核心人物、原东风兵团的司令黄锐庵，与林彪、‘四人帮’也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听命于刘格平和其夫人丁磊，曾向山西省委夺权是事实，也被开除了党籍，定性为“三种人”。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是名工人，并非中共党员，也被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公职。

对如刘灏相似的年轻干部如何处理？中央当时并不是没有不同

的声音。可举原省委机关七一公社的负责人李辅为例。“四人帮”倒台后，任襄汾县委书记的李辅，与刘灏、段立生等年轻干部一样，曾被王谦整肃，中央派霍士廉取代王谦后，他被平反，并被省委派到平遥县，出任了县委书记。李辅到任后，成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政策的践行者。1981年11月15日，省委书记霍士廉专程到平遥县，召集县里四大班子成员开会，讲到这一年5月他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以李辅作典型，说李辅“文革”初期造过反，但没有参与打砸抢，本人有工作能力，在基层干得也不错，像这样的干部该怎么办？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和中组部赵际清副部长等首长当即表态：像这样的同志，仍要作为党的优秀青年干部来培养。

但到了1985年，霍士廉调走，省委书记易人，李辅还是被省委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同时撤销了一切职务。

对“文革”初期，听毛主席的话，响应党中央号召，有担任过群众造反组织领导人历史的年轻干部，类似的不信任，还有例可举。



作家孙涛(左)与刘灏

曾任昔阳县委书记,后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的侯光天,任昔阳县委书记时,在前任书记刘树岗工作的基础上,一边平反全县遗留下来的三千多件冤假错案,一边通过干部年轻化,领导全县人民抓农田水利建设,大搞植树造林,涵养水源,调整了产业结构,全面落实生产责任制,使受极左思潮侵害严重的昔阳县全面拨乱反正,走上了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因政绩突出,被调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但因为“文革”时期在山西大学时,是8·8一派的领导人之一,先被记录在案,接着在1987年2月被免去了晋中地委副书记的职务,再不给安排工作。

对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兆田的处理,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卢功勋在1987年10月6日省委召开的老干部会议上,在所做的情况通报的报告中,有一段说明:“还有一类是象原省水利厅李兆田那样的特殊情况。李兆田在‘文革’一开始就积极造反夺权,是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头头,曾策划组织过两次武斗,造成四十人死亡的严重后果。73年末至74年上半年,参加了张珉、赵凤岐组织的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表现积极。75年被逮捕,后判处有期徒刑十年,79年3月平反。核查开始后,对这个人的认识一直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认识是,李在‘文革’前期确有问题,但后期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并受迫害,是觉悟并付诸行动的表现,前期问题不必再追究。另一种认识是,李反对‘四人帮’并受迫害,已平反,后期是非已分清,前期问题严重而从未处理,应重新作出严肃处理。对这一问题,我们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究讨论,采用了‘不定性、不处理、党员不登记’这样一种特殊的办法予以解决。做到了既分清是非,又解决了问题。对类似李兆田问题的其他人,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同样收到了好的效果。”

李兆田“文革”初起时,紧跟领袖造反,因根红苗正,被推为一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文革”的进程中,他又成为反思“文革”,

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在‘不定性、不处理、党员不登记’后，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这样对待一名领导干部中由参与“文革”，到反思“文革”，再到反对“文革”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连工作的机会都不给了，如此处理，果真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吗？

山西清理三种人从1983年年底开始，到1987年结束，“先后列出核查对象2126人，查清问题的2070人，结案1986人。定为三种人的共285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672人，维持原结论的52人，非党工人中问题严重，采取不定性，把问题如实记录装入本人档案的111人，问题严重，因情况特殊采取‘不定性、不处分、党员不登记’和‘不定性、不处分、记录存档’的13人”。（摘自1987年《卢功勋同志在省委召开的老干部会议上关于全省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情况通报》）

毛泽东当年害怕他死后，有人否定“文革”，主持中央全会否定了“文革”的邓小平、陈云，恐怕也担心他们百年后，有人再以党中央的名义，去翻他们定的案来肯定“文革”，所以，他们力主把所有在“文革”中当过群众造反组织领袖，后来被提拔的青年干部，统统以“三种人”之名驱入另册。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首长的想法，自然被抹掉了。

在山西，曾跟着康生、江青向省委造反夺权的刘格平等领导干部，曾跟着江青、王洪文批谢，又跟着批邓的王谦等领导干部，并未去承担“文革”中的责任和处分，而刘灏、段立生、侯光天、李辅、李兆田、黄锐庵等一些当年的中学生、大学生、青年干部，却分明成了承担这种历史责任的悲剧角色。然而，客观地说，他们，包括与他们一道革命造反的那些省城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以及与他们一样，将领袖毛泽东奉若神灵、按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而革命造反的一些年轻干部们，又能承担得起山西10年“文革”的多少责任呢？再往大里说，在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都有难以计数的被批斗者死于非命。

这些冤死者、以及在各种武斗中的战死者和被无辜殃及生命的死伤者，又能向谁去讨还一份该承担得起的历史责任呢？

由于党内外都有人被定为“三种人”，足见处理“三种人”不属于党内的纪律处分。再以法律而论，在中国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三种人”这种定义。打砸抢者，可以按刑法论罪。参与了林彪集团的人物、参与了“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也可以按参与林彪集团和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一案论罪。而“文革”之初成立群众造反组织，特别是像兵团、红联站、红总站这样的一大派群众组织，是当时的党中央和党中央领袖发动“文革”的产物，是被当时的党中央文件肯定了的“革命左派组织”和“革命组织”。它们的领袖刘灏、段立生、侯光天、李辅、李兆田、黄锐庵等，都是要紧跟伟大领袖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年轻人，有革命造反之实，却无篡党夺权之罪。在最高领袖和党中央的一次又一次动员号召下，他们激发出火热的参与行为，正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动员号召进行“文革”的必然。他们在“文革”之初都做过红闯将，“文革”中间也都做过被革命被批判的斗争对象，做了官后，也都想做个按毛泽东思想做人行事的好官，这正是他们既有不同派性，又有共同思维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搞过很多运动，“文革”也是一场运动，如历次搞运动一样，党中央总要先发动一批积极分子，借力推动运动，刘灏、段立生、侯光天、李辅、李兆田、黄锐庵等，就是山西“文革”运动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当毛泽东逝世后，这些积极分子们，却不得不去替领袖承担起“文革”的责任。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想就刘灏这名中学生、段立生这名大学生和黄锐庵这名青年干部三个人的命运，做一次假设。谢振华在山西主政后，山西政局正在渐渐平稳。刘灏完全可以去北大当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从此跳出山西，留在北京，生活在父母身边；以段立生的能力，也完全可以调出山西，去省外的某一个大城市工作，或从政，或搞

某种专业发展自己；至于黄锐庵，与妻子全是广东人，如能调回广东，一定也能成为改革开放中的活跃人物。如果我的这种假设成立，他们的人生将是另一种命运。为写作此书，我曾和刘灏、段立生、黄锐庵分别在聊天时谈过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却变不成后悔药。在“文革”时代，他们无疑是时代的精英。他们只想按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理解，对党中央文件的理解，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既没有登上林彪的贼船，也没有被“四人帮”网罗。在山西的三大派争斗中，他们更没有如杨承孝那样，因挑动和指挥武斗而背上了血债。正因为他们不是碌碌无为之辈，正因为他们一心想参与文化大革命，并在山西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所以那个时代，他们组建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并被拥戴为领导。错误的时代潮流，最终让他们收获了人生的悲剧，这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历史现象。他们投身那场大革命时，是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并非私心驱使。他们发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肯定的革命行为；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心想跟着领袖在“文革”中建功立业。紧跟毛主席，忠诚毛主席，是“文革”年代无数年轻学生、年轻工人、年轻干部发自心底的心声和不可质疑的信条。还有一点不可否认，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让他们在“文革”中又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经历了炼狱般的七斗八斗之后，还是舍弃不了后来到手的官位，并希求在已经坐上的官位上，继续借“文革”之势上升。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当领袖将全党全民领进死胡同里自相残杀后，“文革”结束了，领袖睡在了纪念堂里，曾不断地给他们送来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那些让他们精神振奋投入“文革”的白纸黑字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已成历史，现在，又以另一种权威的腔调发声了，而他们，却不得不继续留在死胡同里，被做了“文革”的殉葬人。

【12】罪与罚的话题

在山西,还有谁应该名列刘灏、段立生、黄锐庵、郝庭云等之上,去承担“文革”的责任呢?

刘格平是在山西领头造反,策划了 1·12 向中共山西省委夺权的核心主谋。更重要的,刘格平向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提供证据,是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提供所谓 61 个叛徒集团罪证的打手。他是山西第一个“三种人”。

事实却是,在山西 10 年“文革”中,最早写出联合署名五人大字报,带头向省委夺权的刘格平等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支持他们的“支左一杆旗”张日清将军,他们的政治结局和人生结局都很好。

现将他们六人的一些情况综述如下:

刘格平系河北沧州人,回族,1922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 年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这是我国北方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向北洋军阀打响的第一枪。1926 年 7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主流媒体作了报道,称其为“我国民族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之一”。1999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格平文集》。这是丁磊为丈夫操办的一件后事。“文革”初期由刘格平和刘贯一合作的“两人大字报”,还有刘格平亲自挑头写出的“五人大字报”,应该是刘格平一生中重要的两篇文章,自然不会收入其文集了。

党中央对发生在 1936 年北平反省院中的那桩公案的当事人,都有了政治结论。1978 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为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案平反。中组部的意见中写道:“薄一波同志在反省

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天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当年不同意在《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出狱,比薄一波这批人又多坐了八年牢房的刘格平,在中办学习班受审查后一直被下放劳动,没



作家孙涛诚邀部分帮助提供史料、订正史实的“文革”亲历者聚餐后合影。年龄最大者已过耄耋之年。逝去的历史,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

有安排工作。1983年，中央也给刘格平做出审查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

刘贯一系北京通州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在百度百科网页上，介绍了建国前后刘贯一的革命经历。其中，建国后他的经历如下：“建国后，历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著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和小说《流浪》。”原来刘贯一还是一位作家。刘贯一曾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敌工部部长，是陈毅元帅的老部下。在有关新四军的一些文献和回忆文章中，多有关于刘贯一当敌工部长时，在陈毅领导下建功立业的记载。当然了，关于他在“文革”中随同刘格平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紧跟这个司令部的“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中共山西黑省委”夺权的历史，在这些史料中均未有回忆和描述。

袁振系山东掖县(今莱州)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被调离山西后，先后在安徽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曾出版过由万里作序的《袁振诗选》。2004年8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当年的“新华社8月27日电”在介绍了袁振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光荣履历后，最后这样评价袁振“在不同地区和岗位上，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这“不同地区和岗位”以及贡献，是否包括了他在山西的那段历史？是否包括了他在1966年中央华北局会议之后，参与由刘格平领导的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紧跟这个司令部的“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中共山西黑省委”夺权的经历呢？对于袁振，对于后人，这段经历似乎应该忘掉了。

何英才系山西洪洞县人，因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国农林水利工

会主席的职务,在“中国农林水利工会政务网”上,可以查到有关何英才的小传。他是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着不平凡的革命履历。小传中这样介绍了这位老党员在“文革”中的经历和结局:“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74年8月15日在太原含冤去世。”这种文字是后人写的“历史”。当他在“文革”中与刘格平结成同盟后,却因为建国前做党的工运工作期间,在地下斗争中,曾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也就成了兵团和红联站反对刘格平时,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大叛徒的帽子一下子就被造反派们戴到了他的头上。抹掉“文革”前期的历史,而只说当事人在“文革”后期的遭遇,何英才确实也成了一个受害者。

陈守中系河北阜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享受正省级待遇。2006年10月31日在太原逝世,享年95岁。《山西日报》发的消息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确实不假,确实是一种盖棺定论。正是由于这种“忠诚”,陈守中才会在“文革”中参与由刘格平领导的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紧跟这个司令部的“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中共山西黑省委”进行夺权的斗争。当这种历史需要避讳和无法书写时,这种历史也就只好被后人忽略不计了。

再说说张日清这位将军。他在“文革”之初与刘格平一道联手造反,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紧跟这个司令部的“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中共山西黑省委”进行了夺权斗争;在夺权后又与刘格平渐渐势不两立,终于同刘格平一道被调离了山西。张日清将军后来担任了武汉军区顾问,于2005年10月14日在武汉逝世,与刘格平一样,享年也是88岁。“新华社武汉10月28日电”中,介绍了其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其种种浴血奋战的革命履历。媒体对这位共

和国将军的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高级指挥员。”

我们还以上述这六位党的高级干部为例，他们确实是一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奋斗过的老革命、老军人。他们的一生，确实有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为尊者讳。后人实在也没有必要再去责问他们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了。

还应提及一下陈永贵和李顺达。

新华社记者、曾与陈永贵有过多年直接交往的冯东书先生，在其《“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 3 月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全国搞了一次政治大清查，清查“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一个大“造反派”没有被清查，他就是陈永贵。

“文革”前，陈永贵在大寨创立了大寨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许。“文革”中，陈永贵扯旗造反，将大寨渐渐变成了极左的前沿阵地，本人也被毛泽东提拔到身边，做了内阁近臣。“文革”结束后，这位传奇农民，终于在政坛上黯然离去了。1979 年底，陈永贵被中共晋中地委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 年 8 月 30 日，被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198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其中第一条写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

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不要登报点名批判),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

陈永贵的问题,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了责任。陈永贵付出的代价,便是在这一年12月山西省选举中共十二大代表时,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落选。根据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当陈永贵不再一手遮天之后,昔阳县委在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起。(此数字见《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据《山西大事记》(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80年8月条目下记载,中共昔阳县委组织力量清查“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中,造成的141人非正常死亡案件,全属冤假错案。

1983年党中央安排陈永贵去北京东郊农场当了顾问。陈永贵从大寨虎头山上走出来,一直走进北京,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又从天上落地,还原了本色,头上的那块白毛巾没有变,又成了农场年轻人眼中朴实无华的永贵大叔。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陈永贵在“文革”中扯旗造反，是时势造就的一位传奇式的农民英雄。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无数劳模中，陈永贵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文革”10年中，由一位基层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成为县委书记，又成为省委领导，最后迈进了党中央政治局，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你斗我，我斗你，而陈永贵却“一贯正确”，只斗他人，青云直上，在中国的广大农民，包括广大干部中，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个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格外垂爱陈永贵这位农民，不能不说是成就了陈永贵的重要原因。

山西清查中李顺达遭受的冤案，在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调离山西后，被省委彻底平反。之后，他担任了省农委的副主任，1983年，又当选为山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7月1日，这位被乡亲们和与他共过事的同僚们称为老实人的老劳模，在佛教胜地五台山溘然长逝。享年68岁。



张志安陪同老作家胡正前往赵树理故居

山西“文革”前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被上述这些造反派们造过反、革过命的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其实与他们是殊途同归。卫恒终于得以平反。王谦、王大任等在调离山西后，也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分别担任了党的高级领导职务，直到人生谢世，被冠以与刘格平等五人一样高基调的盖棺定论之词，回归了历史的长河。

具体介绍一下老干部王谦和老将军谢振华。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彻底否定“文革”的战略部署中,决定由霍士廉担任山西省委第一把手,免去王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离山西,出任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在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首长的亲自过问下,山西开始拨乱反正和走向安定团结了,谢振华的彻底平反问题,以及山西一大批被清查的干部的平反问题,成了山西新省委要解决的一件大事。

10年“文革”后期在山西省委主政的王谦书记,在80高龄接受其家乡的两位文史工作者采访时,也谈到了他在1980年被党中央调离山西时的情景。这位在“文革”中被人狠整过、也狠整过别人的老人,对自个在主政山西时清查扩大化的历史,依旧耿耿于怀,拒不认错。照录如下:

我在调出山西的时候,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说:“我在山西的功过是非,我不要求中央给我作什么结论,中央要给我作结论可以。”他说:“中央谁要给你作结论?谁也不能给你作结论。”我说:“是呀!我也不要求作结论。中央给我结论我也是同意的,我认为是对的,我赞成,我认为是不对的我照样不同意。”我说:“我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至于功过是非让后人作结论去吧,也许7年,也许20年,也许50年,才能说清楚。说我扩大化我不承认,我清查的是造反派,而且是10年一贯制的造反派。有的省指名道姓的清查最后作了结论的有一万多人,有的判刑,有的开除,这不叫扩大化?我们一共不到500人做结论,这叫扩大化?还有另外一个省4000多人,一个省7000多人,这三个省不叫扩大化,我们叫?”

(摘自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平定现代名人谱》中张裕财和李宿定采写的《我的出身和经历——王谦同志访谈录》。)

据王谦向一些老同志们回忆，“文革”中他被打倒那几年，曾被批斗过二百来次。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王谦是“文革”的受害者。这种受害者太多了，正是他们的反思，才有了党内对“文革”的否定。但王谦却是另类。他在晚年曾请山西一些老同志聚谈，有人写文章，复述王谦的看法：“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从指导思想到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么，三分错误出在哪里呢？是走资派的干扰破坏。”此处所言走资派，是指邓小平吗？复述者没有解释。王谦还想把当年造过他反的兵团、红联站的领导们全找来坐一坐，共同谈谈对“文革”的认识，只是因为后来身体健康恶化，又听人说这些人大多数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此事也就放下了。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当年第一个炮打卫、王、王的中学生刘灏，绝对没有想到，晚年的王谦，这位曾被打倒的走资派，在对待“文革”的认知上，竟然会与他这个造反派有了共鸣。历史真如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能将一些人的思想甩出，也能将一些人的思想吸入。

那么，被陈永贵和王谦必欲批倒批臭的谢振华将军呢？在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谢振华于1977年12月出任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参加中共十二大，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之后，又出任了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亲自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收复老山、者阴山等我国主权地区的战役。

历史进入了2006年。这一年10月22日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搀扶着老红军代表、90高龄的谢振华将军缓步进入主席台。谢振华将军代表老红军作了发言。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这一切，都是历史延续的现实。

俱往矣！他们都盖棺定论了。

刘灏、段立生、黄锐庵、郝庭云们，他们岂能与这些政治家们和老劳模们相比！

如刘灏这样的中学生，如段立生这样的大学生，如黄锐庵这样的青年干部，如郝庭云这样的青年工人，他们难道能承担起山西 10 年“文革”的责任吗？

曾在“文革”中倒了霉的保皇派者，如当年的工人诗人张志安，虽也蹲过大狱，但终未构成政治问题，退休后虽不再写诗歌了，但还在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做着副主席。经他主持开发整理出赵树理故居后，一直在那里工作。那位曾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刘普德，从大狱出来后获得平反，也分配了工作，在退休前，职务是太原钢铁公司一家下属工厂的党委书记。还应该提一下兵团的另一位中学生领导（也是太原六中 32111 公社的领导之一）刘大康。他在“文革”后期 1972 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进入北京的一所名校，跳出了山西的政治环境，“文革”结束后出国留学，成了旅居海外的一名学者。

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不是党员，是省电力系统的一名工人。被定为“三种人”后，1984 年被开除公职，于是下海经商，后因经济上出了点问题，经商不畅，遂于 1986 年 2 月某日，即农历正月十五之夜，携年轻漂亮的身为省歌舞团舞蹈演员的妻子，与带着情人偷渡台湾的一名船老大结伙，越过了海峡，到达台中市某港口。被驻防在当地的台湾当局军队拦截后，这位红总站的造反派领袖当即向对方表示，说自己是受中共当局迫害的造反派，要到台湾“政治避难”。经对方研究后，台湾有关方面正式向他们表达了态度：不许登陆，责其返回大陆。人家送他们一些燃料和食品，派出一艘军舰，将他们的船押向大陆。就这样，郝庭云夫妇和那名船老大和其情人，尚未登上台湾宝岛的土地，就又被台湾当局的武装人员送返大陆。郝庭云先被福建

省莆田县公安局扣捕,后被送回太原。这位当年山西电力系统基层的普通工人,趁“文革”而成为红总站总指挥的郝庭云,被检察院针对其偷渡台湾一事起诉,于1987年8月被判12年有期徒刑。郝庭云刑期未几即被释放,之后,继续下海经商,风生水起,开始了属于他个人的另一段人生。

【13】答案需要历史来回答

历史是一行行记录现实的履痕。现在,我们需要提及黄炎培和毛泽东那个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了。1945年,黄炎培参观延安之后,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无疑是对的。问题是,在执掌了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头脑里的帝王思想和他践行的帝王文化,渐渐取代了尚有的一点民主意识。在他被尊崇为“人民大救星”的同时,他本人和党内及民众中,将他的一言一行当成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领袖终身制的体制,也促成了领袖以自我意志,凌驾于全党和全民之上,将打倒蒋介石政权前,向全党和全民许愿的人民民主新制度改换了内容。“文革”的发生,正是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政治环境下的产物。

历史是一条无法割断的长河。在研究毛泽东的时代时,我们应首先正视其领袖终身制的制度弊端,和这种制度在中国所以能形成的



“文革”历史研究是2014年夏日这次小聚的话题。前排右起：李辅、王宪斌、寓真、王艾生、傅业、周宗奇；后排右起：赵瑜、张玉峰、成葆德、孙涛、陈为人、赵国增。

封建文化的土壤。党内民主的不健全，促进了形成现代君主制，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现代君主面前，形同虚设，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失去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正是人治取代法治的极端体现。其次，应正视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继续执行自我授权的干部制度，造成了干部只对上负责的事实。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公检法失去了互相制约的作用，而“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更助推了不要法制的浊浪。试想，如果我们有一套上级领导无权左右，造反组织无法砸烂的公检法制度，在新闻政策上让全民都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社会环境中，“文革”的浊浪能畅行无阻吗？最后要正视改革开放后渐渐出现和加深的社会矛盾，正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社会种种矛盾的客观延续和加剧。这三条的总根子，还是缺失了建国后对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我们不能改变曾经发生的历史，却不应忘记曾经发生的历史。非如此，历史就可能重演。

从出狱至今，刘灏几次回北京去看他的父母双亲，几次途经天安

门广场,那番感慨是无法描述的。他的眼前幻化出昔日的“红太阳”,而“红太阳”正永远地沉睡在他的纪念堂里。几度举足又止,几度徘徊又去,他还是没有勇气迈进老人家那高大的寝宫,去瞅一眼再不能指挥“文革”的伟大领袖。老人家呀老人家,你何以要弄出那么一场“革命”来,让我们清清楚楚又糊里糊涂、万分虔诚又万分疯狂地起来造反,栽了人生中无法弥补的大跟头呀?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末。刘灏已是 50 多岁的人了,他去北京看望老母亲。已过了 80 高龄的袁振,正好也住在北京看病。两人又见面了。相对无言,两人的脑子里,大概正同时翻腾着在山西太原相识的那些往事。不知怎么着,话题突然打开,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怎么共产党内的斗争,总是血雨腥风?怎么共产党内的斗争,在自伤中,又总是要伤及无数人民群众呀?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已经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不搞政治运动,难道就不能执好政?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起那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呢?

两人都曾在“文革”中残酷地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残酷地斗过。他



原省城三大组织的领袖刘灏(左)段立生(中)郝庭云(右)共话“文革”历史

们是亲历者,是过来人。

答案呢?答案需要历史来回答。而随着历史的远去,答案将会各自不同而长期共存。因为,研究和探寻毛泽东发动那场“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10年中,其高居神坛之上不断变化的心路历程,一代一代的研究者们,可能会解密出各种不同的版本。而这种研究、探寻和解密,则不在我此书的写作范畴中了。

【14】文化革命和文化复兴

在中国历史上,如刘邦和项羽都会青史留名一样,毛泽东和蒋介石这对生死冤家,也必将双双永载史册。

毛泽东在晚年病重时,曾经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嘛!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收回那么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经历千辛万苦,投身武装斗争,走上了井冈山,终于靠枪杆子杀进北京城,创建了新中国。此事必将伴随着历史长河,被中国人民千古流传。毛泽东的悲剧,在于渐渐走上神坛后,由过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革命家,变成了不要法制、相信

人治的执政党领袖；在他人生的晚年，以一人治国的终身制现代君主的心态，用一位诗人浪漫的情怀，发动“文革”运动，造成国家和民族的10年浩劫。这第二件事，也必将伴随着历史长河，被中国人民千古流传。

在“文革”中，全党全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我们可以翻拣出一些早已消失的文革词语：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最高指示，万寿无疆，一句话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等等。这些过时的词语便是对那个年代个人崇拜的一种诠释。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人民尊敬和信仰领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领袖搞个人崇拜，则是一人之私。因为只有全国全党上下形成如此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毛泽东才可高坐于神坛之上，用一己之力，借助全党全民对他的个人迷信，打倒他想要打倒的人，办成他想要办成的“文革”伟业。“文革”由毛泽东一人发动，却有亿万民众跟随，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和年轻的干部们、工人们，他们起初投身于这场“革命”时，是虔诚的，从而造就了在中国这片封建文化积淀极深、新中国建国后又自我封闭的土地上，演绎出了一曲人与“神”共舞的闹剧。然而，与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年轻的干部们和工人们相比，在神坛上的毛泽东却始终是清醒的。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摘自席宣、金春明合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二版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史书记载，秦始皇身边，先后有徐福、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多名方士侍奉，以近臣身份，为其求仙求药，以期长

生不老。而毛泽东明白他不会万寿无疆,他希望的,是他的“文革”伟业,能千秋传承。可惜,当正义对强权无奈时,强权对时间也无奈。毛泽东最后对手,成了他敌不过的历史老人。毛泽东一心想建树的“文革”伟业,成了他晚年充满浪漫和悲情的一场失败的政治实验。

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胜利后又展开的腥风血雨斗争中,胜利者是毛泽东,失败者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然而,当胜利者最终于1966年走上“文革”歧路,要横扫中华传统文化时,失败者却在台湾开始了反思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我读到了刘作舟刊发在《都市》2011年第4期上的文章:《感受我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台湾记游随笔》,特摘录一段:

1966年,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倡导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任总会长,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文复会”创建了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开展文化复兴的全面工作。这些做法虽有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之嫌,但无论如何蒋介石在复兴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好事,值得为全体中国人所称道。

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文复会”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新倡导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抵制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增进社会和谐。

这场历时二三十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于蒋经国去世后告终,它在台湾完成了“去日本化”的任务,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我敢断言,只有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够担当起扫荡入侵并殖民于台湾的异质文化,完成重新凝聚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除此以外,任何其他文化和“主义”都是不行的。仅此

一端，蒋介石父子功莫大焉。如果没有蒋介石父子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可能早就脱离祖国的怀抱了。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有善于反思，能够与时俱进，传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前行。

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

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从“文革”中《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到毛泽东主席发动“批林批孔”,再到经过改革开放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回归传统文化,创新传统文化,历史就这样在绕了一圈后,继续前行。

2007年,刘灏度过了他60岁的生日。他的结发妻子张莉,是当年太原五中一位端庄典雅的女同学。自从与刘灏从相爱到结为夫妻,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位人品正派的男人,无论在动乱的年代,还是出狱后在平淡而清苦的生活中,他没有做过伤害朋友的事情。这对恩爱夫妇,早已习惯了平静且清贫的生活。一杯浊酒,无限滋味,只有满头华发,留着他们夫妻俩岁月的沧桑。刘灏依旧有许多朋友,有“文革”中的那些“战友”们,也有“文革”之后不断结识的新朋友们。抹掉了身上那些曾有的政治符号,从做人的个人品性上讲,与刘灏相识的人们依旧认为,他是可交的朋友。唯有感叹或咒骂一声的,是那场“革命”,还有那场“革命”过后,刘灏难以承受,却又不得不去承受的那份历史责任。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出了封闭,开始了复兴大业。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获得政治局讨论一致通过。讲话最后指出:

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

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制度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上。……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在那时,山西诗人张不代写下了一首诗,正题:《请注意,您的责任的高峰》,副题:《写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诗》。(见《张不代诗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2 月出版)

现在,当我将山西 10 年“文革”的历史叙述完毕之时,读者无疑也与我一道,完成了一次穿越中国 10 年“文革”微缩隧道的历程。

结束了。如梦般的 10 年终于结束了。

我们回眸过去,请刘灏夫妇、以及我在这部书中提及的诸多“文革”当事人,还有此书的读者们,和我一道,大声点,朗读张不代诗中的这一段吧!

就因为我曾太多太多地
面对东升西落的红太阳
唱过廉价颂歌,
而扭伤了脖颈。
——那是一页页
多么令人懊恼的日历呵,
多少天真浪漫的青年
却狂热歌唱过那么多
并不天真浪漫的事情;
谁背叛了我的颂歌在窃国越境?

谁亵渎了我的颂歌在私攫权柄？
谁玷污了我的颂歌在利欲熏心？
谁篡改了我的颂歌在尝试黄袍加身？
哦，能怪我年轻的灵魂
过于轻率，
过于混沌，
过于发昏？
可谁曾想过：
如此纯洁的神经
却犯下如此错误的原因！

后 记

回忆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而历史,便存在于亲历者的许多故事中。

作家用笔记录历史,更应该用思想面对历史,何况,我就是山西10年“文革”的亲历者呢!本书不是奉命而作,我只想用民间的立场和自己的思考,以刘灏为切入点,还原山西10年“文革”的历史。

在整个“文革”10年中,中央高层的斗争和权力演变,对各省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终身制的领袖已经由人变神,在神坛上一手遮天的高度专制体系下,虽然也有“让群众自己发动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最高指示,但“文革”的本质,只能是由领袖先造时势,而这种时势造就的无数英雄,又逃不脱领袖的掌控。具体到个人,连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那时也难以挣脱这种政治环境。具体到各种造反派组织,一个上山下乡的政策,让中学生们的这种组织不复存在;一个解放军支左、军管的举措,大学校院和工厂中的这种组织再难生存;“文革”中因言获罪的盛行,更说明“文革”的本质是个人的专制。

“文革”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那一个愚昧的年代,产生过悲壮也产生了悲剧,而其后的悲哀,则是这场悲剧被人们有意和无意地遗忘。做过恶梦的人,可能因害怕再做恶梦而想忘掉恶梦。但不再做恶梦就得弄清恶梦的成因。文坛泰斗巴金老人曾经呼吁建立“文革”博

物馆，原因之一，就是经历过那场恶梦的人还有的健在在世。10年“文革”，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乃至全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有其必然的由来，也有其深刻的教训。如果让我们的后人再如今天的一些编剧和导演那样，去随意地戏说“文革”，那10年的历史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警策意义呢？

这部纪实作品，既选定了以刘灏和他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为切入点，这样的结构，则会必然出现一些对山西10年“文革”中其他重要人物和事件的遗漏。我期望有更多人回忆和补充。只有无数的当事人变成无数面镜子后，才能从各个角度折射出山西10年“文革”的真实过程。

这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这部作品已经写完了。肯定有许多史料、以及无数历史的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收集和辩讹。最早着手这部作品的写作，是在1986年。起先邀银小骏一道进行了一部分社会调查，之后，在许多年中，我以马拉松式的写作方式，陆续采访了許多人，有的是专程询问，有的是在闲聊中，获得他们当时的有关情况或思想方式，有的当事者已无法找到，则只好去翻阅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了。这是一次很艰难的写作。“文革”10年，特别是“文革”之初的那几年，是一个全党参与，全民陷入悲剧的岁月。当“文革”被党中央以决议的形式否定后，有些当年曾冲杀在革命造反第一线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已不愿再提起自己的那段历史。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当年也曾参与向省委、市委革命造反的干部，更不愿述及自己当年的政治态度和种种行为了。这或许是一种痛苦，或许是一种不愿再揭开伤疤的心理，或许是一种希望自己这段历史不再为人所知的阴暗心态。这些，实在是悲剧过后，当年参与“文革”者们人性中的另一种悲剧。正因如此，我更感到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才是对历史的负责。我出版过不少作品，有的还很畅销。可

是,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我的定位不是畅销,只是对一段历史尽量原汁原味的记录。

2008年12月20日全书完稿。2009年10月,我将这部书稿修订后打印30本“征求意见稿”,分送一些老同志和山西“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当事人征求意见,2010年3月和2010年5月,又先后将修订稿各打印30本,以“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和“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分送一些亲历者征求意见。2011年3月,我再次将增删后的文稿打印30本,以“第四次征求意见稿”的形式,继续向一些同志征求意见。2011年7月,我将这部书稿陆续在我的新浪博客“昨夜涛声”中发出,实际上形成了面对更多读者的“第五次征求意见稿”。感谢一些“文革”的当事人在阅读了我的打印稿后,或给我指讹,或向我提供我尚不知晓的历史细节。也感谢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文朋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评点此稿并提供史实,从而形成了“第六次征求意见稿”。2013年1月,我又以征求意见总稿的形式(即第七次征求意见稿),印制三百本,再次向一些朋友们征求意见。在得到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帮助后,我对书稿又作了大量增删,并根据一些朋友和学者的意见,将书名由《虔诚的疯狂》,改为《虔诚与疯狂》,自费出版,少量印制。这次出版后,我又得到许多读者朋友的支持,或提供史料,或订正史实,于是,我又对全书做了一次修订。我相信,书中肯定还会有失准之处,希望继续得到更多热心山西“文革”历史研究的朋友们的指正。

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中论及史家该如何写史时,有这样的教诲:“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以此标准,对照此书的制作,我不敢说做到了,却敢说已经努力了。

“文革”是一段历史。历史是人类生命长河中的客观存在。“文革”毁灭了国人传统的道德底线,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的滥觞,难道不是

在这个基础上滋生出的罌粟花？官场上腐败的横行霸道，难道不是这罌粟花结出的恶果？想想吧，“文革”的发动者、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们，终有一天，会统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今我们不记录下他们的真实故事，岂不是对历史的失职！我不知道后人如何去追述“文革”的历史，也不会知道后人如何去评价“文革”的历史，我只知道，我是真实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中，发生在太原、山西的一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真相存在于亲历者的故事中，记下他们的故事，便记下了真实的历史。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总结那段历史的沉痛教训，是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知识分子应当勇于担当的一份责任。正如杜牧在他那篇千古流传的《阿房宫赋》中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最后，有两点需要向读者说明。

一：书中凡五一广场群众组织集会的人数，以及一些武斗的参与人数，全系根据当时群众组织的宣传品而来。如1967年6月20日决死纵队有万人围攻省委党校，是红联站当时发布的数字，分明是要宣传决死纵队的恶行；同年8月8日决死纵队攻打平遥城，决死纵队的报纸报道出动了五千余名决死队员，分明是要宣传攻打平遥他们是主力军；至于出动七万工人平息十中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则是红总站当时的宣传。这些数字肯定注了水，但当时真实的数字，已无法查证落实了。

二：此书之前已有八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得到各种意见的同时，也有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人，抄袭我的文字，拼凑成文，据为已有。为宣示我的著作权，特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由我少量印制，继续向山西“文革”亲历者和当事人征求意见，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

言犹未尽，且为后记。

1986年夏日起笔。

2008年12月20日全书完稿。

2009年10月11日第二次补充并重校。

2010年3月20日至4月30日再修订。

2010年10月至2011年2月25日再修订毕。

2011年7月开始在新浪博客连续贴出。

2011年12月31日完成重新修订。

2012年11月30日再次修订毕。

2013年1月印制征求意见总稿。

2013年12月再次增删毕。

2014年3月此书自费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

2016年3月再次增删修订毕。

2019年9月第二次修订毕。

附录：孙涛主要著作目录

长篇小说：

- 《朱衣道人》(198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 《风流恨》(1988年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 《西部人鬼录》(1988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 《葫芦迷阵》(1989年希望出版社出版。)
- 《金融家》(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与银小骏合著。)
- 《重返伊甸园》(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 “龙城三部曲”之《龙迹》(1997年济南出版社出版。)
- “龙城三部曲”之《龙碑》(1997年济南出版社出版。)
- “龙城三部曲”之《龙蚀》(1997年济南出版社出版。)
- “晋祠旅游文化丛书”之《天龙盗宝》(1997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 “晋祠旅游文化丛书”之《舍利之谜》(199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 “晋祠旅游文化丛书”之《云陶真人》(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 《龙族》(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纳入该社《小说界文库》。)
- 《麻雀》(2004年5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纳入该社《大众文库》。)
- 《傅青主》(2007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
- 《红军东征》(2012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系影视文学版。
与孙国强、梁志宏合著。)

中短篇小说集：

- 《不能停止的钟摆》(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散文随笔集：

- 《人生隔夜茶》(199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闲话晋商》(2006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 《我们的傅山》(多人集。200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

《走向全球》(1992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雨神》(1991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电视专题片、连续剧：

《晋魂》(30集专题片。1997年太原教育电视台制作播出。担任撰稿人。)

《晋颂》(18集专题片。1999年太原有线电视台制作播出。担任撰稿人并兼文学统筹。)

《傅山》(6集专题片。2003年山西省作协影视中心制作、山西电视台播出。担任撰稿人。)

《矿山人家》(30集连续剧。山西省作协影视中心制作,2011年5月央视八频道播出。担任编剧。)

《红军东征》(30集连续剧。央视制作,2012年2月央视一频道播出。担任编剧。)

